



宋斐如文集



宋斐如先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redacted]，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月由台灣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有民族救亡使命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入民族救亡和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其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溶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決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 陳映真

ISBN 986-7359-36-0



00250

9 789867 359384

定價：250 元

宋斐如文集 卷三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第四輯 日本政治

深圳台盟 主 編

楊 益 群 執行主編（特邀）

宋斐如文集. 卷三, 抗日運動 / 宋斐如著. --
臺北市 : 海峽學術, 2006[民95]
面 ; 公分
ISBN 986-7359-38-0(平裝)

1. 中日戰爭(1937-1945) 2. 中國 - 歷史 -
民國 26-34 年(1937-1945)

628.5

94026003

宋斐如文集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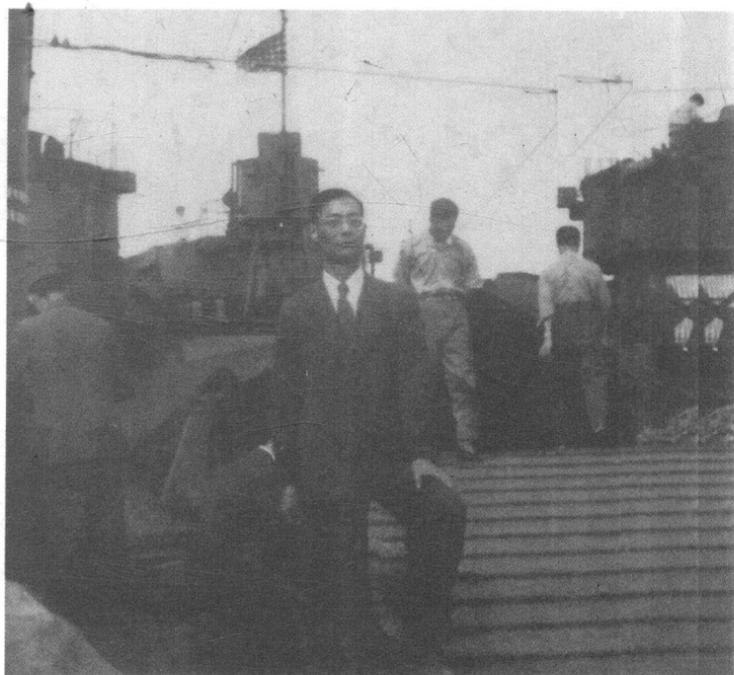
第三輯·日本軍事外交
第四輯·日本政治

著者 宋斐如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 : (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 : (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trevier@st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 : (〇二) 二二六七七七八八 傳真 : (〇二) 二二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 : (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 : (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十室
電話 : (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 : (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 : (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 : (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五八五四四四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出版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日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38-0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抗戰時期的宋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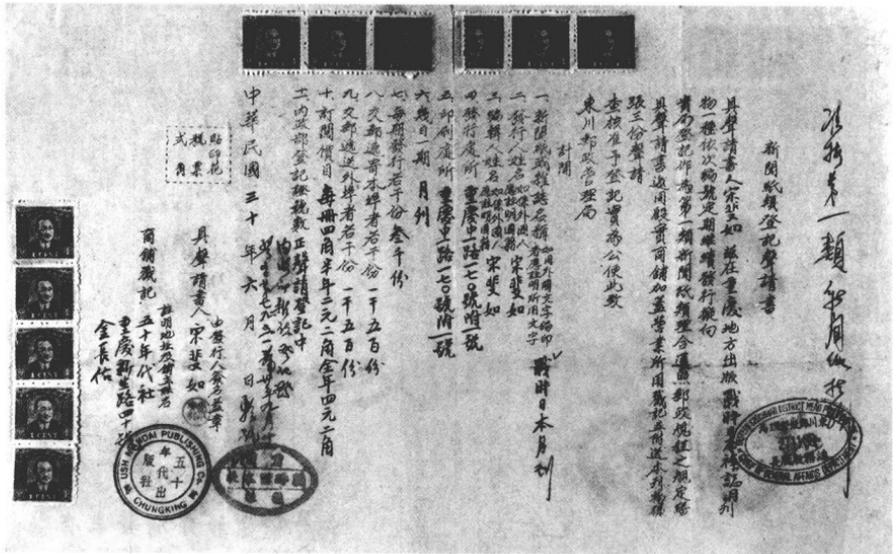
抗戰中的宋斐如

戰時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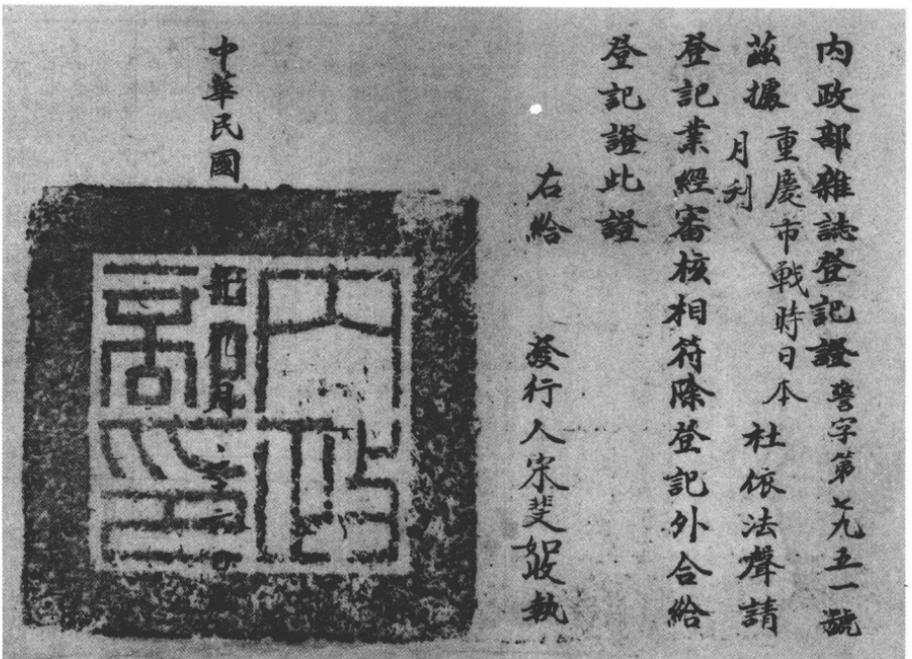
宋斐如主編

生活書店特約經售
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1941年6月《戰時日本》登記聲請書



1941年9月26日內政部發給《戰時日本》雜誌的登記證

目錄

宋斐如文集 卷三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 東條內閣內外動向的檢討（一九四二年九月）／3
日本戰時外交及其動向（一九四三年一月）／12
日本的軍事動向與我們的警惕（一九四三年二月）／21
日本最近軍事動向（一九四三年六月）／29
蘇日會馬上爆發戰爭嗎？（一九四三年八月）／33
日寇一年來的決戰設施（一九四四年三月）／40

第四輯 日本政治

- 日本無產政黨的研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61
日本新內閣之前途的黯淡（一九三一年一月）／120
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127
一年來的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155

日本右翼運動最近的狂態（一九三八年五月）／162

日本近衛內閣改組與軍部法西斯政府的確立（一九三八年六月）／170

近衛內閣改組與今後動向（一九三八年六月）／179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一九三八年七月）／186

戰時日本社會危機的發展（一九三八年八月）／192

日本工潮新階段的開始（一九三九年四月）／201

二年來沒落過程上的日本內政（一九三九年八月）／203

日本外務省派閥鬥爭及其背景

——戰時鬥爭激烈化的秘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213

泥塘中的日本內政（一九四〇年一月）／220

戰爭第四年日本政治總檢討（一九四〇年一月）／222

日寇特殊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和社會（一九四〇年九月）／232

日本的欽定憲法與陰性議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240

日本特殊選舉制與官僚政黨（一九四二年一月）／248

日寇國民政治的沒落——國民政治組織的糾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256

日本戰時議會本質的檢討（一九四四年一月）／264

如何鏟除日本軍權政治（一九四六年一月）／274

日本軍權政治終結與日本人民應有之努力（一九四六年一月）／278

第三輯

日本軍事外交

東條內閣內外動向的檢討

一、為何先南進

當近衛將首相交椅讓給東條的時候，日本的臨戰體制已被推到參戰的前一步。當時剩下的問題就是北攻好呢？南進好呢？當然，這只是一個時間先後的問題。日本朝野，持北攻之論者有之，主南進之論者也有之。前者以荒木貞夫為倡導者，他回想當年「出征」西伯利亞的經過，常以日本功虧一簣，深感遺憾。去年八月十五日他還在《國民新聞》上發表日本應貫徹攻蘇的主張，意謂：「……憶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吾人出兵西伯利亞時所獲經驗，不論多大抱負，滿腹經綸，即有一定方針，若無貫徹始終之決心與奮鬥到底之毅力，終至功虧一簣，當時情形即是如此，吾人出兵西伯利亞，即缺乏其最後之努力，為未收如期戰果，今仍引為遺憾。歷史不斷循環，此理今仍不變」。言下嘔嘔，大有無上感慨之況，但事實不如是簡單，荒木儘管作其北攻未圓的美夢，但南方資源的引誘，更為強烈。日本北攻的前提，是南進的成功，即其內部的穩健派，如元老重臣派及財閥等，也皆反對北攻。日本北攻蘇聯，為一極大冒險，即令不於短期內為蘇聯擊潰，其作戰也必拖延很久，軍需必不能繼續。欲作長期戰須先安定戰爭資源。當時美國對於日本北攻，也監視甚嚴，日本在未探得美國真意以前，北攻更為冒險。美國要求日本根本改變態度，始逼日本內閣更迭，東條雖然武裝了內閣，事實更不能不考慮美國態度，故須先解決南方問題而後北攻。是以東條內閣一面喧嚷北攻，同時又加緊對美的談判。

在美日談判進行中，日本軍部一再對美故作恫嚇之詞，自非偶然。上海敵軍機關報，《大陸新報》，以《德軍勝利所給予國際政局之影響》為題，大發厥論，稱：「美國亟

切盼於蘇聯未被德軍擊潰以前，由美日會談求得對日和解；日本此時無須亟亟期待美日會談有何成果。德軍在蘇之勝利，已最令日本在國際政局中之地位，趨於有利，英美此際不如重新承認遠東之事委諸遠東人之原則，方為得來」（去年九月廿二日）。

該報更於去年十一月七日倡言：「東條內閣之成立即以大膽打破此僵局（指美日談判）為目的」。當時，日本的外交重心在南方，南方政治問題不能解決，北進攻蘇自是失其理論的根據，沒有北攻的經濟基礎而倡言軍事北攻，終於變成空論。南進的理論終究贏了北攻的空談。日本軍事評論家及經濟專家，提供了更確切的理論根據。

二、南進的理論

日本朝野自前年以來因侵華戰爭曠久不決，乃高唱其「東亞共榮論」，企圖擴大戰爭範圍，欲於「世界範圍內」解決「中國事變」，其公開倡言征服的地域，已經擴大甚多，但想深慮切之士，尚不敢明言西伯利亞，而限其「共榮圈」於包括南洋各地。當時日本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自己的經濟關係須依存於英美及其勢力圈，但受英美的經濟制裁日益加緊，又須擺脫英美以自立。這才是北攻的界石，南進的推進機。所以日本一般盛倡：改變從前的經濟觀與世界觀，以確立包括南洋的東亞共榮圈。日政府當局也一再聲明南洋為「東亞新秩序」的一環，南洋已非單純通商外交的對象，甚至揚言南洋為其生命線，而欲排擊第三國勢力出於線外。當時，日本對外交動的代表指出如下：

第一，日本的經濟機構，擺脫依存英美的體制；

第二，強化德意日軸心的作用，調整蘇日外交；

第三，如不得已時，日本須有對英美行使武力的決心。

——日本軍事評論家匝瑳胤次，去年《改造》時局版九月號。

匝王差氏於是提出世界經濟四分論，以為未來的世界經濟，必將分成歐洲「部落克」、東亞「部落克」、英美「部落克」，及蘇聯「部落克」。當他論所謂東亞「部落克」時，也不過主張：「東亞國防體制的確立，必須荷印、安南、菲律賓、泰國及馬來亞的參加」。日本必欲先得南洋，經濟的動機大過戰略的動機。

三、南洋資源的引誘

日本經濟對外的依存性，還尚極其強烈：原料須由外國輸入，製品又須推銷於外國市場，近年來依存美國的程度，驟然增高，一九三九年日本對美洲的貿易總額達一八五，五〇〇餘萬元，在日本對太平洋貿易總額中占至三七·九%。只就美國及加拿大言；即占至三六·七%（據佐藤弘著《太平洋經濟學》）。美國及加拿大的資源極其豐富，對日貿易年年出超，其輸出物品，為戰爭、工業生產乃至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棉花、石油、鋼、鐵、機器及零件（包括飛機）、木槩、木材、鎳、及製品、鉛及其製品、半製品、全製品。美國對日出超為三六，〇〇〇萬元。加拿大出超也約一一，〇〇〇萬元。日本輸美加的物品，以生絲為大宗，屬於奢侈品。於此可知日本經濟機構如何依存於美洲，一二年來，日本經濟學者高聲呼叫：日本須急速改變其對美洲的依存關係，而美國敢於對日表示強硬，原因在此。

日本欲改進對美經濟依存關係的方向，在於開拓西太平洋以代替東太平洋，實言之，即確立日本的西太平洋經濟圈，包括香港、安南、海峽殖民地、菲律賓、荷印、澳洲及新西蘭。這些地方，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止，在日本對太平洋貿易中占很低的地位，一二·四%。但是這些地方的資源，卻強烈引誘著日本。安南及泰國的米產，澳洲的羊毛，

海峽殖民地及菲律賓的鐵、錫及橡皮，荷印的石油、金雞納霜、胡椒、棕欖油、橡皮、椰子、茶、咖啡、砂糖、烟草以及各種礦產，都是世界的名產。單就荷印講，金雞納霜年產一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九三%，胡椒產額占世界八二%，棕欖油占世界第一位（二十二萬噸），橡皮年產三十萬噸，椰子年產三八萬噸，皆占世界第二位，茶、咖啡及糖，占世界第四位，米占第五位，烟草占第六位。又在礦產中，錫年產七四〇萬噸，占世界第三位，原油產七四〇萬噸，占世界第六位。其中尤以蘇門答臘、婆羅洲及爪哇，石油藏量甚豐，其年產量約當日本產量三十六（？）萬噸的二十一倍，約當日本年消費額三八八萬噸的兩倍（以上均據佐藤弘同著，載日文《日本評論》一九四一年八月號）。

此外，南洋各地還擁有一三，〇〇〇萬以上的人口，對於日本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品，如人造絲織品、棉織品、生絲及人造絲、纖維原料，都是一個大主顧。這麼多的人口，以前對日貨的購買，雖不算太大，但若其市場歸日本獨占後，情形自必兩樣。此種情形若與西伯利亞比較，直如小巫見大巫。南洋的氣候，又為日本人民所喜歡；西伯利亞的寒冷及乾燥，日本人民大多視如畏途。所以日本北攻的意義，軍事重於經濟，僅就軍事戰略一點言，南洋地位也甚重要，西隔印度洋可與歐洲非洲毗連，東臨太平洋而與南北美洲混成一片，日本欲與英美爭霸，南洋為必得之據點。

企圖獨霸亞洲而又處於資源饑餓線上的日本，自然不能不重視此經濟軍事重點的南洋，日本攫取此地資源的方法，原有戰爭與政治兩種方法，日本政府未嘗不想以政治方法達到目的，故在年底以前日本的南進武力只推至安南，一舉一動，都要看看美國的臉色。

四、對美談判無結果

日本垂涎著南洋各地的資源，認為這些地方沒有抵抗力量，即其宗主國的英法荷也

已暴露無力，支持頹勢的唯一柱石，就是美國。美國已成日本南進的眼中釘，而必須拔去，其方法不是親和就是戰爭。

希特勒用盡種種的方法，要拉日本北進夾攻蘇聯；強迫維琪政府割讓安南給日本，率先承認偽汪政府；但日本為其自己打算，始終保持觀望態度，努力首先解除後顧之憂，美日談判遂至斷斷續續拖延了兩個多月，日本對美外交，在近衛的任期，沒有放棄親善的幻想，美日能否媾婚至東條上台前夕，達到非要決定不可的階段。東條內閣對擴大戰爭，在其上台時雖已彎弓勒馬，勢在必發，不能北攻也須南進，自日本看來，其關鍵完全在於美國的真意與虛實。日本已非迅速確定此真意與虛實不可了，於是，繼野村之後，增派來栖，用意已略與以前不同，再遣若杉□，態度暴露出更積極而焦急。

走在戰爭前面的日本對美外交姿態，吾人早即論及，日已不復是對美依賴、央托或懇求，而是刺探的、強硬的、戰爭的了。日本必須以強硬的手勢，刺探美國的真意與虛實，以決定戰爭的步伐與方向。日本的腹案是：德國若能很快攻到莫斯科，則可發動國軍北攻蘇聯，否則不暫觀望，亦須改變方針。同時美國若肯袖手旁觀，並由它在美洲南洋等地採購戰爭必需品。則日本北攻的勇氣，也可以增加，因此，東條上台後對美的態度，仍是硬中帶軟。例如日本外務省機關報，英文《廣知時報》當時曾對美國提出警告如下：「美國倘仍利用海參威，為運輸美國物資赴蘇之路線，則戰爭有延及遠東之虞，美國如欲對蘇實行有效適當之援助，則改善太平洋關係，當於美方有利。此種關係之調整，應以正確理解『東亞和平機構』中，須以日本政策為基礎。美國欲有效的援助蘇聯，故欲使援助蘇物資，經由海參威運蘇，而善意的日本，自極重要」（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社評）。

但以美日的根本矛盾無法調和，終致日本所希冀的美國姑息政策落空，實際所表現的，只是態度強硬而包圍日本又日益加緊，漸顯經濟制裁到軍事包圍的姿態。美國雖無

意即與日本戰爭，但其願以經濟制裁及軍事包圍兩把刀夾迫日本屈服，卻是事實。日本方面由海軍出頭應變，東條的海相龜田繁太郎，十月十九日向全國發表談話，竟稱：「日本海軍已完成一切準備，不僅擬解決『中國事變』，且擬應付當前局勢中之任何變化」。這不但是對美恫嚇，並是對日本國民的警告與暗示，所以日本各派均應聲強調對美戰爭的準備。

美日談判露出無改善結果的希望時，日本完全確定了狡猾的手法，一面繼續偵察太平洋的情勢，一面準備伺機而動。所以在美日談判還打得火熱的時候，日本海軍節節向南太平洋集中，狐嘴向北曠，而魔手卻向南伸進。前緬甸總理宇素向日本第五縱隊，供給秘密資料，加強了日本海軍發動的勇氣，太平洋戰爭終於在英美軍人還在安樂過周末的時候，突然爆發了。

五、「戰爭」與日本內政

日本採用自殺的手段南進，特種潛艇、特種飛機等等的採用，直以日本人民為戰爭機器，由於這種莫大犧牲與非人道的自滅政策，贏得了太平洋上暫時的勝利，武力南進獲得了意外的成果，東至阿留申群島的北端，西至孟加拉灣，南至澳洲中部，皆為獸蹄所踐踏。同時，在自然條件上也算占住了南洋豐富的資源，特別是戰爭資源。

日本南進的一時成功，是軍部冒險家的成功，直接影響日本兩大官僚勢力，起了決定的變化。元老重臣派不願意擴大戰爭，而軍部悍然為之，並且得到一時的勝利，於是軍事官僚的氣焰大漲，貴族官僚及其他穩健派，在政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近衛輩人幾乎完全退到後台，本屆總選舉的結果，民政與政友等有關的議席大為減少，而親軍派政黨的議員，占了壓倒的多數，政黨的力量漸以大政翼贊會為橋梁，建立起軍閥支配的單

一政黨，今年五月二十日已經正式成立了翼贊政治會，今後日本政治動向更加顯明。

翼贊政治會的宣言，強調「政治力結集」。這個口號自第二近衛內閣末期革新派即已提出，他們原想以政治新體制為號召，以大政翼贊會為帥領，組織單一政黨。當時大政翼贊會已為革新派所操縱，現狀維持派乃起而攻擊，指為「違憲」、「赤化」，結果革新派的計劃失敗而退出了大政翼贊會。革新派被驅出翼贊會之後，一面攻擊「大政翼贊會革新性的褪色」，一面則進行新組織，欲用以代替大政翼贊會。

革新派早即企圖組織革新的政黨，乃擁當時的首相近衛為總裁，但近衛對於組織新黨，並不積極，只稱：「翼贊會是公事結社，是推進翼贊政治的議員機關，無團體意識」。後來革新派的施設又為穩健派所攻擊，大權終又落入穩健派手裡，革新派覺悟出欲由大政翼贊會完成「政治力的結集」，已不可能，於是重新發動「第三政治力結集」的組織。

大政翼贊會是擁護近衛文麿的團體，翼贊政治會卻是東條政府及戰時內閣時代的產物，時代性不同，意義也就不同。翼贊政治會推阿部信行大將為總裁，石渡莊太郎及舊政友會及民政黨的重要分子，任該會常任總務，會內設事務局，遇必要時尚可設立其他機關。除陸海軍大臣外各省大臣皆參加，貴族院及眾議院兩院議員，除參加其他政治結社者外，也可參加。此外，尚有大政翼贊會重要分子，皆在網羅之列，據同盟社五月二十日電，被邀參加翼贊政治會的人數，達一〇四四名，迄舉行成立大會之日止，確實參加者共九三二人。翼贊政治會全是東條政府支持下的一個政治團體，這正與近衛政府支持大政翼贊會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東條沒有任總裁，而以阿部信行代為其名，而自任實際的總裁，這固然由於東條名望不如近衛，但作風卻比近衛之為半傀儡者又勝出一籌。東條較重實際，翼贊政治會規定由首相擔任監督，由各省大臣擔任會內各種運動團體的指導。據五月十五日，日本情報局正式發表的政治會內部機構，包括了各種「國民

運動團體」，如「工業報國會」、「農業報國會」，以至「婦女」及「青年」等團體。

六、南進後的北進問題

「戰爭」的一時勝利，不但決定了日本政治的動向，並且決定了外交的行使，這確是日本近年史上一個劃期的發展。

軍部夢想多年的「公武合一體制」，實際上得了第一步的成就，東條對外政策的決定，可較為自由了。於是北攻蘇聯的空氣又瀰漫於遠東，據說問題只在於東條政府與關東軍之間的磋商，日本北進的可能性，確實增大了。

日本在未武力南進或南進而未得告一段落以前，日本軍閥的北進論，自然受到元老重臣派及財閥們的反對，他們誠恐日本會因北進而經濟體系瓦解，今以南進占了南洋的資源，精神上已得到安慰。東條在未經選舉及議會未召開以前，也不敢輕言北攻蘇聯，因恐遭元老重臣派的反對與抨擊，乃峰選的結果，親軍派政黨占了絕對的優勢，「無風帶」的戰時議會，更是風平浪靜地結束，聞日軍已集中重兵於北灣，進攻蘇聯確實躍躍欲試。

但是日本在北進聲中存在著一個難題，那就是中國這塊「絆腳石」，還沒有安置妥當。我國英勇抗戰已滿五年，日軍用盡所有的方法不能解決，武力南進擴大戰場至兩倍之廣，仍不能解決，北進戰場與我國□□□關係更為密切，故應考慮之點更多。在德國攻蘇未占全勝以前，日本決無北進的勇氣，而在此猶豫觀望之間，可能為安置這塊「絆腳石」而用其力量。曾經施用過和平攻勢，但在英美參戰的今日言和，這足證明日本政治家的低能。實則，只有用兵。為防禦其本部的空襲，打通大陸與南洋的陸運，節省船隻一二百萬噸，也有必要。這是我們應該警覺的地方。我曾強調英美聯軍目前的戰略上

的重點，應當是在於加強援華，因為加強援華，才可以打退日軍，圍剿匪穴。

原載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廣西日報》

日本戰時外交及其動向

一、五年來的日本外交

在這五年的戰爭過程中，日本內閣就有過七次之多的變動，而且一變不如一變，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可說是日本政治上最脆弱的表現，而日本外交的變幻微妙，也可想見。在中日戰爭之前一個月，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第一次近衛內閣的時候，日本國人乃至近衛也並未料到全面戰爭會爆發，尤未料到中國會自動抵抗以至拖得這麼長久。當時的外相廣田，是歐美派，與幣原、出淵、佐滕等人同伍，一般稱之為日本外交陣營的元老。日本外交在九·一八以前是歐美重於亞洲；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當局看到新形勢的變化，亞洲的重要性大過歐美，於是亞洲派日益抬頭，政府亦視亞洲重於歐洲，日本外務省的亞洲派，遂一躍而成爲新興的勢力，而此兩派的鬥爭更見激烈。總而言之，歐亞兩派鬥爭的發展，傳統派主張偏於維持現狀，繼續與元老重臣接近；革新派主張偏於「革新」，所以與少壯派軍人接近。傳統派在外交陣營有其悠久的傳統力量，在未有激烈變化以前，對於新興的革新派，仍是歐美派占著優勢的地位。

中日戰爭雖經過南京的退卻，而我抗戰到底的決心，並未動搖，反而給日寇的和平幻夢予以粉碎，這是敵人戰略與政略脫節，面背相反，於是遠東形勢日益嚴重，而日本的外交重心也集中到亞洲問題方面來了。

迄一九三八年五月，近衛內閣經過一番大改造，換了宇垣當外相，首相級的大臣有五個之多，宇垣即其一。當時的外交方針，在宇垣是主張調和英美蘇的，這樣便不受少

壯軍人時視，終於因為興亞院的權限問題，少壯軍人便唆使革新派鼓動風潮，推波助浪，被稱為「惑星」的宇垣外相，不久即憤憤然「吞五熊之淚」，掛冠而走了。

繼任外相的是有田。他一面以牽制蘇聯的理由加入了空泛的《意日防共協定》，並不加入具有實際內容的三國軍事同盟，避免中蘇同時作戰，很得到國內一般的好評。但是侵華戰爭的發展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難，日本加入防共軸心，正與蘇英美法正面衝突；反之，為要完滿推進對華外交，又非與英美法蘇周旋不可。有田雖然巧妙地以蘇聯為日本的假想敵，但不敢強化《防共協定》至締結軍事同盟的程度，所以另與英美法進行國交的調整。可是這種微溫的作法始終為軍部所不滿，這便是有田外交的致命傷。

近衛內閣在一九三八年底，因不能對付新事態的發生，閣僚之間互相傾軋，各不相下，終因池田財相與末次內相的衝突不已，致使近衛內閣不得不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總辭職，宣告下野。

接著是平沼組閣（時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名雖革新，實際毫無新的內容，日本論客評為「廢物收容內閣」。這時的外相仍是有田八郎，故依然無所建樹。可是駐德大使大島，卻本著軍部的意旨，在外活動甚力。然有田卻想加以控制，不願日本加入軸心軍事同盟，自然的，平沼這等外交方針，很難令軍部滿意。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八日《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後，此事傳到東京時，日本統治者內部驚慌失措，一時朝野對於德國之作風大加抨擊，穩健派與革新派亦互相攻訐，彼此怨恨，軍部乃借政府不及早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致令德國奔向日本假想的敵國蘇聯為口實推翻了平沼內閣，有田也跟著遭遇「樹倒猢猻散」的命運。

平沼內閣僅七個月二四天，便倒台了。接著是阿部信行組閣，先是他自兼外相，不久便任命野村大將為外相，而以谷正之為次官。野村自稱為「知美家」，他曾想盡力調

整日美間的關係，此時美國對日的壓力漸漸加大，野村之空洞途徑，自然毫無辦法，於是，罵聲四起，阿部也只有垂頭喪氣，在任四個月零十六天，不僅外交無生氣，即內政也是沒有一點成就，軍部更在報紙上大肆攻擊，於是這被指斥為「最不孚人望」的內閣就在議員二七六名聯名反對中總辭職了。

繼之，米內組閣（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組成），仍舊拉有田來當外相。米內此次出馬，滿想調和軍部與元老之間的裂痕，可是「中國事件」的解決，還是無望，戰爭還是在漫漫長夜中，國內經濟困難日增，陸相與米內也不能合作。當時日本國內正鬧米荒，故譏米內內閣為「無米內閣」。米內尸位六月，終於無所成就，廢然下台，而有田「調和」外交的希望也落空了。那個時候，日本政治舞台，沒有人敢於嘗試，西園寺公亦不得不再度拍出「最後一張牌」，闖下禍來的近衛，再出來收拾這個「僵局」——不能解決的「中國事件」。於是近衛第二次上台組閣，當時外相是松岡洋右，他是再作馮婦的近衛之最大成功者。松岡曾親自出國到歐洲訪問德意，回頭來到莫斯科，而與蘇聯訂立了一紙《中立條約》，感到「生平最大榮幸」，日本舉國上下也大吹大擂，稱讚為外交上的偉大成就，他曾與斯大林接觸，並說過：「日本如侵蘇，我即切腹」，然而口水未乾，而關東軍已「秣馬厲兵」，所謂「北進」問題，雖未敢輕易動手，始終是軍部所嚮往的目的物；而且還是影響著德蘇戰爭爆發，希特勒希望日本從遠東方面夾攻蘇聯，因之常常有擴大而轉為事實的危險。正因為德蘇戰爭發生，松岡便再也站不住腳，先第二次近衛內閣之坍台而被滾開。

蘇德戰爭爆發後，日德關係起了一度變化。日本對德態度比較觀望，其原因在於德國失去了控制日本的法寶，在德蘇戰爭之前，德國是引誘日本維持日蘇和平關係，以便利用蘇聯的西伯利亞鐵道，好運輸從遠東輸德的物品而供給日本以擴充的軍需品，日本遂處其控制之下。但自蘇德戰爭爆發後，此種情形便無可能，德國已無法強迫日本迫隨

其外交，於是德國又要別種花樣，逼迫維琪政府把安南讓給日本，並承認汪精衛偽政權。這樣拉攏日本來幫自己的忙，但這於日本是一種「糖衣毒藥」，日本反戰鬥士青山和夫稱為「毒饅頭」。日本貿然吞下這個「毒饅頭」，然德國當然就要負責應之責。當時，德國所要求的是日本北進，第二近衛內閣既然不能做到，就須有一種辦法酬應「盟國」，於是第二近衛內閣終又坍台了。新的國際局面日益緊張，日益逼迫日本作戰，但是日本這時只能備戰而不能作戰。這時的政治極其紊亂，因為沒有一個能孚眾望的人物可以接替近衛，在軍部方面似乎感覺尚無需親自出馬；在元老重臣看來，也是除了近衛再來扮演外，再沒有唱得更好的角色，於是近衛再倒台後三天，馬上第二次粉墨登場。

這次日本內閣的更迭，完全在於敷衍德國，其所玩的把戲有如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宣告破產了，重新組織新公司，可以聲明：「一切舊欠概不負責」。巧之近衛下台不過三天，重新打鼓開場，可想其大半。本來近衛那「最後一張牌」是已經輸掉了，試想第三次出馬，又怎會醫好滿目創傷，所以在他第三次組閣中仍是矛盾重重，困難與阻力，仍加在這位「公子哥兒」的身上，而其醜態更加百出無窮。

這時的外相是改換了豐田，他在就職後第一次講話中說道：「我在三個月前當海軍次官時，對國際形勢很熟悉，其後則不甚了然」。

當海軍次官時，日本參加了「德意軍事同盟」，其談話目的完全在於敷衍德意，這更可說明第三次近衛內閣的外交方針了。

第三次近衛內閣除了組織大政翼贊會，有表面之成績之外，其他是談不到什麼的，這次內閣正當日本準備「介入」世界大戰的時候，故其本質是所謂「臨戰體制」的「臨戰內閣」。當時為了加緊揮師軍事準備，與軍事的積極活動，就不得不再強化外交的活動，用以配合軍事上的陰謀，野村使美，目的就是一面要制止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準備，

一面為著緩和並鬆懈美國人民的戒心，故其開始，日本未嘗不是帶著誠意，希望和乎取得美國的讓步。但是，由於美國態度的強硬，對日制裁一天天加緊，日本外交就不斷地演變，從野村的向美討好到若杉的對美試探，最後到了來栖赴美，則除了陰謀麻痺美國備戰的警覺外，就只剩了一片敷衍，裝腔作勢以拖延時間，好讓軍部積極準備閃擊戰爭了。總之，我們從野村、若杉、來栖所活動的基本性看來，都不外是表現著日本外交完全為著擴大對外侵略戰爭的掩護。因為，我們不管日本外交與軍部有幾分之幾的分峙和對立，而日本外交終是執行它的最終目的——強化帝國主義的力量，擴大侵略的獵物。

當我們很緊張的看著日本一套又一套地要著「外交把戲」的時候，——正當日美談判中——有一點值得吾的回憶的；我們國內當時的論客皆推測日本必北進，而荒木貞夫也有過極力鼓吹北進的言論，但是事實上日本選擇了南進，這又是什麼原因促成的呢？

第一、日本元老派是要制止戰爭繼續擴大的，但臨到不能制止時，就同意南進。

第二、由於北進僅有政治上的價值；而南進更兼有重大的經濟上的價值。

我們知道日本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原料，乃至軍火，多從美國輸入，製品及某些種特產的銷售則更要依靠美洲市場，如日本生絲品等等，是以美國和中南美及加拿大為市場，因而離開了這個重大的美洲市場，更無辦法。可是自來栖赴美以後，日美形勢日趨緊張，日本在美洲的市場幾乎要全部斷絕。這樣，它不得不另尋出路，於是日本就選擇了由東太平洋市場移到西太平洋市場的方向了。如此在經濟上是有其重大的意義的，轉移經濟上的依存性，劃出所謂「經濟圈」、「共榮圈」，企圖達到自給自足，而衝破包圍，殺開出路。

我們知道香港、安南、菲律賓、泰國、新西蘭、澳洲這許多地域都是實在的「天富之國」，物資礦產都異常豐富，從這裡可以取得石油、錫、橡膠、金、羊毛、米糧、茶

葉，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富裕的出產。為著搶奪這樣豐富的資源，日本就不惜冒著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危險，而日本也唯有「介入」這個世界戰爭的「火坑」，它才能夠滿足經濟上的要求，因此我們瞭解南進對日本的誘惑力是超過北進的。

就在這個喧擾和醞釀中，日本內閣又演了一次倒台與登場的悲喜劇，那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近衛第三次辭退，十月十七日東條英機繼之組閣，外相東鄉，他曾做過駐德駐蘇大使，而負起調整對德對蘇關係的主要任務。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日本外交在如何積極地由英美轉向德蘇，而開始加緊布置南進的姿態，太平洋戰爭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轟然爆發了。自太平洋戰爭開始以至現在，日本外交幾乎可說等於停頓，「震關」兩大派閥之爭表面上也是暫時休息，而由「軍事行動」代替了外交。

二、日本之新動向

推測動向是困難的事，那些「算流年」先生的推測，廉價的斷言，「某月某日某時日本如果不怎麼樣，可以砍下我的腦袋」——這種賣膏藥式的作風，是沒有價值的。我們預測動向，必須要有相當確實的依據，把握許多複雜的因素，分析主要及次要的基本條件，而從實際情況的湧進中，觀察其發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戰局形成整個的，敵人的外交退回後台，而戰爭進到前台，所以我們主要的要推測敵人的軍事動向。然而敵人最近的動向，擺在我們面前的可能性有幾種呢？我們分別起來，可以說軍事方面有四種：（一）東進，（二）北進，（三）南進，（四）西進，現在分開來作簡略的敘述：

（一）東進——日本想東進由夏威夷打美國，目前沒有必要，也沒有這個膽量。俗語說：「癩蛤蟆想食天鵝肉」，在日本恐怕還不作此夢想，但是目前也有最大的可能，

而事實上已經在進行著的，就是日本要把東南太平洋上某些有戰略意義的重要島嶼加以占領。

(二) 北進——今年七八月以前，北進的軍事準備，是很積極的，日本以三十個師團以上的兵力駐屯於「偽滿」的邊境，真有所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的姿態，可是過了七八月以後，這種緊張的形勢是逐漸消沉了，這裡可以找出幾個原因：第一，日本看見德國侵蘇戰爭並不順利，特別是去冬希特勒在東線挫敗的教訓，日本一向貪小便宜，不肯下大本錢，現於斯大林格勒兩三個月攻不下，現在更吃了一個大敗仗，德國在東線的軍事將要全部動搖，要在這時去做納粹的呼應蟲，就是急躁的少壯派和關東軍，也怕沒有這股勇氣；何況東條過去已經嘗過了張鼓峰及諾門罕兩次的敗仗，現在蘇聯雖然打一年又五個月，人力物力固然消耗甚大，可是他在遠東方面強大的軍隊，仍是沒有什麼調動，而且可以隨時打擊日本進攻。日本北進戰爭一開始，東京、大阪、九州北部等處，就有被炸毀的危險，其本土所受的損失，必非常之大，恰好給中、美、英、蘇同盟國「釜底抽薪」的機會。何況蘇聯即令退出海參威，甚至退至哈巴諾夫斯克，日本拿到了這方面的一角，也無法繼續進軍到西伯利亞大森林，在冰天雪地裡要想拖著這個大「白熊」的尾巴，實在是不容易的。其次英美在南太平洋發動反攻，牽制日本，日本已受到相當的損失。美國在所羅門島及瓜島的進攻，使日寇感到窮於應付，哪裡還可能同時分兵進攻呢？第三自英印糾紛發生以後，日本就認為有機可投，而不暇顧及北進了，何況希特勒還在促日本會師印度呢！

(三) 南進——南進的目標有二：一是攻澳，一是攻印。目前日本對於攻印似乎在觀望，如果英印問題愈鬧得利害，印度內部黨派爭執愈激烈，英國對印度不合理的鎮壓手段所激起的反抗愈深，則日本認為奪取印度的希望愈大，將來花費的力量就愈小，日本目前已在充分運用政治手段挑撥英印感情，大肆欺騙宣傳，使印度方面愈有機會可乘，

但卻避免過度刺激英印，反而促成英印問題合理解決，這就是所謂「兄弟鬩於墻共禦外侮」。站在我們同盟國勝利的立場，我們絕對不希望英印不幸的局勢演進下去。因此，我們為阻止日本南進，打破敵寇的占印野心，希望英印雙方重開談判，本著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使它適應於印度，承認印度的獨立與自由，才能如尼赫魯先生所說「倘若同盟各國認明而且確實予世界道德及革命的領導，那麼侵略各國就要被迫放棄掩飾它們多數詭計的假面具，而一支龐大的新力軍也要興起制止它們的詭計。只有自由的號召以及人民能深信他們是為自己自由而戰，才能使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與俄國人那樣拚死作戰。」

南進第二方向是澳洲，數月來英美盟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反攻，謀於此方面鞏固總反攻的據點，而日本為保持同方面的據點，以便得於遠離本土的地方決戰，免致危及本土的安全，故此方面戰爭也不必繼續下去，但此方面的戰局，目前尚不能發展至如北非，日本的行動自也著重於南進第一種方向了。

(四) 西進——西進不是方向，而是對象：這個對象就是我們中國。日本要解決「中國事件」是它一切所要解決問題之基本問題，我們不要以為敵人經過了湘北浙贛的潰敗就再也不會進攻中國。自然，我們不是自己洩氣，過分估計敵人；敵人的力量已大減，確是事實，但若因此即認為敵人沒有進攻中國的陰謀，那就大錯特錯。敵人在最近的過去曾企圖打過粵漢鐵路以至湘桂鐵路，通安南、泰國以至馬來半島，雖未成功，但現在又已在真準備蠢動，我們大後方各地又時常遭到空襲，亦足證敵人想有所行動了。敵人自占領南洋富庶之地以後，即從事調整，企圖能於短期間恢復元氣，再繼續打中國，而於世界範圍內解決「中國事變」。滇邊戰事正與現階段世界戰局聯著密切關係，此方面問題的發展，十分值得我們注意。

我們國人常有一種錯覺，事實上我們是世界大戰中的一個主角，我們在演戲，但是許多人的心境卻是在觀劇，是一種觀眾的心情，如果這樣大意下去，敵人一來攻，我們

即遭嚴重打擊。我們應該隨時提高我們的警覺性，準備隨時隨地都可以給敵人痛烈的還擊，並準備於總反攻情勢成熟時，立刻可以發動全面的反攻始可。

原載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廣西日報》



日本的軍事動向與我們的警惕

自從日本對我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我國人士所最注意的問題，不消說就是日本的軍事動向。這個問題不但吸引了軍政界的注意力，並且為一般國民時時刻刻所關心。但是我國人士所注意日本軍事動向的問題，有時難免是變態的、錯覺的，關注日本北進或南進反比關注進攻我國的心切。當敵人在中國戰場暫時停止前進的時候，一般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日本何時北攻蘇聯或何時南進攻英美的問題上。一二年來，許許多多的國際問題座談會，皆以日本南進或北進為討論的題目，從未有以日本將如何西進為討論專題的。這固然是我國人士對於國際問題的注意力之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就是忽略自身問題的暴露。在大家熱烈討論日本南進的時候，我們挨過幾次攻擊，日本南進已一年了，我們仍繼續不斷遭受日軍的進攻。現在留下一個北進的問題，仍不失為討論日軍動向的最主要題目，許多人尚沉醉於這一個問題，但是世界上沒有比實際情形更為現實的，日軍在北進方向之外，還有一個更可靠的方向，這就是西進，因為日本擴大戰爭範圍，發動世界大戰，其終極目的仍在於解決「中國事變」，以為獨霸東亞的基礎，征服世界的前奏。我們是對日抗戰的第一個主角，但是許多人的心境卻是在觀劇，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故不憚麻煩，簡單為文，提醒我們的警覺。

一、日本北進與西進問題

自近衛內閣坍台而東條組閣以來，我國的論客判斷即頗為分歧不一，有謂日本「馬上」北侵蘇聯的，有謂東條內閣為近衛內閣之續的。但是前者太過於急躁，後者則玩忽了日本統治階層的變化。近衛第三內閣，是現狀維持派（元老重臣的政閣）重點內閣的

終了，而東條內閣則為革新派重點內閣的開始。東條內閣無論如何總是「急躁的」臨戰體制，其主觀完全和前內閣不同。但若謂東條內閣馬上北進，無條件北進，則未免重視一面，而忽略一面。日本加緊準備北侵蘇聯，故無問題，但卻不能無條件的發動。

因為日本欲北進必須安定南方，便無後顧之憂，當時的問題在於美國是否立即參戰，或嚴格實施經濟制裁。日本的戰爭資源依賴美國及其勢力圈的供給，自美國態度強硬以來，日本雖也曾加緊積蓄，但尚不足以支持長期大規模戰爭的消耗。因此，日本欲北侵蘇聯須先確實探到美國不加干涉的腹案，若杉赴美使命，完全在此。美國不能幫助日本結束中日戰爭，已為日本朝野所瞭解，再派若杉，用意自另有所在，當然是在試探美國能默許日本再蠢動到何程度。換言之，日本北進不會引起美日間的重大問題，日本就會決心北進。所以一面成立東條內閣，積極準備戰爭；而一面則仍繼續與美談判，以求得一個決定點。

時間的經過果然證明了客觀論斷之正確，一般卜卦式的國際問題專家的預言完全落了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曉，狡猾的日本軍閥突向美英的太平洋諸據點，發動襲擊，「日本精神」的自殺飛機及自殺潛艇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艦隊，首先遭受最重的創傷，香港及菲律賓等地，也皆同時遭遇奇襲。英美政府及英美人士，或許不相信會有這樣一個突變，我國北進論者更加啞口無言了。太平洋的突變已經證明日本並沒有北進，而是南進了。

但是時間的經過，不幾何時又將日本北進的論調鼓煽起來。太平洋戰爭在很短期間給日本軍艦穩定了腳步，日本幾乎完全占領了香港、菲律賓、安南、緬甸、馬來半島，乃至荷屬東印度群島，南至新幾內亞中部，西至孟加拉灣。珍珠港的空前大破壞，直至一周年之後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始完全恢復了元氣，東方第一大軍港的新加坡，即完全資助了敵人。日本軍隊在太平洋上休息七個月之後，一般又重新討論日軍北進攻蘇的

問題，自非偶然。

去年六七月間，日軍北進的傳說，復又盛傳一時。據各方面的報告，日本確實集結三十師團以上的大軍於偽滿邊境，兩個健全的機械化部隊是為攻蘇而準備的，日本海的日本海軍，準備著占領海參威，風聲鶴唳，大陸的東北面，已有草木皆兵之感。

其時，許多卜卦式的日本問題專家，紛紛討論日本幾時即必進攻蘇聯，有的斷言：黑龍江凍冰的第一周的周末拂曉，日軍必先發動，甚至於賭腦袋，賭大菜。據筆者的觀察，其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在於輕視敵人謀我的心情，說敵人不會再向我進攻；一在於重視德國攻蘇的一時勝利，以為蘇聯敗退至莫斯科附近，日本必乘勢大舉北進，但是時間已過了半年，日軍依然沒有北進，其間且曾向我下一次浙贛路的大攻擊，晉南、魯西、豫鄂等地也皆時常騷亂過，其打通「大東亞鐵路幹線」（從粵漢路接湘桂路，出安南、泰國，以聯馬來半島）的幻想，雖然終被我們所粉碎，但其謀我的心情始終未泯滅。一時傳說日軍北由豫陝南下南由騰衝經大理入西康，以完成南北兩頭大包抄的陰謀。此陰謀的戰線過長，南北共約三千多公里，日軍之運輸與給養，自然極度困難，自無成功的可能。不過，兩月來，日軍確已一面集結軍隊於滇邊，企求南抄之計得逞，另一方面又於皖鄂等地蠢動，發動空軍到處狂炸我大後方，以為牽制。這一連串的事實，皆值得我們沉醉於北進論者的玩味與猛省。

我國北進論者所著眼的，是蘇聯之一時敗退與德國的僥倖勝利，但亦未能完全言之成理。去年十一月以前德國的一時勝利與蘇聯的退卻，固然是日本北進的絕大的衝動機會，但是蘇聯敗退的程度如何？還是日本等候考慮的問題。張鼓峰及諾門罕兩役，已給日本以絕大的教訓，何況海參威及伯力等地空襲力量的威脅，更非局部衝突所可與比。日本發動侵蘇，自非承擔與世界陸軍第二強國作戰不可，日本陸軍泥腳一隻已陷於中國，另一隻擔當得起對蘇作戰嗎？蘇聯雖於抗德戰爭上損失不少，但其元氣並未損傷，對付

一個半殘廢的陸軍國，總還十分夠資格。蘇聯有飛機三兩千架，則對於日本各地的威脅，自然非常之大。日本幾個工業區，如東京、橫濱、大阪、神戶、九州北部等，皆在海參威轟炸半徑之內，日本雖說也有地下隧道之設備，但究竟容不了多少，況如東京隧道非常淺薄，容易炸穿。

或謂日本之欲北侵蘇聯，是買德國的賬，但是德國當時企圖南轉而攻高加索，下伊朗而略中東近東，德國與其要求日本北進，倒不如要求日本南進，夾攻英美。德日相約會師於印度洋，曾經一度傳為德日侵略者的幻想，是則日本與其獨擔對強蘇作戰，倒不如幫德夾攻英美之為愈。現在德已大敗於蘇聯，北非第二戰場開闢以來德國地中海的地位甚且岌岌可危，其要求日本夾攻英美之需要加大，日本攻蘇的勇氣更為削減，北進的可能性更為縮小，而於別方面用功夫了，這就是西進的問題。

二、釋日本西進

日寇西進問題的嚴重性最大，而國人誤解者又最多，且其關涉所及，並不只限於中國本身，而實是整個太平洋的問題，是反侵略各國關係密切的問題。

自一九四〇年秋德意日軍事同盟成立而日本南進問題成了討論的焦點以來，日本「南進」也同時以另一種姿態成了討論的對象。我在《論日本南進呢？西進呢？》、《再論日本南進呢？西進呢？》兩文中曾提出此問題，但剖述最精確的應推孫哲生先生之《國際動蕩中的日本動態》（均見《戰時日本》第五卷各期）。現在又因為日本北進可能性的擴大而更加嚴重成了討論的焦點，在戰時日本社召集的座談會上，幾乎集中論點在此。「北進呢？南進呢？西進呢？」上面。然而，今日之所謂「南進」已為梁寒操先生所提醒，「是美日的戰爭問題」，意義卻不若以前的含糊；只是「西進問題」的意義，還有

一部分人不甚明瞭，西進與我國關係嚴重密切，故不憚麻煩，特為解釋並加申論。

第一，有人把西進解為方向問題，故當我提出「日寇南進呢？西進呢？」的問題時，即有人責問我所指定的是否就是日本由湖北直攻重慶，當時我的答覆是「否」，並舉敵軍在福建浙江海口的封鎖，及由豫南進攻鄭州指向西安為例，質問者終於大笑曰：「先生錯了，封鎖閩浙應為北進，豫南之役應為南進」，像這樣以局部決定整個，以方向混亂問題者，實是誤解「西進」根本意義之尤者。

第二，有人把「是否想進」與「能否前進」，混為一談。當我寫《日本南進呢？西進呢？》的時候，就有人說我太把敵人力量估量過大了，說敵人今日已無力量再向西進了。但是我們所討論的是敵人的動向，推測敵人的動向，並不要確定敵人是否再進，或前進到什麼地方？我們抗戰所爭取的是最後的全民的勝利，不是偏安的一時的愉快，所以我們要積極準備，敵人進攻則迎頭痛擊，要時時刻刻注意敵人，不想再西進，絕對不能武斷敵人無力再西進，就自己沉醉下去。其實，在許許多多過去的樂觀者沉醉著日本立刻南進去與美國打仗的時候，我們已經挨過幾次揍了，幸得英明的最高領袖，指揮得法，終把冒險來攻的敵軍打退。

第三，許多人忘卻太平洋整個問題的聯繫。日本對我侵略陰謀，非出一朝一夕，即對我全面侵略戰爭，也已達到五年又半，其目的不外乎想滅我民族亡我國家，完成獨霸東亞的基礎。現在這種工作並沒有完成，自日本野心家慣用的「重心理主義」講，必先完成這一工作告一段落；自利害得失講，它也不會因南進或北進而放棄中國，最高度也只同時並進。如此主張，或許有人以為我為敵人增威風，就敵人今日泥腳深陷，如何能夠南北西並進呢？但是問題並不譴責此機械的看法，日本再三狂言要在「世界範圍內解決中國事件」，不就是這種意思嗎？敵人集中軍隊於安南、廣州及台灣，南侵緬甸，切斷滇緬路，一面侵英，一面攻我雲南，豈不就是南西並進了嗎？再如日本在華北的「掃

蕩」，據說目的在於準備北進，那末，這豈又不是北西並進了嗎？總之，太平洋危機是整個的，並不能因為敵人西進、北進、南進，依時間的先後採取各個擊破的詭計，而分成幾個部分。

第四，許多人混同了可能性與現實性。一九四〇年秋間討論日本南進及一九四一年討論日本北進的人們，皆過分注意日本南進或北進的可能性的問題，但卻忘記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那是西進。自日人川島浪迷上書「對華管見」以後，侵併大陸野心即已形成。自對我發動全面侵略戰以來，妄想滅亡中國以為獨霸東亞基礎的陰謀算已立定。雖說五年來碰了我國的英勇抗戰，陰謀已不得逞，但其滅亡中國的野心卻未曾稍減，所以任何政變發生乃至任何派人出組內閣，其政策的第一條，總是結束「中國事變」。即臨戰體制的近衛第三內閣，及現在的東條軍事內閣，都沒有忘記了這個綱領——結束中日戰爭。不但東條如此宣稱，即在華日軍也曾如此蠢動過。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軍委會發言人宣稱：日軍「似有南北一齊蠢動的模樣，北方昨已發動，南路刻尚在調遣中」。這是當前最現實不過的現實問題。當時日人顯然有視國際勢力新變動而有北進或南進的衝動及準備，但以當時情勢觀測，北進與南進還是可能性的問題，在北進與南進的可能性未更高發展以前，準備工作才是日本的「現實問題」，而在準備工作當中，「結束中國事變」仍是最重要的綱目。太平洋整個危機開始於九·一八，而日本的西進固可以擴大到北進或南進，日本無論何時總不能放棄「西進」企圖襲擊中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一週年的今日，日本西進結束「中國事變」的心情仍甚急躁。

三、應有的覺悟與努力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從國際上看，太平洋的危機是整個的，不是割

裂的；從中國本身看，日本不會因北進或南進而放棄侵華。

就日本不放棄侵華言，日本必繼續西進。無論日本北進與蘇作戰，或南進與美作戰，但其主要幻想是在征服中國。即在日本南進或北進以後，日本仍要繼續侵略中國，要努力作到用中國的資源補充美國及南洋資源的斷絕，並實行在「世界範圍內謀解決中國事變」，無論那一種場合，日本總想「西進」。但須重再聲明一句話，日本是否西進得了，是另一個問題，結果的問題。

今日為保障抗戰前途爭取最後勝利，我們必須更加提高警覺性，配合各方面的力量，更加積極準備，隨時可以給予敵人一個迎頭痛擊，以達抗戰的終極目的。

再自太平洋危機係整個的一點言，英美蘇各國，絕對不能因日本「西進」是攻中國，而滿不在乎地等待變化，英美兩國特別要再三玩味「太平洋危機始於九·一八」的□□，更應該認識「世界罪惡的發明家」（英人拉攏之言），體會其侵略中國只是獨霸東亞，進侵美洲，征服世界的序曲而已。英美蘇同盟國家更應記著：中國是總反攻的最重要的據點，日本西進愈積極急切，乃至該種企圖愈益得逞，其對於英美的威脅也愈巨大。同盟國家的反攻失去根據，太平洋完全為日本所控制，英國勢須退出亞洲，固無庸言，即美國之立腳於美洲，亦會受到基本損害。今日美國固已於所羅門島向日本反攻，英國亦已發動反攻緬甸的軍隊，但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動作究竟不如在歐洲之積極。美國之爭所羅門島仍未願開鞏固將來反攻的據點，英國甚且宣稱克復緬甸，今日尚非其時。於此我們更應敬告英美不要放縱太平洋上的侵略者。更確切言之，日本在侵略陣營中的比重，現已駕德國而上，日本不及早打倒，同盟國將來作戰必非常困難。世界危機是整個的，東西戰場不可□□，亞洲的第二戰場也應趕快開闢。英美愈應一面在緬甸及新幾內亞等方面積極反攻，以收牽制之效，並早收復緬甸重開滇緬路，一面大量供給中國以飛機及其他軍火，加強中國反擊日本的力量。同盟國家正準備著圍剿日本船隻，但不能忘記中

國在此圍剿中所占的地位。一月廿三日華盛頓中央社電轉英國的消息稱：「據可靠消息，倫敦方面若干人士相稱（開羅會議的）主要討論事項，乃聯合國家如何以全力在本年或一九四四年進攻歐洲之軸心，然後回師遠東，大舉進攻日本及其帝國之每一部分」。如果這種決定成了四強A B C D最高作戰會議的作戰方針，被放縱的日本必更加猖獗，其時不但遠東風雲變色，或許整個世界戰局也受影響。此點，深願我們的同胞多加考慮，同時忽略日本西進的國人，更應猛省。

原載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廣西日報》

日本最近軍事動向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日本最近的軍事動向》。日來日軍北進攻蘇的推論，常發現於報上，所以要先檢討日軍的北進可能性，然後再分析其他方面的動向。

日本最近會不會北進攻蘇呢？北進攻蘇的問題由來甚久，至前年秋間成了日軍北進與南進的爭論。有人論斷日軍將在黑龍江凍冰第一個禮拜日的清早，日軍北攻蘇聯。去年夏間又傳出日軍北進的消息，說日本在我東北的軍事布置非常積極，集大軍在三十師團以上，但是結果日軍沒有北進，倒反南進了。現在南進戰爭休息年餘，故又引起各方面日軍北進的推測，自然不無理由。但是今日的戰爭是全面戰爭，日人稱為「總力戰」，戰爭本身沒有目的，是為達到政治經濟的目的而執行戰爭。所以現代戰爭是以軍事戰配合經濟戰、外交戰、思想戰，等等，所以要推斷一種戰爭的爆發可能，應從政治、經濟、戰略，以及國際關係各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從經濟方面來考察吧。日本進攻蘇聯的經濟意義一向甚低，現在尤甚。西伯利亞是一片沙漠，沒有什麼經濟價值；北庫頁島的油礦權，現在又已不值得重視，因為日本占南洋群島，煤油年產量在日本消費量兩倍以上。再說北洋漁業的利益也很薄，不夠幾日戰費，更不值得。其他的戰時資源，已有南洋群島來補充，而蘇聯亞洲部分皆甚缺乏。日本現在不能因為經濟的原因進攻蘇聯。其次，政治的原因比較值得重視。以前日本經常宣稱：日本願為資本主義國家攻蘇的先鋒隊，日本欲借此題目對英美法各國討價還價，但是現在日本已與英美法宣戰，已無再作此種宣傳的必要，更無伴作攻蘇手勢的必要了。況且攻蘇會引起日本國內的社會危機，正如元老重臣穩健派所憂慮的，蘇日爆發戰爭，日本國內引起社會革命的可能。所以日本現在不會因為政治原因而進攻蘇聯。

再次，考察日本現在的戰略，日本雖有幾分攻蘇的理由，但是反面的理由尤其大。日本怕美國借用蘇聯領土為進攻日本本土的空軍根據地，故有先占蘇聯領土的必要。但是目前時機未成熟，而其他方面如太平洋上英美的反攻準備，中國戰場上的軍事發動的需要更切。今日適值德國慘敗之後，日本若貿然攻蘇，無異於自願擔承與世界第二陸軍強國作戰，貪小利避大虧的日本，必然不敢出此。

最後，考察一下德國命令的效力。現值德國慘敗被困之際，德國固要求日本北進分蘇兵力，但是德國命令已無以前的效力，日本要先打自己的算盤。自德國物資不能供給日本以來（蘇德戰爭爆發後），德對日強制力已大減少，即令日本須敷衍德國，作軍事策應，但有其他的地點，可以牽制美英。南洋群島的經濟消化，雖有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政治及軍事施設並未完成，日本尚須在此方面用工夫。所以在整個世界戰局中，日本亦無攻蘇的膽量和決心。

然則日本軍事最近可能由那些方面發動呢？這個預測是一件困難的問題，但大體上可以找幾方面來分析一下：

（一）進攻印度——英印問題糾紛甚久，未得合理解決，是鼓動日本攻印的有力動機。日軍最近又在緬甸集中不少兵力，其用途不外乎兩方面：一、總攻中國，二、進攻印度。很早，各方面即有德日會師印度洋之說，地中海沿岸英美對德意戰爭正烈時，日軍更有攻印可能，但是現在北非戰爭，已結束，地中海的控制已歸英美掌握，德日會師之夢已粉碎，日軍單獨占領印度這大塊土地，亦無力量。日本認為英美尚無積極地反攻的準備，故對印度，似仍以運用政治戰略為得策。日本尚不會攻印。

（二）進攻澳洲——日本半年來在太平洋上吃了兩次大虧。所羅門島和新幾內亞之戰，深覺英美從西南太平洋反攻日本的危險性。所以最近集中大量軍隊於澳洲附近，並

且建築許多飛機場，可容一千五百架飛機，這是日本攻擊的手腕，日本攻澳可能性較大，其目的在於破壞英美太平洋上反攻日本的據點，並切斷美澳的聯絡。但其戰略是「以攻為守」，考察西南太平洋沿岸日本各據點的積極建設，可知一斑。

(三) 包圍我國——日本此次作戰的第一目的，在於所謂「征服中國」，即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亦有著在世界範圍內解決「中國事變」。所以六年來日本始終未忘情於「征服中國」，只要有機可乘，日本無不樂意進攻中國。現在對我國來一個更大規模的進攻，可能性相當的大。這裡有政治、戰略各方面的意義存在。日本或者預料英美始終著重於歐洲，將來對日或將以政治方式來解決。那末日本可能乘英美未完全解決德意而不能全力於太平洋的時候，先謀穩定主要的侵略目的物，更多造成既成事實，以便將來和會上的談判，這是日本最近可能加強我的政治理由。至戰略上說，現在情勢已與太平洋戰前兩樣，日本以前是為著解決「中國事變」而發動太平洋戰爭，但是太平洋戰爭於今年又半，中國沒有被解決，中國抗戰倒反成了英美對抗日本的生力軍，從前是為解決「中國事變」而發動太平洋戰爭，現在已變成為著圓滿解決太平洋戰爭而預先「征服中國」了。

再自日軍最近在各戰場的蠢動看，三個月前兄弟這樣判斷（詳見《廣西日報》星期論文），即在今日仍可適用。日本對華在目前又有根本解決的幻想，其策略在於包抄，緬甸集中軍隊，如用於攻華，則或前由騰衝出大理，入西康南部。最近進攻我太行山之激烈為數年來所罕見，皆可窺見日軍野心所在。但是南北包抄戰場須延長三千公里，日本陸軍力量是否夠用，大成問題。洞庭湖畔和鄂西的猛攻，與粵南等方面的蠢動，都是這個主流中的波動。

總之，日本今日欲乘英美尚不至對日總反攻的時候，努力鞏固它獨霸亞洲政治的基礎，與抗拒英美反攻的軍事防線，其要點在中國大陸及西南太平洋。從科學的分析可得

這樣的結論。至於蘇日基本矛盾之存在亦是事實，能否爆發成為戰爭，尚是疑問。

（在曲江記者公會演講，宋斐如講，區巖華記）

原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廣西日報》

蘇日會馬上爆發戰爭嗎？

一、希望與現實

蘇日的糾紛具有悠久的歷史，尤其自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華範圍日益擴大以來，兩國的正面衝突，曾經延續了很長的期間。再加以兩國的政治體制不同，兩國的外交原則亦互異，蘇日的矛盾和糾紛，當然是不能根本解消的，戰爭也自不可避免。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今日討論蘇日戰爭問題，應該以蘇日兩國何時爆發戰爭？或者可能爆發戰爭時會如何？為問題的焦點，否則該項討論變成空談了。

數月來中外論壇上，對於蘇日會不會爆發戰爭，或何時爆發戰爭的觀察和主張，很不一致。但有一點頗為西南人士所深刻注意的，即重慶的某些日本問題專家極言日本即將對蘇發動軍事攻勢，甚至如龔德柏先生斷言六月廿五日日軍必發動，《大公報》記者子岡也期望著稱：看這一炮能否發得響？但是六月廿五日已經過去了，龔先生這一炮沒有響，一般人更想明瞭蘇日戰爭究竟什麼時候能爆發？這個解答相當的難，只要是一個普通人，不是神仙，不是瘋子，就不敢講日本將於那年那月那日進攻蘇聯。

固然我們希望蘇日戰爭能夠早日爆發，使瘋狂的日本侵略者受到腹背夾攻，以促其早日崩潰，這正與蘇聯方面希望英美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夾攻德國是一樣道理。又站在整個世界戰略的立場講，我們更希望中英美蘇能因為對日包圍戰而協力作戰臻於更密切更調和的地步。但是希望究竟是希望，社會科學家除了追求理想之外，還要凝視現實，使自己的論據不致失掉科學性。聽說，軍事專家楊杰先生曾論斷日本尚不至於攻蘇，而

龔先生指責稱：此人若執政，其國家必倒霉。這也是非科學的態度，但其希望之切，倒可欽佩。

日本進攻蘇聯的準備，確已相當積極，且有某程度的完成，最近更因美蘇合作愈趨密切而大起恐慌，所以對蘇又作恫嚇之辭，說：蘇聯若借空軍根據地給美國用以轟炸日本，則日本不辭對蘇一戰。另一方面日本更積極的動作，是攻入新加坡的山下奉文，最近調任關東軍司令，現駐東三省邊疆某地。此次雖未公布，但有相當的確實性。聞日本海中，現有日艦巡邏於美蘇之間，大家更加樂於談日本即將進攻蘇聯了。最近，日本又於倉皇間召開臨時議會，蛛絲馬跡，難免令人加深注意蘇日戰爭行將爆發的問題。

五月初，筆者在曲江記者公會及嶺南大學政治學會講演時，曾經論及蘇日的關係，當時斷言：蘇日兩國目前尚不至於爆發戰爭（區嚴華兩次記錄載於桂《廣西日報》、《曲大光報》及《曲江新建設月刊》）。現在過了兩個月，蘇日戰爭果然還沒有爆發。而《半月文萃》的主編，又來要我談這個問題，筆者仍舊依據客觀的觀察，略抒所見，能否切中事實，自為另一問題，因為吾人究竟不是神仙，也沒有軍事情報作根據。且從經濟、政治、戰略及國際關係等方面，檢討蘇日關係最近的趨勢，會不會馬上爆發戰爭。

二、蘇日戰爭的客觀論據

任何戰爭的爆發，都不是偶然的，而戰爭本身並沒有目的，其終極目的在於達到政治和經濟上的希望而已。所以檢討一種戰爭能否爆發，何時爆發？首先要從當前的政治及經濟等原因加以考察，而為達此目的的戰略及與有密切關係的國際現勢，更須深刻注意。

（一）政治經濟方面 自政治經濟上考察，日本目前無須要北進攻蘇。蘇聯亞洲區的經濟價值並不很高，西伯利亞是一片沙漠，經營亦不容易，就是濱海省各地，現有經

濟價值也不很大，北庫頁固然有煤油礦，也會釀成蘇日的爭執。但在日本占領太平洋群島一年又半的今日，在資源供給之點已不成問題。最近日本輪運統制局局長曾在其播講中謂：「日本現在已有豐富的原料，只是輪船不夠運輸到日本工業生產地，以製成軍用品。」南洋群島的資源確實豐富，安南及泰國產米，海峽殖民地及菲律賓產鐵、錫及橡皮，荷屬東印度產石油、金雞納霜、胡椒、橄欖油、橡皮、椰子及各種礦產，產量皆占世界第一、二位。只就北庫頁島能產的煤油一項講，蘇門答臘，婆羅洲及爪哇的煤油年產量，約當日本產量的二十一倍，在日本消費額三七八萬噸的二倍上下。在戰時三牲之中，日本必定顧豬頭，不會棄豬頭而取鴨蛋了。

再如北洋漁業的利益，在今日看來也微乎其微。蘇日的魚約糾紛雖說是常年的爭執，在平時北洋漁業的利益及其經濟價值也相當大，大約一年可有四千多萬元。但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每日的戰費平均在五千萬元以上，日本現在不會因為每年收入不及一日戰費的經濟原因，對蘇發動戰爭，也是自明之理。

在政治的意義上，現在日本攻蘇也已失去作用。以前日本常以攻蘇為對英美法討價還價的手段，它之侵略中國也以防共為口實。但是今日，日本已與英美破了面實幹起來了，這種口實完全失掉根據，對於外交政策的運用上，已無用處。日本攻蘇的政治運用，不但於外交無益，且反於內政上有害。自從南侵太平洋半年而戰爭不能結束反而日益擴大，困難也日益增加以來，國內穩健派反對擴大戰爭的情緒，復又增漲起來，所以在這次臨時議會上，東條受了議員嚴厲的抨擊。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的厭惡，隨戰爭之延長而益增長，重臣及財閥等穩健勢力，已由潛伏而逐漸抬頭了。觀此次翼贊政治之內訌，可知東條年前由元老重臣派奪過的國民組織指導機關，今日又起了動搖。日本穩健派誠恐日本一旦與蘇聯發生戰爭，會激發潛伏的社會危機，表面化為社會革命，所以極力避免與蘇聯作戰。

總之，日本政府今日在經濟上寧可努力於保持其已獲得的資源，並設法使得充分發揮其效用；在政治上寧可減少國內人民及反對派對於戰爭的恐怖心理，不會再以對外戰爭的方式而促內部分裂。

(二) 在整個戰略方面 日本現階段的戰略，應該是「防守的」，而不是進攻的，即令有時也會使用進攻的手勢，但也只是為守而攻罷了。自經五月下旬羅丘會談以後，美英的世界戰略已有劃時期的變化。「聯合參謀部的意見，固仍遵從先擊敗希特勒的一般政策」(五月廿二日華盛頓訊)，但其同時注重遠東戰場，則也甚明顯；英美盟邦已屢次揚言在太平洋發動大規模的反攻，澳外長伊瓦特聲稱：「聯合國現時已可用對德的同樣力量，對付日本，戰爭已進入新階段，此不但歐洲如是，太平洋方面亦然」(紐約六月十一日中央社路透電)。澳洲官方樂觀空氣的瀰漫，反映著太平洋英美軍備的加強，所以華盛頓郵報敢於「逆料盟軍將向緬甸長驅直入，重開緬甸通至中國的道路」(六月十一日中央社電)。

因此，日本官方已起極度恐怖，在日前召開的八十二屆臨時議會上，東條極言「戰爭已至嚴重階段，日本須提防英美的積極反攻」。於此可見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占領地位，已經動搖，他們的心理已在岌岌危懼的狀態下。所以日本當前的急務，應該是如何防衛這塊侵占地，使不為英美奪回而用以進攻日本本土。尤有進者，日本現在專靠太平洋群島的資源以維持戰爭，日本一旦失掉這方面戰爭資源的供給，將無辦法推行戰爭。如何保持這些太平洋資源及如何加強運用，是日本當前最急要的課題。日本上下皆已覺悟今日戰爭已成「長期性」，而此後的勝負將決於雙方生產力的比賽。故今日將更竭全力於一方面防衛所有占領地並加緊其資源的消化；其重點在中國淪陷區及太平洋諸島，而不在于未必占領到手的西伯利亞沙漠；日本此時未必攻蘇。

再自日本攻蘇勝負的前途估計，日本也尚有充分考慮的必要。日本之所以屢次主動地準備攻蘇，原想乘德國攻蘇的勝利，投最小的資本收最大的代價，所以每逢德國猛攻而蘇聯危急時，日本必更積極準備發動，其指標就在於德軍攻至莫斯科。但事不湊巧，德軍在斯大林格勒被擋駕，更不幸今年春季以來德軍大敗於蘇聯，日本終於按兵不敢動。這次日本攻蘇德論據之一，仍在於德國將發動夏季大攻勢，但是論者並沒有看到德軍夏季攻勢之不能有把握。事理很明，因為北非德意失敗以後，英美進攻歐陸自是確定的戰略，不但意大利已經岌岌可危，即德國本身也不能不考慮南歐與北歐方面英美之大規模進攻。據這幾次的消息，「德方已派兵十師團，開入意大利北境，以防衛伯倫納要隘」（六月廿五日華盛頓訊）。又據巴黎電台軍事報告員六月廿八日晚聲稱，「軸心當局頃正沿歐陸海岸，集中大軍二五〇師，以抵抗盟軍登陸，每一要塞均有重兵防衛」（六月廿八日倫敦訊）。再據倫敦每日快報訊，德國元帥季德爾的指揮部，已移至德國西部（七月一日路透電）。這些軍隊當然不只是意大利的軍隊，德國作戰的重點，似已由東戰場移至西戰場，是則夏季對蘇攻勢，已成了過去。

這次日本之所以積極準備攻蘇，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華盛頓方面傳出羅斯福總統曾向斯大林提議借用蘇聯的根據地，用以進攻日本本土。所以日本一方面對蘇聯放出恫嚇的空氣，另一方面責令駐蘇大使佐藤尚武於六月十三及十八日連訪蘇外長莫洛托夫，談話內容如何，雖無詳細報道，但可想得到的，可能是試探蘇聯對羅斯福的提議的態度。當時正當德國企圖大舉再攻蘇聯的時候，莫洛托夫的答覆可能是：大家還是嚴守蘇日中立協定為佳。所以這幾天，日本的態度比較沉靜些了，日本攻蘇在最近還尚有待。同時也可看出日本現時對蘇只是嚴陣以待，還只是防備性的備戰，而不能馬上採取進攻的戰略。

現在日本若冒然進攻蘇聯，其危險及負擔必大。德國既須防衛英美大舉來攻，東線所留軍隊必不甚多，是則日本必須覺悟單獨對世界第二陸軍強國的蘇聯作戰，而另一方

面日本還須分出大部分軍隊防守太平洋，結果戰局倒轉過來，蘇聯可以用全副力量對日，而日本則須兩面作戰，日本之潰敗必更迅速。日本一向最會打算盤，雖急躁瘋狂必不出此。

自遠東整個戰局考察，日本現階段戰略的重心，必在於太平洋，將於太平洋各據點加強布置，在新幾內亞方面防禦美澳軍反攻，在緬甸方面防禦英印軍反攻。日本最近的產業的超重點主義，集中於輪船及飛機的製造，其用意即在準備於不久將來抵抗美英。日本現戰略的第二重心，當在於中國戰場的所謂「掃蕩戰」。日本為要加緊重心主義的生產，正有待於中國資源更多的供給。去年日本由中國淪陷區運走的原料，已達一億噸以上（據蔣夫人在加拿大國會的講演），因為中國原料供給地，距離日本工業生產地最近，可省輪船運輸的困難，所以自經濟的戰略意義講，日本要用一部分軍隊於中國各戰場上。日本現階段戰略的重心，既在上述兩方面，自然要分大部分軍力於這些方面，而沒有充分的力量去對抗陸軍強國的蘇聯。

（三）國際關係方面 日本攻蘇的軍事感受性最強而變化亦最激烈。日本曾經一次大規模準備進攻蘇聯，彎弓勒馬一切皆準備完全，只欠一個最高峰的命令，但是臨時卻變成了「演習」。前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曾經有些部分的軍隊被派送到東四省某地，候命北攻蘇聯，但是結果這批軍隊沒有再北進，所得的命令，反是南進參加太平洋戰爭了（皆據俘虜口供）。

這些事實是在說明日本受國際變動的影響太大。今日在遠東戰場上，急激變化可能性最大的，是太平洋戰場，而北方戰場的變化當較和緩。美英大規模反攻日本，已在積極準備中。雖說丘吉爾首相昨日演說仍稱：「他時倘若德意兩國在蘇聯打擊下以致崩潰而德國工業被英美飛機炸成粉末，則歐洲方面每一艘軍船，每一架飛機，每一個士兵，凡能夠動員者，將全部調往太平洋參加當地軍事行動，直至日本屈膝然後已」（六月三十日對基爾特會黨演說），但是英美對日的反攻，將來得更迅速些。日本為應付太平洋

上的激變，自不敢對蘇聯輕啓事端。

或尚有人認為德國對日本的指揮相當有效，而德國又在大聲疾呼日本援救。但須知道日本今日的軍事行動已相當自主，它要先打妥自己的算盤，然後計及盟邦的厲害。況日本在太平洋上發動以攻為守的戰略，自日本看來，也未始非救援德國之道。所以今日日本也不會因為單純的援德而北進攻蘇。

綜合以上的剖述，日本為畏懼蘇聯而揚言進攻蘇聯，其戰略自然是守而非攻，美國海長說得好：「日本不欲與蘇作戰，現在努力避免意外之事猝發」（六月廿三日對記者談話）。蘇日雙方雖皆整軍秣馬，據傳雙方各置大軍一百萬於東三省邊境，但其實際情形，則又如華盛頓觀察家的論斷：「攻西伯利亞殊屬不可能，因蘇軍處於易守，而日軍處於難攻的地位，」，「蘇聯在無充分把握以前，不致在遠東有任何行動」，「如日本進攻西伯利亞，美國即可在該地獲致基地，」，「又如希特勒夏季攻勢成功，日本將進攻蘇聯，惟希特勒現在已無成功的可能性」了。這些論斷可以充當吾人上面剖述的結論；他們更堅定地說：蘇日戰爭「今夏難有爆發的可能。盟方認為日本或將在冬日蒞臨時進攻蘇聯，但就眼前的跡象觀察，本年似仍不至發生」（皆據華盛頓六月廿三日中央社合眾電）。倫敦方面也是同樣，「一般相信，目前尚不致有所發展。蘇日兩國暫時維持正常關係，而在西伯利亞邊境，互陳重兵，以資守望」（六月廿八日重慶電）。筆者五月初旬講演的論斷，並不算奇突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於湖濱）

日寇一年來的決戰設施

一、戰局變化與施政總則

日寇雖然自稱一九四三年為「決戰年」，但其實際對外只是保障占領地，消化新資源；對內則為東條努力於加強軍事獨裁，並多少容納現狀維持派的勢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罷了。對於新舊占領地實施懷柔政策，加緊剝削戰時資源，為前者的表現；實行政特別生產行政的一元化，並頻頻召開議會，吸收穩健派份子入於內閣及有關係的系統中，為後者的表現。

我們要檢討這一九四三年日寇的一般設施動向，須先瞭解這一年中太平洋戰局的本質上的變化，因為這一年設施，完全在於適應戰局。日寇在一九四二年的戰爭中，可以說走了戰爭的最高紅利，並乘其僥倖勝利的餘威，竭力圖謀其國力的「膨脹」，這個聲音一直延長到一九四三年的上半年。在這個期間，美英荷的太平洋諸據點，幾乎全部為所占據，美國太平洋上最重要據點的珍珠港，也遭到重大的損失，日寇勢力席捲了整個南洋群島，且有進迫澳洲及印度的企圖。這一階段日寇的戰略處於進攻的地位，其膨脹可說已達到頂點。

但自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周年，美國珍珠港的軍事設備完全恢復舊觀，澳洲的防禦漸趨於鞏固以來，日寇的作戰態度，就起了一大變化。至太平洋戰爭第一年，日本黷武主義者，還是任性地擴大侵略範圍，無時不在幻想著侵澳侵印，其戰略是攻勢的，但自太平洋戰爭周年以後，日寇的態度開始惶惑彷徨。其上半年的戰略，即已由進攻改為防禦性的進攻，至下半年即今年六月以後，幾可以說完全變成防守戰了。這是日寇太平洋戰

爭第二年的主要變化，在最近期內將仍沿此路線演進，而日軍節節退卻以至於總站的台灣，所以太平洋戰爭的重點，就在於西南太平洋。至若中太平洋方面的重點作用，最近也開始其序幕，其重要性的比重，或將與日而俱增。但據十二月上旬盟軍訊，西南太平洋日軍備業已被迫而退守內圍新防線，盟軍且更步步進迫。又據美海長諾克斯稱，中太平洋方面，美軍已可以利用塔拉瓦島的機場及重要根據地，襲擊中太平洋的日軍。

總之，在戰略上日軍已處於盟軍準備四方八面進攻的威脅之下，即日寇當局也都痛切感到此點，並時常發出悲鳴。據《新聞紀事報》戰地記者勃朗之分析，進攻東京有五條路線，而目前的比重在中太平洋及西南太平洋三條路上。不過事實和需要，還指示我們從中國實行總反攻的戰略價值，日益增加，且亦必須日益增加。

日寇這年來的國內政治及施設，也隨應此太平洋戰局的演進而變化。

在太平洋戰爭的第一階段，為著完全運用其戰果而對於突然膨脹的新占領地，採取消化政策與懷柔政策，後者應用於政治上，前者應用於經濟上。日寇在占領南洋群島後，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使新占領地的人民馴服，及如何恢復新占領地的生產狀態，所以日寇當時運用於南洋各地的政略，就是鼓煽南洋各地人民的所謂民族仇恨及反對白人統治者的反抗心理，提出所謂「大東亞共存共榮」，「同生共死」，所謂「亞洲人的亞洲」等綱領及口號。甚至於在細小的實際行動上煽動各該地人民對其宗主國人民的復仇行動，例如當安南人面前毆打法國人，驅使緬甸人凌辱英國人，最近且又挾持印奸包爾斯等人組織印度的偽組織等等，皆出於此原則。

另一方面又在經濟上，日寇拚命利用南洋現成的物資及生產設備，並使其破壞的都市，盡速恢復舊觀。在南洋群島上，各種戰爭資源占世界生產總額很高的比重。自全體上言，樹膠占世界九〇%，錫產占世界七〇%，鋼及鐵有數百萬噸之多。亞麻的生產幾

乎占一〇〇%。在日本糧食方面居第一位重要性的米產，占世界產量的九〇%。汽油的生產量，據日本人佐藤的估計，在日本消費量二倍以上，據著名軍事評論家尼克爾遜陸軍少校的評量，也足以轉動日本艦隊、航空隊及輸送船。再如新加坡、馬尼拉、仰光、香港等地的科學技術，原即不低，日本能夠充分利用，當於日本的軍需生產，有極大的幫助。

在這一時期，東條政府的內政方針，就乘其初勝的餘威，極力增強其軍事獨裁的權力。但在此時期的作法，尚只限於新舊占領地的統一，利用與統制，所以首先增加大東亞省，以促進新舊占領地的行政一元化，除純粹的外交事項以外，所有一切關於新舊占領地（台灣、朝鮮及琉球除外）的行政施設，一概移交大東亞省處理。在產業行政方面，東條政府強調其所謂「百年戰爭」的生產，但終一九四二年一年之功，尚只停留於空洞的討論，並無新的具體辦法。

東條政府內政控制與生產政策的加緊，開始於太平洋戰爭一周年以後。太平洋戰爭的周年紀念日，美國官方公布珍珠港被奇襲的損失，業已完全恢復原狀。此外，美國和平工業改變為戰時工業的優異的成功，及軍需生產的突飛猛進的消息，充分刺激了日本軍事當局。東條政府感覺到本國生產質量之低劣，尤其是飛機一項，更畏懼「美國挾其數量上的優越壓倒日本」（日本官方的警語）。故自太平洋戰爭第一周年的前後，東條政府即開始加緊軍需生產的統制，其歷程為統制會社的設立，營團制度之增設，及統制會社制度的實施，是在步步加強軍需生產的國家管理。在生產行政上最重要的一點，還在於生產指導權及管理法的一元化。這是本年春間確定的《戰時行政職權的特例制度》，其法律根據在於本年一月頒布的《戰時行政特例案》及三月八十一屆議會通過的《戰時行政職權特例法案要綱》關於生產方面的規定。東條政府除於戰時行政的集權化外，還實施戰時軍需生產的集中政策，規定制鐵煉鋼工業、煤炭工業、輕金屬工業、造船工業、

航空機製造工業五種，為所謂「超重點工業」。同時實行所謂「企業整備」，第一次，將不需要或次要的產業設備及勞力，移用於最重要的工業生產；第二次，更進一步將同種工業中的中小規模生產設備及勞力，再度裁減或撤廢，而移用於規模大而生產力高的生產單位，以從事於所謂規格合理化、生產量增加、提高生產品質。

東條政府的戰時行政特例制度，不只實施於生產上，且又貫徹於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制度上。在中央方面，乘此動機極力謀少數閣員制之進展，及其職權的增強；在地方方面，提高地方行政官的權限，裁汰駢枝機關，派駐地方的中央機關從屬於地方行政官。先就中央有關戰時生產的機關說罷，原來各部門分屬於各省，彼此不相聯繫，至於重複對立。例如主要軍需生產，大部分屬於陸海軍兩省，一般生產資金屬於大藏省，生產資材屬於商工省，運輸流通事項，又屬於鐵道省及遞信省，各省各有獨立職權及運營方針，不但不能統一，甚至互相對立。原來，日本的內閣制度，是國務大臣平等存在，總理大臣不過是名目上的代表而已，並無絕對的指揮權。

東條政府為著加強其權利，乃藉口於分立重複的弊病，一方面建立戰時行政特例制度；另一方面改革中央行政機構，減少閑僚數目，推進軍部年來所要求的少數閣員的集權制度。十一月合併農林省及商工省為農工省，合併鐵道省及遞信省為運輸通信省；廢興亞院，設軍需省，並由東條自兼大臣，即其最近的實例。東條代表軍部以建立日本軍閥獨裁步驟，至此已由披甲荷槍而至實彈，此時才算實實在在全副武裝了。

日寇一年來的內外施設，充分表露了軍閥獨裁政權的特質，雖說日本的傀儡議會，也曾頻頻召開，但皆是戰時的「無風帶」，只充當了東條政府法令及預算的追認機關。高喊多年的所謂「國民政治」的加強，也適得其反，日益衰退了。太平洋戰爭第一周年的日本議會，稱為「總力戰議會」；第二周年的議會，稱為「決戰議會」。前者乃東條政府要求日本國民為其黷武主義而全體動員，後者更進一步而要求所謂一億國民，齊赴

前線作無意義的犧牲。

在日本軍閥的侵略下，日本國民被用作肉彈炮藥，而日常生活的幸福被剝奪殆盡。日軍慣用「特種」的名稱，獎勵生命的貢獻，例如特種飛機、特種潛艇、特種部隊，其意不外乎要其人民自殺，特種與自殺劃一等號。但是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在生活管制之下，降低到動物的程度以下。日人主要日常消費品的糖，被定為奢侈品，米產不夠分配，專用雜糧代替，其糧食增產計劃，已置重點於「日滿支共同體制」，想依賴我東三省的糧食去彌補，但恰巧東三省自今年夏起大鬧旱災，其日暮途窮之狀，業已暴露無遺。

二、增強戰力與集中權限

東條政府因迫於國際情勢及聯合國國家對日作戰的決意，終於覺悟到戰爭的長期化，而決心準備對付這個長期戰爭。其所謂決戰的意志早即決定於一九四二年底，所以在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即便召開第八十一屆的所謂「決戰議會」。這一屆議會，因為日本穩健派（另稱「現狀維持派」）對於決戰，尚存觀望，最初沒有完全支持東條政府的方針，遂致東條費盡精神，從事疏通，耽延很久，舉行開幕典禮後即宣告休會。至今年一月廿一日始再復會，而其討論議案，一直拖至三月廿六日，始告完結而閉會。其間，東條本人甚至於稱病一次，其執行決議的分歧及結束之困難，於此可見一斑。

日本議會原自去年四月三十日總選舉以後，即已完全為軍事法西斯急進派的御用單一政黨，翼贊政治會所把持，稱為「翼贊議會」，對於東條政府所提出的議案，本是無條件擁護的，去年五月廿五日召開第八十屆臨時議會，即已有顯明的表現。但在這屆議會上，東條政府為著上述的內外情勢而有與穩健派調和的必要，所以事前和事後，皆曾從事相當的疏通，而其會期也得特別拖長。這些皆在證明東條政權本質的變化，其上半

年的政治施設，也表現於這一屆議會的決議上。

第八十一屆決戰議會所通過議案，大別之可得兩大類別：其一是所謂「增強戰力」的決議；其二是加強政府尤其是東條首相的權限。前者為總綱，後者為執行的細則。故又可分成幾個部分：第一是《戰時行政職權特例法案》，第二是《戰時刑事特別法修正案》，第三是《非常軍事支出預算案及一九四三年度收支預算案》。本屆議會所通過法案共有八十九件，但是特殊而主要的，不外乎上述幾種。

先就東條所要求的總綱講，三月六日，眾議院通過的《增強戰力決議案》的主要內容，是：「基於宣揚八紘一字的大義，擊滅英美，建立世界新秩序，乃皇國的使命。為謀實現真正舉國一體的國家總力，集中於戰力的增強，確立必勝不敗的體制。」其提案的理由，據眾議院議員小泉又次郎的說明，是：「近代戰爭乃連續的消耗戰，欲在龐大的消耗戰中獲勝，則必得動員一切人力和物力，始克有濟。」其重要目的仍在於加強人力和物力的搜刮，完成所謂「決戰的態勢」。

在執行這種加緊人力和物力的搜刮政策上，東條第一注意到的問題，就是生產行政的分歧重覆和生產行政必須一元化的問題。從來日本內閣對於生產行政，是分立不統一的，例如生產資材屬於商工省，勞動力屬於厚生省，資金屬於大藏省，交通運輸屬於鐵道省及遞信省。又如戰時生產的總計劃又屬於企劃院，新占領地的物力及人力的徵調又屬於興亞院，後來移交大東亞省。東條就藉口這種理由而要求生產行政的「臨時措置」，於是日皇以敕令頒布《戰時行政職權特例法案要綱》，議會通過《戰時行政職權特例法案》，其內容包括中央及地方行政的一元化，但最重要之點則在於生產行政的集權化。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條：在大東亞大戰中，對於鐵礦、煤炭、輕金屬、船舶、飛機等重要

軍需物資的生產擴充，遇特別必要時，內閣總理大臣，得令有關各省大臣，予以必要的支持。

第二條：在大東亞大戰中，遇前條所述物資生產擴充的特別需要時，對於勞務、資材、電力、資金，內閣總理大臣得將有關各省大臣的職權的一部分，親自執行，或令其他各省大臣執行之。

第三條：在大東亞大戰中，遇日常物資生產擴充的特別需要時，於前條所述場合外，內閣總理大臣，對於勞務、資材、電力、資金有關事宜的行政官廳或官吏的職權，得親自執行，或令其他行政官廳或官吏執行之。

以此規定，東條總理大臣在生產行政上，無異是一個獨裁者，原是平等並立的各省大臣，都要聽從他的「指示」了。

另一方面東條政府又謀加強其對於一般人民的壓迫與控制，向這屆議會提出《戰時刑事特別修正案》。該特別法原只規定：「在戰時，凡以企圖變亂國政為目的而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七條）。而修正通過的結果，這一條規定增加了三項：「以變亂國政為目的，危害、逮捕，或監禁他人，及以同樣目的所為的暴行威脅等罪」（第二項），「以變亂國政為目的所犯會議宣傳及擾亂治安等罪」（第三項），及「凡以企圖變亂國政為目的而妨害治安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四項）。戰時的日本人民，滿身加上鎖鏈，幾無自由可言。

議會既通過準備決戰議案，自須供給政府以充分的經費，故又通過空前的龐大預算案，預算總額為四，七四一，〇六〇萬日元，其中一般會計部分，一三，二七五萬日元；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二七〇億日元，此外還包括其他各種特別會計，所以預算總額，共達四，七四一，〇六〇萬日元的驚人數目。日本人民形容這個龐大的預算，稱道：

「四七〇億元的預算，若以十元一張的鈔票平鋪起來，長可達千里；若堆積起來，便要高過富士山。」

第八十一屆議會，除了內政之外，對於外交方針也有劃期的新決議，其一面正如東條所宣稱，是「帝國現正從事於可決定世界命運的大戰……官民一致為擊潰宿敵英美，而向身為東亞十億民眾的先鋒之途邁進」，「將用一切可能想像的辦法擊潰『重慶政府』——指我中央抗日政府」；另一方面強拉偽汪組織「介入」世界戰爭，以與日寇「同甘共苦」繼續長期戰爭。本年一月十九日汪偽對英美宣戰以後，日本即假慈悲，宣稱「尊重中國地位」，對中國不干涉政治，「交還租界」，「交還產業」，還要「幫助建軍」。這是日寇對華侵略政策的轉變，是一種懷柔偽組織的作風，加強「以華制華」毒計的陰謀，同時想借我國的豐富資源以維持長期戰爭。

三、加強生產的設施

第八十一屆議會，日本朝野雖宣稱為「決戰議會」，事實上只是決戰的積極準備，或更嚴格地說，只決定了繼續戰爭的總原則罷了。到八十二屆以次的議會，才算討論到決戰的具體辦法。日本長期戰爭的要點，著重在生產戰，英美對於日本的最大威脅，在目前也就是生產的突飛猛進，數量上的優勢。所以在這屆議會上，除了永井柳太郎提議並得通過的《一億國民決意打倒英美決議案》外，討論的焦點集中於如何增強戰力的具體辦法上。

這一屆議會是臨時召開的，六月十五日開幕，經過十六、十七、十八三日的正式討論。東條在開會的報告上，即便強調：「盟國行將由緬甸及新幾內亞實行總反攻，」並稱：「戰局已益見緊張，戰事也將更為慘烈，」要求議會通過議案，增強作戰力量（六

月十六日講演）。東條為增強戰力而要求整備企業，稱：「在決戰下，為急速增強直接戰力，特擴充從來的企業，使產業的各分野，得有徹底的整備，」其實施原則，就是：「舉凡普通產業和平時營業，與增強戰力無直接關係者，應在綜合計劃之下，將其一切設備、資材、勞力、運輸等力量，全部轉移於所指定的重戰時產業。」

關於企業整備的具體辦法，六月十七日，岸商工相在臨時會議的答辯，說過：「紡織工業的整備程度，其方針在於棉花、人造絲、紡織各部門，四成左右繼續工作，五成或四成暫時保留，其餘二成轉移使用或廢止。又關於相同的織物工業，四成乃至五成，也繼續工作，二成保留開工，其餘四成則予廢止。」

但是這次的企業整備，是全面的，即戰時重要產業部門，也同樣予以刷新的處置，所以岸商工相又稱：「整備的對象不獨限於和平產業，整備的最大重點乃在整備重要產業部門，為使有效活用自其他部門轉來的工廠設備及勞力等，對於重點產業部門的內容、組織，加以根本刷新，實為當前急務。」

日本此次的企業整備，包括兩層的辦法，其一是戰時非必要部門的整備，而將其生產設備、勞動力及資材，移用於別部門重要產業；其二是同一重要產業部門的整備，即將中小規模的產業單位，加以整備縮小，而將其剩餘的設備、資材及勞動力，移用於大規模的產業單位。嚴格地說來，後一種同樣產業部門的調整與刷新，才是這次企業整備的重心，日本朝野非常重視這次的調整，在臨時議會召開前，五月廿八日東京廣播即便宣稱如下：

「政府已決定召開臨時議會，為生產增強的前提的企業整備，是議會的中心課題之一。此次的企業整備，並不似從前，僅使生產配給機關合理化而已，凡非戰時緊要產業，一切皆予以整理，並將由此所得的勞力、資材、電力、資金等，全部傾注於緊要產業部門。」

「此次極大規模的整備，即謂為將我今後產業，完全塗成戰時色彩，亦不為過。不但為產業態勢之再編成，且間接改變經濟產業的本質，其所企圖者，為一產業革命。」

日本工商省整備課長橋井真，對於這次企業整備的特色，也有如下的敘述：「從來的企業整備有置重點於和平產業部門，但是此次企業整備的辦法，卻要貫徹於所謂『重點產業部門』，即所謂第二種工業部門。在航空機、造船、機械工業，或某種金屬材料工業等，不復再採取消極的辦法，而想以某些方法使得繁榮發展。當然，其辦法自與前異，是為戰力增強的直接目標，為此次企業整備的特色」（據八月號日文《實業之世界》所載）。

又其企業整備實施的目標，大約如下，重點在於重產業，這次的整備對於鋼鐵業、煤炭業，及非鐵金屬礦業，也採取裁併辦法，甚至可以說明這次企業整備的重心，正與下面所剖述礦物增產問題相關聯。鋼鐵業，只保留日本製鐵會社及鋼管會社兩家私營公司，其餘中小製鐵業公司，悉數裁廢。煤炭業也只保留三井、三菱、住友、貝島，及明治等大公司，其採掘辦法，採用地域集中制，以肥筑、筑豐，及盤城三地為中心，其餘小煤礦全部停止工作。非鐵金屬礦業，指定礦山二四五處集中開採，其餘小礦山均予以停止。這些事實是重產業整備的一實例。至於輕工業部門的整備，尤為徹底。例如日本支柱工業的紡織業，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原即停閉九〇%以上，經此次的整備，所殘留者將更寥寥無幾，決定僅保留紡機百萬錠及織機三百架以上的大公司八家，且該八大公司，又只保留原有機器三〇%。其他如人造絲工業、食糖工業、製紙工業，乃至水泥工業等，莫不加以大規模的整備。

第八十二屆議會上，除了企業大整備案以外，還有《糧食增產案》，及《重要礦產增產案》等，也是重要的議題。

關於糧食增產對策，議會只決定一個「日滿支糧食自給自足共同體制」，而據農林省企劃課長木村武的剖述，日本當前的「糧食緊急增產對策」約分三層（八月號《實業之世界》）：

第一、輸入外米，擬由泰國、安南、緬甸，及台灣朝鮮等地輸入米穀，以濟日本本土食米之不足。據說將於缺乏不夠應用的船隻中，分割一部分充作運米之用。

第二、提前食用下年度米穀。昭和十九年的產米，原須自本年十一月開始收成，而此次計劃提前於十八年度食用，再摻以雜糧，如春季馬鈴薯及滿洲大豆的配給，也歸於此段對策。

第三、此後的應急增產對策，其最主要的是不耕作地的解消，大體上可得田五千町步及旱田五萬町步，我東三省所謂「報國農場」的開拓，也歸入此類對策之中。其次農耕技術及組織，也為增產的重要手段。「糧食增產協議會」，關於今後的增產，規定兩項原則（拙作《日本糧食增產政策批判》（《大公報》））：

第一、關於米穀增產上的重要改善事項，及其指導者及方法；

第二、提高兼業的低位收穫農家所耕作田園的收穫量。

其次，關於「重要礦物增產對策」一項，日本商工省曾於第八十二屆議會開後，特地著文強調其重要性及其增產方法如下：

「對於消耗莫大物資的大規模近代科學戰，必須有雄厚的物質與生產力，無論一機一艦，都要輸送更多的兵器，赴前線應用……」

「而製造這些兵器彈藥、航空機、艦船的源泉，是鐵、銅、鉛及亞鉛等金屬礦物，不能確保這些礦物，即連一輛戰車或航空機，也不得造出。換言之，戰力基礎的這些礦物資源的開發與增產，是貫徹決戰的至上命令」（內閣情報局《周報》第三六五號）。

其礦物增產新對策，第一是「國內自給態勢的確立」，因「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輸入完全杜絕，而他方面國內需要卻反而年年增加」，所以「無論如何必須開發國內礦物資源而期增產，而自給自足必要的數量」。第二，是國內增產與新占領地開發並重，「在南方地域，固然擁有占世界總產額九〇%的錫，以次幾多的豐富資源……日本也正動員優秀的技術從事開發」，「但同時目前還須付出任何的犧牲，以徹底開發並增產國內礦山，使之變成戰力」（同上）。

總觀這一屆議會的主要議題及其後具體對策所反映的施設事實，可知日寇自去年下半年以後，才算進入積極準備決戰的階段，在四、五月間還向國際及我國，放出和平空氣的刺探（見筆者在衡陽青年會演講筆記），自非偶然。聯合國軍自五、六月以後準備總反攻，已經威脅及於日本重要據點，乃至日本本土，日寇遂致慌張萬分，手忙腳亂，急急於長期戰爭及大規模戰爭的應付。此時日本政局，已不但反映日本政治動向，並且反映太平洋時局的新趨向。

四、虛張決戰與軍閥集權

自五、六月以來，太平洋對日反攻的局勢，日緊迫一日，澳印兩方面也屢次發出樂觀的空氣，自信盟軍已由防守轉為進攻，盟軍已經取得主動的地位，並且不久即可向日軍大舉反攻。八、九月以後太平洋各路盟軍，皆有更積極的發動。西南方面作戰的再

接再厲，不消說；即北路方面也已經克復吉斯卡及阿圖兩島，轟炸及於千島列島。中路方面也曾克服馬爾卡斯島，轟炸及於台灣海峽。西路方面，中美陸空的協力作戰，完成湘北鄂西的大捷，並且屢次出擊日軍陣地。這樣四方八面的圍攻，業已震撼日本政府的心臟，故第八十二屆臨時議會開會僅逾四月餘，而東條又以召開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的消息，驚動世界，且其加緊集權，具備特別性質。

這次臨時議會召開於十月廿五日，開會僅三日之短促，其目的在於：「俾政府提出預算及各立法案件，使在現有情勢下，能與國務執行相配合，借求國內外明白政府具有有效進行作戰及再度加強全國團結之不變決心」（據東京九月廿八日廣播）。我們於此可以明瞭兩點：一、東條政府因迫於外來情勢而須呼籲議會以至人民，追隨政府從事於決戰。二、要求其他黨派服從政府，全國團結一致，一任東條政府擺布，以遂行決戰工作。

因此，這次臨時議會的重要議案，除了年度的預算案外，就是政府對於議會所要求的「緊急措置」的案件，占最重要的地位，如：一、機關預算手續簡單化之議案；二、關於司法行政簡單化之議案；三、關於軍火公司之案件（此條應為求得軍火財閥諒解之議案）；四、關於加強空防之議案；五、關於議員應徵服役，其職責繼續問題之議案；六、關於修改兵役法之議案（即為擴大徵兵制的議案），等等；無一不是政府要求議會及人民絕對服從的案件。

東條政府在決定召開臨時議會的前後，即已屢次宣告情勢之急迫而呼籲人民加強防禦，其情急現於言表：

「各階層人民必須認識國內外情勢之嚴重及其任務之困難。全國力量必須集中於軍火工業，尤應擴充日空軍，加強其實力。日本及滿洲國的糧食，必須實現絕對之自給自足。廣泛加強日本本土防務之計劃，必須立即擬成。全國人

民將全體動員，兵役將予擴充，婦女工作將予擴充，空防將予擴充，尤以工業區為然」（九月廿三日德國無線電台報告東條廣播）。

日本遞信省大臣寺內在日航空日廣播也稱：「吾人不能鬆懈，因美國方面有更好更新式之飛機出現，美國近來製造有繼續的進步，一旦挾其數量上的優勢進攻時，吾人自不免忍受貴重的犧牲」（舊金山九月廿七日電）。

東條更在議會的開幕中瑟縮陳詞，從其演講中也可見其施政方針一斑。東條首述太平洋一般的情勢：

「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倏忽二年了……現英美以絕大決心，發動攻勢，駁駁有凌壓吾人之勢。……此項責任，決非輕易，過去之思想與作法，實不足以完成此項艱巨。唯吾一億人民確應放棄不合時宜之舊習慣，而以全力圖之，方有可為。且局勢瞬息萬變，時機不容稍縱，此即政府所以決定採用《國政運營大綱》之理由……」（十月廿六日東京廣播）。

從東條的演講中還可以窺見日本最近施政方針的具體情形：

第一、國內行政機構的大改造。這屆臨時議會的召開，政府之向國民報告此項改造及要求追認，幾占最重要的題目，所以東條聲稱：「政府目前改革行政機構運用的首要目標，在於增進統帥部與國政機構之關係，以加強領導作戰方面之效力。同時實行有力與及時之對外措施，作為致勝之道……」

在臨時議會召開前，東條政府即已準備好內閣機構的大改組，並定自十一月一日起正式成立新機構，廢去舊機構。其主要者為合併商工及農林兩省為農商省，合併遞信及鐵道兩省為運輸通信省，另外廢除企劃院而新設軍需省及通

信院。其改造的主旨，據說：在使設計與執行合而為一。這就是東條所稱「政府已實行增強全部機構之計劃。為求行政事務之處理，與目前進行之大戰協同一致，政府乃對行政機構加以調整」（同上演說）。

第二、迅速擴充軍需工廠，尤置重於空軍之擴充。此項實際行政改革，就是軍需省之新設。軍需省所管理的事務約有數種：一、關於國家總動員的基本事項；二、關於礦業的一般事項；三、關於礦產及工業品的生產配給及消費配給等事項；四、關於主要軍需品的原料與材料，及特定軍需品的生產管理發貨定貨與籌辦等事項。尤堪注意的，就是東條首相身兼軍需省大臣。

第三、日本特別加緊空防，決定成立一個防空總司令部於東京，以統一管轄國內防務。同時，頒布疏散首都及重要城市的居民及機關的命令。日本最近還決定疏散重要工業生產於朝鮮、我東北四省，及華北、華中等地。

第四、東條為加強總動員，而擴大徵兵制及征役範圍。東條宣稱，「關於國家總動員方面，政府已加速推行募集學生服役（前曾規定暫行徵募學生服役辦法），並擴大軍事及工業徵募範圍之方案，」決定有關教育之戰時緊急施政方針。同時，擴大應用徵兵制於朝鮮與台灣。

這一屆議會所反映最重要的政治施設，首推行政機構的改革。東條對於這一點，非常注重，且再三誇示於議會，在他的報告講演中，下有有力的結論稱：

「余深信國內機構之增強，目前之是否能得迅速執行成功，將決定大東亞建設之成敗」。

此屆議會對於外交事項，沒有新的決定和宣示，只東條略為提到德國，稱：「日本

期望德國盟友，於未來新戰事中，獲得理想結果」。對於加緊侵華，當仍維持上屆議會
的決議。

五、一九四四年的展望

我們應深加認識的，就是東條此時是在與穩健派調和協力之下，謀決戰之遂行，他
已漸與急進的革新派疏遠。急進革新派的瘋狂代表者，中野正岡之自殺於此時，自非無
因，其遺書中有「余凝視日本而死，死亦無所戀」等語，深堪玩味。此後日本施政方針，
也將沿此線路前進，何時開始「決戰」雖難斷言，但其一九四四年度財政預算之「打破
日本財政記錄」，業已預告我們：日本更將孤注一擲，走向戰爭的深淵。據十二月十日
東京同盟社廣播內閣情報局的消息，稱道：「日本閣議通過大藏省所擬一九四四年至一
九四五年會計年度的總預算（筆者按，應為一般會計預算之誤），將提交行將舉行的第
八十四屆議會討論，下一財政年度預算，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開始，總計一，五〇四，
三〇〇萬日元，較本年度總預算（包括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屆議會通過的補充撥
款在內）增加一，二一九百萬日元，較本年度原有預算增加五，二四八百萬日元。此數
之巨，打破本國財政記錄。……」

本年度預算總額共達四，七四一，〇六〇萬日元。就上列一般會計預算的增加類推，
下年度預算總額，當膨脹至五百乃至六百億日元，或竟過之。日人評定本年度預算總額，
若以十元鈔票堆積起來，則可高過富士山，是則下年度預算總額或可高過新高山（位於
台灣中部）。日本用以高過新高山的預算從事於下年更激烈的戰爭，我們可以聯想到這
場更激烈的戰爭，可能就在包容新高山的台灣揭開慘敗的序幕罷。

綜括地說：一九四二年全年及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是日本舉國陶醉於僥倖勝利的時

期，大部分日本人皆在昏昏沉沉地作他們獨霸亞洲的迷夢（詳情參考拙著《日本亞洲獨霸》——桂林三文出版社版），但是這個美夢到了一九四三年秋間，即已完全變成了惡夢。盟軍太平洋各路的進攻，空襲日本本土的威脅，首先打破了他們的幻想，台灣新竹機場之蒙受慘烈轟炸，馬紹爾群島基地之被占領，更使他們膽戰畏縮。日本軍閥雖在此膽戰畏縮中，手忙腳亂地積極準備「決戰」，而此一年的一切施設，將於一九四四年盟軍大反攻中，完全化為烏有。

代表日本「革新派」言論的《公論》雜誌，曾於去年新年號的社說中，警惕日本國民稱道：「昭和十八年是我國國民『奮起第一』的年頭，同時也應該是舉國反省的歲次。昭和十七年的正月，曾經因為過分光輝的緒戰的大戰果，而全部國民大小皆沉醉於戰勝的氣氛中，其懷抱美英容易對付的心理，有不可否認的。但在開展第一年間，國民之間漸次認識美國決非容易應付的對手。美、英，特別是美國，之為不可厚侮的敵手，在熟知對方的人們，早已明瞭並不是新奇的事情，在一部分國民之間，精神上，尤為美國生產的偉大所壓倒，在資源上，在生產設備上，乃至在生產技術及工作機械的進步上，若以日本與美國比較，則至少在今日是一對十之比。……美國的生產力，今年一年中，仍將處於上升期。」

日本在今年年頭坦白承認生產設備及生產技能的劣勢，而特於這一年竭盡所有能力及方法，擴充生產設備，謀生產數量之大增加，即如內政施設及外交措置，也莫不如此挽回生產頹勢而努力。但是一九四三年全部過完了，日本的生產設備及其能力，依舊處於拙劣的地位，或視年頭的情形更不如。日本軍閥就以此更為拙劣的「戰力」，迎接決戰第二年。

關於此後情勢的展望，因與日本締結《中立協定》而保持緘默已久的蘇聯，最近曾經評論稱：「日本已陷於不利的形勢無疑。日本雖仍保有廣大的領土，但不能採取進一

步的動作。刻英美軍已為繼續太平洋戰爭，而不妨礙其在歐洲對德作戰，太平洋戰鬥力的比率，已有利於盟國」（據柏林十二月六日廣播，《戰爭與階級》周刊的評論）。同盟國已可以兼顧歐洲及亞洲的戰爭，這是盟國生產之進步，是日本生產劣勢的加深。美國業已開始「超級航空母艦」的製造，欲用以轟炸日本本土及占領地據點，美海軍航空署署長藍漠塞少將，最近宣稱：「進攻日本外圍陣地的行動，將自美國航空母艦的甲板上發動，美國準備在海軍決戰中，以一艦對一艦制勝日本海軍」（十二月十五日伊里諾斯製造廠商協會演說）。這不能視為美國的宣傳，而實在是美國生產設備優越的豪語。藍氏還稱：「吾人愈早迫令日方出而作決定的戰鬥，結果愈佳。」不知一年來集注精神於航空機及軍艦的製造的日本當局，將如何答覆藍氏，更不知一九四四年的日本施設，又將如何推行呢！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桂林）

原載一九四四年三月《新中華》復刊第二卷第三期

第四輯

日本政治

日本無產政黨的研究

日本的無產政黨，早在六十多年前的明治初年，即已產生。例如借金黨、佃戶黨、貧民黨、東洋社會黨及車界黨^①皆是。明治中年更有東洋自由黨、日本社會民主黨的出現，而日本平民黨、日本社會黨、國家社會黨繼之。重以大正十四年三月，日本普通選舉案通過國會，日本無產政黨更以蓬勃之勢增加起來，並且添加活躍的氣象。其後屢經合併、分裂、協同、軋轢等等演變，而日本一般人士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加以充分的注意。這個日本無產政黨的問題，現在已經是日本社會或政界——如從東方全體的立場看來，自然也是東方社會或政界——的重大問題之一。尤其是最近，什麼無產政黨全體合併問題，什麼部分的合併問題，什麼勞農黨的取消問題……，鬧得日本社會滿城風雨。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實有充分加以檢討的價值。我們就想在本文，就此重大的問題加以概要的討論。

我國著作界很少關於無產政黨的論文，致使大多數人對於無產政黨之為何物，尚缺明瞭的意識。所以，本文在未檢討日本無產政黨以前，先就無產政黨的意義或性質及其與各方面的關係，略加敘述。

一、無產政黨的意義

無產政黨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語，如就字面說，本是自明的。正如字面所指示的，無產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如果加以更為精確的定義，那末，無產政黨就是「無產階級之階級的政黨」了。這種定義，若從字面說來，固然沒有錯誤，但是我

們對於無產政黨的概念，依然不大明確，它的性質依然模糊。所以，我們應該更進一步，來究明它的內容和性質。或謂：正如有產階級的政黨，是有產階級的政治組織；無產政黨，自然也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這種說法，是甚合論理的。這種說法，還可以區別無產政黨的性質與其它無產群眾的組織的性質。蓋因其它無產群眾的各種組織，是帶著經濟的性質，而不是政治的性質。例如勞動組合與農民組合等等無產的團體，都是經濟的組織。它們的舉動大都局限於經濟的範圍內，即使它們的經濟的舉動，常與政治的行動具有相互的聯關性。

然而，只說「無產政黨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我們只能理解它的形式，至若它的機能似有加以更為明顯的說明的必要。換句話說，到這時候我們必會想到：無產政黨雖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但其目的究竟何在？至少，也可以想到：無產政黨是在那一方面進行它的工作？對於這種疑義，我們應該在無產政黨的意義之上，加上「目的限制」，說：「無產政黨就是目的在於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的組織」。

這種解釋，或許有人以為是冗雜而非必要的，但是事實並不然。許多人在其觀察一切的事物，常於有意識或無意識之中，注意其事物的現象而輕忽事物的機能。其實，事物的研究者，尤其是我們社會問題的研究者，與其注重問題的現象，不如加力注意事物的各種機能。所以上述那樣關於無產政黨的解釋，實是必要的。第一層，我們可以在構成無產政黨的概念時，握住無產政黨的目的，或其「機能」。即無產政黨的目的，在於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這一點實是無產政黨整個問題的樞要部分 (Vital Part)。

談到這裡，我們的討論就要關聯到「無產政黨的構成要素」上頭。如上所述，無產政黨既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那末，它的基本的構成要素，自然是無產群眾——包括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工人和農民。如無無產群眾的支持，無產政黨就失其所根據。但是，此外尚有其它必要的構成要素。在現代，若無這些次級的構成要素，無產政黨也就

不容易成立，次級的構成要素云者，就是無產群眾之外的諸社會群。例如中間階級和過渡階級的各種分子。這些無產群眾之外的諸社會群對於無產政黨的成立，在現在不但理論上是必要的，事實上的無產政黨，也都包括這些分子在內。

不過，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下列的事實。無產政黨固然必需無產群眾以外的諸社會群，而且事實上也都包括這些社會群，但是無產政黨絕對不能因此而改變它的本來的目的——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因為這種工作是無產政黨的原本目的或機能的緣故。無論那一種無產政黨，如以非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或政治行動以外的工作為目的，它就成了「偽無產政黨」，或非政黨的無產階級團體。這種偽無產政黨，實際上固有許多的存在，但是事理卻實是如此，事實且在昭然證明這種事理。「偽無產政黨」，名義上固然仍是無產政黨，但若自其實質說來，卻已不是無產政黨了。反之，無產政黨只要是以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為目的，即使它的構成要素包括非無產群眾在內，它仍不失為無產政黨。

二、無產群眾的經濟行動與政治行動

上面我們固然已就無產政黨的性質和內容約略述過。我們固然述過：無產政黨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的組織；並且這種組織又是以無產群眾——包括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工人與農民——為主要的構成要素。但是，無產群眾因何而構成無產政黨？換句話說，無產群眾為什麼要支持無產政黨？這個問題就是無產政黨的行動與其它無產階級團體的行動的關係。且在本節解剖這個問題。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在經濟上被榨取的社會群之反抗榨取的社會群，雖然性質上和過去各個時代的反抗，完全沒有差異的地方，但是在量的方面就有很大的異處。

現代的各被榨取的社會群，都以極大的規模和積極的方法，對抗其對方的榨取群。例如包括數千數萬甚至數十萬的構成分子的勞動組合之對抗工業資本家。又如同樣大規模的農民組合之對抗地主或農業資本家。思想左傾的知識者的團體，從思想方面反抗現代支配階級及其附庸集團，也可以充當一例。這些都是顯著的例子。而這些集團（如勞動組合、農民組合及思想左傾的智識集團）之反抗榨取階級的形式，常是為著達到增加工資、減少佃租、改良工場設備、縮短勞動時間等種目的而採取的怠工、罷工及抗租等等，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下的農工群眾，實已學得這些大規模而且積極的反抗了。因為他們為著最低限度的生存。這種反抗正如資本主義社會之下產生土地兼併和資本集中的事實那樣，它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

然而，上述無產階級群眾的反抗，若只限於採取怠工、罷工及抗租等方式，以達到增加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良其它的勞動條件及減少佃租，那末，它的性質還是單純的、初期的反抗罷了。這種單純的、初期的無產群眾的反抗，常是短期的、一時的行動，並且又常限於某一特殊的地方，或某一特殊的無產集團。例如某一工場的全體工人，甚至專限於熟練工人或非熟練工人。他們專為要求增薪而罷工，所以，一旦增薪的目的達到，這種反抗馬上歸於消滅。其它的縮短勞動時間、改良工場設備及減少佃租等等的反抗，也都同樣，一旦目的達到，即便停止，或消滅。所以，這樣的反抗只能說是「經濟的行動」，而不是「政治的行動」，固然，「經濟行動」與「政治行動」之間，有相互的關係存在。但若這種行動的目的，只限於一時的、一地方的或某一團體的範圍，那末，它就不能稱為政治的行動，是很明瞭的事理。然則無產群眾對榨取群的反抗，要具備什麼樣的性質，始能稱為「政治的行動」？

上述無產群眾之對於榨取階級的反抗，若只限於經濟的範圍內，那末，即使他們的反抗仍以集團或階級為單位，這種反抗還是不能稱為完全意義的無產者全體的行動。必

須上述無產群眾的反抗，由短期間的、某一地方的，或某一團體的範圍，擴大到永久繼續的、無產者全體的範圍，更須由某一特殊集團，例如熟練工人，或甲工場的工人的特殊利害關係，擴大到無產群眾全體的利害，它始能稱為完全意義的無產者全體的行動。如未達到這種程度，它就只是所謂「對於全體資產階級的對立」；而這些無產群眾，也只是「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階級」(Class in itself)罷了。

然而，無產群眾對於資產階級的反抗，要由某一特殊集團的利害關係的打算，轉到全體無產者的利害關係，其間必須經過一種「意識」的媒介。在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對抗的過程中，被榨取者漸漸覺出他們的這種反抗非以團體協作的方式不為功。換句話說，他們覺出團體的利害關係了。這種意識先由個人而團體，由團體而階級，逐漸擴大，便成了階級意識。到了階級意識普遍地形成之後，無產群眾的行動，就會由暫時的、一地方的，或某一特殊團體的利害關係，轉而以永久的、階級全體的利害關係為目標。到這時候，他們就已是上述「與資本階級對立的階級」(Class in itself)，而是「為著自己階級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了。此時，他們完全處於全體無產階級的地位，意識出他們自己之歷史的任務，而一切的行動全受這種意識所指導。此時，他們的行動就已不是個人對個人、或集團對集團，而是階級對階級了。因此，他們此時的行動，已由單純的經濟行動，轉入「政治行動」了。

三、無產政黨與其它無產階級的團體

上面述過無產群眾的經濟行動與政治行動的關係，而進行政治行動的，就是無產政黨，然而它的形成究竟經過什麼過程？本節且就此點加以略要的解释。

無產政黨的行動，固然專以無產群眾的全體利益為前提。但是它的形成卻有待於無

產者的別種團體，普通，概由無產政黨之外的其它各種無產團體，如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無產青年同盟、無產階級思想的各種機關，及編輯無產階級的新聞雜誌等團體，促使無產政黨的產生，而這些無產團體就在無產政黨與無產群眾之間，充當上述二者的連鎖。到此時，勞動組合、農民組合以及其它的無產團體，在其政治的行動上，聽無產政黨的統一指導，變成無產政黨的協助機關。但是這些無產團體的這種協助的任務，卻非常的重要。他們傳達無產群眾的現實的要求於無產政黨，廣布無產政黨的決議及行動的意義於無產群眾，藉以完成他們的中間的、媒介的機能。

實際上，無產政黨与其它無產團體的關係，還不止於上述那樣單純。普通是由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等無產團體選送本團體的指導者，或鬥士於無產政黨，以便將本團體的精神代表於無產政黨中。而屬於這些無產團體的無產群眾，經由無產團體的媒介，而對於無產政黨，加以極力的支持和援助。惟其有這種無產團體，或無產群眾的支持和援助，無產政黨始能完成現實的政治行動的效果。同時，各種無產團體也因無產政黨的統一的指導，而其政治的行動始克進行。總而言之，二者之間實有「相互信賴」與「相互支持」的關係存在。

上面我們雖然述過無產群眾到了意識出階級全體的利害關係時，就希望、並且必需一種統一的指導，要求全國單一的無產政黨出現。但是事實上，這種必需和要求，常因無產階級內部的「不均一性」，或有產階級的「分裂政策」的作用，而在某一階段常有許多的無產政黨同時並立。諸如上述，無產政黨是以數個無產團體的支持和援助為前提的。而這些無產團體又各有某種特殊的利害關係，於是受到這些無產團體支持或援助的無產政黨，就非以同樣利害關係為目標不可。同時，又有其它幾個無產團體，另以別種不同的利害關係為目標而組成別個無產政黨。於是這兩個代表不同利害關係的政黨，就對立並存，而各自進行步驟不同的，例如急進、緩進的政治行動。其中，更有折衷主義

的無產政黨成立，於是許多的無產政黨就違背無產群眾的單一政黨的要求而群立。不過，這種現象也只是在某一階段應有的現象罷了，經過種種淘汰和刺激之後，自會歸趨於一致。關於這層，不想加以深進的討論，只與上述問題相關聯，略為觸及罷了。

四、無產政黨的發生

無產群眾的反抗，漸由經濟行動的形式，趨向政治行動的形式。換句話說，隨著無產群眾的階級意識的普遍化和深刻化，而無產群眾的運動，漸由組合主義的行動，轉化為全體階級的政治行動，這是上節所已述過的。無產群眾的運動達到這個階段時，他們之間就必然地要求無產政黨的出現，這也是上節所已述過的。

然而到這階段，無產群眾為著進行階級全體的政治行動，何必一定要有政黨呢？要進行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不必經由國會，豈不是也可以嗎？或者，不在具有永久的組織體制的政黨指揮之下，政治行動豈不是照樣可以進行嗎？這樣質問的人必定不少。例如法國的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t)、或美國的世界工人會(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World)所主張的總罷工(General Strike)也不失為一種全體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的表現。即使這種行動是在「否定政治」的標榜之下進行的，但其行動的本質卻毫無改動。

這樣一來，無產政黨豈不是永遠沒有發生的必要，而且沒有發生的可能性嗎？不過，事實上全體無產群眾的政治行動，如要長久繼續進行，就非有統一指揮的政黨不可。否則，這種政治行動，就不能夠獲得相當程度的繼續進行的效果。且將其理由敘述於下：

無產群眾，雖然同樣處於被榨取的地位，名雖為被榨取階級，但其內容卻非常的複雜。無產群眾既不是從天降下，從地流出者，也不是一模一型印就的。事實上，這種群眾的洪爐裡頭，勞工、農民、精神勞動者、無產婦人等等

盡都包括在內。即單就勞工一層檢看，也就分子複雜錯綜之至，既有來自農民層者，也有來自手工業者的，更有來自都市的小市民層者。其技能和智力也都參差不等。不熟練勞工與熟練勞工的地位，既不能盡同，生長於工場內者與長至中年始為勞工者的意識，也決不能一樣。

依據上述的情形看來，無產群眾的內部，實有很多不同的特殊集團並列存在，各集團的意識，也各不同。存在不同、意識又不同的各個集團的行動，即使是依從階級的立場，也必不能盡同。必定或為地方的，或為集團的，時間也不能永久繼續。這種狀態就構成「無產群眾內部的不均一性」的現象。而這種「不均一性」就促使無產群眾內部的各集團，自以長鏈的一環連結構成一個長鏈。各無產集團的獨環所構成的這個長鏈，就是無產政黨。所以，無產政黨之必然的發生，是以無產群眾「內部的不均一性」為其最基本的條件。簡約一句話，「無產政黨產生於無產群眾內部的不均一性」。

這裡，我們還須補述幾句話。上面所述，只是橫斷某一階段，以說明無產政黨的產生過程。我們固然敘述過：無產政黨的產生由於無產群眾的階級意識的需要。但是，正如無產政黨的構成，專賴於現實的無產群眾，同樣道理，無產群眾也絕對不是憑空掉下的怪物，必有其所以構成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經濟的轉變。若自次序說來，近代經濟關係的轉變，產生無產群眾，而無產群眾構成無產政黨。於是無產政黨之成立，根本倚賴於經濟關係之轉變，即無詳細的解釋，也可以判明了。

然而無產政黨的成立，於經濟關係的轉變之外，事實上，尚須倚賴於政治關係的轉變，在其初期且須社會思想的培植。例如在封建的專制主義高壓之下，無產政黨是不能發生的，這和有產政黨之不容易發展，是同一道理。又如社會主義思想還未充分發達的時代，各種無產團體如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等等，就不會有赫赫可觀者出現。（這個說

法，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被動的，人為的地方，尤其可以適用。）這些無產團體尚未產生，或未充分發達以前，無產政黨自然沒有產生的基本條件。所以，政治關係的轉變和社會思想的進步，也是促使無產政黨發生的動機。

近世經濟關係的轉變之為無產政黨發生的基本因素，和近世政治關係的轉變及社會思想的進步之為促使無產政黨發生的動機，不但理論上如此，即各國的事實也莫不如此。解明這幾點，始可以明瞭無產政黨與一般社會進化的關係。本文既要討論日本無產政黨，就要先就日本近世經濟關係的轉變、近世政治關係的轉變、近世社會思想之進步三者與日本無產政黨的關係，各別加以相當的考察。以下，就依照這種次序，往前進行我們的討論。

五、近世日本經濟與日本無產政黨

我們在以上四節，略就一般無產政黨的意義、性質、內容以及它的成立過程，敘述過一個大概。相信讀者對於無產政黨，大約業已構成一個概念，所以關於一般無產政黨的說明，就停止於此，此後，專就日本無產政黨的研究，進行我們的討論。

本節先就日本近世經濟發達——即日本產業革命的開始，日本資本主義的急進，日本資本主義的轉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及產業的衰落窮絕等等過程——與日本無產政黨的關係，加以概要的考察。

前面已經述過，無產政黨的發生，由於無產群眾的階級意識的需求，而這種階級意識的形成，又全賴無產運動的尖銳化與普及化。所以，無產政黨的產生，須以無產運動的尖銳化與普及化為其前提條件。在無產運動尚未發生，或雖發生卻未達到尖銳化、普及化的地方，無產政黨必不能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是真正專以無產群眾為基礎。例如在

無產運動並未尖銳化普及化的明治初年，日本雖也發生了許多的無產政黨，但是這些無產政黨，卻與現在的無產政黨大異其趣。

然而，正如無產政黨之產生有待於無產運動的尖銳化和普及化，無產運動的發生專賴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達。要談日本無產政黨的產生，因須考察日本無產運動的情勢，要談日本無產運動的情勢，更要研究它所自出的母體，即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泰西的產業革命是經過二三百年的長期醞釀成功的，而日本的產業革命卻只以四五十年的短期完就了充分的成功。這是一樁聞名於世界的事實。於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產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都不循由自然的主動的過程，而只是人為的，受動的罷了。切實一句話，日本產業革命的開始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急激的發展，完全是在當時官僚政府的保育干涉政策（Paternalism）的指導、誘掖、獎勵之下進行的。它絕對不像泰西的資本主義之以自由競爭主義為培養的原素。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色之一。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雖自所謂「歐風美雨」刮破了，衝開了日本的鎖閉的關門以來即已開始。但是它的充分的發展，還是在中日戰爭之後。且就當時的都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變遷檢點看：

日本人口都市集中表

年次	人口實數(千人)		百分比(%)	
	一萬以下的鎮村	一萬以上的市鎮村	一萬以下的鎮村	一萬以上的市鎮村
明治十二年	31,805	3,965	89	11
明治二十年	34,609	4,901	88	12
明治二三年	34,882	6,087	85	15
明治二六年	35,538	6,521	84	16
明治二九年	36,272	7,128	84	16
明治三一年	37,360	8,043	82	18
明治三六年	38,494	10,049	79	21
明治四一年	38,884	12,899	75	25
大正二年	39,707	15,224	72	28
大正七年	39,535	18,552	68	32
大正九年	37,921	18,036	68	32
大正十四年	37,884	21,853	63	37

(備考) 一、本表的實數根據《明治大正產業發達史》一九二九年版。
 二、假定一萬人以上的市鎮村為商工業區，藉以推論商工業的發展。

根據上表，明治二十九年以前商工業區人口的增加，還非常的遲緩，其在人口總數所占百分比，是由十一增至十二，十五，十六，十六，十八。其增加狀態若與其後的十八，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二，三七比較看，那是極其緩慢了。

這種商工業發達狀態的遲緩，是在證明日本當時尚未充分資本主義化。依據「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必定併兼，資本必定集中」的法則的推論，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達的地方，無產群眾必不至激烈增加。無產群眾不激烈增加，無產運動就不至普及化尖銳化，而無產政黨就無由產生。所以，日本明治初年的無產運動極其幼稚，以與現代的無產運動比較看，性質上實有霄壤之差。真正無產政黨的出現，更是談不到的事。其時，即使也有借金黨、佃戶黨、貧民黨、東洋社會黨、車界黨的出現，但是這些並不是現代意義的無產政黨。其所以產生的原因，完全在於政治的轉變的影響，或為一時的經濟行動罷了。當時有一部分失意的藩士，為要抵抗攻擊得意的官僚政府，便倡導所謂自由民權主義以為武器。上述那些無產政黨——不，這些只能稱為無產政黨的先驅——就以這種自由民權主義的倡導的餘波而產生出來。於此，即可知道，這些政黨和現代無產政黨之以無產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普遍的、尖銳的覺醒為基本條件，性質是完全不同的道理。即如那時候的無產者的團體，也都一以無產者「相互扶助」的感情為宗旨，和現代無產團體之對抗資產階級，完全異其旨趣。

然而日本資本主義在明治初年的發達，雖然非常遲緩，但其早已萌芽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明治維新以降，日本資本主義即在官僚的保育干涉主義的產業振興政策的溫床裡，日漸發育起來。經過中日戰爭之後，它的發育就以一日千里之勢，增長到相當的程度。

中日戰爭的結果，日本因勝利而由中國取得二億兩（約當時日金三六，〇〇〇萬元）

的賠款，並且奪得台灣，勢力及於朝鮮，而日本國富大為增加，原料供給地和製品販賣市場，也都充分擴大。他方面又因為官僚政府對於軍國主義的經營愈有自信，極力擴張軍備，振興產業。於是，日本經濟界發生普遍的企業熱，公司、工場等企業機關，正如雨後春筍那樣急激增加。這種情勢表現於中日戰爭前後各種企業公司銀行及私營鐵路數目及其資本金的差數上面。請檢點下表：

	明治二六年六月	明治二九年六月
股份公司的數目(家)	一一三五	一四七三
同上的資本金(元)	一〇八,一九〇,七一九	一八九,三八三,〇九二
銀行的數目(家)	一三五	一九七
同上的資本金(元)	六二,九一六,一〇〇	二二一,四三二,〇四二
私營鐵路的數目(家)	二八	四〇
同上的資本金(元)	七,三二二,三〇〇	一一一,一三八,〇〇〇

(備考) 本表參照赤松克磨所著《日本勞動運動發達史》所載。

(注) 中日戰爭始自明治二十七年(光緒二十年，公曆一八九四年)二月，至二十八年四月，雙方的媾和始告成立。

根據上表可知經過中日戰爭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怎樣急激地發展起來。這一點參照上揭都市人口集中表，更可以深切地確信。

日本資本主義經濟，自經中日戰爭之後既有那樣急激的增進，若自理論說來，自必惹起無產運動的普及化和尖銳化。然而事實上，卻只成立了比較多數的勞動組合，經過

短期的鬥爭之後，立即衰落下去。明治三十年，勞動界同盟罷工的件數達三二，參加人員達三，五十七人，明治三十一年，件數四三，參加人數六，二九三。但至四十二年，件數倒反減至十五件，參加人數四，二八四，三十三年又減至十一件，二，三一六人。其後更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參照赤松克磨所著《日本勞動運動發達史》）。

上述情勢，日本的一般論者概將其原因，歸結於明治三十三年三月所頒布的《治安警察法》以及其它警察犯處罰令、行政執行令等等惡法。《治安警察法》等法令固是壓抑國民的行動自由的惡法，尤其是取締無產者運動的最著名的惡法。所以對於無產者運動的衰落，這些惡劣法令的制定，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從經濟發展的方面，也未嘗不可以找出另外的原因來。中日戰爭以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初期的，且是激進的，所以對於勞工的容受量非常之大，勞動界不至發生失業的恐慌。乍由農村進城的工人，又比較能夠安於低級的生活，對於惡劣的勞動條件尚不至發生不滿。因此，本期的勞動爭議的件數，只是比例地增加，無產者運動只是比較地增進罷了。那時候的日本無產者，尚無階級的覺醒，階級意識的分量幾等於零。

在上述情勢之下，一般的無產階級，即連「與資本階級對立的階級」(Class in itself)還夠不上，至若「為著自己階級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那更是談不到的事。所以，「覺醒了無產階級全體的利害關係，而長久繼續地進行無產階級全體的政治行動的組織」——即無產政黨，不能夠產生赫赫可觀者，也是當然的道理。固然，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曾有「日本社會民主黨」的出現^②；明治三十九年也有「日本平民黨」和「日本社會黨」的出現^③，但都不幾何時即歸於消滅。

然而，日本產業革命開始於中日戰後，再經過日俄戰爭（明治三十七年，公曆一九〇四年），迨至歐戰（一九一四年），已經約略完成，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到相當的程度。再因歐戰中歐美各國忙於戰爭，無暇兼顧東方貿易的經營，而日本獨占東方的市

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乃達到最高峰。日本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結果，當然同時也激增日本的無產群眾，而孕育激烈的普遍的無產者運動。

此外，尚有一種社會的原因，足以促進日本無產群眾的運動激烈化、普遍化。日本的工資固然也隨商工業的發展而逐漸增加，尤其在歐戰中因為巨大數量的勞工的需要，而一般的工資增高了許多。但是，一般物價的暴漲，房租、公稅等等負擔的增大，在比例上實是數倍於工資的增額。工人的私人財政之「入不敷出」，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至於水平線以下。工人這種窮苦，自然促使他們極力反抗資本家，增加勞資爭議的件數，普及無產群眾的階級意識。且就無產勞工反抗運動之表現為同盟罷工者的件數列如下表：

年次	件數	參加人員
明治三七年	六	八七九
明治三八年	十九	五，〇一三
明治三九年	十三	二，〇三七
明治四十年	五七	九，八五五

(注) 本表數字，根據上引赤松氏同書。

這種同盟罷工的趨勢，雖自明治四十一年後，略見下降，其停滯的狀態繼續到歐洲大戰前的大正四年，但自大正四年後，無論歐洲大戰的好況尚足調劑，它的激烈的增進，更非過去任何時期所可與比。且將歐戰中五年間的日本同盟罷工的件數，列表於下（根據赤松氏同書）：

年次	件數	參加人員
大正四年	六四	七，八五二
大正五年	一〇八	八，四一三
大正六年	三九八	五七，三〇九
大正七年	四一四	六六，四五七
大正八年	四九七	六三，一三七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大正時代的日本的勞動運動，已經達到普遍化、尖銳化的境地。尤其因為產業的發達的停頓或衰落（例如明治末年和歐戰後）影響多數勞工失業時，一般的無產而又無業者，更能滲透於階級的意識，覺醒自己階級的利害關係。

這種無產群眾之階級的覺醒，還可以由日本農村方面，找出另一事例來。日本農村，一則因為日本商工業發達而受到農業凋敝的惡影響。再則因為近年日本商工業的不振，而農村發生人口過剩的恐慌。於是，日本農村的農業勞工、佃農以及農民，普遍地發生生活不安的恐慌。這種恐慌同樣促使他們滲透於階級的意識，覺醒於自己階級的利害關係。（這裡，作者為避本文之過於冗長起見，關於日本農村的衰落的過程及日本農民運動的進展，一概從略。欲知其詳者，請參照高橋氏之《明治大正農村的變遷》，杉山氏之《日本農民運動的現勢》及莊原達之《農民與政治運動》！並望參照本刊本期所載《日本農民問題概觀》下篇之（七）日本農民鬥爭的趨勢！）

上述日本的勞工和農民普遍的覺醒，造成兩方面從階級全體的立場，開始提攜，而無產群眾之負起歷史的使命進行階級的鬥爭，就要從此開展。代表階級全體的政治組織

的無產政黨，就要在這個階段產生出來。完全意義的日本無產政黨之所以產生於大正末年，且於其後繼續健全的發育，原因完全在這裡。

促使日本無產政黨產生的因素，既然充分成熟，那末，如得相當的機會，它立即誕生，是理論上應有的事實。所以，大正十四年三月，普通選舉案一旦通過國會，完備的日本無產政黨立即呱呱落地，並且蓬生不已。日本第一個全國的無產政黨——即農民勞動黨，就是在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五時，成立於東京神田青年會館的④。它的生命雖然很短，只繼續二、三小時之久，即被日本政府所解散，但是此時已非明治時代的情勢所可與比。階級意識既然滲透於日本的全體無產者的社會層，全體階級的政治行動，自必再接再厲，時勢所趨當然不是人力所可阻抑的。

因此，繼上述農民勞動黨之後，而第二個全國的無產政黨的「勞動農民黨」，又於十五年三月五日下午一時，在大阪市土佐掘青年會館，舉行結黨式⑤此外，社會民眾黨、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無產大眾黨，以及由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無產大眾黨及四個地方無產政黨結合構成的日本大眾黨，也都前後繼續成立。我們於此已可以明瞭：日本全體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已經達到燦爛開花的時期了！關於日本無產政黨的成立過程及其演變，想在本論文詳加敘述。

六、日本政治與日本無產政黨

無產政黨的產生和發育，固然有待於經濟關係的轉變。換句話說，無產群眾（包括勞工與農民）的解放運動，要由經濟的行動轉入政治的行動，固然必在資本主義經濟完成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有些地方因為其它的原因和刺激而經濟界陷於窮途）之後。但是事實上，無產群眾要以完備的、長久的政黨組織在政治舞台上活動，政治制度的轉變也

是一個主要的動機。至少，也可以說是媒介的原因。這個道理，只看普通的政黨都在「國法許可的範圍內始得產生」，或看「無產政黨的存續專以合法的活動為依據」，即可知其一斑。固然無產群眾的進行政治行動，不一定要依據政黨的組織，或者不一定要在「合法的」範圍內。例如法國工團主義者及美國世界工人會所主張的依據同盟罷工的形式，或否認議會政治的直接行動，或如蘇俄之以暴力奪取支配階級的政權，就是實例。但是，前者仍囿於一時的行動，而後者在普通的場合是不可行的。所以，無產群眾要以和平的手段，適用政黨組織以攫取政權，政治制度的轉變，就成了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以自然的情勢發達起來的普通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歐美列強，既是如此，在以人為的保育發達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者，更應是如此。這裡，只有一點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政治關係及政治制度的轉變的基礎，依然在於經濟關係的轉變」。

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末期，因為封建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及受到歐美各國情勢的擊動，社會大轉變的醞釀，即已成熟，明治維新的改革，只是這個社會轉變的醞釀成熟的政治表現罷了。其時，實際從事於改革運動的人們，一方面提倡「復古」，他方面又倡導「維新」。「復古」與「維新」，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主張，但是事實上二者都是時勢的反映，可以並行不悖。蓋因不提倡「復古」，不足以造出「倒幕」的根據；不倡導「維新」，不足以步歐美列強之後塵，實行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中日、日俄兩戰後，更加進步而成軍國主義）。這兩點，就是當時日本，政治改革的二大目標。

然而，要「維新」，必先「倒幕」，廢除封建制度。所以，第一步抬出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以便努力於推翻德川幕府。幕府既倒，政治大權名義上也已收回天皇手裡，第二步就是「維新」的進行了。

所謂「維新」，只是「歐風」的模仿罷了。那時候，歐風崇拜的思想，支配了日本的全體社會。上自政治改革，下至思想界，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在取法於歐美。這種模

仿西歐的風尚之極濃厚表現於日本政治制度者，參照著名的《五條誓文》，及引用福澤諭吉氏所著的《西洋事情》為改革官制參考書之一，即可知其一斑。更如「政體書」的官制之效仿北美，以三權分立為根底，實是這種事實的具體證明。

然而政治上的「歐風」，也有種種不同的體制。至少，也有英法的自由民權派，與普魯士的偏重國權者之差別，日本之改革政治制度，究竟效法於那一種？

明治初年，日本政治制度改革的趨勢，表面上好似自由民權說占優勢，國家基本法律的憲法，很有採用法英制度的傾向。且有中江兆民、大井憲太郎及沼間守一等人，極力唱導自由民權論。甚至有西園寺公望者充任社長，而松田正久擔任記者的職務，發行《東洋自由新聞》。而板垣退助氏終於明治七年一月，提出《設立民選議會的建白書》。

那時候的民權論者，只是依據盧騷的《民約論》(Rousseau, Social Contract)，倡導民權的崇高，歌頌法國革命的光榮合理。他們的根本論據在於「社會是由民眾締約結合的，故主權在民，法律應以人民的意向為依據。這種思想，若自現在看來，固然極其單純，但在當時算是進步的思想。日本當時如果採用這種思想於政治制度的改革上，日本政治關係的進步，或許更為急速。

然而，被派赴歐洲研究憲法以為日本立憲準備的伊藤博文氏，偏偏眼看當時普魯士隆興的趨勢和俾斯麥(Bismark)的運用靈敏，覺得眼熱，馬上回國進行立憲事宜。討論研究的結果，日本憲法草案所取法者，已不是法國式的憲法，也不是英國式的憲法，它卻千真萬確地，是偏重於國權的當時普魯士式的憲法。於是，初期自由民權運動，遺留給後繼的有志者，充當繼續努力的目標。

我們再就明治年間日本政界的實況加以考察。

日本自從德川幕府末年，財力即已登上政台，倒幕諸役得力於三井家的援助非常之

大。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井家的主人三井高福氏即被召於京都御所的「全谷出納所」，以掌朝廷的財務。其它如三菱系的財主，地方的富農豪紳的勢力，也莫不盡與其時的政治結成關係，而政界各派也與這些財主富豪，各別互相勾結。薩長藩閥是以三井的金權為背景，大隈派則以三菱系為背景，板垣派則以地方的富農豪紳為後盾。這三派在明治初年各依自己的利害明爭暗鬥，形成三角關係的政爭。

根據上述日本明治政府之倚靠財閥，自理論推說，日本布爾喬亞汜早應操縱政權了，然而事實並不然，政權仍握於官僚手裡，那些財閥只為他們所利用。即使官僚之利用財閥，仍須顧全財閥的利益，但是財閥並未取得多大的實權。這有兩種原因：其一，布爾喬亞汜的內部不一致，例如三井系與三菱系之爭，地方布爾喬亞汜與中央布爾喬亞汜之爭；其二，官僚的殘勢尚屬雄厚。所以在明治二十年以前的長期間，日本財閥僅供官僚的利用。即在三井系與三菱系媾和後之二十年前後，官僚仍以雙手兩纜的手段利用他們。在這種情勢之下，自由民權之不能發達，自是當然之理，無產群眾要參與政權更是無望的。

迨至明治二十三年，一般民眾所企望的日本國會，好容易成立了。但是議員選舉的結果如何？清一色的布爾喬亞汜的議員！所差者，地方布爾喬亞汜增大一點勢力罷了。正如《國民之友》所言：「日本政權分配於四、五十萬的地主之間」（載於明治二十二年三月號，轉錄木村毅所著《日本社會主義史》）。再經中日戰爭後，日本資本主義的充分發達，和日俄戰後它的增進，而日本官僚的勢力日漸消退，日本布爾喬亞汜的全階級的勢力，適成反比例日益擴大。自明治二十三年以至大正的初年，日本政界幾乎盡為布爾喬亞汜占個全盤，政權操縱於財權。正如尾崎行雄所說：「如果日本實行共和政體，大總統自然不是三井就是三菱」（見白柳秀湖所著《日本民權發達史》一二四頁）。這是日俄戰後的事實。所以日本史家均稱此期為財閥時期。在這時期，無產群眾要插足於政界，也是無望的。一切的法令，尤其是取締壓迫無產群眾如治安警察法、警察犯處罰

令，及行政執行令等等，概由布爾喬亞任意規定創制；所有的選舉權，盡因財產上的限制而分配於有產者；無產政黨的成立須得他們所豢養的政府許可，政府尚且可以任意解散。這樣，日本無產群眾從何以進行政治行動呢？不消說，這期間的無產運動，只能在建造基礎之上著手！就是從事於訓練無產群眾。這層想在下節「社會思想的進步」，再加詳細的敘述。

然而，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在日俄戰後即已逐漸踏上早衰的途程，再經歐洲大戰至大正末年而達到窮途。在這種經濟情勢之下孕育、醞釀多年的日本無產群眾的運動，就臻於普及化、尖銳化。這種情勢，就是執掌大權的布爾喬亞泛泛的政府，也未敢太加輕視。所以民治四十三年之所謂「赤旗事件」、「大逆事件」發生時，對於幸德秋水等人的秘密裁判（這次的裁判歐洲報紙多加攻擊，稱為野蠻的侮視人權的裁判），不至再有第二次的產生。他們終於大正十四年三月，心雖不願但迫於事勢不得不把《普通選舉案》，通過於國會。這層就是大正年間日本政治制度改革之最大者。

日本普通選舉法施行後，日本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不受財產的限制，都有選舉權。選民的數目立由三百萬，增至一千三百萬。而在這一千三百萬選民之中，當然是由小資產階級和無產者占大多數。於是，從這次的改革，我們可以發見下列兩種的意義：

- (1) 日本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主義，成立憲民主主義的勃興；
- (2) 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抬頭。

這兩種意義，都於無產群眾的政治運動的進行有利。無產群眾的政治運動，要有充分的進步，普通有待於立憲民主主義的充分發達。因為立憲民主主義，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害關係，以與大資本家、大地主及官僚對立。在這個階段，無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是可以合作的（不過，無產群眾自己的陣營堅固，精神上不為小資產階級所吞併，

是個必須的條件。) 可以說這次的改革，將必對於日本無產政黨的健全發育，大有幫助。不但理論如此，事實也是在如此證明。大正十四年以後，成立的日本無產政黨，不至如明治中年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那樣，容易被政府一壓絕命，就是由於這次的政治改革。又如大正十四年成立的社會民眾黨與明治中年的社會民主黨，宗旨相同，目的也相同，而前者可以健全地存在，後者卻立被解散，原因也即在於這次的政治改革。現在的日本無產政黨，已有相當的戰鬥力，且有許多的無產政黨並存。只要它們不是偽無產政黨，這種現象就未始不是無產群眾政治運動進步的表現。

七、日本社會思想的進步與日本無產政黨

無產群眾的政治行動，須以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達為基本的條件，且須適宜的政治制度的培育，而日本無產政黨的發育正是一例，這都是以上二節所述過的。但是我們還不能忽略無產群眾的運動，要進到這個階級，階級意識的普及，也是一個要件。我們在前頭數節述過，無產群眾的運動，要由暫時的、地方的範圍，進到永久的、階級的程度，必須階級意識普遍化、尖銳化，意思就在這裡。不過，這個意識的深淺廣狹，就是社會思想的問題。

社會思想的進步云者，作者認其有兩種含義：其一，社會思想的量的增大；其二，社會思想的質的改進。社會思想的量的增大，也可以說是意識的普遍化；社會思想的質的改進，也可以說是意識的尖銳化。據此，無產群眾的運動，要進至實行政治行動，就有待於社會思想的量質兩方面的進步，自可不加以詳細的解釋，也得明瞭。我們且就日本的場合，加以考察一下。日本自從嘉永六年七月，鎖閉數百年的關門，被美國的水師提督，伯里氏 (Perry) 衝開以來，即與歐美各國開始交往，而日漸熏染於歐美的文明。

尤其自明治維新後，更進而在各方面加工模仿歐美。明治十九年（據《日本社會主義史》，但是《日本文化之史的研究》卻載為二十年）鹿鳴館的舞踏會，就是這種歐風模仿的最著名，而又最皮相的有趣插話。◎然而，歐美各種的社會思想，也就是在這時候流入日本海，浸潤了日本一般人士的精神。

明治初年流入日本社會的歐洲思想，約有四派：一為法國派的自由民權思想，二為英國派的功利思想，三為德國派的國權思想，四為基督教的思想。在這四派之中，對於後來的社會運動，或無產者運動最有關係的，就是法國派的自由民權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自由民權思想，倡於中江兆民、大井憲太郎等人，尤以中江氏為代表。他對於後來指導社會運動的思想，即社會主義，留下二種的貢獻：其一，從他門下出了幸德秋水、酒井雄三郎等有力的社會運動家；其二，他極端主張無神論，在日本思想史上樹立了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更如自由黨的左派分子，後來也都加入社會主義的社會運動。至若基督教本即標榜平等博愛，主旨和社會主義思想接近，初期的社會運動家，大多首先浸潤於這種思想。例如安部磯雄、村井知至、岸本能武太等初期社會主義研究者皆是。即如中期的建設者，如山川均、高島素之等人，也都肄業於上述基督教思想的搖籃的同志社。更如大杉榮、山口孤劍、石川三四郎、木下尚江、片山潛等人，也都受過洗禮。關於此項，再引大杉榮的一段說話，更得明瞭：

「平民社⑦……但是援助該社的安部磯雄、木下尚江及石川三四郎，都是熱心的基督教徒。聚集於此的青年大半也都是基督教徒。在當時的思想界，基督教是最進步的思想……」（大杉榮氏《自敘傳》二一二—二一三頁）。

明治初年的日本社會思想，既如上述那樣淺薄幼稚，不能產生或組成偉大的社會運動團體，自是當然的道理。例如明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的東洋社會黨，規定如下

的綱領：

第一條我黨以道德為言行的規準；

第二條我黨以平等為主義；

第三條我黨以社會公眾的最大福利為目的。

明治二十三年以前，有一部分志士克盡莫大的犧牲以與官僚戰，不分晝夜極力從事於自由民權運動，意在民選議會成立時，能由平民多占幾席議員的交椅，以增進平民的福利。二十三年十二月，第一回帝國議會果然開幕了。然而，結果如何？土界利彥氏說得非常痛快淋漓：

「自由民權運動志士的夢醒矣。已經明白：自由黨及改進黨，實都只是地主黨、資本家黨而已。指導自由民權運動的士族等，實只盡了新興財力階級的先驅的任務；一般的下層階級只被利用於資助財力階級的崛起；這種事情，也為識者所看破了」（原載《社會主義小史》，轉錄《日本社會主義史》三十六頁）。

其後，從事於政治運動者，放棄本來的步驟而轉向社會思想的研究或傳播；未及從事於政治運動者，也裹足不前，不約而同趨於同樣方向。從此直至日俄戰爭截止，是為社會思想成長的時期。

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即有「社會主義研究會」產生，發起人初係一神教的信徒（Unitarian），其目的在於「考究社會主義的原理及其應用於日本的可否」。

社會主義研究會實是後來社會運動思想的搖籃，大多數的日本社會運動家，都與該會有多少的關係。即如明揭無產階級解放的旗幟的日本第一個無產政黨，社會民主黨^⑧，也是由該會轉變來的。社會民主黨雖然立被解散，但是不久又重以社會主義協會成立為

一個名義上的學術研究團體。這次的會員已與社會主義研究會時的會員之為一神教徒者不同，都是勞動運動家和新聞雜誌的記者。於此，可知社會思想的進步與社會運動及無產政黨之間的密切關係。然而社會思想須有分化，始有進步。源出於社會主義研究會的諸位日本社會思想家，再經平民社的組織和《平民新聞》的刊行之後，分裂為基督教派（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與唯物主義者（土界利彥等人）。其後，乃有《直言》周刊、《光》半月刊、《新紀元》月刊及《社會主義研究》、《火鞭》等雜誌，各以雄硬的筆才吐露宣傳各種的社會思想。其中，尤以《光》為急進，是為幸德氏由美回日後創刊的。其時幸德氏的思想上已有巨大的變化。他在《世界革命運動的潮流》的演說辭裡，表露否認議會政策的意向，是為後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思想分裂為議會政策派與直接行動派的預兆。同時土界利彥也於《光》上登載《關於階級鬥爭論》的評論，批評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立場。這是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已經成熟到分化的起點。

如上所述日本社會思想，雖自明治三十八九年頃分裂為兩派，但是各派卻各振刷他們的精神，極力從事於思想的宣傳，並且參加實際的無產運動。例如西川光二郎等人之組織日本平民黨，土界氏等人之組織日本社會黨，及各派合刊之《平民新聞》日刊等等。尤其是日本社會黨，宗旨雖限於「國法的範圍內主張社會主義」，卻與以前的社會民主黨之只有綱領政策而無實際行動者不同。它實實在在進行工作或領導無產群眾的運動。黨員雖未及二百名，而演說、講演、地方遊說的進行，以及研究會、談話會的舉辦皆極力推行。日本社會黨最初領導的實際運動，就是東京電車費增加的反對，共開市民大會三次（一次被禁於事前未及開成），集會者每在一千五百名以上。結果雖因群眾有毀建築物之玻璃者而被起訴為凶徒嘯集罪，被檢舉者有大杉等十名；但其激動日本社會非常大，影響後來的社會運動的尖銳化一定不小。

上述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派與直接行動派的分裂，至日本社會黨成立一周年舉行的

第二次大會上，更加表現得分明。結果卻歸後者占得勝利。把最初結黨時的黨則第一條，削去「國法範圍內」，只留「本黨主張社會主義」。然而他們兩派因為思想的尖銳化終於不能不分離。自從《平民新聞》停刊後，即各分途：議會政策派獨自創辦《社會新聞》周刊及《東京社會新聞》；直接行動派則各分頭到各地方活動，如《大阪平民新聞》半月刊、《日本平民新聞》的刊行。後來，直接行動派因為明治四十一年赤旗事件及大逆事件，被處死刑者十二名，無期徒刑者十二名，十年徒刑者一名，八年徒刑者一名，而此派的勢力大挫。但是他方面，日本社會思想的前進卻不因為政治的限制而止步。近年來經濟恐慌更為助長它的猛進。並且在它猛進的過程中，處處都與實際的社會運動發生密切的關係。這層不是這裡所能盡述，我們只得作個結束。

如上所述，日本社會思想的進步及其傳播，喚醒了日本的農工群眾；而農工群眾實行解放的運動。以後的農民組合、勞動組合等等無產運動團體，大多是依照上述的過程成立的。其中的指導者和領導者，都是那一派先覺者。即如現在或停止或尚存在的日本無產政黨，事實上也都由那一派最前進的先覺者組織而成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農民勞動黨、勞動農民黨、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等等固是如此，日本大眾黨、社會民眾黨、勞農黨、全國民眾黨等等也莫不如此。而且，近年來日本的社會思想家，漸有組織政黨，欲藉此解決日本的社會問題的傾向。這或許正如赤松氏所言，是「日本社會運動的轉換」（「轉換期的日本勞動運動（？）」），也是日本選舉權普遍化使然的。然而，惟其如此，更可知日本無產政黨正方興未艾也。其勃興、成立的過程及其現勢，再加詳細的討論。

不過，我們於此明白：日本無產群眾的解放運動，已由經濟的行動進入政治的行動。並且，政治行動也在日益緊張，其情勢似乎已非日本現在的經濟制度所得抑制，也非「大陸侵略」及「南洋發展」等手段所得緩和得了。日本無產政黨將必於不遠的未來，對於

日本的無產群眾，由訓練而組織，由組織而造成良美的政治效果吧？！

八、日本無產政黨之史的考察

我人欲檢討日本無產政黨的本身問題，且先自其發展開始。日本無產政黨發達時期的區分法，因人而異，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區分法。但據我人的主見，則以下列三期的分法，最為合宜：

- (一) 先驅時期；
- (二) 成熟時期；
- (三) 發展時期。

(一) 先驅時期

借金黨佃農黨貧民黨 日本早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頃，即受民權運動澎湃的影響，而參混於當時的政黨，尤其是自由黨之中的急進分子，乃從無產群眾的立場，進行下層社會的運動。他們眼看貧富懸隔的事實，地主與佃農對立的事實等等，乃自實際方面進行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運動，自是自然的形勢。同時，他們又由風傳，學得歐洲社會黨的名目及其活動，他們自然出於模仿。於是，借金黨、佃農黨、貧民黨、社會黨等等名稱，出現於當時的日本社會。

東洋社會黨 在上述醞釀之中，具體出現的，是「東洋社會黨」。明治十五年五月，由樽井藤吉、赤松泰助等人發起，成立於肥前島原的江東寺，參加者有數百人之眾。該黨的綱領有下列三條：

- (1) 我黨以道德為言行的規準；

(2) 我黨以社會公眾的最大福利為目的；

(3) 我黨以平等為主義。

他們且在其立案請願書中說：「太政官的告諭文中，亦曾有『平均上下，齊一人權』等語，其根據通義，即社會主義也。」

在日本政黨中使用社會主義為主義者，或許以此為始。但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內容，則與現代的社會主義，意義各異。此點只據其綱領所列：「以道德為言行的規準」，「以社會公眾的最大福利為目的」，及「以平等為主義」，而關於社會的經濟組織，一言未及，則可充分明瞭。尤其是他們的實現目的的手段，只限於「文書及遊說的宣傳」。因此，「東洋社會黨」的思想，與其說是社會主義思想，無如說是「東洋派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較合實際。該黨在未有若何完就以前，於成立後僅過二月，即被政府解散。

車界黨繼東洋社會黨發現的，是明治十六年成立的「車界黨」（或稱車會黨）。該黨成於反抗東京市馬車鐵道會社的運動，先集市內的車夫，結合而稱為「馬車鐵道反對同盟會」。在該黨活動的中心人物，有自由黨的少年，奧宮健之氏，及原為根津花柳巷的車夫，後為自由黨的名士，三浦龜吉氏等人。

車界黨 先在神田明神，開過車夫大懇親會，次於兩國的井生村樓，開過車夫演說會：是為該黨在當時所得進行的工作。但因車夫演說會上，會眾用烟盆飛打干涉壓迫開會的警察，車界黨遂為日本政府所禁止，並加嚴重取締於車夫組合。不久，奧宮氏又因名古屋事件入獄，這個運動乃歸於自然消滅。

惟是，這次廢止馬車鐵路的運動，正與產業革命初期，英國舊式織工之破壞新式紡織機器，約略相似。它雖屬初期的幼稚運動，但其以勞工的團結反對資本勢力的壓迫，卻較比上述東洋社會黨，帶有更為濃厚的社會黨的意義和實質。其名稱車界黨（Shakiatō），

之寓社會黨(Shakiatō)的意思，實非無因。

東洋自由黨 正如我人在本論文前面已述過，日本明治初年自由民權運動盛極一時，其時有志之士概皆奔波於這種運動。但至明治二十三年日本國會開設後，一般奔走於自由民權運動的志士，目擊自由黨及改進黨之實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御用黨，遂覺醒於自由民權運動的痴夢。他們自從發覺上述情形以後，即改途他向。例如法國自由主義的代表學者，且以清廉奇俠之士聞名的中山兆民，因憤於議會的情勢，決意辭去議員之職。東洋自由黨就是這種情勢所產生的。

自從國會開設後，本是比较革命的自由黨，漸漸保守化，專為地主及資本家而存在。同時，該黨左派如大井憲太郎等人，大抱不滿，遂於明治二十五年八月，成立了東洋自由黨。該黨的政綱，標榜「保護貧民勞動者」。黨內分設「大日本勞動協會」、「普通選舉期成同盟會」及「小作條例調查會」，以從事於實際的活動。由「小作條例調查會」著手於農村間；由「大日本勞動協會」組織「車夫組合」、「木匠組合」，啓日本勞動運動之始。該黨且創辦機關報《新東洋》及《吾妻新聞》，常載社會主義的作品。於此，可見「東洋自由黨」，名雖為自由黨，而其實質則帶有社會黨的色彩。可惜其時因為日本資本主義未大成熟，社會主義的運動未有充分發展的地盤，而東洋自由黨也終消滅於無聲無臭。

日本社會民主黨 以上所述自由黨左派的社會主義運動，實是日本無產政黨先驅的先驅而已。嚴格地說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實始於中日戰爭以後。蓋因中日戰爭以後，日本資本主義始有急速的發達。而勞動運動也隨之而擴大，再經明治三十四年的全國金融恐慌的壓迫，經濟界陷於極端的惡況，勞動運動更以河決之勢澎湃起來。但是他方面，日本政府卻以苛刻的壓迫政策（如明治三十三年三月的治安警察法的制定等）酬應勞動運動，欲使其消滅淨盡。然其結果，運動的中心卻由勞動運動轉向社會主義運動，終於

激成以政治鬥爭為中心的政黨運動。社會民主黨則在此種機運之下，由片山潛、幸德秋水、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四郎及安部磯雄等人發起，成立於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以前的日本無產政黨，大都沒有具體的綱領和政策，有之也多於社會主義的宗旨零碎不全。至社會民主黨，始有長文詳盡的《宣言》、具體的綱領及政策。該黨的《宣言書》發表於其機關雜誌《勞動世界》的臨時號，其中論列《理想》八條，《實際運動的綱領》二十八條。可惜乍成立後即被命令解散，掲載該黨宣言的各報，如《每日新聞》、《報知新聞》、《萬朝報》、《新總房》（千葉）及《東海新聞》（千葉）五家，均被禁止發賣，罰金二十元。

社會民主黨的宣言，日本政府雖然禁止掲載，但據其判決文尚可窺見梗概：

「……是應該打破貧富的懸隔，實是二十世紀的大問題……本邦今日的政治機關，全為富者，即貴族、富豪或地主、資本案所獨占；占國民多數的無學無識的勞工及佃農，使役於富者，幾不值得富者之一顧。但使他們獲得應得的地位，實為增進社會全體福利的所在。所以我黨負多數人民的休戚而產生。我黨欲藉純然的社會主義及民主主義，以打破貧富的懸隔，使全世界得到和平主義的勝利，並期向左揭理想著著前進……」

且將其理想節述如下：（一）撤廢人種差別；（二）全廢軍備；（三）全廢階級制度；（四）生產機關如土地及資本悉歸公有；（五）交通機關公有；（六）財富的分配公平；（七）人民的政權平等；（八）人民的教育平等，國家負擔全部教育費。

此外，尚有政策二十八條，因其過於冗長，所以此處從略。惟是，社會民主黨雖有完備的綱領和政略，但卻沒有無產群眾的支持，在實際運動也未留下若何的功績。

國家社會黨 明治中年，日本出現一個標榜怪論的無產政黨，該黨為山路愛山、中村太八郎、山根吾一及斯波貞吉等人所組織，成立於明治三十八年八月。該黨標榜「壓抑富豪的專橫」為主義，至其理由則曰：「古代日本皇室是某種意義的社會主義實行者，所以，我國國民宜藉皇室之力，以抑止富豪的專橫」。據此或知該黨所信奉主義，也與國家社會主義異其旨趣，實為他們獨創的理論。但它也有其所以產生的背景。蓋因明治三十八年八月，適值日俄媾和的結果，日本舉國皆憤慨於當時所締結的所謂「屈辱條約」。是以帶著國家主義氣質如該黨之產生，實非無因。

國家社會黨的宗旨，雖然「非貓非虎」，但在實際運動方面，卻曾與下述日本社會黨合作。而召集過市民大會，幫助無產者反對東京市電車費的增高，開日本無產政黨從事於實際活動的先例。惟是，該黨自從明治四十三年所謂大逆事件發生後，即受政府的壓迫而無形消滅。

日本社會黨 日本資本主義雖自中日戰爭以後（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即有急速的進展，勞動運動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他方面政府的壓迫卻反增大。一般的無產政黨的成立，政府概加禁止，或立刻解散。例如社會民主黨創設者提出「日本平民黨」的結社稟，也未達到結黨的目的。至明治三十九年一月，西園寺內閣成立時，如稍反於前內閣（桂氏內閣）的言論壓迫，採取稍為寬容的政策。於是西川光二郎及木通口傳二人，乃試為提出「日本平民黨」的結黨稟，綱領只在「普通選舉的期成」。同時，土界利彥及深尾韶，也以「實行社會主義」為綱領，提稟「日本社會黨」的結黨。政府皆不加壓迫。不久，此二黨復又合併而成別個「日本社會黨」。該黨成立於明治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同月二十七日在其事務所開評議員會，共訂九條黨則，第一條規定「本黨在國法的範圍內主張社會主義」。

以前的日本無產政黨，具備完全的組織，且會參加實際活動者，除上述國家社會黨應日本社會黨之提議參加市民大會者外，尚無前例。所以，真正而積極從事於實際活動的日本無產政黨，謂以日本社會黨為始，也無不可。日本社會黨的黨員，數目雖然不滿二百，而其實際的活動卻極活潑：演說、講演、地方遊說、主辦研究會、談話會等等，均有極大的成績。其中，該黨所召集舉行的反對東京市電車費增高的市民大會（前後共集三次，開成二次，一次被阻），尤為日本社會運動空前的壯舉。但其結果，西川、木通口、山口、大杉等共十名被起訴為「凶徒嘯集罪」。

日本社會黨至次年（明治四十年）二月十七日開第二次大會時，黨的內部乃起左右翼之爭，問題在於「議會政策論」與「直接行動論」的衝突。在此次大會中，黨綱的提案有三：其一為評議員會的原案，規定普通選舉運動為黨員的隨意運動；其二為田添氏所提修正案，主張普通運動為有力的運動方法；其三為新由美國歸來而思想上大有變化的幸德秋水的修正案，主張議會政策為無能為。第二修正案，即所謂議會政策論，第三修正案，就是直接行動論。當日，此二種主張的提議者，曾經非常激烈的辯論，尖鋒相對，實放日本社會運動界前此未有的光彩。表決的結果雖以二十二票與二十八票之差，維持原案；但是議會政策論二票與直接行動論之二十二票之差，實在指示前者之慘敗而後者之大勝。會議記錄在其機關報，《日刊平民新聞》上登載過。其結果，政府遂以幸德氏的演說及大會議決案為紊亂朝憲，禁止《平民新聞》的發賣，編輯發行人被起訴，二十二日，日本社會黨終被禁止結社。

其後，日本社會主義的運動，重由實際的活動，轉向主義的宣傳。但因日本政府嚴厲的壓迫，而他們所用為中心的《平民新聞》，也終以四十年四月中旬悲壯的廢刊辭為最後一期，被令解散。

再經明治四十三年夏轟動日本全國的所謂大逆事件發生而被難者有幸德氏等人（詳見七、《日本社會思想的進步與日本無產政黨》節內所述）以後，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及無產政黨運動，皆顯中止之狀，直至大正七、八年間因為歐戰所造成的種種原因的刺激，始見復活的曙光。相距約十年間的時期，稱為日本社會運動的「黑暗時代」。而日本無產政黨運動的先驅時期，也就終止於此時。

總觀以上所述，日本無產政黨先驅時期的運動的特色，若自大體上說，可以歸納出下列三點：

（二）成熟時期

日本各種工商業，自經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之後，即已有充分的發達；再經歐洲大戰中的「趁火打劫」，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登峰造極。而日本的勞動問題，乃成日本全國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在大正七、八年頃，一方面日本勞動組合的運動異常勃興；他方面無產群眾也漸覺醒於自己的地位及利害關係，其階級意識也漸普遍化、尖銳化。於是，他們的鬥爭就漸由經濟的，轉向政治的了。在這時期，日本無產群眾的政治運動，先由組合勞動者與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提攜，以民主政治為基調期望普遍的實施，繼而有社會主義同盟及政治研究會等組織，更進而結成農民勞動黨、勞動農民黨，建下日本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基礎。略述於下：

社會主義同盟會 日本自從大正七、八年頃以降，因受歐戰後經濟界的影響，遂於以前的意識社會主義者之外，產生了實質的社會主義者。更因受蘇俄革命的刺激，而政治運動的氣勢愈益加強。因要實行政治的運動，故覺有將各種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如種種勞動團體、學生團體、思想團體等等，團結在一起的必要。因此，大正九年十二月九、十兩日，社會主義同盟就在東京神田青年會館，舉行成立大會。入會者達三千多名。且

在政府重壓之下，繼續了活潑的活動。不幸終因內部思想的對立熾烈——大體上是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對立，而十年夏乃與其內訌同時遭受政府的解散命令。社會主義同盟的壽命，雖只不過半載，但其為新興無產群眾的實質的第一個政治團體，是值得注意的。

政治研究會 大正十一年八月，山川均氏在《前衛》雜誌上，發表過論文《無產階級的方向轉換》，主張政治運動的必要，提倡由經濟鬥爭轉入政治鬥爭，由少數運動變為群眾的運動。其後，日本無產群眾的政治運動，乃漸具體化，而無產政黨的樹立問題，乃成當前急要的問題。同時，又有山本內閣施行普選的聲明，直接刺激各種無產團體，群趨於政黨的組織。遂於大正十二年十二月，由於高橋龜吉、鈴木茂三郎、青野季吉及島中雄三的介绍，而勞動總同盟、關東機械工組合、農民組合、社會思想社等團體的代表共二十七名，舉行第一次談話會。其後，更繼續進行六次會議，遂以組織全國無產政黨籌備會的目的，在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政治研究會的創立大會。

政治研究會的目的，只在「依據無產階級的立場，調查研究政治、外交、財政、經濟、產業、勞動、社會的各種問題，以確定對策，促進群眾的政治組織，藉以期成日本社會的合理改造」所以它並不是政黨的組織，而只是促現政黨的準備團體罷了，其活動的範圍也都限於群眾的政治教育運動。政治研究會雖因當時有組織勞工的畏縮，致使它的運動不能注入於勞動組合與農民組合，而只以組合外的無產群眾為對象，但也頗有可觀的成績，大正十四年是其全盛時期，全國的支部總數達五十三，會員六千餘。

但至大正十四年六月，日本農民組合突然出而單獨提倡無產政黨組織準備會，因此政治研究會的發議權遂為所奪。更因勞動總同盟的分裂，影響政治研究會內部的對立愈益尖銳化。在第二三兩次大會上，左右派因以無產政黨的綱領及組織問題為中心，引起很大的爭論，終於釀成右派幹部的退出，而左派幹部獨攬該會的情勢。其後該會完全變成最左傾勞動組合的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的別動隊。至勞動農民黨成立後，內部之解散

非解散之議起，而左派分子於大正十五年五月召集支部代表，提議「大眾教育同盟」的組織，該案可決後，政治研究會始歸於消滅。

農民勞動黨 上述政治研究會的政黨組織準備運動，勢力雖未侵入有組織的勞動團體如勞動組合及農民組合之中，但是這些有組織的勞動團體，並未忽略政黨組織問題，大正十三年所開組合大會，尤以該問題為重要的議題。就中農民組合尤其重視政黨問題，對於地方的選舉，早即著手參加鬥爭。因此，擁有勞動組合指導勢力的勞動總同盟，早即計劃組織以自己組合為中心的政黨，且以包括勞動者、農民及一切反資產階級的份子而組織政黨為其目標。日本農民組合終因農民群眾的要求——進出於政治運動——所督促，而於六月二十一日，對於組合員在千名以上的全國勞動團體，提倡無產政黨組織準備機關的設置。

根據上述提議，組織了無產政黨準備委員會，設立綱領及規約的起草委員會。設委員會前後共開四次，評議會、政治研究會與總同盟等組合之間，發生激烈的爭議，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最後綱領委員會上，由於政治研究會及無產青年同盟的可否加入政黨的問題，而總同盟脫離準備會。於是，政黨組織的運動一時陷於極大的危境。但終因評議會的自動的退出，及解散政治研究會的承諾，這種糾紛乃得告結束。十二月一日，「農民勞動黨」的結黨式，乃得舉行於東京神田基督教青年會館。不幸，經歷萬重難關而始成立的「農民勞動黨」，成立後僅三十分鐘，即被日本政府命令解散！

勞動農民黨 農民勞動黨雖在結黨後即被解散，但是此時日本無產政黨的組織運動，已與先驅時期不同，是由無產團體自身長大的，所以只要無產團體存在，它永久是不會消滅的。因此，農民勞動黨被解散後，日本農民組合馬上表示再起的意向，就商於官業勞動總同盟，提議無產政黨組織準備談話會的舉行。第一次談話會開於東京玉姬俱樂部，議決新黨組織方針六項，是為有名的《玉姬俱樂部的聲明》。其第一次聲明：「新政黨

完全排除共產系，而以現實的政黨組織前進；導無產政黨的創立入於難境的組合，積極地加以拒絕，消極地請其謙退。」於是在農民勞動黨的組織中脫離關係的勞動總同盟，又再加入新準備委員會。新準備委員會，且因鑒於農民勞動黨之被禁止，修正以前的綱領，改「行動綱領」為「政策」。終於大正十五年三月五日，舉行結黨大會於大阪土佐掘青年會館，定名為「勞動農民黨」。新綱領約有下列三條：

放；

(1) 我們希期依照我國的國情，實現無產階級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

放；

(2) 我們希期採用合法的手段，改革關於不公正的土地、生產、分配的制度；

(3) 我們希望打破專在代表特權階級的利害的既成政黨，以完成議會之徹底改造。

勞動農民黨雖然免於政府的解散，外觀雖似極其穩固，但是內部卻有很大的問題存在。玉姬俱樂部聲明所列第一項，可以分為二種解說：其一，只要共產系等團體謙退政黨準備委員會；其二，即屬於這些團體的個人，也無充當黨員的資格。勞動總同盟的見解，屬於後者，而日本農民組合即固執前說，因此，中央機關對於各地的支部的承認發生猶豫，總同盟更因感覺前途不安，躊躇於支部的組織。致使黨本身陷於「半身不遂」的悲境，不能進行活動。

然而各地的支部大多主張開放門戶，日本農民組合也於該黨第四回中央委員會之前，先在擴大委員會議決開放門戶。因此，十月二十四日勞動總同盟等團體，在黨的第四回中央委員會聲明脫離，安部、賀川、三輪等人也都連袂辭職。所殘留者，僅日本農民組合及製陶勞動總同盟。分裂後的勞動農民黨，以細迫兼光為書記長，更迎大山郁夫為黨首，而陣容一新。且由評議會指令組合員，積極勸誘入黨，所以此時該黨可謂為清一色

的左派分子的黨了。然而其後卻能以左派政黨而著著進行各種工作，不似前此之徒具形骸者大異其趣，也是研究日本無產政黨者所不能忽略的。

總觀以上所述，本期的特色如下：無產團體的各黨各派，皆急於組織統一的無產政黨，所以均能犧牲本團體的意見，甚至犧牲本團體的地位以完成政黨之實現者也有之，例如評議會之自動退出無產政黨準備委員會，及政治研究會之承諾解散，是其顯例。即如最固執的勞動總同盟，大體上也算堅忍到勞動農民黨第四回中央委員會。

(三) 發展時期

日本的各種無產團體，在其政治運動的初期，因急於促成政黨的實現，所以在短期間尚能左右各派互相遜讓容忍。但至政黨實現後，進行實際活動時，或在其確定立場時，各派主張和立場的不同，忽又復活表現於黨的爭論之上。這是事所必至、理所當然的趨勢，是無可奈何的。蓋因各個無產團體所代表的無產群眾性質不同，利害也有多少的差異，無產團體自然各自採取不同的立場。並且無產群眾的政治運動愈益發展，這種分化的情勢必定愈益尖銳化。非到某種刺激或外界的壓迫發生，這種情勢必定不能轉移。所以日本無產政黨運動，自從勞動農民黨固定之後，不久即起複雜的分裂，各派又據各自的主張和立場，組織各種無產政黨，分立並存。這種現象既是無產政黨運動發展到某階段應有的現象，所以我人稱此時期為「發展時期」。

日本農民黨 前此，日本農民組合的右派分子，因不滿意農民組合之政黨組織方針的急進，終於大正十五年三月日本農民組合的第五次大會上，聲明脫離日本農民組合，另合日本中部的大和農民組合及群馬、□木、茨城、埼玉、靜岡等縣的農民組合，成立了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日本農民組合即以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為支持團體，創立於大正十五年十月十七日者。

該黨的宣言中有曰：「日本農民黨為著放射光彩於三千年日本歷史上而產生出來！」它且於其綱領中載著，「振興日本國本」。於此可知日本農民黨，在日本無產政黨中，是以「農民加入農民黨」為標語的、極右派的政黨。

社會民眾黨 當勞動農民黨議決對共產系四團體——「評議會」、「政治研究會」、「無產青年同盟」及「水平社無產者同盟」——開放門戶時，勞動總同盟、官業勞動總同盟、市電自治會、勞動組合總聯合會，及司厨同盟五團體的代表，即與安部磯雄、賀川豐彥等人，於十月二十四日第四回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同聲明退出。嗣後，以勞動總同盟為基礎，進行「現實主義的無產政黨」，遂於十月四日發出樹立新黨的聲明。結果，勞動總同盟和獨立勞動協會——政治研究會右派所組織者——提攜，在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組織了「社會民眾黨」。該黨的特色有二：其一為明瞭採取右派的立場說：「排斥無視社會進化過程的急進主義的政黨」；其二為不採用「無產階級」的字眼，而以「勤勞階級」代之，明示其包括勞工、農民及中下層階級。

日本勞農黨 雖如上述，勞動總同盟因不滿於勞動農民黨之向共產系四團體開放門戶而退出該黨；但在勞動總同盟內部，對於此舉也有極端反對者。同時，日本農民組合內部，也發生左右派的分裂，右派終於退出日本農民組合。「日本勞農黨」即由此二派——勞動總同盟的左派，及日本農民組合的右派——結合組織而成者。它成立於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該黨的綱領，約與勞動農民黨的綱領略同。只其所聲言的特色，在於「小兒病的左翼及以排斥左翼為名而日益增高反動化程度的右翼，一併排擊，以樹無產階級運動的正道」。

無產大眾黨 勞動農民黨自從各右派因不滿於其「開放門戶」而相繼退出以來，左傾分子愈益集中，而日益向左傾前進。此時之勞動農民黨，正如大山氏所言：「立於純

粹無產階級的立場，從其時高速度地繼續展開果敢的鬥爭」。又如同氏所言：「黨已不認識議會為獲得政權的手段……只認其為黨的演壇——尤其是暴露政治的演壇」。

然其內部，也有因此而抱不滿者，此派以大道憲二氏為首領，後因無產政黨合同問題的爭論，毅然退出。繼之而發生日本共產黨的大檢舉（昭和二年三月十五日），勞動農民黨因受牽連被命解散。其後舊勞農黨內部愈益分散，而大道憲二及黑田壽男等人，乃以雜誌《勞農》為理論的工具，與舊勞農幹部派對立。大道氏一派更與舊勞農黨外的各種分子結合，而於昭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組織「無產大眾黨」。無產大眾黨雖非如舊勞農黨的左傾，但也非右傾的政黨，它正處於二者之間，其特色在於：「主張代表同一社會層的所有全國的及地方的無產政黨，依其合同而組織單一政黨」。換言之，它是實現戰線統一的過渡政黨。

新黨組織準備會 舊勞動農民黨，如上所述，因受三一五共黨大檢舉的牽連，而被政府命令解散。其後，幹部派依據舊勞農的主義、主張及指導精神，以重繼勞農黨為目標，組織了新黨組織準備會。其間，或者主張再組合法的政黨，或者主張組織非合法的勞農協議會，雖然一時曾陷於飄搖不定的狀態，但是結果應群眾的要求，決定重組合法政黨。於是新勞農黨的成立大會，乃於昭和三年十二月，舉行於東京本所公會堂。然而新勞農黨依然難免於被解散的命運。同時，新黨組織準備會也被命令解散。

經過此次的壓迫後，準備會的指導者，決心放棄組織合法政黨的意向，而於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另外組織非合法的鬥爭實體，「政治自由獲得勞農同盟全國準備會」（簡稱為「政獲勞農同盟」）。然而不贊成非合法的活動的分子，相繼脫離「政獲勞農同盟」，分散各地另組地方的無產政黨。其重要者有勞農大眾黨、中國無產黨、大和無產統一黨、岩手無產黨。

日本大眾黨 日本大眾黨是由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無產大眾黨及四個地方無產政黨合併而成者。

自從勞動農民黨的內部分裂後，日本無產政黨即已發生複雜的分化及對立的情勢，是上面所已述過的。但是他方面，「統一無產政黨戰線」的呼聲，也未嘗絕於耳。尤其自經第一回普選日本無產政黨嘗過失敗的苦味以後，這種統一的呼聲，更加囂於塵上。昭和三年十二月一日，乃有日本農民黨、無產大眾黨及民憲黨（地方無產政黨）各派代表同訪日本勞農黨，提議合同。日本勞農黨，因此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統一委員會，議決贊成合同。於是，十二月五日，舉行第一回合同協議會。其後繼續六次，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在協調會館舉行創立大會。此即「日本大眾黨」之誕生也。參加者如上所述，有全國無產政黨三——日本勞農黨、無產大眾黨、日本農民黨，地方無產政黨四——民憲黨、中部民眾黨、信州大眾黨、島根自由民眾黨。

然而，如此大規模合併後的，前途似甚有望的日本大眾黨，不幸又於成立後未滿一月，即復於內部發生「清黨運動」。清黨的原因在於大眾黨幹部，有與政友會及資本家發生金錢的關係，而福田狂二一派因擁護大眾黨的階級性而發起彈劾。其後舊日本勞農黨舊日本農民黨幹部與舊無產大眾黨幹部之間，發生激烈的暗鬥。其結果，舊日本農民黨系，退出日本大眾黨；舊無產大眾黨的分子，有的被除名，有的自動退出。到這時候，日本大眾黨，實質上，只是舊日本勞農黨的擴大罷了。

日本大眾黨分裂後，日本舊存的無產政黨消失全國無產政黨的勢力者，有舊日本農民黨及舊無產大眾黨。退出日本大眾黨的舊日本農民，失去組織全國無產政黨的能力，而從來充當日本無產政黨最右派，幾乎不能認為無產政黨的日本農民黨的殘餘勢力，消滅淨盡。即如舊無產大眾黨，雖曾短期組織過反對日本大眾黨分裂的「統一戰線同盟」

及「反對分裂實行委員會」等團體，以與日本大眾黨的幹部爭，但終毫無結果而孤立無援，不獲已而分散各地組織地方無產政黨。其主要者有東京無產黨、秋田無產黨及大阪無產黨等。

勞農黨 舊勞動農民黨的幹部，憤於新黨組織準備會及新勞農黨的被命解散，政府的壓迫臻於極端，乃放棄「合法政黨主義」，組織「政治自由獲得勞農同盟」，以實行非合法的鬥爭。因此，日本政府對於此派的活動，嚴重取締，極端的壓迫。致使他們的活動，不得不採取潛行的方式，處處感受不便。日本政府關係者，甚至採取不公正的壓迫，昭和四年三月五日，該同盟的會員山本宣治代議士之被殺；即其一例。尤其經過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共黨檢舉後，該同盟的活動愈陷於窮境，幾無存立的餘地。因此無產群眾乃復有組織合法政黨的要求，即該同盟幹部分子，也覺有此種必要。

「政獲勞農同盟」，以非合法的形式，繼續了約有八月的運動。至昭和四年八月八日，中央委員長大山氏、書記長細迫兼光，及中央委員上村進，因得河上肇及小岩井淨的贊同，發表樹立新勞農黨的提案書，歷述樹立合法的左翼無產政黨的必要，以求無產群眾的批判。據該提案書，則新勞農黨的性質、任務及組織的原則如下：

(一) 為著不斷地、強烈地、現實地、有效果地擁護伸張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其它一切被壓迫民眾的利益起見，而以大眾的日常鬥爭主義為全活動的基礎。

(二) 且把各個場面的鬥爭，聯結於政治的要求及其必要的關聯上，把整個鬥爭集中統一於政治的自由獲得鬥爭，而強烈地展開。

(三) 他方面，根據這種立場，努力於戰鬥的戰線統一之決定的實現。

(四) 為著遂行以上的目的而(1)在完全「黨的平民主義」的基礎上，(2)擁

有獨自的指導師，(3)確立恒常的政治組織，(4)以合法的左翼政黨，進出於公然的舞台上（《新勞農黨樹立提案》三十三頁）。

新黨組織的籌備著進行，終於昭和四年十一月一日舉行成立大會，該黨於強烈進行被壓迫民眾日常利益的保護及政治自由獲得的鬥爭以外，且以擴大加強勞動組合及農民組合，為其重要的任務。

但當新勞農黨組織的提案發表後，左翼陣營內部，對於該提案之贊成與否，發生很大的爭論。甚至如政獲勞農同盟，且以全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大意如下的聲明書：「這個提案是種企圖左翼陣營分裂的破壞陰謀，是對勞農同盟的直接挑戰。因此，應該斷然反對這種計劃，同時重起大眾的運動，以破壞他們的策動。」

繼之，乃有十四日上列大山等五人的除名和放逐。

至最近，新勞農黨的內部，又以「解消與非解消」之爭，轟動日本無產政黨運動界。

全國民眾黨 勞動總同盟從前即已有過二次的分裂。自去年（一九二九年）四月大阪聯合大會舉行以來，其內部更發生「反對現實主義」的一派，以松岡駒吉及西尾末廣等人為領袖。於是勞動總同盟內部左右派的對立愈益激烈化，遂至醞釀同年九月第三次分裂。因分裂而脫離勞動總同盟的一派，另外組織「勞動組合全國同盟」。

勞動總同盟的分裂，自必影響及於社會民眾黨。其結果，遂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第四回黨大會上，發生大阪府聯合會選出代議員的大部分脫離。同時，東京方面又有宮崎龍介一派，組織「社民黨反動化防衛全國協議會」。於是，上述二派合作而組織「全國民眾黨」，本年一月十五日，舉行成立大會於東京帝大基督教青年會館。

總觀以上所述本期日本無產政黨的分裂與對立，可知本期的日本無產政黨運動，反乎成熟期之因急於實現統一的無產政黨而各黨各派暫以自己的意見供作犧牲。本期的特

色在於各黨各派皆為實實在在遂行本黨本派的使命與任務起見，概都堅持自己的主張。因為這種堅持，而表面上形成四分五裂的情狀，甚至互相軋轢對立。然而這種分裂，是無產政黨運動發展到相當階段，所必有的現象。如無此種現象而永如前期，苟合忍容，則其發展必無進步，可以無疑。所以，分裂對立的情狀，是發展期必然的特徵。不過，無產政黨的分裂與對立，也須有相當的限制和標準，否則，有時也足以妨礙本身的發育。

九、現存日本無產各黨的綱領及政策的比較

成熟期以後日本無產政黨的發展過程，若概括言之，則第一個「農民勞動黨」，僅存三十分鐘而消滅；由農民勞動黨，重再脫胎而成「勞動農民黨」；復由勞動農民黨前後分化而產生「日本農民黨」、「社會民眾黨」、「日本勞動黨」及「無產大眾黨」；因分化而獨立的日本農民黨、日本勞動黨及無產大眾黨，復與其它四個地方無產政黨重組而成「日本大眾黨」；舊勞動農民黨被解散後，經過新黨組織準備會的醞釀而重組「勞農黨」；最近，因不滿於社會民眾黨的反動化而產生「全國民眾黨」。於此可知現存日本無產政黨，只有社會民眾黨、日本大眾黨、勞農黨及全國民眾黨四個。究明這現存四個無產政黨的綱領和政策，即可明白過去日本無產政黨運動各派的大勢及其異同。蓋因現存各黨對於過去各派，均有歷歷可尋的系統關係故也。

(一) 現存各黨的綱領

(1) 社會民眾黨的綱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a、我們確信建議勤勞階級本位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樹立健全的國民生活的方法，而希望其實現；

b、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分配方法裡頭，有阻害國民生活者，而希望以合法手段加以改革；

c、我們排斥代表特權階級的既成政黨，及無視社會進化過程的急進主義的政黨。

(2) 日本大眾黨的綱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a、我們希望根據我國國情，以實現勞動者，農民及無產市民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

b、我們希望採取合法的手段，以改革現在不合理的關於土地、生產、分配的制度；

c、我們代表無產階級的利害，希望有產階級所壟斷的政治上各種制度的徹底改造。

(3) 勞農黨的綱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a、我黨為擁護伸張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其它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日常利益而戰；

b、我黨以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的擴大強化為重要任務；

c、我黨希望無產階級戰線的統一；

d、我黨為全體被壓迫民眾之獲得政治自由而鬥爭。

(4) 全國民眾黨的綱領（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

a、我黨代表勞動者、農民、小賣商人、小工業者、商業使用人、薪水生

活者等全體勤勞階級的利益；

b、我黨希望建設勤勞無產階級本位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的各種制度，並解放勤勞階級；

c、我黨運用勤勞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依照合法的手段，為達上述目的而鬥爭。

總觀以上四黨的綱領，其共通點如下：

(1) 各黨皆不滿意現有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及社會的各種制度；
(2) 各黨字面上所代表的分子約略相同，只有社會民眾黨及全國民眾黨，標榜「勤勞階級」或「勤勞無產階級」而已；

(3) 各黨皆欲為「勤勞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利益而鬥爭；

(4) 無論明文規定與否，各黨皆具有反抗既成政黨（指有產政黨）的意旨。各黨的差異點，大約可以列之如下：

(1) 勞農黨未曾明言「合法的手段」，其它三黨皆有此規定；

(2) 社會民眾黨特別明言「排斥無視社會進化過程的急進主義的政黨」，其它各黨則無此規定；

(3) 只有勞農黨明言（a）我黨以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的擴大強化為重要任務，（b）我黨希望無產階級戰線的統一。其它三黨則皆無此規定。

（二）現存各黨的政策

我人以上已就現存各黨的綱領比較過，理應再在本段，就各黨的政策詳加檢討比較，以見各黨為實現理想而採取的手段。但是，這裡因限於篇幅，致使各黨所列的政策，不能全部列出，只得採用歸納的方法，把各黨的共通點及相異點，介紹於下。

日本無產政黨各派從來所列的政策，大異相同；即現存四黨的政策，也莫不如此。不過在此「大略相同」之中，也有小異，急進緩進皆有分寸之差。就大體言之，在現存四個無產政黨之中，社會民眾黨最右，而全國大眾黨次之，日本大眾黨居中，而以勞農黨為最左。我在這裡已限於篇幅，不能把各黨的政策全部列出，我們只得把居中的日本大眾黨的政策，舉為例示，然後再就各黨的相異點略加解剖。

日本大眾黨的政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1) 政治方面

- ① 普通選舉的徹底（實行）；
- ② 壓抑無產階級運動諸法令的改廢；
- ③ 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
- ④ 縮小軍備，縮短兵役年限，改善兵卒待遇；
- ⑤ 把民眾軍閥主義化的一切政策，如學生的軍事教育，青年訓練所等等，一概排除；
- ⑥ 制定對於因戰死、徵兵、廢兵而起的本人及家族的窮困的扶助規定；
- ⑦ 撤廢殖民地的政治差別；
- ⑧ 打破秘密外交；
- ⑨ 對於冤罪、不當拘束，及官吏的非法處分所產生的損害，確立國家賠償制度；
- ⑩ 由國庫支付無產者訴訟費，改正陪審法，及改革其它的裁判制度；

⑪ 對於礦毒、烟害、土地陷落以及其它礦業、工業等所生損害，確立賠償制度；
⑫ 地方自治制的民主化。

(2) 財政方面

① 財產稅的創設，所得稅及承繼稅的高率累進賦課；

② 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稅，關稅及其它的民眾負擔，一概撤廢；

③ 地方稅制的徹底的改革；

(3) 經濟方面

① 團結權、罷業權的確立；

② 禁止立入、禁止假處分及立毛抵押，制定以確立耕種權為基調的佃種法；（「立入」為「進入」之意，指地主之侵入佃地刈取穀物而言。）

「立毛」指在田中尚未收成的「作物」而言。

③ 制定最低工資法；

④ 確立八小時勞動制（礦山勞動則為六小時）；

⑤ 禁止婦人及少年的夜間勞動、船內勞動、坑內勞作等危險勞作；

⑥ 改正工場法、礦業法等等，制定交通勞動者、自由勞動者的保護法；

⑦ 船員法、海商法、及船員關係法規的改廢；

⑧ 肥料的國營；

⑨ 養蠶保護及其它小農保護施設的國家經營；

⑩ 存款部資金運用的民眾化，產業組合制度的改正，其它無產階級的金融制度的確立；

- ⑪重要農產物專賣制的實施；
 - ⑫重要食糧的價格公定制度的確立。
- (4) 社會方面

- ①男女之法律上、社會上的權利及機會平等；
- ②女子人身買賣的禁止；
- ③封建的賤視觀念的打破；
- ④職業介紹制度的民眾化；
- ⑤健康保險法的改正，船員保險法的制定，失業保險及其它勞動保險制度的確立；
- ⑥義務教育及職業教育費的國庫負擔，教育制度的改善；
- ⑦居住權的確立，借地借家法的徹底改正，及公營住宅的建設；
- ⑧診療機關的公有化；
- ⑨農村文化設施的普及；

勞農黨、社會民眾黨及全國民眾黨的政策，大致與上列相同。惟是其它三黨，皆有「對支干涉絕對反對」的明文規定。社會民眾黨又有「社會制度的改革」一項的規定，開列如下：

- (a) 廣止富族院的預算修正權；
- (b) 延長議會的會期；

勞農黨的政策與上列日本大眾黨（其與社會民眾及全國大眾黨也然）的異點，無「勞動法及佃種法」的要求，而多出下列數項：

一九，廢止勞動爭議調停法；

二三，廢止自耕農創定法，徹底改正佃種爭議調停法；

二八，廢止農會、產業組合及漁業組合，改廢耕地整理法及森林法。

尤其可注意者，勞農黨之下列二項政策，是超越其它三黨的特色：

三四，確定學生、生徒的研究自由及校內自治權；

四五，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三十四項為注重學生等思想方面的無產運動；四十五項帶有國際化的意味。

十、現存各無產政黨勢力的比較

無產政黨的存在和發展，專以其實力為斷。而實力云者，無產群眾的支持是也。實力的雄大與薄弱，又全以支持擁護它的無產團體的多寡，及這些無產團體本身實力的大小為標準。此外，沒有組織的無產群眾的向背，也有多少的關係。由這兩方面構成的各無產政黨的實力，檢點（a）選舉上所得票數，（b）加以支持的無產團體本身，即可具體地明白地表現出來。我人且從此二方面，窺察現存日本各無產政黨的實力，並加比較如下。

（a）就選舉觀察的各黨的勢力。

現在四個無產政黨所經過的全國的選舉，就是本年二月二十日舉行的第二次普通選舉。此次普通選舉的結果，無產政黨候補者中選者的數目共有五名，列表如下：

黨別候補者當選者數目表

黨名	候補者數	當選者數	次點者數
社會民眾黨	三三三	二	四
日本大眾黨	二三三	二	五
勞農黨	一三三	一	二
全國民眾黨	四	〇	〇
地方政黨	二二	〇	二
合計	九四	五	一三

此次普選的結果，當選者各黨合計五名，較比第一次普選，減少三名。自大體言，實是無產政黨運動的失敗。各黨當選者數的比較，以社會民眾黨與日本大眾黨為最多，各有當選者二名；而勞農黨次之，有當選者一名。若與第一次普選的結果比看，則社會民眾黨上次當選者四，此次正減其半數；日本大眾黨的前身的日本勞農黨，上次當選者數只有一，本期則增至二名，增加一倍。再者本期次點者數，社會民眾黨只為四，日本大眾黨尚有五。於此，可知極右的社會民眾黨實力之低落，而居中的日本大眾黨實力的增大。勞農黨雖是經過許多波折而始草創成立者，且在所有無產政黨之中，是受壓迫最利害者，但在本期普選尚得一名當選者，次點者數二。全國大眾黨與地方各政黨，則毫無成績可言。

只據當選者數的比較，尚不能確實決定各黨在普選上的實力。我人應該再就各黨所得票數，及候補者每人平均票數，以決定其實力。且看下表：

黨別得票數比較表

黨名	得票總數	候補者數	每人平均得票數
社會民眾黨	一七〇,三八五	三三三	五,一六三
日本大眾黨	一六五,二九七	二二三	七,一八七
勞農黨	七八,五三八	一三三	六,〇四二
全國民眾黨	一九,六九五	四	四,九二三
地方無產政黨	六八,三八九	二二	三,二五六
合計	五〇二,三〇四	九四	

據上表，社會民眾黨所得總票數最多，日本大眾黨次之；每人平均得票數，以日本大眾黨為最多，而勞農黨次之。此外，全國民眾黨及地方無產黨，為最低。

本期普選無產政黨各派所得票數的總計，為五〇二，三〇四，若與上次總票數之四九二，二二一比較看，增加實屬有限。二年間日本無產政黨運動的宣傳，殆等於零。況且當選者數，反比上次減少三名，這不是無產政黨運動的失敗，是什麼？不過在這失敗裡面，可以反證：日本有產政黨，尤其執政黨對於無產政黨，尤其左傾派的壓迫愈益厲害。更如素來戰鬥力最強最為有產政黨所忌的勞農黨前身的勞動農民黨，在上次普選得票總數，尚為一九三，〇二八，本期勞農黨得票總數減至七八，五三八，減少過半，尤其可以證明上述事實。於此，我人預言：日本無產政黨運動，要占得勝利，非日本無產群眾的勢力壓倒地增大，則須日本的政治制度發生巨大的變化。

(b) 就支持團體觀察各無產黨的勢力。

實質的無產政黨，必擁有無產團體——尤其是經濟鬥爭團體，為其後盾。而這種無

產團體的多少及其本身實力的厚薄，對於所支持的無產政黨的消長，具有極大的關係。本節再就支持日本無產政黨的無產團體，檢點日本各無產政黨的實力看。

此類支持無產政黨的團體，本來包括勞動組合、農民組合、思想團體，及學生團體。但因思想團體及學生團體，極其散亂變化無定，尤其是學生團體更不能明露公然地加入，所以不容易得到確實的統計。因此，以下所列支持團體，大多以勞動組合及農民組合為主。

(一) 社會民眾黨

團體名稱	當選者數
日本勞動總同盟	三〇,〇〇〇
日本海員組合	八一,〇〇〇
海軍勞動組合聯盟	四三,〇〇〇
官業勞動總同盟	一四,〇〇〇
日本農民組合總同盟	一五,〇〇〇
合計	一八三,〇〇〇

以上所列各團體，是代表日本右翼勢力的勞動團體，由這些團體組織「勞動立法促進委員會」，在實質上作成聯絡的形態。其中，勞動總同盟尤其是社會民眾黨的主要支持團體，該組合的有力的幹部分子，同時參列於社會民眾黨的樞要機關。日本勞動總同盟原來的勢力更大，但如上述，自經一九二九年九月總同盟的第三次分裂以後，其勢力大有減縮，影響社會民眾黨，也非常之大。日本海員組合，在支持社會民眾的各團體之中，是組合員數最多者，其關係該黨的消長非常之大，故由該組合派送米窪滿亮、堀內長榮等人於社會民眾黨的最高幹部，參與該黨的最高權。他如海軍勞動組合聯盟及官業勞動總同盟，都有直接統制的地方無產政黨，例如海軍聯盟佐世保勞愛會的。佐保民眾

黨、海軍聯盟橫須賀工友會的民眾進黨、官業八幡同志會的社會民政黨、官業名古屋向上會的勞農民眾黨等等。而這些組合皆指使所統制的地方無產政黨，和社會民眾黨合併，表明積極擁護支持的態度。

除上列五大團體之外，尚有食薪水者協會、借眾人組合、社會青年同盟、社會民眾婦人同盟等支持團體。

(二) 日本大眾黨

上面述過日本大眾黨是日本勞農黨、無產大眾黨、日本農民黨及其它四個地方無產政黨合併而成者。所以，合併當時，除從來支持日本勞農黨的各團體之外，重新加入舊日本農民黨的支持團體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及支持舊無產大眾黨的各種勞動團體。然而後來又經過數次的分裂、脫黨、開除等變化，而其支持團體發生很大的變化。現在自大體上說，正如日本大眾黨之殆為舊日本勞農黨一樣，其支持團體，與舊日勞黨的支持團體，實無多大的變化。且看下表：

團體名稱	組員數
日本勞動組合同盟	二七,〇〇〇
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	七,〇〇〇
日本海員組合	五,六〇〇
(舊司廚同盟系)	
全國農民組合	二二,〇〇〇
(舊合日本農民組合同盟系)	
日本黨勞動總同盟	三,〇〇〇
神戶市電從業員組合	一,六〇〇
橫濱市從業員組合	一,三〇〇
合計	六七,五〇〇

除上列七團體之外，尚有東京交通勞動組合的舊日勞黨系、舊全國農民組合同盟的一部分及全國婦女同盟。

(三) 勞農黨

勞動農民黨是舊勞動農民黨經過許多的波折轉變而成者。舊勞農黨的支持團體及組員數，約如下表。

團體名稱	組員數
日本農民組合	六八，七四三
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	三五，〇八〇
關東電氣勞動組合	一，二〇〇
關西電氣勞動組合	四五〇
東京市從業員組合	二，五〇〇
在日朝鮮勞動總同盟	一，七五三
全日本鐵道從業員組合	五，〇〇〇
日本交通總聯盟	一四，九八八
礦夫組合九州聯合會	六，〇〇〇
京都陶瓷工組合	七〇〇
海員刷新會	一〇〇
合計	一三六，五二九

但是勞農黨成立後，受到左翼各派的排斥，所以它的支持團體，不能如舊時的雄厚。且在其成立當時，表示擁護的團體，大多出於部分的，出於整個者尚少。所以，我人只能從下列表示贊成各團體，推想其大概。

東京交通勞動組合有志分子，東京市從業員組合有志分子，大阪金屬勞動者組合，大阪木材勞動組合，京都陶盜工組合，全國農民組合新潟縣聯合會有志分子，全國農民組合京都府聯合會，筑波地方無產團體協議會等。

(四) 全國民眾黨、勞農同盟

全國民眾黨是一九二九年九月脫離勞動總同盟的分子結合而成者。其支持團體，只有勞動組合全國同盟一個。該同盟的組合員數，約在八千至一萬。

此外，尚有一個「政獲勞農同盟」。它雖然不是公然的、合法的政黨，但是它是表現日本共產黨之政治活動於外表者，並且擁有許多善於鬥爭的團體。所以，在此範圍內，它是有舉出說說的必要的。加盟，或擁護「政獲勞農同盟」的團體，大約如下。

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無產青年同盟、無產者新聞社、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等等。

十一、日本無產政黨運動與中國革命——結論

我在以上各節所述，算已就日本無產政黨運動本身，解剖敘述過一個大要。要而言之，日本無產政黨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往前發展的時期，將來的成功正未可限量。然而，日本無產政黨運動的發展和成功，究竟對於中國有何關係？尤其是對於中國革命，有何損益？我人想在本節，就此問題略加論述，以結束本論文。

日本帝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雖被列於「一等國」，但是它本國的經濟條件，卻非常的薄弱。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未及三十五年即已步入「早衰」的途程；各種資源的利用，殆已達到「飽和點」；經濟恐慌一年比一年尖銳化，失業者數一年比一年增大，社會思想一年比一年左傾化，因而貴族財閥本位的政治，日益動搖，一般的支配階級都在戰慄，絞榨腦汁思有以安定這種危局的方法。

然而，安定日本現在的危局，只有下列二種方法：

(一) 根本改變日本現在的經濟制度；

(二) 採取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向外發展。

第一種辦法是要推翻現在支配階級，奪去他們不勞而食的特權的，所以日本現在的支配階級當然不會贊成。結果，日本現在的支配階級就只有採取第二方法，犧牲外國的土地及人民，以為他們緩衝。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早即以意識的必要，而其軍國主義的劍鋒及於琉球、台灣、朝鮮；後更迫於客觀條件，而其侵略及於滿蒙，尤其在歐洲大戰中，趁火打劫，提出所謂二十一條的要求。他方面，且乘各種機會助長中國的內亂，阻止中國革命的完成，以期達到他們轉嫁的目的。要而言之，日本現在的支配階級，是不希望中國革命成功的。

上述是日本現在支配階級與中國的關係。但是本論文的討論對象的日本無產政黨，對於中國所採的態度如何？日本各無產政黨的政策，大多明文規定「絕對反對干涉中國」，這是反對日本支配階級干涉中國內政，助長中國內亂，延宕中國革命的意思。

事實上，不但反對干涉中國內政而已，並且積極反對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行為。

當一九二七年，日本政府阻止中國國民革命軍向北進展，採取對華積極干涉政策時，日本各無產政黨即共起而反對。所以，同年一月十六日，當時的日本無產政黨、勞動農民

黨、日本勞農黨、社會民眾黨及其它的無產團體，即應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招待，舉行日華懇談會，討論反對日本政府對華干涉政策團體的組織。其時，日本勞農黨、社會民眾黨，及勞動農民黨的代表，皆表贊同之意，願贊助對華不干涉同盟的設立。

就中，尤以最左傾的勞動農民黨，最為努力，各方奔走於這種運動。同年四月二十一日，遂成立「對華不干涉同盟準備會」。東京、長野、青森、岩手、靜岡、名古屋、大阪、京都、神戶、奈良、三重、岡山、九州等地方，也都成立「對華不干涉地方同盟」。同年五月二八日，日本政府出兵山東的時候，對華不干涉同盟準備會的活動，更加熾烈化，立即召集全國協議會，得各地方種種同盟會及無產團體的加入，乃於五月三十一日成立「對華不干涉全國同盟」，標榜「對華不干涉」、「反對出兵」、「立即撤兵」等等口號。這種運動，一時普及於全國。

日本無產政黨之反對日本對華的干涉，自它們的立場說，是當然的。日本無產政黨的宗旨與目的，是在推翻現在充當日本支配階級的貴族和資本階級。而日本帝國主義向外的發展，愈益成功，則日本貴族和資本階級的地位愈益鞏固，這對於他們的運動，是極端的不利。所以，勢須對於日本之積極對華干涉，加以反對。

反過來說，中國現在受到國際帝國主義重重的壓迫，就中尤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最。數十年來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完全成功，莫不由於這些帝國主義的作祟。所以，近年來的中國革命，至少在口頭上也就喊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否，實際上，非至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絕對不會完成真正的革命。

然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則日本無產政黨運動，可以達到完全的成功，日本無產群眾得到真正的解放。我們於此，發見：中國民眾和日本無產群眾，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中國革命和日本無產政黨運動，在某一點，必然地採取共通的進程。日本的無產群眾和

中國的民眾！起來吧！共同攜手，向共同敵人的陣地衝鋒！這才是「日華共存共榮」的真正意義！

注釋：

① 車界黨的讀音為 *shakriats*，與社會黨同音，蓋含社會黨之義於其中也——參照山川均氏作《無產政黨的先驅》（《改造》大正十四年六月號）。

② ③ 參照山川均氏的論文，《無產政黨的先驅》（載《改造》雜誌，大正十四年六月號）

④ ⑤ 參照茗荷房吉所著《日本政黨的現勢》，昭和二年日本評論社版。

⑥ 該會為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召集，舉行於伊藤的私邸。到會者有貴族顯官男女四百多人，各作各樣不同的化裝以取樂。轟動全國。

⑦ 平民社在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由幸德秋水、土界利彥、石川三四郎及西川光二郎四人所創，是當時社會主義研究者及社會運動家德團體，刊行機關報《平民新聞》。

⑧ 社會民主黨的理想有廢除人種差別、各國的軍備，及階級制度，生產機關及交通機關歸公有，財產公平分配，人民政權平等，教育機會均等各項。

本文參考書：

1. 茗荷房吉著《日本政黨的現勢》（一九二九年版）
2. 木村毅著《日本社會主義史》（一九二六年版）

3. 臘山政道等著《無產政黨論》（一九三〇年五月版）
4. 施無量著《日本無產政黨研究》（民國十八年一月版）
5. 大山郁天著《現代日本的政治過程》（一九二五年版）
6. 日本《改造》雜誌及《中央公論》各期
7. 大山郁夫著《無產政黨論》
8. 全上《政治的社會基礎》（第三篇）
9. 山川均著《無產者講話》
10. 高橋龜吉著《明治大正產業發達史》
11. 白柳秀湖著《日本民權發達史》
12. 赤松克磨著《日本勞動運動發達史》
13. 山川均等《無產政黨研究》（《改造》大正十四年六月號）
14. （著者忘記）（錢氏藏書）《日本文化之史的研究》。

原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一二期

日本新內閣之前途的黯淡

(一)前日本內閣總理濱口氏病勢之轉重，牽動了日本政潮。先而代揆問題重疊塵上，繼而若槻禮次郎被推戴為民政黨的繼任總裁，終而濱口內閣不得不由若槻新內閣起而代之。於是若槻新內閣成立於四月十四日。

然而繼濱口新內閣而起的若槻新內閣的內容，究與前內閣有無多少的差異？實在沒有多大的差異！閣僚之間，除了陸軍，商工，及拓務三大臣易人而外，其他八部大臣皆仍其舊，只有一部分行政官員，略為撤換罷了。

大凡政治舞台上，改變了角色，必定有一番新花樣的表現，眩示政策給世人看，以取得一般民眾的信任，即不大擂大鼓宣示政策政綱，也必有多少的表示。此次，若槻新內閣關於大政方針，只是「現內閣的施政方針，原則上踏襲前內閣的主義政策」（見東京四月十五日的新聯電，新閣最初之閣議）而已。若槻在就民政黨總裁的致辭中，也有「……政治猶生物，確守既定之方針，順應情勢，實為其要諦……」等語（見東京四月十四日新聯電）。再就其舊閣蟬聯及若槻先就民政黨總裁然後組閣的意義玩味之，則新內閣的政治方針之「繼承前內閣徹底實行緊縮政策」，也可以斷言矣。

讀到「實行緊縮政策」，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濱口內閣成立時日本的經濟情勢。日本自從歐戰告終以來，失去趁火打劫的機會，而經濟景況急轉直下。當時的政友會內閣，睹此情勢驚慌失措，馬上採用膨脹政策，想在膿血流注的疔瘡上緊貼橡皮膏，期其膿血自行消盡。但是疔瘡究竟是疔瘡而不是小火疥子。所以細菌只在內部潛伏地大肆繁殖，腐爛之勢與日而俱長。其終結，乃促政友會內閣塌台，而民政黨的濱口內閣起而代之。

濱口內閣在未上台以前固已診察出日本的癥結在於「用橡皮膏封貼疔瘡的爛口」，

治療之法非施手術割治不可。但在其上台之後，卻只「割而不治」。採用緊縮政策，解除金幣出口禁令之後，只見膿血四流，內部的腐狀完全暴露，而癥結所在依然無補於日本的經濟景況。不幸又適逢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際會，濱口內閣的手術愈陷於無能的狀態。終於引起刺客的窺伺，一槍打塌了濱口的高台，牽動了日本的整個政界。而眾目睽睽的若槻氏，終不得不屢誦「余跳入火炕以維此極重大之難局」的咒語，而出來組閣了。

(二)「余跳入火炕」！不錯，若槻氏此次挺身出當難局，「勇固勇矣，其奈難關重重何」！濱口氏昭示十大政策，奮勇斷行的結果，也只落得一九三〇年度的財政收支發生四千八百萬元日金的不足，而一般的經濟界卻愈有衰落的趨勢。僅就財政上言，當此極端的不景氣，這四千八百萬日金的措置已就不易，加之一九三一年度的預算又有更改之虞（據東京十七日新聯電），一九三二年度預算案的編制，就非更加緊縮不可。這樣一來，勢將使現在的不景氣愈益尖銳化，深刻化。於此，若槻內閣的政策，恐怕難免要發生破綻了。不知道勇敢的若槻氏，採用何種手段，來打通這第一個難關！

若槻氏在其就職的當初，即屢宣稱繼續濱口內閣的「行政、財政、稅制的三大整理案」。據此，若槻氏之欲以徹底實行此三大整理案以解決日本現在的僵局，可以想見。據東京十九日的新聯電，若槻首相十八日在招待民政黨所屬議員席上，關於金解禁後的對策、蕭條打開策、財政鞏固策等，曾主張逐漸推行從來的主張。又據同電若槻氏三大整理政策的內容，約略如下：

「……此次整理方針及範圍，關於行政及財政者為各省（即各部）繼續費之根本改訂，補助費之整理減額，官吏減奉案之斷行，恩給法改正，各省及各局的合併，行政事務聯合統一，以及改革軍制之督促。又關於稅制則為當國

稅、營業稅、雜稅及地方稅雜稅之全廢時，自社會政策的見地，期負擔之均衡，同時刷新地方財政。……」（錄自四月二十日大公報）。

據上電所述約言之，三大整理政策的內容，就是「裁併行政施設」，「樽節各種支出」，「調和國民在租稅上的負擔均衡」。我們再來檢點此三大整理政策的施行方法如何。若概內閣之施行上述三大整理案的步驟，先設「行政」、「財政」、「稅制」三種調查委員會，充分調查研究，政府即依所研究的結果決定具體的方法。

關於行政改革方面，仕立鐵次郎研究有素，所以四月二十三日在首相官邸所開的行政整理第三回準備委員會，專由他發表主張，聽政府採用。仕立氏的行政改革意見如下：

「……為防止各省預算之爭奪，及政務之統一，而整理各省大臣，設置無任所之大臣，合併陸海軍改為國防省，謀航空陸海軍之教育，及其運輸維持衛生等之統一合理化，排除帷幄上奏，設立軍部大臣之文官制，農林與商工，鐵道與遞信均各合併，廢止文部省，而於內務省設立教育局，以處理其事務，廢止司法省，設置檢察院及大審院，並廢止保障其地位之警視廳，使直轄於東京府，其他又行局課之廢合，換言之，即從來外務、商工兩省所處理之通商事務，一概整理，文部省之情報部，對華文化事務局移管民間，擴張大藏大臣之權限，設置各省直轄之會計官，以負經理監督之責，預算款項之流用，須得大藏大臣之承認，廢止陸海軍之委任經理，改正恩給法，設立養老院及保險制度，保險金定一〇%，延長恩給年限，廢止各種調查會，擴張會計檢查員及法制局之權限，排除教育之劃一主義及官立學校之廢止，現在之軍隊，定為十個師團，地方行政定為十府縣，廢止府縣制改為町村制，要之因現在國民之所得為一一五・四億元，對於國民之負擔，應取其所得之一成為宜。」（據東京四

月二十四日的新聯電，錄自四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後經木尾原仲二、矢野恒太、松本丞治等人調查研究的結果，合財政、行政兩案，擬就成案，發表於四月二十六日，其要旨如下：

(一) 財政經濟政府及地方自治體之一般會計歲出，整理至總額十五億元之程度，訂立官業漸次移入民業之方針，改正會計法規，劃分既定費及未定費，結算依據年度末之現計，擴張會計檢查院之權限，對於政府及保護事業施行嚴格的會計檢查，各省之會計主任受大藏大臣之指揮監督，改正日本銀行條例及兌換銀行券條例，完成中央銀行之金融中樞機關之機能。

(二) 行政內閣除置總理大臣及各省大臣外，再設置無任所國務大臣若干名，以謀政務之統一，內閣設立政務局，掌管政務，廢止政務官，中央之行政官廳為內閣之外務、內務、大藏、國防、產業、交通六省，並於各關係省監督下，設置官業外局（例如郵務院、林業院等），廢止司法省，設立檢察院，廢止文部省，設置文教院，對於檢察員、文教員、經濟監察員及殖民地之長官，為安固其地位，不濫為更動，廢止警視廳，司法警察屬於檢察院，而行政警察則屬於警保局，廢止拓務省，對其事務則分屬各關係機關，與以適宜處置，廢止樺太廳，使隸屬於北海道廳，縮小關東廳，廢止教育之劃一主義，對於官立大學，取漸次變成私立之方針，設立官立大學院於東京及京都，以為最高之學府，常舉行帝國經濟會議，以供政府之咨問，廢文官任用令，而於各省規定銓衡制度，俾得廣開門戶，登用人材，廢止府縣，分全國為十數行政區域，而各區域則設置中央政府之支派機關。（據四月二十七日東京新聯電，錄自四月二十八日《大公報》）

他如「稅制改革」的具體方法，截至現在雖尚無成案入手，但只據四月二十八日新聯電，也可知其方針之大概，且照揭如下：

東京二十八日新聯電，大藏省二十七日午後二時；於官邸由青木主稅局長、重澤國稅課長、石渡書記官等參集，對於國稅整理案加以審議，聞當局之意向如下：

提高累進加稅，以謀負擔之均衡，減輕消費稅，而加重直接稅、宅地稅曾經貴族院決議，然於實施後一、二年間擬講求激增緩和之法，對於公產稅，則委讓諸地方，又對於財源如果有餘裕，則減低烟草稅，目下正進行調查中（錄自四月二十九日《大公報》）。又據東京四月二十五日新聯電所稱，民政黨對於政府的財政整理，有獨自作成對案的意向，其基本方針：

- 一、當此次財政整理之際，為均衡國民之負擔，使其糾正不公平的地方；
- 二、依據累進課稅，以加重富裕階級的課稅，並實行減輕中產階級以下的負擔；
- 三、稅制的整理，分國稅、地方稅，及關稅三方面。

此三項可以說皆屬於稅制改革的提案，政府將來必定採用。據報，他們尤其注意所得稅的修正，並欲由社會政策的見地，為保護筋力勞動階級起見，擬將「個人所得稅」的免稅率提高，廢止國債等之免稅，改正承繼稅，依綜合課稅主義，而提高資本家之累進課稅率。

(三) 總括上述若槻氏的三大整理案，其要點約有二項：

- 第一、想依行政財政整理的徹底實行，減少歲出；
- 第二、想依稅制的改革施行社會政策。

然而第一項的實行，當前就有重重的難關。即使打通這些難關，結果也未必能振作日本經濟界的不景氣。且詳釋之。裁減官員，減少薪俸，本來就是一件難事。濱口內閣曾行之而遭司法官之反對終歸失敗。所以，若槻內閣此次欲於「絕對秘密」之中行之，且不涉及恩給法的修改而以暫時的性質行之（據東京四月十八日新聯電）。但鑒於過去的事實及社會的趨勢，恐怕不容易實現。上面述過，一九三〇年日本的財政發生四千八百萬日金元的不足，所以若槻內閣編制一九三二年的預算時，須由此籌出一億二三千萬元，好得收支相抵。但是此數欲專求之於行政施設的裁並尚不能辦到，勢須擴大至於軍界及教育界的整理。教育經費的撙節或尚可以辦到，但各軍費的撙節，當此列強岌岌於軍備擴充，日美積極備戰之際會，恐怕萬萬不能辦到。況且，要籌出此數巨款，無論如何非發行公債不可。到發行公債增加人民的負債時，若槻內閣的政策，就難免發生破綻了。

再者，日本今日難關的所在，是「失業情勢之增長」及「經濟界不景氣的尖銳化」。而裁減官員適足以增長失業情勢，減少薪俸和裁員同時作用，也能縮小一般的購買力，而使不景氣的經濟界愈益消沉。於是，若槻新內閣的政策效力，就完全歸於烏有了。若槻新內閣前途的黯淡當不在濱口內閣之下。

第二項，想依稅制的改革，尤其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稅率（減輕勞動者的負擔），提高資本家的「累進稅率」（加重資本家的負擔），以斷行社會政策，解決社會問題。但是這種政策的施行，在資本家階級支配下的日本社會，是很難實現的。尤其是工商業資本家階級所支持的民政黨，絕對不能讓他所使役的政府，施行不利於工商業資本階級的政策。因此，若槻新內閣即欲斷行這種社會政策，也只能在某種嚴格的限度內行之。如果必欲如其所宣言，「徹底實行」，那麼，恐怕政府的主人翁就會請他們下台享享清閑吧！

根據以上所述，若槻新內閣的終局，不但是原則上繼行濱口內閣的主義和政策，即其所謂「徹底施行」，將來恐怕也不能出於濱口內閣範圍之外。若槻新內閣不但「踏襲」前內閣的主義和政策，而且是「惟妙惟肖」地踏襲。我們曾謂濱口內閣的手術，「割而不治」，而若槻新內閣的手術恐怕也只能終於「割而不治」吧！若槻新內閣的前途，是多麼「黯淡淒涼」喲！

我們認為日本經濟的萎靡及其派生的種種問題，是一個日本經濟制度的整個問題。如果這個整個問題不能徹底解決，其他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在此整個問題未解決以前，無論那一個「三頭六臂」的內閣，或怎樣抱有「跳入火炕」的大決心的內閣，也不能打通這些重重疊疊源源不絕的難關。無論那一個內閣登台，也終必難免「黯淡淒涼」的。

原載一九三一年一月《新東方》第二卷周年紀念特刊

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

一、引言

記得陳翰笙先生在拙稿《日本近世產業史論》序言中曾有一句話，說道：「日本經濟的衰落，能否求得一條出路，須視中國革命能否成功為斷」（大意如此）。這裡所謂「一條出路」，當然是指日本經濟現階段的出路而言，而日本經濟現階段的出路，又當然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其次階段的出路，簡單一句話說，就是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的成功。改換一個立場來說，中國革命倘能成功到可以拒絕日本在中國帝國的帝國主義型的發展的程度，則日本現階段的社會革命可以成功。蓋因中國若不能辦到這一項，則日本帝國主義尚可以恃「大陸經營」的效用，以延長日本帝國主義的壽命，而日本現階段的社會革命，就會無期延宕下去，於此，可知日本之「大陸經營」與其本國的社會革命，二者的成敗實有正相反的密切關係；而此次東北事件與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關係之密切，也可以想見。

事實上，日本一般的無產群眾對於這次的東北事件，也非常的留心。社會民眾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曾派二個會員到滿洲視察此次的情形（據 The Trans-Pacific）。日本無產階級各黨各派對於此次的東北事件，皆有相當的表示；屬於各黨各派的理論導師以及自由的論者，皆作鴻篇大論，對於東三省的日本權益問題，發表意見。《東洋經濟新報》派，長谷川如是閑等自由派，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赤松克磨一派及「普羅科學」派……等人的此項論作（這些作者都站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內，所以成了本文檢點的對象），就是最顯著的。尤其是社會民眾黨的論戰健將，赤松克磨氏，

專撰《滿蒙問題與日本無產階級》，闡明東北事件與日本無產階級的關係，並提示本人的見解（此見解參閱後節《赤松氏的錯覺》）。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關係之密切，更可以自事實方面求得證明。

河野密氏曾就此次東北事件的本質說道：「今日，對滿蒙問題之武斷行動，只是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汜的世界恐慌對策之一連鎖……」（見《東亞》十一月號《滿蒙問題私議》）；我則更乾脆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滿蒙之積極行動，實是日本布爾喬亞汜為排脫日本現階段的社會革命，或緩和它的必然計劃。東北事件捨日本現階段的社會革命不能求出根本的解釋。

二、日本群眾的言論

然則自從東北事件發生以來，日本的輿論如何？尤其是日本無產群眾及其代表的輿論如何？據河野密氏的解剖，關於東北事件的日本輿論，約可分為二大派：其一為帝國主義論；其二為自由主義論。前者主張榨取滿蒙，後者反是。帝國主義論又可重分為強硬論及穩健論。前者以軍部的理論及森格、中野正綱、松綱洋右等私人的理論為代表；後者是以幣原外交方針為中心的理論及一部分學者的理論。前者主張以武力保護並擴大滿蒙的所謂特殊利權，故又稱帝國主義的武斷派；後者則欲以和平手段達到同樣目的，故又稱為帝國主義的文治派。但是二者的目標完全一致。自由主義的代表者，有長谷川如是閑等私人，主張偏重於經濟的開發。

依據上述的分類，很難求出本論文所追求的分類，蓋因何者為無產階級的主張，何者為資產階級的主張，很難下個界線。但據我個人的觀察，日本無產階級或其代表者對於滿蒙問題的輿論，可以歸納成二大派別：其一為國際主義的主張；其二為國民主義的

主張。前者主張放棄日本一般之所謂「滿蒙特殊權益」；後者主張保護該種權益，為達此目的，甚至主張不惜採用任何手段。據我個人所知，前者應以「普羅科學」派的主張為代表，而勞農大眾黨的主張也屬於此派。

日本《普羅科學》雜誌十月號所載《怎樣觀察對滿侵略戰爭？》的剖述，完全否認日本此次武力侵略的合理性。該論文否認日方關於東北事件所宣傳的所謂真相說：「但是，日軍所攻擊的對象，不僅只是犯有暴行的（實際是否如此，尚待證明）駐北大營的中國軍隊而已，與之全無關係的駐守瀋陽城內的軍隊（距北大營約六英里），也遭受炮擊，更可驚的是：距事件發生地遙遠的長春（距瀋陽北九十英里），安東（距奉天東南百七十英里）各地，幾乎和瀋陽同時突被襲擊；出其不意，中國軍隊完全被解除武裝。……」（見《青年與社會》第二期《日本勞動大眾對滿洲事件的態度》）。該文繼續闡明該事件發生的真因，其結論就是「堅決反對對滿侵略戰爭！」又The Trans-Pacific 曰：The Farm-Labour Masses Party, which is the other leading Proletarian Party; is more communistically inclined and demands that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Manchuria in favor of China. 勞農大眾黨之反對日本主張「在滿特殊權益」，是無疑義的。

與此相反，主張保護日本「在滿特殊權益」的日本無產階級代言者，第一可以舉社會民眾黨，而《東洋經濟新報》派的論者——即上引河野氏所謂「帝國主義的文治派」——也可歸入此類。社會民眾黨對於東北事件雖極注意，曾派專員至滿蒙視察實情，但其所得的結論是保護該地的日本特殊權益。該黨的書記長（General Secretary）赤松克磨（Mr. Akamatsu, Katsumaro），尤其風頭出得十足，在Trans-Pacific發表根本意見，保護滿蒙的特殊權益。他開口便說：「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urging the workers of the world to unit in a common cause……」其次大發其主張，茲節譯一節於下：

「日本的經濟情形是特別的，而其國家正在企圖改進本國勞工的生活狀況。日本在滿的權利正是日本經濟生命的主要部分（vital part）。因此之故，在此範圍內，日本應受正當的保護。我們支持國家社會主義，它是將來國際主義理想的基石。一旦社會民眾黨當權——相信可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勞動政府必將保護日本在滿的權利，如英國勞動政府保護英國在華的利益。」

赤松氏還在《東亞》發表專論《滿蒙問題與日本無產階級》，剖述尤其詳盡，此項擬在後面設專節加以批判，故從略。

此外，《東洋經濟新報》派，對於帝國主義的武斷派的侵略論據：（一）滿蒙是日本經濟上的生命線；（二）滿蒙是日本國防上的必要地帶；（三）滿蒙是日本對赤俄的緩衝地帶，加以反駁。其言曰：「……例如彼等因日本人口多，土地狹而主張求尋出口於中國大陸。但是人口問題不能因領土之擴大而得解決……彼等又移轉論鋒。日本缺乏煤鐵等原料，故確保滿蒙為供給地，是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準備。此點仍與過去的事實相反。滿洲並未賦予日本以原料供給的便利。即假令右說為合理，也無伸張我國政治權力至滿蒙的必要，只以和平經濟關係即可達此目的。第三，尚有論者說道：無滿蒙則我國國防危。……但此無異英國為保全國防而主張在對岸的歐洲大陸占有領土。作者不能相信此說」（見《東洋經濟新報》的《解決滿蒙問題的根本方針如何》）。

此派雖反對武斷派的武力行動，但不反對特殊權益的保護，故有「帝國主義的文治派」之稱（河野密之言）。

上面二大派別的言論，只介紹個大概，詳細之點俟後面批判時，再來詳加援引。

我們介紹日本無產群眾對於滿蒙問題的二大言論之後，我們已可以進入本論，來檢討東北事件與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的關係。不過，我們應該知道：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

即已經過一度的社會革命。現階級的社會革命與當時的社會革命，性質上雖有不同之點，但其轉變的契機，則無異處，並且認為同類變革，比較容易推進我們的理論。前度的社會革命，在此意義上，實有略加剖述的必要。

三、明治維新的社會革命

日本明治維新的社會革命，是東方近世著名史實之一。但此著名史實的發動，並不是憑空掉下的；實在有它發生的原因及其演進的歷程。而此發生原因及演進歷程，給與我們討論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的示範。因此，要討論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問題的我們，且先來考察明治維新的社會革命。

日本的封建社會繼續至德川時代，社會內部即已發生種種的矛盾和頹狀，而孕育新社會的種子。大凡封建社會制度之下，土地是主要的生產手段，而農民是唯一的生產階級。在農民階級之上，有特權階級施政統治生產者的農民階級。日本當時構成這種特權階級的，就是所謂「武士階級」。日本的武士階級，在整個封建時期之中，雖然處於統治者，支配者的地位，但至德川時代，武士的本質業已發生了變化，即和鎌倉時代的武士已大異其趣。他們離開了土地，墮入不生產的階級，完全仰養於農民階級。並且，一般的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奢侈日益增大，而國費日益增加，收支終陷於不能適合的狀態，幕府和各藩皆陷於財政的困難。統治階級為欲挽救此種困難，自然根據從來的治農政策，即「在農民不生不死程度徵稅主義」，對唯一生產者的農民階級，實行苛斂誅求。農民不堪重負，連袂相率而入都市，或於鄉下改營小商業，於是封建社會倚為柱石的農業經濟日就衰落，封建社會乃不得步入崩潰的行程。他方面，商工業如雨後春筍般勃興起來，貨幣也漸通行，都市日漸發達，而從來被鄙視的「町人階級」一日千里地抬頭。簡

言之，貨幣經濟和商業資本，成了新興的經濟勢力。

經濟上既然發生了變化，建在經濟基礎上的上層構造，自然也非隨之變化不可。自經濟變化之後，從來仰養於農民的武士階級，終不能不屈服於新經濟勢力之前，仰養於新興階級的町人階級，或自己町人化，潛入町人階級之中。反之，町人階級則利用其雄厚的財力，握住社會的實權，擠武士階級的勢力出於農村，而自己取其支配地位而代之。此時，統治權也因當時的財政之仰賴町人階級而為所操縱。這種趨勢，再重以「黑船」來襲，日本封建社會的頹勢一旦和新興的歐美資本主義晤面，欲保住社會不變革，勢在不可能。果然，經過多少波折之後，經濟組織改變了，政治制度維新了，社會革命乃極自然地完成了。

我們且來考究日本封建社會崩壞而資本主義社會完成的原因，以為後面討論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的張本。根據上面所述，可以約略領會日本封建社會崩潰的原因，在於武士階級的腐敗，但是客觀的條件仍應歸結於當時封建制度的熟爛化而喪失了效用。具體地列舉起來，可得下列各條：

(一) 當時封建制度下的經濟組織，已不能與發達至相當程度的生產力適應，因而封建制度喪失了本身的機能；

(二) 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極端腐敗，喪失了支配者的能力，因而社會上發生紊亂的情狀；

(三) 已無能力化的武士階級，且又窮奢極侈，浪費一國的財富，而全國愈陷於窮狀；

(四) 武士階級為保持他們的奢侈生活，乃對當時唯一生產階級的農民，實行暴斂誅求，而一國生產力的泉源，臻於涸竭；

(五) 他方面，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胚胎，已在封建社會的腹內，逐漸生長起來。

德川時代的日本封建社會，因其內部具備上列各項客觀條件，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新生命，乃終至破殼而出。這是極其自然的演進。

不過，在此演進的行程中，日本資本主義的生長曾經經驗過一度的遏制，和相當的掙扎，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日本資本主義在德川時代的初期即已種下胚胎，倘得調順的發育，它必定早在明治維新以前，突破封建社會的皮殼無疑。不幸，德川三代將軍，家光，鑒於歐美勢力之東漸，誠恐本國的政治秩序和國勢受到影響，毅然在一六三九年宣布《鎖國令》，嚴禁日本國民與任何國人交往。此鎖國時代繼續二一五年之久。日本資本主義的生長，即因遏制於此鎖國情狀而中途停止。直至一八五三年「黑船」來襲，日本的鎖國狀態始為美國伯里提督所擊破，而被遏制二百多年的日本資本主義，乃得破殼的機會。

其次，日本資本主義在其生長的過程中，曾經經過相當的掙扎。在其初期表現出來的形態，是打倒德川幕府，打破現狀的企圖。而此企圖當時又分成二大派別：其一是復古派，其二是進步派。否定現狀雖為二者所共同，但前者憧憬王朝的古代，後者則歡迎歐美資本主義的新文明。二派在倒幕的過程中鬥爭的結果，終歸進步派占了勝利，德川幕府崩潰後之所謂明治維新的大業，皆成於進步派之手。這樣，明治維新不是單純的政治革命，同時又是一個帶著社會革命性質的資本主義革命。這裡，我們應當注意一事：各派社會運動鬥爭的結果，日本社會不返於復古，而趨於維新，並不是進步派對復古派的勝利，而實是時勢的歸趨使然的。蓋因當時，需要資本主義革命的各種社會情形，已在國內外成熟至相當的程度。時勢的潮流到底是不可遏制的！

四、另一社會革命的前夜

日本自從經過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革命以後，經濟組織由封建的自給自足經濟，轉變為自由的交換經濟，在封建時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到此時乃變成助長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完成了最近六十多年日本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但是歷史是前進的，歷史的演進是依據「相反而相成」的形態的。它循著「由肯定而否定，復由否定而肯定」的無窮的途徑往前猛進。因此，明治維新以來，被肯定的日本經濟組織，到了現在已經步入被否定的線段，無窮進步的歷史又在示意：日本又應從新建一個肯定的經濟組織了。換一句話說，明治維新以後；由封建經濟改造過來的新生產關係，雖然在此五十六年間與生產力適應，幫助生產力發展下來，但至現在因為生產力無限發展的結果，這種生產關係又與生產力發生桎梏了，不但不能如日本資本主義初期之助長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反成了桎梏。日本現階段又在需要一個新的經濟組織。這個新的經濟組織，將如德川封建社會之轉變為明治維新後的資本主義社會，而由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且其轉變過程中，也將如當時之經過一個社會革命一樣，再度經過一個新階段的社會革命。簡單一句話，日本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又處在另一社會革命的前夜。

且先自經濟方面加以考察。指示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經濟興衰的指標，莫如輸出工業製品數量的增減。此項數量增減線狀，已在拙作《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第一節《日本經濟的衰落》詳細解剖過，這裡只述其結論：明治二十二（二十六年）代，日本每年平均輸出工業製品，占全部輸出品二五·四%，與明治初年之七·八%相較，增加一七·六%；再至三十二（三十六）年代又增至三三·〇%，就經過年數的比例言，增加率約與上期相等；但此急激增加之勢，至明治四十二（大正二年）代，即已呈現停頓的徵象。尤

其是明治四十二年與大正二年相較，不但沒有增加，倒反減少了。經過歐戰中幸運時期後，日本經濟的衰落一步步著低落的線狀，現在正嘗著一九三〇年恐慌後的辛辣滋味。

不但工業經濟如此，農業經濟尤其呈現一種可憐的情狀。日本耕地面積指數，自一九二一年以後，竟會絕對減少了，由一九二一年的一〇〇減至一九二六年的九八·五；同時，日本主要穀產米麥的單位產量，也自一九二一年以後，年益減少，由一九一六一九二〇年代之每反步實數一，八八四日石，減至一九二六年之一，八〇九日石。簡單一句話，近年日本農業經濟的質和量，皆有退步，這種情形經過一九三〇年恐慌後，尤其顯著（關於日本經濟衰落詳情，請參閱本專號所載拙作《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他方面，農村及都市的勞動力日形過剩，失業的問題威脅著日本的現社會；各種物價日益低落，一九三〇年後的低落率自四〇%至六〇%不等，此項使一般的企業家破產的破產，停業的停業，結果只有一個整個產業界的不振。

但是這種情狀並不是日本經濟此後的發展絕對不可能的意思，它只是世界資本主義沒落的一連鎖而已，只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現階段，才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充當社會構造基礎的經濟組織，既然喪失了機能，建築在其上面的政治層，自然不會出於例外。明治初期——甚至德川末年——日本全以國家的權力培養幼稚的工商業；把國營企業無償地贈送給資本家；運用關稅政策保護幼稚的粗工業；利用產業補助金辦法，獎勵並培植資本家的企業等等。誠然，當時這種利用政治權力於產業上的Paternalism（保育主義），獲得了相當的效果，資本主義的基礎一日千里地擴大而堅固。但是這種政策現在已經不合時宜了。又如當時的官僚政府之集中全力於「富國強兵」，努力於鞏固日本國家的基礎，也莫不採用以所謂「指導誘掖」為基調的政治的Paternalism。誠然，當時這種政策果將分裂的衰萎的日本，造成了軍國主義的日本，現在列入世界三大強國的日本，但在現在這個處方又已不靈驗了。目下日本總歲出預算約五〇%的海陸軍

費及有直接關係的各費（據一月二十日《東京朝日新聞》），現在已成了重壓日本國民，使不能翻身的負擔，已不復能振刷日本軍國主義的威風了。日本國家對於資本的蓄積直接間接保護的各種費用及高抬的關稅政策，現在不但不能培植日本產業完成更進一步的發展，倒反增加無產大眾的窮化程度，助長資本家的奢侈生活，簡單一句話，日本政治上的 *Paternalism*（保育主義），現在已經完全喪失了本來的效用和機能了，而只適足增高現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桎鑿的程度。

同時，在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的內部，業已種下他種社會的胚胎，經濟運行的法則並未完全依據資本主義經濟為根本法則，自由競爭。獨占資本的勢力，已經支配了日本現在經濟界的全局。政治上也然，真正民主政治的理想，固然壓根兒就未在日本政治上實現過，而時至現在，財閥的權力更加支配了整個的日本政權，官僚只是他們的傀儡罷了。他方面，日本社會上，憧憬著未來社會的新意識，也已相當普遍；受到這種新意識所熏染，及為他們自己的利害關係所驅使而潛行著的新勢力，也已在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中，占著相當的地位了。

總而言之，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及在其腹內孕育著的新雛形，已把日本資本主義推到另一社會革命的前夜了。日本現在的統治階級雖在戰慄著，但是下列的事實依然陳列在我們的眼前。若依照上節所列舉日本封建社會崩潰原因的樣本，把現在日本資本主義將要崩潰的事相列舉之，可得如下：

（一）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組織，已不能與發達至相當程度的生產力適應，因而資本主義制度喪失了本身的機能；

（二）統治階級的資本家階級極端腐敗，喪失了支配者的能力，因而社會上發生紊亂的情狀；

(三) 已無能力化的資本家階級，且又窮奢極侈浪費一國的財富，而全國愈陷於窮狀；

(四) 資本家階級為保持他們的奢侈生活，乃對於現在唯一生產階級的農工，實行直接間接的暴斂誅求，而一國生產力的泉源，臻於涸竭；

(五) 他方面，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胚胎，已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腹內，逐漸生長起來。

五、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

馬氏在其《經濟學批判》的序文中，把歷史演進的法則，指示給我們：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實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整個生活行程。……」然而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在其發達的某一階段，必與現存的生產事情互相矛盾。……即由此生產力發達形式的事實，一變而成生產力的障礙物。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開始。……」

「某一社會形態，非至其內部所包容的一切生產力充分發達之後，決不會滅亡。更進步的生產關係的出現，非決定此種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既在舊社會之翼下孵化著不可。……更精密地考察看，凡問題之發生必由於解決問題的物質條件既已存在，至少也已在發生著，可以想見。」

若將此公式應用在日本社會的現階段，則「日本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已與現存的生產事情互相矛盾了」。「其生產發達形式的事實，早已一變而成生產力的障礙物了。」因此，「日本社會革命的時期」必定開始無疑。又據上節的剖述，「決定社會主義生產關

係的物質條件，既在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之翼下孵化著，」所以「更進步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出現」，可以說是決定之數。再自一般所常引證的所謂「日本資源之涸竭」而論，「日本社會內部所包含的一切生產力業已充分發達了，所以日本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必定滅亡。」

發展至現階段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必定滅亡，而只具軀殼的日本現社會，必定向更進步的社會主義轉變，這雖是歷史的過程，但誰來完成這種「歷史的使命」？自然，非日本的無產群眾及其代表者不可。在明治革命時代，布爾喬亞汜新興階級，完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的使命。同樣，現在日本的普魯列大利亞新興階級，也非完成日本現階段的社會革命的歷史使命不可。事實上，日本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已隨日本經濟情形之轉變，而著著發展下來了。

日本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產生於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組織內，並且隨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爛熟而生長。所以，欲理解日本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應先理解日本資本主義的產生、生長及爛熟的過程。日本資本主義受孕於德川封建時代，出生於明治初年。因為它的出生時代，正值世界資本主義已步入壯年時期，所以不得不受環境的推動，在最短期間完成了長足的進步，經過中日戰至日俄戰期間的充分生長，即呈現衰老的朕兆。大正初年，幸得歐洲大戰的庇佑，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登峰造極。但是登峰造極反面的意義，就是不復再有更高的發展。所以，歐戰後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大起恐慌，病症幾乎入於膏肓，雖經政友會內閣「膨脹政策」的興奮藥針，結果也只不過加重了民政黨內閣以後日本資本主義病症的危險程度罷了。

日本資本主義的生長過程如上所述，而日本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又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生長，互為表裡。正如日本資本主義之受胎於封建社會一樣，日本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也受胎於日本資本主義社會。並且可以申論說：日本資本主義爛熟之日，即日本無

產群眾社會運動勃興之時。所以日俄戰後的勞動爭議及無產者的團體，即有急激的增加；而在歐戰後的大正七、八年頃，日本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轉換了一個新形勢：一方面，日本勞動組合的運動異常勃興；他方面，無產群眾漸覺醒於自己的地位和利害關係，而階級的意識逐漸普遍化。他們的鬥爭漸由經濟的，轉向政治的了。其後，公開的無產政黨的政治鬥爭和非公開的共產黨潛行鬥爭，乃有可觀的成績。

日本無產政黨的公開政治鬥爭和日本共產黨的潛行鬥爭二者之間，不無多少差異之點；但其由經濟鬥爭轉入政治鬥爭，欲以政治手段達到日本無產者的建設，企圖完成歷史的使命，卻是二者共通之處。於此，他們的政綱和策略，乃成我們檢點的對象。日本共產黨所採用的手段，是非合法的、潛行的，所以他們的政綱和策略，我們外行人無從知道；但若公開的、合法的無產政黨的政綱和策略，就有詳載的文獻可據。且先就最近日本無產政黨的政綱和策略加以考察，以窺見日本無產群眾社會運動所向的一斑。

日本無產政黨的政綱和策略，隨其各黨各派的差別而有多少條文的不同；處在發展時期的日本無產政黨且常變化分合，數月間即有幾次分裂與合併。但因他們所要實現的目標相同，策略上自然也無多大的出入。現在根據去年十二月號本刊所載拙作《日本無產政黨的研究（下）》，摘錄一二為代表，以供我們討論的根據：

勞農黨的綱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一）我黨為擁護伸張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其他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日常利益而戰；

（二）我黨以勞動組合，農民組合的擴大強化為重要任務；

（三）我黨希望無產階級戰線的統一；

(四) 我黨為全體被壓迫民眾之獲得政治自由而鬥爭；

日本無產群眾為要達到上列的目的所採用的策略又如下列（錄自上引拙作，但刪去無大關係者）：

日本大眾黨的政策

(一) 政治方面

1. 普通選舉的徹底實行；
2. 壓抑無產階級運動諸法令的改廢；
3. 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
4. 縮小軍備……；
5. 把民眾軍閥主義化的一切政策……一概排除；
7. 撤廢殖民地的政治差別；
8. 打破秘密外交；
10. 由國庫支付無產者訴訟費……

(二) 財政方面

1. 財產稅的創設，所得稅及承繼稅的高率累進賦課；
2. 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稅、關稅及其他民眾負擔，一概撤廢；

(三) 經濟方面

1. 團結權、罷業權的確立；

2. 禁止立入，禁止假處分及立毛抵押，制定以確立耕種權為基調的佃種法；

10. 存款部資金運用的民眾化，……其他無產階級的金融制度的確立；

12. 重要糧食的價格公定制度的確立；

勞農黨又有下列二條特別規定：

34. 確定學生、生徒的研究自由及校內自治權；

45.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此外，大多數日本無產政黨尚有「對支干涉絕對反對」的明文規定。

以上所列的綱領及策略，可以歸納成下列三項要旨：

(一) 否定現狀，企圖打破現狀；

(二) 努力於剝削資本家階級的權益，擴大無產階級的權益；

(三) 反對帝國主義型的發展。

六、布爾喬亞的解救策

日本的無產階級社會運動家，看透日本經濟的沒落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機能的退化。誠然，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裡，刺激經濟活動的原動力是營利。所以在營利比率日漸低落的日本經濟界，百業皆呈現不振之狀，甚至如農業經濟上，竟會耕地面積絕對減少，單位產量絕對減低。救濟的根本方法就是以有效的制度代替無效的制度。因此，

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綱領的第一要點，就是否定現狀，第二要點就是擴大無產階級的權益。

然而否定現狀就是打倒現在支配階級的資本家地主階級，擴大無產階級的權益就是消滅有產階級權益的第一步。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站在他們自私的立場上，自然不能容受，自然背道而馳。所以，一切日本有產政黨的綱領和政策，嚴格地加以考察，皆與日本無產政黨的綱領和政策，形成正反。

然而，日本有產政黨各黨各派的綱領及政策，與日本無產政黨的綱領和政策之大體相同者迥異。有產政黨各黨各派，或因政權的爭奪戰，或因緩和無產階級的反抗，以保持有產階級的現實支配，所以難免在他們的綱領和政策上，摻雜多少欺騙的成分，因而發生策略上巨大的差異。但若考察各黨共通的要點，則又非出於偶然。實有根本的精神在焉。日本有產政黨各黨共通的要點，大體上可以舉出下列各項：

- (一) 維護現存的經濟制度；
- (二) 標榜超階級的或全階級的利益的代表；
- (三) 採用社會政策；
- (四) 保護在華既得權益。

日本現存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這種經濟制度下的支配者及統治者，是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日本一切的有產政黨，皆直接間接受到資本家地主階級的支持——否，無寧說是受到資本家及地主階級的指揮，以代他們執行統治權。一切的有產政黨的綱領及政策的第一要義，先舉「維護現存的經濟制度」，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又，有產政黨所代表的是支配階級、統治階級。支配階級及統治階級的反面，就是被支配階級及被統治階級。由兼備支配階級與統治階級的有產階級，統治並支配著兼被支配階級兼被統治階級的無產群眾。這種情勢實質上，確是階級的對立，階級利害關係

相反的對立。但若將此階級對立的情勢，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有產階級立即發生危險。所以，他們的綱領和政策的第二要義，標榜超階級或全階級的利益，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日本一切的有產政黨，雖然皆以維護現存的經濟制度，標榜超階級的或全階級的利益的代表為基本綱領，而各種社會事實卻往往否定它們。日本有產政黨儘管維護現存的經濟制度，而現存的經濟制度偏不作險，處處暴露出它的缺陷來。日本有產政黨儘管標榜超階級的，或全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而實際的情形卻往往是階級利害的相衝突，和階級關係的對立，在日本資本主義沒落的現階段，社會情勢尤其是如此。這種情勢雖說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使然的，且為保全有產階級的利益更不得不然，但若這種社會缺陷和欺騙一任其暴露而無所蒙蔽，統治階級馬上會被污損了威風，而影響其基礎的動搖。於是，採用社會政策，以在缺陷及欺騙上蒙蓋一層薄膜。有產政黨之施行社會政策，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然而薄膜究竟蓋不過赤焰焰的光輝，欺騙的社會政策結果無補於問題的根本解決。日本一切的有產政黨雖皆標榜社會政策之採用，並且實際上一直施行下來該種政策，但是結果仍不能為農村都市的數百萬失業群眾找出工作，數千百萬的無產大眾的生活，不但無改善的希望，倒反日益危殆，進入沒落第三期的日本經濟的衰落，毫無打出一條出路的曙光，而只隨著世界經濟恐慌的尖銳化而物價愈益暴跌，各種企業愈陷於不振，耕地面積愈益縮小，單位產量愈益減少，失業群眾的數目愈益增大。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可謂達到危急的年頭了！

此時，日本有產政黨要救濟這種危機，使臨危的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得以苟延，站在兼支配者及統治者的有產階級的立場，本有二種方法：其一，就是不顧大多數民眾的生死，索性採用保護培育資本家企業的政策，以造成假的良好市況。其二，就是侵略他國的領土，侵奪他國的利權，以其所得彌補本國的缺陷，簡言之，就是帝國主義型的發展。

不過，第一法之保護並培植資本家的企業，實質上就是巨大費用的轉嫁和一般無產群眾的剝削。這種方策，各用於資本主義初期，實甚合宜，但施之於日本資本主義末期的現階段，則未免「倒行逆施」。此時，日本資本主義越發施行這種策略，越為它本身挖墳墓。歐戰後，政友會內閣施行膨脹政策之無效，可以證明。

此外的辦法，就只有一個帝國主義型的發展了！保護並培植資本家企業的方法，是對危病者打興奮藥針，充其量也不過發生興奮作用而已，甚至是「飲鴆止渴」的方法。而帝國主義型的發展，卻實在有延長殘喘的效用。於此，日本一切有產政黨的政綱之列「保護在華既得權益」為其要點之一，我們不難尋出理由來。惟是，日本保護，或擴大在華既得權益，實與日本資本主義存立的絕續，有密切的關係，同時和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的成敗，也有極重要的因果關係。

七、東北事件與日本資本主義

我們且轉回頭來說「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何以衰落？」的問題，略加探究。若以資本主義經濟為前提，則可列出四種要因（詳論，請參閱本專號拙作《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

1. 生產原料的缺乏；
2. 商品市場的狹隘；
3. 投資市場的狹小；
4. 糧食問題的尖銳化。

本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重心是營利經濟；刺激經濟活動的原動力，自然是利益。企業家為追求利潤而經營企業；股份資本家為得紅利而購買股票；金融資本家為得利息

而購買公債及公司債並建設銀行；……總括一句話，莫不在於追求利益。利率大的產業，一般人爭趨經營；利率小的產業必定萎靡，甚至滅跡。但要企業的利率率大，至少要具備（一）生產原料豐富；（二）商品市場廣大，二大要素。若生產原料缺乏，生產費必定格外增大；若商品市場狹隘，商品價格必定跌落。二者夾攻，即使不至利益全無的程度，但自以追求利益為目的資本家而言，利率率減至某程度，該種企業終須停頓，或縮小範圍。所謂不景氣，經濟恐慌，市場紊亂，經濟衰落等等，就發生在這時候。其結果，也就是投資市場的狹隘化。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的經濟情狀，現在正嘗著這種辛辣滋味。因此，日本倘仍欲以資本主義的立場打開這個難關，第一必須尋覓生產原料供給地，第二必須開拓商品市場，第三必須擴大投資市場。

日本企業界利益率的低落，並且影響到日本全國國民的糧食問題。農業投資的不合算，促使日本農業資本家或地主，不肯開墾新耕地，或增投資本作更集約的耕種。其結果，日本耕地面積不但沒有增大，倒反縮小；穀物的單位產量不但沒有增多，倒反減少——但對於現在日本耕地面積六百多萬町步，未墾的可耕地面積尚有一六五萬町步，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他方面，日本人口卻以急速的比率繁殖下來。欲其不鬧糧食問題，似乎不可能。於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型的發展，又增加一種理由。

日本既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又迫於上述各種經濟貧困的威脅，日本資本家地主的統治權執行者的在朝官僚，自然急於向外發展。這種向外的發展，本自日本開國以來，即成了以「富國強兵」為基據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政方針。但在日俄戰前，此種發展尚非經濟上的必要；經日俄戰爭後——尤其是歐戰後，這種必要始具確實的內容。

然而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往何方前進？誘於天然富源及賤價的人工，牽於國際情勢及地理的關係等等，沒落線上的日本積極經營中國大陸，是必然的行程。故自明治維新後，日本即先以軍國主義的政治需要而挑發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又繼之。占得台灣及

朝鮮各地，猶不知足。及至今日，受到世界恐慌及其內部缺陷的夾攻，再加以日本在華的經濟活動，若一任自由，則日本必敗的示意，日本遂焦急於把在華的勢力範圍，完全殖民地化。

日本在華的主要勢力範圍，是東三省。東三省經濟價值之大，又冠於中國全部。東三省的面積約三倍於日本內地，而人口反不及日本內地二分之一，人口的包容力尚有三四千萬人之譜。土地多肥沃可耕，氣候又相宜，即現在的農產量每年就約近二千萬噸，除去自用尚有六百萬噸左右的剩餘。生產資源有鐵和煤，有各種的金礦，有天然的森林，有肥料原料的大豆，有棉織業原料的棉花，有毛織業原料的羊毛。主要農產的水稻與小米，可以直接間接解決日本的糧食問題。每年六四，七〇〇多萬海關兩的貿易能力，可以銷納日本的工業製品。過去日本對華投資占對外投資八一%，對東省投資又占對華投資七二%強。現在尚有廣大的企業場面，可以充當日本的投資市場。具備這些條件的東三省的經營，足以彌縫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的缺陷於一時。因此，日本早即握住東三省的經濟實權不放。近年，復因世界恐慌一環的本國恐慌加重，及英美等國向東三省之進出，遂更覺手忙腳亂，恨不能把東三省活剝生吞下去。而有計劃的、強奪的東北事件，遂發生於本年九月十八日晚。

然若日本果能把東三省完全殖民地化，獨占東三省的一切，則於日本全國前途，將有何種影響？「日本吞併東三省，無異吞炸彈」的情勢，姑置不論，但若日本果能以東三省獨占者的權力積極經營東三省，現在正在日本資本主義面前示威的上列四項問題，總可以得到多少程度的解決，而現已病人膏肓的日本資本主義，可以減去幾分的危險性。東三省是日本資本主義的「續命湯」！事實的確如此！此次日本在東三省的暴行政策成功之日，就是日本資本案、地主及其政權執行者「彈冠相慶」之時！步入沒落第三期的日本資本主義，或將得到暫時的「安定」。但是此種安定，必然地影響日本現階段社會

革命的退卻。日本資本家地主及其政權執行者「彈冠相慶」之日，也即是日本無產群眾「抱頭大哭」之時！日本無產群眾的聰明領導者，當不至昧於這個明確的歸宿吧！

八、赤松克麿氏的錯覺

然則，日本無產群眾及其運動的領導者，對於此次東北事件的態度如何？本文第二節，業已述過，日本無產群眾及其代表者對於東北事件的主張，約可分為二種：其一主張放棄日本在滿特殊權益！其二與此相反，堅持擁護日本在滿特殊權益。本節批判對象的赤松氏的主張，屬於第二種的擁護論。

赤松氏素來即以日本社會運動家著名，並且是說過「國際主義的理想是可稱讚的……」（The ideal of international is misandable……見The Trans-Pacific）的社會主義者。他這次以社會民眾黨書記長的身分，向日本無產群眾表示關於東北事件的態度，並且在各雜誌發表專論，自然要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現在願以最冷靜、最公平的態度，來領教這位忠實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日本無產群眾忠實的社會主義者的高論。

赤松氏在The Trans-Pacific 周刊裡發表的主張，已在本文第二節介紹過，其要點就是「……日本在滿的權利正是日本經濟生命的主要部分。因此之故，在此範圍內，日本應受正當的保護。……」他還在十一月號《東亞》雜誌上，發表本問題的專論《滿洲問題與日本無產階級》，茲介紹其要點如下。他先確定「各國的經濟情況不同，所以各國的無產階級皆站在國民經濟的立場上，進行他們各自的鬥爭」的大前提，然後申論如下：

「日本無產階級非先於日本國民經濟機構中求得自己生存權的確立不可。現在，欲於資本主義國民經濟上確保日本無產階級生存權之無望已暫明確化。在此現狀之下，企圖國民經濟機構之社會主義化，是極當然的路徑。但欲建設

社會主義的日本國民經濟，則此建設非能允許日本大眾生活上進者不可。社會主義日本，若資本家地主榨取階級滅亡後，大眾生活水準依然低下，則不可。社會主義的本質不但要貧富的懸隔絕滅，尚須大家的生活水準上進。」

「因此，建設社會主義的日本國民經濟應具備的條件，第一，最大條件之一就是生產資源的確保。資源薄弱的日本本土的經濟機構，即使社會主義化，也不能藉此充分提高日本大眾的生活。於此，滿蒙資源正如資本主義日本所必要者一樣，對於社會主義日本也是必要的。……滿蒙的權益即為日本大眾生存權所必要者，則不問其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與否，無論如何可以主張確保的正當性。可以說：一民族為著確立自己的生存權而擁有一定量的必要資源的權利。」

赤松氏上列各點主張，可以歸納為下列二要點：

第一，滿蒙是日本經濟生存上絕對必要的因素；

第二，日本擁護日本在滿蒙的利權，則日本大眾的生活可以上進。

赤松氏第一見解的論據，在於日本經濟的衰落由於日本「資源的薄弱」。此種「資源薄弱的日本本土的經濟機構，即使社會主義化，也不能借此充分提高大眾的生活」。所以，具備豐富天然資源的滿蒙，乃成了日本國民生存上必爭的地帶。

然而赤松氏未免太過於信仰「資源決定說」。資源之決定經濟的興衰，是有「極限」的，不是可以漫無限制的適用。其實，資源常隨生產技術的進步及生產關係的變革而變化。且舉燃料來說吧！產業革命以前的燃料皆用木材。當蒸汽機關乍發明而使用之初，一般人莫不憂慮燃料的缺乏。但是後來卻發見了煤來代替。其後又發見瓦斯、石油、電力接踵而來，以後科學愈益發達更當無窮盡。又如由石器而銅器而鐵器；由人力而蒸

汽力，而電力；又由最近織物界之由真絲而人造絲，等等，莫不是資源隨生產技術及生產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實例。再就日本明治維新革命說吧！維新前正當日本封建社會發生破綻的時期，日本經濟界未嘗不苦於生產資源的缺乏，但經明治維新的社會革命而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一變之後，資源缺乏的缺點馬上消滅而完成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長足進步。同樣，日本資本主義發達至現階段，生產關係上已經發生了障礙，所以覺有資源不足的缺陷。但若聰明的日本社會改造家能注意及於此點，先把拘束生產力發展的現在生產關係改造過來，把日本大眾的種種重負，由資本家地主的奢侈方面，移於生產方面，則科學可以更加實用化，生產技術可以進步；而發見新的資源，並非不可期待的。即就現有的資源而言，並非完全用盡，而實只限於「利益率小」致使不能開闢利用罷了。不然，現在日本未耕地尚有一六，〇〇〇多萬町步放置不開墾，既耕地面積且日益縮小，而他方面卻大唱「日本土地饑荒」以為侵外的論據，必定探求不出正當的解釋。（關於本段的詳細討論，請參閱拙作《日本果非侵外則不能存立嗎？》）。

復次，再就赤松氏的第二見解，「日本占得滿蒙，則日本大眾的生活可以上進」，略加批判。赤松氏對於日本無產大眾，許下一個大願：「一旦社會民眾黨當權——相信可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勞動政府必將保護日本在滿的權利，如英國勞動政府保護英國在華的利益。」（見The Trans-Pacific）。因為他相信日本苟能保住其在滿蒙的權益，則日本無產大眾的生活可以上進。然而赤松氏這種確信，只是一種幻想，它的誤謬比第一見解尤甚。

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組織，是以支配階級的資本家地主為重心的。其社會的榮辱消長，均以這個支配階級的榮辱消長為轉移。因此，不但資本家地主們希望施行有利於他們的政策，即他們的統治權執行者的政客官僚，也秉承主人的意旨，施行同種的政策。資本家地主階級統治權的執行者，往往板著面孔，似乎大公無私地標榜「一國的產業無

論如何，國家應極力講究政策加以保護」的意旨，而不問產業權握在那一種人手裡，及施行保護政策之後對於民眾會發生何種損害。他們就是根據這個原理。日本資本家地主的統治權執行者，處在外部的世界恐慌及內部的資源缺乏兩重鐵板夾攻之下，應用這個原理尤其「惟妙惟肖」。因此，即使侵佔了他國的領土，橫奪了他國的權益，依然無益於日本的無產群眾。不信，且看過去的實例。日本無產大眾負擔巨大的軍事費及軍事公債（據豬侯津南雄《帝國主義財政的危機》，一九二三年日本國民的軍費負擔額占國民所得八·一%——間接負擔尚不在內；日俄戰至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軍事公債占國債總額八〇%至六〇%），侵佔了台灣及朝鮮等殖民地，但其結果，也只落得稱為殖產公債的資本家培植公債，稱為拓殖事業公債的殖民地公債，及稱為金融調整公債的資本家救濟公債，等等的增發無已（詳見《帝國主義財政的危機》）。例如就台灣殖民地說，不但一切的企業權及各種利益落入三井、三菱、鈴木等大財閥手裡，甚且到他們的企業失敗時，日本民眾還要負擔救濟的責任，救濟鈴木商店，調整台灣銀行的輿論騷擾，無產大眾的腦中，當然殘留著深刻的印象。日本擴大殖民地對於日本無產群眾的利益，充其量也不過多造幾十萬「鄉下皇帝」——各殖民地的警察，及資本家大嚼時由口角落下的「食屑」。日本經營殖民地尚有一個主要的效用，就是延長日本資本主義的壽命。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因為本國資源的缺乏早即呈現衰狀而孕育社會主義經濟的種子。但是後來僥倖得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經營的緩衝，延長了三十多年的壽命以至於今。日本現在雖處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但能獨占滿蒙為其殖民地，其可再度苟延殘喘，是無可疑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殘喘苟延一日，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的統治權鞏固一日。我實在懷疑赤松氏所標榜的增高日本無產大眾生活的「國家社會主義」，將由那一點出發？社會民眾黨——赤松氏就是該黨的書記長——的政綱，究將如何實現出來？日本擁護在滿的權益則日本大眾的生活可以上進的話，不知究何所指而云然！

論赤松氏的聰明，應該不至昧於上述客觀的當然歸宿，即使無暇顧及空虛的「正義」和「公理」，對於這種明若觀火的客觀歸宿，也當不至昏聩至此。並且，社會民眾黨的政策中，曾列「對支干涉絕對反對」的明文，我們更加懷疑。然若赤松氏「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就無厚責的必要了。赤松先生！君之真意因怕「資本主義日本擁護滿蒙權益時，中國必視為『帝國主義政策』，日本將蒙此宣傳的不利」，而假借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護身符，是不是？！

九、日本無產群眾應有的覺悟

然而赤松氏的主張，究竟沒有帝國主義武斷派代表論者松岡氏的爽直。松岡氏主張擁護日本在滿的權益的論據有三：其一，滿蒙是日本經濟上的生命線；其二，滿蒙是日本國防上的必要地帶；其三，滿蒙是日本對蘇俄的緩衝地帶。實則，此三項論據骨子裡的意思如下所列，上面只是客氣一點的說法罷了：

- (一) 滿蒙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上的生命線；
- (二) 滿蒙是日本侵外的必要地帶；
- (三) 滿蒙是日本進攻蘇俄的預備地帶。

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世界大恐慌，促使日本資本主義歐戰後經濟衰落愈益尖銳化。他方面，日本的工農無產群眾的社會運動，愈益革命化。同時，英美各國又著著向滿蒙方面進出。這些種內外的威脅，迫得在現階段社會革命前戰慄著的日本資本主義，不容不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企圖把半殖民地的滿蒙完全日本殖民地化。再者，本國天然資源缺乏而帝國主義的野心又無限大的日本，它的希望實非只限於滿蒙，其「得隴望蜀」的野心，路人皆見。日本倘能侵占滿蒙，則其進略山東、河北、內蒙古之特別區，實甚容易。

所以說：滿蒙是日本侵外的必要地帶。歸結起來，日本侵佔滿蒙，不但可以延長日本資本主義的殘喘，同時且可以增高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氣焰。

但是，在日本延續其資本主義的殘喘，維持其帝國主義的存在的內部，潛藏著一種不可蔑視的赤化勢力。而蘇俄又是此種赤化勢力的推動機，企圖延續資本主義命脈的日本，自然要進攻蘇俄。滿蒙又是進攻蘇俄最便利而且必經的地帶。欲戰慄於現階段社會革命之前的日本資本主義，不侵佔滿蒙，似乎有點不安心，而且不甘心。

上面所述，才是日本此次在東北暴行原因的正當解釋。將來，借暴行侵佔的結果——假定「無異吞炸彈」的侵略果然成功——也將如其原因所指示的，僅僅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續命湯而已。只就滿蒙問題的前半段歷史而論，我們也不難舉例來證明。據帝國主義理論家松岡氏之言，「……我國因為日俄戰爭，犧牲了十萬生靈、二十億國幣，以賭國家的存亡……」。又此次東北事件發生後的費用，只據《東亞》雜誌四卷十一號六九頁所載，即已費去一三八萬日金元。但是所犧牲的生命和國幣，究竟是那一部分日本國民的生命和金錢？所得來的權益，又落在那一部分日本國民的手中？關於此層，日本《普羅科學》雜誌替我們解答得非常透徹：

「……由中日、日俄二次大戰獲得的『日本特殊權利』，明明白白地是犧牲勞動者、農民的血與肉換來的。用勞工的血肉換來的『特殊權益』——關東州租借地、大滿鐵、世界第二大煤礦等，都落在資產階級的掌握裡，成為支持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台柱，而反成為現在對日本的勞動者、農民實行壓抑和榨取的原動力。所謂『滿蒙特殊權利』，果真有的話，至少不在勞動者和農民的手中。」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滿蒙的特殊權利』，決不是國民全體

的」（據《青年與社會》第二期）。

既然「用勞農的血肉換來的『特殊權利』，不但都落在資產階級的掌握裡」，倒反成了「支持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台柱，現在對於日本的勞動者，農民實行壓抑和榨取」，那末，日本無產群眾何苦擁護日本在滿的權益？！自以日本無產群眾利益代表者自許的赤松先生，何苦極力主張日本在滿權益的擁護論？！

回想日本封建制度的機能，早在德川初期即已退化，倘無德川三世家光之二百多年的反動的鎖國狀況，日本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必定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成功了。又如德川末期，對於日本封建制度的革命勢力分為「進步」與「復古」二派，鬥爭的結果終歸進步派獲得勝利。家光的鎖國令只禁止二百多年間日人與外國的交往，卻阻止不了「時代的進化」。結果，只落得二百多年封建頹勢之延長吧了！「復古派」爭執的結果，也只落得被撇在潮流之後的慘敗！

現在，「日本在滿的特殊權益」，可以譬之家光的鎖國令；該種權益的擁護論者，可以譬之復古派。希望日本社會進步的日本名達！聲言代表日本無產群眾利益的一部分日本社會主義者！何苦與進化的潮流逆行？何苦為無數的日本無產群眾，造下一筆「大冤債」？

日本的無產群眾！無產運動的領導者！你們不是在否認日本現狀嗎？你們不是在努力打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現狀嗎？「壓抑榨取你們的日本階級」，現在又為擴充「支持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台柱」，而嗾使你們來擁護非你們所有的「日本在滿的特殊權益」。你們聰明的朋友說得好：「……然而，現在日本資產階級，認為這是全體國民的事，強迫我們『誓死保護』，甚至驅使我們於殘酷的戰爭之中」（《普羅科學》雜誌）。擁護或擴大日本在滿的特殊權益，只能鞏固「支持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台柱」，只能削

小日本現階段社會革命的客觀勢力。請充分吟味下列一段話的意義吧！

「某一社會形態，非至其內部所包容的一切生產力充分發達之後，決不會滅亡。更進步的生產關係的出現，非決定此種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既在舊社會之翼下孵化著不可」（《經濟學批判》序文）。

日本侵占東三省成功之日，即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日，也即日本無產群眾抱頭大哭之時！

原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新東方》最近遠東問題專號

一年來的日本

一九三七年是中國多難的年頭，同時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多事的年頭。在這一年中日本國內究竟發生了那些事件，演成了那些問題，這種事項的正確瞭解對於我們的全面抗戰是很大的補益的。因此，應時事月報之徵求，草寫這篇論文。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的日本，是怎樣一種形態？這一年日本的動態如何？這一點若概括地一句話說來，這一年的日本是法西斯日本更加急速上升的一年，並且可以說是「軍事法西斯」實力發動的一年。為使事態特別明瞭起見，我們可以區分這一年為上半年及下半年兩期。這兩期的變化非常明顯，若拿來和去年比較看，就有特別的趣味。一九三六年的日本，是上半年嚴重（二·二六事變）而下半年沉靜，但是一九三七年卻正相反，上半年比較沉靜而下半年嚴重，終於進入了對我侵略戰爭的時期。若上半年可以稱為文治期，那末下半年就是戰爭時期了，但是文治中已充分含蘊著軍治的性質，這是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軍事性使然的。這一年的主要事變就是寺內——廣田內閣的瓦解，宇垣組閣的流產，林內閣的夭折，二·二六事變以來各方所矚望近衛內閣的成立，在近衛內閣成功了軍、政、財合抱的情勢下發動了對我的全面武力侵略，許多許多的矛盾、衝突、摩擦和牽制等等就貫穿著這些事變而演繼下來。經濟也隨著軍事的發動由準戰時體制步入戰時體制，教育文化政策也帶上戰時的意味，和軍事行動配合起來。

我們且先從政界的變化講起。一九三七年的春間正是日本第七十回議會開會中，政黨和軍部衝突表面化到最高峰的時候。眾議院議員濱田國松竟以七十多歲高齡奮勇向陸相寺內肉搏，終於因為「……請查速記錄，若余有侮辱軍隊的言語，餘當剖腹以謝君，否則君應剖腹自殺」的酸辣，激動了寺內不可一世的雷霆之怒。於是寺內陸相要求廣田

首相解散議會，其理由是說政黨送黨員入閣但又反對政府，這是阻礙廣田當時所負一致肅軍與庶政一新的二大使命之行使的。這些議員是二·二六事變前選舉的，不適用於二·二六事變後的情勢，故須解散重新選舉能代表二·二六事變後國民總意的議員，贊助現內閣的二大使命。但是查檢議會速記錄的結果，不但政黨方面沒有侮辱軍部的言語，倒反發現了很多軍部侮辱政黨的言語。這雖足以表現軍閥的氣焰，但一方面海陸相的態度卻未能一致海相主張維持舉國一致的現狀。因為閣僚意見的不一致，於是廣田斷然地決定內閣總辭職，二·二六事變幾經難產的廣田內閣於是壽終正寢了。

寺內廣田內閣倒於政黨與軍部之衝突，於是為著調和政軍而十數年來被視為「惑星」而潛居朝鮮多年的宇垣前總督，遂以軍人政治家的聲望而被推薦組織內閣。官僚、財界、政黨乃至一般人民也都表示歡迎，只有軍部不滿意，軍部拒不派送陸軍大臣。照例陸海軍部大臣是由軍部選派的，而這次軍部要人皆一致罷工不參加組閣。宇垣自己雖然可以兼任陸相，作個破題兒第一遭，但宇垣閉門考慮三天的結果，因為沒有斷然的勇氣，終於奉還大命。集元老、重臣、財界、政黨乃至輿論於一身的宇垣內閣也只因為軍部的不贊成而流產。軍部反宇垣組閣的原因，說來歷史很長，據說是因為宇垣前在陸相任內簽訂軍縮條約，和裁減了陸軍二師團，軍部就認他為叛徒。這是的確的，宇垣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人，他是和政黨有密切來往的軍人政治家。以軍人政治家的宇垣終因被認為軍部的叛徒而被拒絕，可見日本政黨政治之如何沒落，軍事性質之如何濃厚與上升動向。廣田內閣的總辭職並不是因濱田國松的一席嚴酷批判，而因由軍之內部自己不調和的原故。

繼宇垣之後出而試為組閣的就是林銑十郎，他是軍部以意外的好感歡迎上台的，寧可說是軍部的總意逼他上台的。但是林大將組閣的過程中也充分表現著軍部意志的支配力，他先拜訪前任陸相寺內，磋商本任陸省的人選，但是結果寺內所推薦的人選不是他自己所屬望的人，而是軍部之長官會議預先決定的中村孝太郎中將。海相方面，林大將

原是矚望於末次大將，但海軍方面也以從來慣例推薦海相是海軍的特權為理由拒絕了林大將的要求而薦米內中將為海相。海陸相除外的大臣皆如林大將之推薦。不得前任陸海相推薦，就得不到本任海陸相，不得海陸相就不能組閣，最終大權操之於軍部。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政權性質的問題。中村中將曾被宇垣列入所希望的四個陸相候補者之中，並且是三長官慎重考慮的結果，但卻加以拒絕，在林大將組閣時並沒有為組閣本部所屬望，但卻未加拒絕，這完全是出於軍部的立場。林內閣雖然組織成功了，但是它的施政卻是意外的失敗。林內閣鑒於第七十回議會前後政黨與軍部的衝突，而抱著融化政軍為一體的大志願。它努力的結果，政軍的抱合，或許有了某程度的成功。但卻出乎意料之外的；還有一個財、軍的對立。這個對立早已演變下來而至二·二六前夕演成一個大激變。財界最有力代表者高橋是清就死於這個對立的最高峰，高橋雖然死了，但是對立仍未融化，林內閣即倒塌於這個「仍未融化」上。林內閣雖然成功了政軍的抱合而失敗於財、軍的對立，這裡又留下了題目讓各方最期待的近衛文磨來做。

近衛公爵在二·二六事變後即為各方面所屬望。且為西園寺公所愛護。但因西園寺太過於愛護，自己擔任大變後重擔的勇氣不足終於堅辭而薦以廣田。然而日本型法西斯的發展，到目前已不容各方所推重為法西斯領導的近衛再作辭退了，於是勉以衰弱的身體起來組閣了。普通閣員都是無法推定，陸海軍大臣也依軍部的希望由杉山及米內留任。近衛內閣算是一帆風順地成立了。成立後政軍財三者抱合的工作，果然經近衛之手獲得了相當的成功。於是日本型的正格法西斯遂突飛猛進地奔騰起來。清算對華外交的過去，樹立強硬外交的決定和進行，都是這種表現之一。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全面侵略，也就在這種軍事法西斯突猛奔騰的情形下發動了。

隨著幾次政局的轉變而行政機構也有多少變化，在廣田內閣取消了內閣審議會。到林內閣改革內閣調查局為企劃廳，到近衛內閣又與資源局合併成企劃院，對華全面侵略

發動以來為利於軍事之行動先設參議會，後因覺得力量不夠又設大本營，大本營問題成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各方的討論問題。這種演變也是軍事法西斯一日千里向前發展的一表現。

日本軍事法西斯的猛進另一方面也很自然地表現於外交方針上。日本法西斯外交第一步，表現於對華政策上，由佐藤外交起一八〇度的變化，急轉直下地變為積極要求，要求不成加以恫嚇，恫嚇沒有效果終於在盧溝橋發動武力，由華北的局部擴充至上海，而成為全面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全面侵略是帶有國際性的，所以另一方面又加緊日德同盟，擴大成為日德意防共協定。日本對於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之外交方針，是拉德意以牽制英法，對於美國則極力疏通，對於蘇聯則伴作準備進攻，始終以「防共」的假題目欺騙英美，引誘我們。日本最近的強硬外交尖鋒完全對準著英國，最可憐的就是老大的英國紳士，且看一九三八年四月間英國紳士果將如何對付這個遠東的強盜（據說，英國須四月後始能對日強硬！）。

日本經濟，一九三七年的變化也非常急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準戰時經濟體制到近衛內閣轉入戰時經濟體制的序幕。戰時經濟體制在林內閣即已逐漸具體化。林內閣時代即已著手於各種具體的經濟政策，什麼擴充生產政策、安定社會經濟政策、管理對外匯兌，等等都是在林內閣時代制定的，到了近衛內閣時代更加積極化。不久，對華全面侵略發動了，日本社會經濟就在總動員的名目下被軍事強拉著向前邁進。政府強逼人民服務於戰爭，可憐的就是人民的生活隨著戰爭的展開而日益惡劣，他們的負擔是一天天的加重。一方面租稅隨著戰爭日益加重，另一方面物價隨著戰時通貨膨脹而日益高漲。日本的預算隨戰爭而急增，所謂「對華事變費」一會兒五億元，一會兒七億元，一會兒就是十二億元、二十五億元了。這些重擔加在民眾身上，民眾喘不過氣來，就用反對侵略戰爭來回答政府，反戰的宣傳散發在各地，軍需工廠的工人怠工、破壞、炸燒煤油等等，都是反戰的表現。軍需工業工人的需要增加了數倍，可是工資卻不但沒有增

加倒反減少了。一九三一年日本經濟走入準戰時體制以來，不到六年間，人民生活的負擔加重了三二%，下層大眾的負擔更增加了四六%。但是勞工的鬥爭的件數在侵略戰爭發動前急增很多，發動後倒反沉靜起來。這或許是工人力量的潛伏化，日本統治階級的刺刀素來是尖對著一切勞工的，戰時更要加嚴了。

但是感受性靈敏的知識分子及共產黨人，卻更加增強他們的活動。日本左傾社會運動家去年被檢舉過一次，左翼各派差不多全部被逮捕了去，下了獄，這一次又來一次大逮捕，一共捕去三七〇多人，可以說是「一網打盡」了。

一九三七年上半期的日本工潮是急增的，但下半年期倒反沉靜，但是前進知識分子的多事多難卻起來代替了。日本政府自開戰以來就很重視國內一般大眾的反對，特別是重視前進的知識分子。所以政府就借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名義，由政府人員總動員向日本民眾擴大宣傳，組織日本文化中央聯盟於首都的東京，而於各地成立分會。但是日本的文化宣傳綱領實在太空洞，「日本精神」究竟是什麼，受過二十世紀潮流洗禮的人不能領悟；日本政府的精神宣傳也太不切實際，要人民幸福和戰爭配合起來，也是日本現代人民所不能領悟的理想，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效力終不如刺刀的威力來得有勁。在戰時戒嚴時期中，日本大眾的反抗力量，完全潛伏了，變成了地雷。但是前進的知識分子的感覺卻依然是那麼尖銳，日本政府對於他們依然不能放心，於是出以「一網打盡」的逮捕辦法。日本社會的動蕩，是用三七〇多人左傾知識分子的逮捕送走了一九三七年的。

殘暴的戰神強拉著日本帝國主義走上了亞細亞大陸，早就準備在大陸上橫行直撞，並且也已局部地發揮過它的威福。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期攜帶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神，居然又大發起淫威來了。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藉口於預定好的陰謀而掀起了盧溝橋事件。五六月間日本帝國主義即已在華北安排好炸彈，準備把華北幾省一下炸變了顏色。六月底我在北平即已察知各方面的傾向。果然地，回到南京不到一星期，盧溝橋事件即已爆

發，但是我們沒有整個的打算，地方也沒有十分的決心，依然想苟安於二年來的均勢上。殊不知日本國內的情勢已和二·二六事變以前的，截然不同了。二·二六事變前是軍部財界及政黨對立最尖銳的時代，但自經過林內閣財軍抱合政策及近衛內閣財政軍抱合政策的成功以來。軍事法西斯已就上了軌道。這種內部統一的成功，在侵略性日本帝國主義很自然地必轉而向外侵略，所以佐藤外交完全被清算後又回到廣田外交的方針。於是日本軍事法西斯開始向我們動蠻了。他的意思滿以為恐嚇一下我們就屈服，就答應他所要求的種種條件。殊不知我們竟給硬釘子碰，我們竟由華北局部的抵抗變成全面的抵抗，並且他吃到不少苦頭。單就上海一隅的抗戰言即已維持了三個多月，日本軍隊增加到二十多萬，整天整夜專靠著猛烈的炮火依然沒有打退了我們誓死抗戰的民族英雄。直到十一月初我們為著作戰的新計劃而退卻，但是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勇士還能決死奮鬥於日本軍隊的重重包圍中，屋頂的青天白日旗直飄揚至十一月二十幾日，所謂「皇軍」的威風不知道存在哪裡？

隨著上海的退卻，日本帝國主義又分路進攻我首都，我們為著抗戰到底計，遂決計遷都，軍隊也於十二月十三日退出了南京。日本帝國主義對我的全面侵略戰爭，遇到了新的難關，以後的打擊更要加倍起來。第一，我們的遷都表示抗戰到底更堅決的決心，我們的最高領袖在退出南京後的幾次宣言，皆充分代表著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堅決意志。第二，我們引敵深入內地，日本軍隊將因戰場之擴大而不足以分配，因為交通不便而陷於窘境，因為山地戰而被包圍。第三，日本帝國主義對我的侵略已經打破華中的均勢，更要進而擾亂華南，英美各國還能否隱忍下去，是很大的問題。國際問題日益使日寇陷於窘境，最近英日的糾紛、美日的糾紛、蘇日魚約糾紛等等，都是在國防上增加日寇的難關。而日寇自己的種種蠻幹也正在促進這種難關，英艦及美艦的被炸，類皆如此。日本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年度改為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七年是這種被日本帝國主義的蠻幹

送走了的，長此蠻幹下去，一九三八年就有挑起第二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世界在東方強盜的橫行下迎來了一九三八年，且看這個強盜能橫行到幾時！

原載一九三八年一月《時事月報》第十八卷一期

日本右翼運動最近的狂態

日本右翼最近的大活躍，可以包括在「日本主義運動」的旗幟之下。

最近的日本主義運動，自二·二六事件以後起了一大轉變。二·二六事件發生的當時，政府當局所表示斷然的態度，對於日本主義陣營給予了兩種大的教訓。其一是少數恐怖主義者行動的界限，也即所謂上層革新派的革命性的界限；其二是脫卻軍部依存主義，而向大眾中間建造基礎，以成為國民一般運動的必要。這又是昭和七年「血盟團事件」以來所深刻經歷的內部動搖和分化的教訓。「血盟團事件」以後，日本主義運動漸由原來的單純「反共產主義」而趨向所謂「革新運動」的進展。最初以醞釀的運動是「樹立單一維新政黨」，這個題目在昭和十一年下半年即已獲得日本主義陣營各派的擁護，向戰線統一的方向開展。現在先來追述其轉動的來歷。

這時期的「維新政黨樹立運動」最初的柱石，是「三月會」（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的），和「八月會」（昭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成立的），前者是以赤松克麿（國民協會）等人為中心，而於二·二六事件之後成立的，主要的活動方面是關東區域；後者是以吉田賢一（皇國農民同盟）等人為中心，在關西地方的友誼團體之間活動。「三月會」不久即變成有名無實的存在，而「八月會」的中心勢力卻是十年四月三日成立的「愛國勞動組合全國懇話會」（該會是以高山久藏等人的總聯盟，西山仁三郎等人的產業勞動俱樂部及小林順一郎主持的愛國勞動農民同志會等團體為中心的）。但至維新政黨樹立運動開展為全國性的時候，吉田賢一和其他指導者之間，即又發生意見的分歧，他終以「皇國農民同盟」為中心而於十一年七月五日重新成立了「皇國農民團體關西準備會」。其次，又和由全國懇話會分裂出來的關西諸組合，另外組織「關西皇國勞農協

議會」(八月二十五日)。這個協議會到其他各派統一為「時局協議會」的時候，又發展成為「大和聯盟」，以與「時局協議會」對立。

「八月會」所以向上述方向轉動的機緣，在於同年五月十九日成立的「五月俱樂部」。據說是以大日本生產黨的吉田益三等人為中心而活動的，五月二十九日即已在關西地方結成「全國愛國團體統一聯盟」，其後漸得生產黨、新日本國民聯盟、愛國政治同盟、國民協會、皇道會、國體擁護聯合會等關西方面支部的支持，而於六月二十日結成「維新政黨準備會」。另一方面又有糾合各派青年份子的「純正維新共同青年隊」(關東方面，成立於十月二十四日)，及「純正日本持義青年運動全國協議會」(關西方面，成立於十一月三日)等團體同時成立，並行發展。十月二十七日，橋本欣五郎的「大日本青年黨」終於舉行成立會了。但至同年年底十二月十五日舉行成立會的「時局協議會」成立後，以上的戰線統一運動才算告一段落。此外，雖然尚有小林順一郎等人的「三六社」及「愛國勞動農民同志會」系的進行。總而言之，除上述「大和聯盟」以外，日本主義陣營的統一聯絡機關總算成立了。現在試舉統一聯絡機關的「時局協議會」的常任理事的人物及所代表團體來看，則有入江種矩、增田一悅(國體擁護聯合會)、橋本欣五郎(大日本青年黨)、高山久藏(總聯合會)、渡邊良三(明倫會)、吉田益三、葛生能久(生產黨)、前田虎雄(神岳隊)、赤崎寅藏(新日本海員組合)、杉浦武雄(東方會)、岩田愛之助(愛國青年聯盟)、永井了吉、西鄉隆秀(直心道場)、小林順一郎(三六社)等人。於此可見其網羅各派範圍之廣泛。

但就這一年的合併及分裂的經過加以考察，則距離「擁國民大眾為基礎的組織」，還相當的遠。從來日本主義團體特有的缺點的排他的小派分立主義，還沒有克服，所有的只是戰線統一的形態略為整齊罷了。「維新政黨的樹立即在目前」的呼聲雖是當時陣營內外的任何人所想像的，但是去年發生的兩件事件，卻把這種期待一掃而盡。

第一事件是三月的總選舉。在日本主義陣營中對於議會的態度分成數派，若就其政策看，大體上可以分成二大派：其一，肯定議會而主張議會內部的革新政策；其二，根本否認議會本身的機能。觀此次的總選舉即可明瞭其情形，二月十日正式成立之「政治革新協議會」，表面上是對付總選舉的共同政治鬥爭機關，時局協議會的加盟團體大部分都參加；但是這個機關卻是以江藤源九郎議員（淡交會）為委員長而與「時局協議會」獨立創設的。此事從頭即暗示著前述二派的分離。果然，「政治革新協議會」和小林順一郎等人選舉消極派所指導的「時局協議會」對立，變成「議會派」的選舉中央機關，推選江藤等五名議員主指其事，至六月十一日即因其機能完了而解散，但其當然的歸宿，七月八日又以江藤為委員長，創立了「日本革新黨」。

小林順一郎等人之所以對選舉抱消極態度，是基於這種理論的：「議會不是下黨上達的機關，而必須是翼贊天意的機關」。

第二件事件是中日事變的爆發。在繼林內閣總辭職之後，宇垣內閣流產，近衛內閣成立的過程中，日本主義陣營內的各派的活動頗為複雜，這裡避免一一的分析。在近衛內閣成立的當初，日本主義陣營內的一部分人，雖然評為「公武合體」（原為公家與武家，朝廷與幕府合作之意，現在指皇室與政府合作之意。因近衛為權貴之族，但這是帶著諷刺的意思）。但隨中日大戰的進展，而這些日本主義陣營的各派皆加以支持，對於這次提出議會的《國家總動員法》及《電力國家管理法》。也自議會的內外給予絕大的聲援，這時候，「維新政黨」已經成了陳舊的綱領了。

最近日本主義陣營的新動向，的確在於響應、援助政府內外政策，也即參予具體的政治問題。其主要而顯著的活動，有下列幾種：第一，在中日事變爆發之後，以造成所謂「國民精神戰時體制」為目標，而在政府指揮之下，以「時局協議會」為中心創立「國

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其主幹人物有小林順一，即入江種矩、松本勇平、井田磐楠（貴族院）、高山久藏、中川佑（純正青年協會）、西鄉隆秀（同上）等人。其次又以「時局協議會」為母體在議會開會前後，繼續成立了「國際勞動會議脫退促進同盟」、「電力案促成國民同盟」，及「國家總動員促進國民同盟」等團體。「日本革新黨」更加單獨地發出聲明，支持政府的各種國策。此外，各派各團體的年會及緊急大會的決議和聲明，更是不遑枚舉，真是極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光景。

但是日本精神各團體自認為最得意的傑作，卻是他們對左翼各派的「落井下石」。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及今年二月一日日本政府兩次檢舉左翼分子及解散日本無產黨和全國勞動評議會的過程中，這些日本精神團體即與政府相呼應，加強他們對於人民戰線派的攻擊。甚至在一月十七日開會的「時局協議會」系各派的緊急時局問題協議會上，決議要求社會大眾黨即時解散。貴族院的井田磐楠男爵及菊池武夫男爵的「國體擁護聯合會」，則更猛烈地在議會上，或發行種種刊物，對於左翼及自由主義的言論大肆批評和攻擊。

最近日本主義陣營中更有展開樹立新政黨的傾向。但這與以前樹立「維新黨」的情形不同，這個動向最初的表现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滿山頭、一條實孝公爵，及山本英輔海軍大將連名發表的「舉國一致一國一黨」的聲明。這個聲明雖然沒有立即具體成立組織，但是日本主義陣營各派對於軍部官僚，反政黨的一部分，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則是確的事。至少有兩種新政治運動，是因為呼應而產生的。其一是「舉國一致聯盟」及「防共護國團」的政雁解消運動；其二是二月十一日開成立會的「大日本運動」，現在就此二種新政治運動略述於下：

「大日本運動」是在貴族院，軍部，官僚及一部分政黨之間推進所謂舉國一致的新黨樹立運動的。開始不久即因為包含的階層過於廣泛，所以進展至為政治的實際運動時，

各人的立場難免發生障礙，於是中途轉變成為發揮日本精神的一種精神運動。據其成立會當日的趣意書，則有塩野法相、永井遜相、秋田及荒木兩參議等在朝的要人及上書日本主義團體的代表者共五百多人，為發起人及贊助員連署簽名。現就其發起人及贊助員中的著名人物，摘要分類如下：

(一) 軍部：今井信夫、林銑十郎、川島義之、荒木貞夫、岸本綾夫、阿部信行。

(二) 官僚系：橫行助成、齋藤樹、皆川治廣、唐澤俊樹、吉田茂、白鳥敏夫。

(三) 貴族院系：井上清純、一條實孝、三室戶敬光。

(四) 政黨：政友會方面有東武、宮田光雄、川村竹治、津雲國利、濱田國松、熊谷直太；民政黨方面有軟母木桂吉、小泉又次郎、櫻內幸雄、俵孫一、富田幸次郎。

(五) 日本主義團體：有各派主要人物。

觀察以上所列人物，實在網羅著大日本運動名目下的各派代表分子；其中甚至如政友會解黨派的宮田光雄及川村竹治等人，也與統制派的濱田國松及東武等人並列，並且是抱著相當的熱心參加的。所以這一運動的將來。是有相當加以注意的必要，同時，其內容的複雜也可以想到。「大日本運動」在政黨分子的看法和企圖，正和下述「政黨解消運動」相反，是欲假藉這個「日本精神運動」以圖謀「政黨更生」，其活動中心是「常盤俱樂部」。但是這種運動還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所謂上層革新派及新官僚位置的移轉，隨著時局的進展而上層的所謂新勢力逐漸發展。近衛內閣的補強及改造的政局動向，就是反映這種動向的一面，因為「大日本運動」內部包容著這種政治勢力的代表者，所以

政治上的進展當然濃厚。這個運動全體或者可以說是既成政黨和上層革新派二者關係改造內閣的抗爭之緩衝地帶。」這一點是和「政黨解消運動」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地方，因而運動的全體正缺欠著與真正的「國民形態」。

其次，政黨解消運動的內容則比較確實，其背後有軍事法西斯主義者在指揮著，有全體轉動的中心存在著。這種運動一方面為所謂上層的革新派走上了政治舞台；另一方面由所指的民間左翼團體表現為暴動，負內政責任的政府當局，居然加以公然的袒護（例如內相末次大將的談話）。這一運動正與「大日本運動」同樣在所謂日本主義運動營壘中占重要的地位。若自其本身的確實性，即與政府當局的實力派所結成為一體說，或比「大日本運動」還值得注意。而充當這一運動的有力中心，是所謂「防共護國團」；在這一運動中最顯著的事件，是該護國團占據政友會和民政黨兩黨本部的驚人事件，現就其經過及其內部情形，略加分析；而其歸宿點的政黨解消運動，也可明瞭一斑。

二月十七日「防共護國團」占據政民兩黨本部的事件，因為時局的關係，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被害者的兩政黨，追究內務大臣的帝都治安責任。十九日的眾議院本會議上，民政黨的松田議員即指此事件為「民間的二·二六事件」；在同日的政友會議員會議上，強硬派也主張：「事件雖小，但其實質則為民間法西斯企圖壓迫議會政治的事實，政黨在這時候須以必死決心排擊法西斯，擁護立憲政治」。但是使人驚怪的，「防共護國團」的大部分構成員竟是三多摩地方的政友會院外團，以院外團而占領本黨的本部，強制「既成政黨的解消」，自政黨方面看來，至少是一種關係政黨存亡的事件。

政黨方面更宣稱：「防共護國團的政黨解消運動，在內相與某參議之間，傳有聯絡，並傳因圖國家總動員法案之通過而有一部官僚誘起這件事件」；認為這事件的背後有一種政治的陰謀而攻擊末次內相。但是主使者的末次內相則答謂：「這不過是政黨內部的糾紛」，而一腳踢開毫不在乎。

防共護國團事件確有政黨內部糾紛的一面內容，但惟其如此，所以問題更值得注意。政友會的一部分「有志者」一月十六日舉行了「現狀打開懇談會」。它是由川村竹治未、下成太郎、熊谷值太三人發起的；其決議事：「關於時運的推移與稀有的重大時局，應廣泛與憂國之士推進一大國民運動，圖謀迅速結成強力政黨，以行舉國一致之實」。在會上除三位發起人之外，宮田光雄及津雲國利也公然主張解消政黨，說：「政友會應即解散，結成法西斯的強力政黨，從事於時局的克服」；並謂：「這與東武和濱田國松等會合主唱者異其意識形態，即絕對反對法西斯擁護議會政治的人們，也終於不得不服從多數作前記決議」。防共護國團的委員長中溝多摩吉，大家認其為津雲國利的乾兒，所以占據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津雲國利即以紊亂黨規的罪名而和西方利馬同時被政友會所開除。這是防共護國團事件的政黨內部糾紛的經緯。

但是「護國團事件」另一面內容的政黨解消運動，則更值得注意。自一月中旬即有叫喊「解消政黨」的一隊人，歷訪政民兩黨，乃至社會大眾黨的幹部及所謂有力者，促膝談判解消政黨問題。這一隊的一部分就是以中溝為委員長的三多摩地方的政友會院外團千餘名組織的所謂「防共護國團」。另外一部分是下澤秀夫（國體擁護聯合會常任委員）所指導「要求解消政黨青年隊」（一月十二日成立，二十四日改稱「舉國一致聯盟」），其主要人物及代表團體如下：須藤理助（護國青年黨）、鈴木勇（勤王聯盟）、壁經平（東西聯盟）、下山治平（國士會）、西村泰藏（勤王自由同盟）、平野小劍（內外更始俱樂部）、上村專之丞（天軍會）、馬場園義馬（真日本社）、內用剛藏（池勇日本社）、皆川三陸（政教社）、佐藤信勝（信統會）、川口政好（明德會）、松浦應（國粹大眾黨）、友納早一（洗心社）、深澤源造（南北會）、若狹勝次（國威宣揚會）。占據事件發生的當日，一個多月的歷訪工作告一段落，而另一方面即於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國難突破緊急國民大會」，其決議如下：「甚於肇國之大本，期昭和維

新之斷行，既成政黨應即解體而恭順以行舉國一致之實。」大會的召集者用「舉國一致各派同志聯合會」的名義，代表者則為貴族院的一條實孝公爵、同久我通顯侯爵、參議秋田清、海軍中將小林省三郎、陸軍中將堀內文次郎、俵孫一等人聯名。

日本反動的右翼勢力所反映的上層軍事法西斯，促成了對華的侵略戰爭；而這種戰爭又必然地激發民間右翼運動的進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社會運動起了一個大轉變，許多左傾團體的代表也都向右轉了。「中日戰爭」爆發後，在軍閥政府高壓之下，許多左翼的指導領袖完全投降了，或竟從理論上把侵略戰爭合理化、大眾化，和軍閥政府狼狽為奸。但這只是日本社會一面的轉變，隨著侵略戰爭的進展，日本反戰反法西斯的勢力不獨增強了左翼營壘的力量，並且日在侵透於民眾之間。日本反戰勢力若如鹿地先生所譬喻的是個「巨大的冰山」，那末，日本軍事法西斯在這侵略戰爭中，將必如鹿地先生所說的：「法西斯主義者繼續打仗吧！他們坐上這樣巨大的冰山而粉碎成為微塵，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注：本文資料大部根據日文《改造》雜誌四月號

原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二卷第一期

日本近衛內閣改組與軍部法西斯政府的確立

一、近衛內閣改組的前後

日本近衛內閣改組已經一周了，國內外的報紙也皆著論評釋過，但是所論列的限於偶然性和近因，至於其必然性和遠因則很少提到，所以本文擬對這個問題作一更深入的檢討。

近衛內閣的去留問題，數月來的日本朝野喧嚷已久，綜合其看法不外乎三種：其一是維持現狀，其二是總辭職，其三是充分改造。各種看法都有相當的理由和根據。但是結果第一及第二兩種的看法完全落空，而第三種猜測倒反不幸而言中。特別是改組的情形有些地方使一般人不能瞭解，例如斷然「割愛」了廣田，拉進了宇垣，將素來對立不相容的軍部各派於一爐等等。但是日本政權之如此演變及近衛內閣之如此改組，是有其必然的歸趨。本文之剖述，打算著重於日本軍部法西斯政權確立的經過。故首先就有關近衛內閣改組之前後諸事故說起。近衛內閣改組的浪頭可以說開始於中日大戰第二期作戰，決定擴大的當時，這是我們抗戰到底及中日糾紛之不可調和性使然的。廣田前外相早在本年一月下旬揭露了德國調解中日糾紛的經過，並宣布中國已拒絕德國調解的消息（據東京一月二十二日路透電），這種方針正和最近廣田對日本國協會會員演說中所述：「今日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時期，……日本現在決心與中國政府從事於長期的戰爭」，是先後響應的。一方面表示著日本的侵華戰爭已到騎虎難下的關頭，另一方面表示日本侵略者準備拚死地橫衝過這個大關頭。於是日本政界行為的摩擦和激蕩，就在這

種要求下開展了。

第一件磨擦是右翼新勢力與既成政黨的大糾紛。二月十七日「防共護國團」數百人分別攻占「政友會」及「民政黨」的本部；三月三日「社會大眾黨」黨首安部磯雄為匪徒毆傷。這是右翼新勢力向政黨的進攻，不是末次內相所推諉而一般人所附和的「黨內本身的問題」。攻襲黨本部事件之發生，事前得到政府當局的諒解，所以內相末次成了眾矢之的。政黨議員在議會中公然指摘說：「防共團之暴行，據云和內相及某內閣參議（暗指秋田）取有聯絡，顯然是一部官僚企圖藉此壓迫政黨，以使動員法案得以通過，實在是政府的政治陰謀。」又毆傷安部主使者也只是右翼團體「風雲俱樂部」。據首犯萬年東一的自白，「認為社會大眾黨去年冬雖聲明轉向，但仍不徹底，故有予以嚴懲的必要」。這兩樁事件發生後，政黨員在議會上對政府大加攻擊，並逼內相末次負其責任。結果惹起右翼總帥的末次大將大發雷霆，要求內閣採取「適宜方針對付政黨」。對付政黨的適宜方針就是解散議會。這一場風波雖然因為末次「擔保帝都治安的安全」而告一段落，但是右翼勢力與政黨的磨擦已種下根基，右翼勢力是在日益加強了。

日本政界第二樁風波是總動員法案及電業國營法案引起的糾紛。這兩種法案在軍部法西斯主義是認為最得意的所謂「革新政策」的。但是當政府提出議會的時候劈頭即碰到政黨堅決的反對。政黨反對的理由是：（一）全國總動員法的內容大半可以依敕令行使而這種委任命令不獨無視議會的立法權，並且，蹂躪憲法第三十一條的非常大權，國民的自由也要被削減殆盡；（二）總動員法對於金融產業施以極端的統制對於財界及產業界的發展加以過度的壓抑；（三）總動員法第一條所規定施行動員時期中所謂「戰時或事變」的事變二字，缺乏明確解釋，若其事變的時候濫用非常立法則危險極大。至於電業國營法案，即在貴族院也曾經熱烈的辯論，議員松本丞治攻擊這案最厲害（三月八

日路透電），政友會及政黨則更以「官僚統制」為理由極力反對，最低限度也要大加修改，這是因為政黨背後的財界及電業資本家認為國家統制與他們的利害相反。這兩種法案經過兩個多月的長期糾紛及再三磋商，總動員法案經過部分的修改，電業國營法案經過更多的修改，始在軍部強硬要求及政府解散議會與右翼團體暴動的恫嚇之下通過了。政府及軍部與政黨及財閥之間的對立激烈可以想見。總動員法案雖於三月十六日通過眾議院，二十四日通過貴族院，電業國營案也於三月二十六日最後通過貴族院，但是眾議院方面齋藤（民政黨議員）、牧野（政友會議員），乃至池田、櫻井、植原等人的攻擊，貴族院方面土方及松本等的抨擊，已使政府及軍部感覺施政之棘手。特別是公子哥兒的近衛本人感覺最深刻，最不愉快。

近衛因處事棘手而萌退志，四月初旬遂稱病以示態度。近衛之去留，初在政黨各方面並無挽留的表示，一部分自由主義甚至於希望他及早去職。近衛本人及他的親友也都這樣相勸。只有軍部和右翼勢力，要近衛勉為其難。四月七日內相末次即希望近衛留職。四月十二日陸相杉山更進一步要求近衛改組內閣，並組織擁護政府的新黨。四月十二日中外新聞稱，軍部又通知政府，反對首相走職。同時軍部及其他各領袖皆力勸近衛打消走意。近衛到此時已經欲罷不能了，於是派文相木戶幸一往訪西園寺，聆取時局的意見以為改革政府的根據。四月十五日內相末次，法相塩野，及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等又先後往訪近衛，切實磋商。四月十六日近衛遂向閣員聲稱：彼並未提出走職。而四月十八日民政黨首町田在其重要演說中，希望近衛努力為國效勞。五月二日，近衛更決定改革議會制度，其範圍包括選舉制度、眾議院制度及貴族院制度之改革。近衛內閣加強的態度於此確定，而補強的腹案也從這時候逐步成就。近衛之留職及閣員一定標準的更動，在五月上旬即算定不易，遲至五月二十六日始完全表面化，其苦心孤詣，實非偶然。

二、軍事法西斯政權確立的經過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外相廣田與財相賀屋同時提出辭呈，近衛首相即予照准，並任命前朝鮮總督宇垣一成，繼任外相，前日本銀行總裁池田成彬繼任財相，前陸相荒木貞夫也同時被任為文部大臣。替代陸相杉山的板垣征四郎也已於六月四日就職了。此時近衛內閣的面目完全一新，雖然只是改組，但其實質則等於組織新閣。現在就其閣員的面目看，海陸軍人占五把交椅，並且都是重要的位置，頗有令人生軍部內閣之感。宇垣在陸軍方面自成一派勢力，財界及政黨也都相當倚重，去年組閣雖未成功，而其威重依然尚在。荒木與真崎在肅軍前是軍部的絕對勢力，此次被任為文相，將更發揮他的極端狹義的國家主義思想，總動員所謂日本精神。板垣的上台正足以增強少壯派軍人的力量而有利軍部所謂正統派政策之遂行。這些人將來的作為，正好和內相末次的狂妄配合，而對國內外推動軍事法西斯政策。財界巨頭的池田成彬此次毅然允許出任財相兼任商工大臣，當有堅決的新計劃，將必增強近衛內閣的力量不少，其將調和軍閥與財閥乃至政黨間的矛盾，是可以想到的。遞信大臣永井是主張電業國營的人，甚至欲以去留爭，其為統制經濟政策的意味，正與軍事法西斯獨裁互為表裡。厚生大臣的木戶也是近衛的親信，在近衛為軍部竭誠服務的心境，當不會有出入的意見。其餘各相如司法大臣鹿野、鐵相中島、拓相大谷，及農相大馬就無足重輕了。醞釀多年的軍部政府，到今日始完全實現，軍事法西斯政權也因戰爭而完全確立了。

但日本軍事法西斯政權的演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政權的內容也不只是軍部上層的意識。日本法西斯的活動，無論在朝抑在野都是用「革新」兩個字作招牌。所謂「革新」者也，至少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反對共產主義與政策，其二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組織。當然日本這樣革新只是為軍部、官僚地主及財閥的統治者張目罷了。日本「革

新」的歷史可以說開始於一九三二年「血盟團事件」及五·一五事件的當時。事件的主使者在法庭上公然提出「革新」的陳述。日本政府所加於血盟團主犯的判決書明言彼輩為謀「革正」及實現君臣共治，而企圖打倒政黨、財閥及特權階級等舊勢力。但另一方面他們則又以國家主義鼓吹者的權藤成鄉所著自治民範、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桔孫三郎的所謂王道國家建設論及大川周明的所謂國家革新論為其意識的內容。即其後的「神兵事件」也同樣持所謂「革新的理想」。日本民間右派的這樣「革新思想」及行動終為軍部及官僚統治者所利用，自二·二六事件發生後即以「革新」為各種政策指導原理。二·二六事變是日本上層政權一大轉變的關節。所謂革新的指導原理首次具體表現於廣田內閣的施政方針，同時日本的國家指導部也走上統制化的路程。當時代表軍部意識的寺內陸相聲明書的要求，是：「任打開這未有的時局新內閣，對於內外時弊的真正根本刷新及充實國防等積極的強力政策，須有遂行的氣魄和實行力，這是絕對必要的，決不能依然帶著自由主義的色彩，或專依維持現狀或消極政策而得妥協退嬰為了。所謂依積極政策以一新國政是全軍一致的要求。妥協退嬰不是收拾時局之道，反足使事態紛糾，具將貽大禍根於將來。不合於上述趣旨的內閣果能克服這貫通內外的時艱嗎？」當時軍部推進法西斯統治的氣焰是這樣咄咄逼人，幾經難產的廣田內閣也就不得不想依樣畫葫蘆姑且試試看。廣田在七大政策上就列行政機構的改革政策為首要。他在第六十九回議會上宣布施政方針，極力強調：「相信行政機構改革的目標在於適應時代的要求，俾便多舉實績。因此，當然努力於改訂應加改訂的各種機構，用以調節綜合社會情勢與機構之間所產生乖離之點，消除因制度固定所產生各種弊害。……全面地綜合地樹立一切的國策，使得有組織有計劃地實行，這是當前的急務，……」但是二·二六事變後日本政界的情勢，不容廣田對於這種支票全部兌現。廣田內閣當時成立的根據在於維持各方勢力的均衡和恢復安定的狀態。所以，以破壞均衡為前提的機構改革政策，到底不能

實施。這就是廣田內閣對於國家指導部的統制沒有成功的原因。

廣田內閣的國家指導部的統制政策，在一般上雖是失敗了，但卻在另一方面為軍部建築成功控制內閣的基礎，軍事法西斯就是在這基礎上更加健全地發展起來。這個基礎就是「軍部大臣現役制」的恢復，日本在二十五年以前就是實行這種制度，陸海軍部大臣非是現役的大將或中將不可，平常人不消說，就是預備軍人及後備軍人也都不能充任。這於軍部控制內閣是極有力的方法，明治末期的西園寺內閣曾經因為這種制度而不得不倒潰。當時陸相上原勇作主張增設兩個師團，事為閣議所不容，他即直向天皇辭職。其後因為軍部內部的統制，西園寺又不能在非現役的軍人中找得陸相，所以終不得出於總辭職一途。當時正值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走著上坡的時候，遂引起第一回憲政擁護運動，排斥軍閥的橫暴，而桂內閣終因這運動的壓迫而辭職，這是有名的「大正政變」。繼之又有山本憲兵衛內閣的再接再厲，終於在政友會的援助之下竭盡絕大的努力，好不容易廢除了這種制度。這種助長軍部統治的「現役制」的恢復，雖說是日本資本主義向下期必然的歸宿，但助其實現的卻是廣田內閣。「陸海軍部大臣現役制」的恢復，第一步就在廣田內閣倒潰，宇垣組閣的當時，發揮了軍部控制整個日本政局的威力。日本政界惑星的宇垣終因軍部拒絕派送陸海軍部大臣而不得不流產，其後的內閣都在軍部的指揮之下施行內外政策。

「革新」的字樣，到林內閣的時候更進一步被用於首相的政綱宣言上：「排矯激，戒因循，必斷行適合時世的革新」，「披瀝赤誠一意講究革新的方策」（去年二月八日的宣言）。林銑十郎組閣當初完全秉承軍部的意志，打算拉住財閥與軍部結托以降服既成政黨，滿以為只要這樣做去，軍事法西斯政權即可鞏固，庶不知日本客觀的條件還未完備，所以林內閣解散眾議院之後，雖有另組新黨的意志，欲擁近衛為黨首。不幸選舉的結果，政友會和民政黨的議席依然占壓倒的多數，遂逼不得不總辭職。林內閣當時的

革新意見，正與二·二六當時的軍部意見符合，軍部的意識是：「否定由占議席多數的政黨組織內閣的政黨內閣制。改革現在議會對政府的對立抗爭的制度，而以相互協力的日本精神為準據。」林內閣推進軍部法西斯政權的工作，可說心有餘而勢不足，終不得不失敗於政黨聯絡工作的不足而掛冠以去。

掩飾於所謂「革新」的名目下的日本軍事法西斯政權，到了近衛內閣才具備了確立的條件，各種「革新」政策才有真實施行的可能。這是由於中日戰爭的機會，近衛內閣為對付這種空前的難關，而向各方努力要求舉國一致，採用全國的戰時體制。所以近衛內閣自其成立以來，不但步步努力於政軍財之方面勢力的切實結合，並且不斷地向戰時體制的建造途上猛進。近衛內閣正好適逢其時，可以公然要求與政府為難的各方勢力服從戰時的要求、命令和施設。戰時體制的建築是一步步地完成，軍事法西斯政權的基礎也隨之而一步步地鞏固。只就目前說，政府不但可以左右議會（上述總動員法案，電力國營法案，及其他的許多法案之強制通過議會即其實例），許多太上內閣，或內閣指導機關的新設，已使政府完全聽命於軍事指揮部了。名為補強近衛內閣，實則加強軍事法西斯的統治。各種行政機構的新施設，隨著中日大戰的開展而日漸完備。近衛在七月二三日開幕的第七十一屆特別議會上即提出過「以事變為中心」的新方針。九月四日開幕的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上，關於此點又有熱烈的討論，引起了補強內閣的注意。近衛終於在「對外強硬對內協調」的標語下先改革了企劃廳為企劃院，增設內閣參議及大本營。

企劃院的出現，由於十月一日的閣議，雖說只是過去的企劃廳和內閣資源局合併而成的，但其性質則二者完全不同。企劃廳只是抽象的研究機關，即資源局對於軍需動員的推進也不夠用。但是企劃院則在「謀平時戰時國家行政的統一」，「謀國家總動員計劃的樹立和遂行上的調整（據其組織大綱）。其組織設總務、民生、產業、交通、財政及調查，雖是贊助內閣的機關，但對於政治的及經濟的統制卻有集中的力量。企劃院設

立的另一面意義就是軍部所要求的「統制強化」，可以說是「國策樹立遂行之綜合的統制機關」了。自二·二六事變以來，軍部即要求著改革行政機構，設立強大的統制機關，以便否定政黨內閣制，消除議會對於政府的牽制。這就是設立內閣調查局，又由內閣調查局轉為企劃廳，再由企劃廳轉為企劃院的由來，而軍事法西斯的統制政策一步步進展了。

其次是內閣參議的設置。企劃院雖可以補強內閣但尚不足以指揮內閣，還不足以滿足軍事法西斯更集權化、更統合化的統制機關的要求。於是第二步就設置不處於「內閣總理大臣管轄之下」（企劃院的規定）而於內閣指導地位的內閣參議。「臨時內閣參議」制度是在十月十三日由樞密院正式可決，而於十五日公布後成立的，其任務在「參與內閣籌劃工作」（條文第一條），內閣參議官受國務大臣的禮遇（第二條），其構成點的分配，是由軍部選送四名，政黨選送二名，財界二名，外交界一名，無所屬一名。現任參議事是宇垣一成、荒木貞夫（陸軍）、安保清種、末次信正（海軍）、前田米藏（政友會）、町田忠治（民政黨）、鄉誠之助、池田成彬（財界）、松岡洋右（外交界），及無所屬的秋田清。觀此陣容，可知軍部及政府的用意在於包羅萬象。

第三出現的是太上內閣的大本營。內閣參議制雖則增強軍部的力量不少，但究竟不是一個純粹獨立的集權機關，還不能充分適合軍部更集權化和更統合化的要求。在中日戰爭日益擴大的今日，軍部所要求的是一方統轄軍事一面壟斷政治的最高統治的主體。於是中野正剛九月四日在第七十二屆議會上提議，大本營的設立，十一月十六日的閣議即便可決，十七日晚由海陸軍大臣上奏裁可，而於二十日正式成立了。依新大本營的條令，新大本營是天皇大勳之下的最高統帥部（第一條），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各為其幕僚之長，任仕帷幄機關，參劃策戰，稽終局之目的在謀陸海兩軍之協同策應（第二條），這個條令不但適用於戰時，並且適用於「事變之際」（第三條）。新大本營的組織是把參謀部及陸海軍兩省人員全部統合在一起，一切的軍令、軍事動員，及軍事編制

全部統一於這個最高統帥部。特別重要的是「使平時陸海兩省各自分掌著的統帥關係一元化」（大本營成立當時陸海軍當局發言人的談話）。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各種新聞的解釋。東京日日新聞說，「這次所要設立的大本營……必然地須扼成政治、外交、經濟及思想的總動員……可以看做躍進的日本劃期的紀念塔」（十一月二日）。日本自由主義者的宮澤俊義也說：「大本營的設置決不能單純地視為參謀本部（陸軍）與軍令部（海軍）一時的合併，實在是統帥部對行政部關係的強化，統帥部處於實際政治上的優越地位。更就政治體制言，這是含有以統帥部為指導的勢力的集權化、統合化的作用」。軍部指導部統制化的要求，到此時算具備形體了。

但是國家指導部統制權的行使，脫離內閣而處於超越的地位，就實際言到底不如在內閣本身上謀完全變質之為愈。由內閣以外的一個軍事法西機關來統制內閣，倒不如內閣本身完全軍事法西斯化，對於軍部的統制來得便當，來得有勁。於是軍事法西斯政權仍然不忘於內閣的改造，這又是這次近衛內閣大改組的動因。在一個弱體內閣中配以五大員強硬的海陸軍人，其陣容已無須詳細考慮，也可明瞭這個內閣性質之為何了。近衛新內閣的閣員，上面已經介紹過。這裡總括一句話，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政權不但隨著戰時的擴大而日益增強，軍事法西斯內閣也漸漸完成了。以善於適應的近衛文麿當此內閣的首相，即是說現在日本內閣已經完全戰時內閣化，完全軍部內閣化，也非過言罷！此後日本政界的問題或將展開一個一黨運動的新形勢罷！

近衛內閣改組與今後動向

一、局部改組的原因

喧嚷很久的日本近衛內閣總辭職的問題，現在竟以部分的改造了事。這於一般人或許是一樁奇怪的事情，但自問題的本身考察，卻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在日本軍事法西斯政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今日，打著燈籠找遍日本全國再也找不出一個比近衛文麿還合適的首相。這不但是因為他有那高遠深刻的政治評論家的條件，並且是因為他有那不堅決好商量的實行家的弱點。在對外戰爭的時候，日本侵略者總是要求所謂「舉國一致」的政府，按諸過去中日戰及日俄戰當時的事實，政黨及議會是對政府讓步的。這次日本議會對於全國總動員法案、電力國營法案以及其他許多法案照樣通過，也是證明了同一步伐。所以近衛內閣容易穩定。同時，近衛又能盡力服務於軍部，折衷周旋於軍部、政黨與財閥之間，所以軍部也自樂於利用。出身貴族為唯一元老的西園寺公所眷愛的近衛文麿當然可以安定於首相的交椅了。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局在今日擴大軍事冒險的情勢下，在對華戰爭日益棘手國內財政經濟日益艱難、外交政策硬軟皆非的當前，卻又不是一個八面玲瓏的「弱體內閣」所以可以擔當這個空前的大局的。近衛內閣雖然通過了第七十三回議會的難關，但是它在所謂非常時的「革新政治」的強烈要求下，此後還須繼續更多更艱難的苦鬥，解決許多更根本的問題。例如貴族院的改革、選舉法的修改、行政機構的改革，乃至任用令的改革等問題，都是近衛內閣改造前的弱體所不容易勝任的。斷行貴族院的改革則與貴族院

直接發生衝突，修改選舉法又須與既成政黨起一大衝突，若再實行改革行政機構或改廢任用令，則更須與官僚大本營的樞密院相周旋。再如對華侵略戰爭中的日本外交也陷於硬軟皆非的苦悶中，也是需要一確定而有力的新方針的。究竟繼續排英好呢，抑或強行對蘇聯的軍事冒險好呢？「日美親善論」乃至締結日美互不侵犯條約的夢想，既是一場單相思，對蘇軍事冒險，又無十分把握，那末日本外交不能再長此下去了。這也是近衛內閣所以不得不求補救而必以宇垣易廣田的原故。

日本軍事法西斯現政權竟以年來軍部所排斥的宇垣大將任外相，而驅逐了二·二六當時出任時艱切實履行軍部所提所謂「革新」要求的廣田，似乎也是奇怪的事。但是我們要認清兩點：其一是廣田外交的過渡性，其二是宇垣的軍人政治家的本質。廣田本人在日本內閣的地位只有由準戰時的階段過渡到戰時體制的階段，其本人的外交方針不是以適合狂妄的軍事法西斯戰時的要求的，所以縱令他是近衛的好友也終於不得不讓出外相的交椅來。至於宇垣一成呢，他雖然曾經開罪於軍部，但其原因只在他和政黨勾結以與軍部摩擦而已。若其外交的方針，我們相信必不會與軍部有多大的出入。這就是去年這時候宇垣不能組閣成功而卻在今日被請出任外相的主要原因。

二、改組後內外政策的動向

日本內閣這次的變動雖只是局部的改組，但其意義之重大則等於新閣之成立。改組後近衛內閣的容貌完全一新，新舊閣員的背景完全調和起來。近衛內閣經過這次的改組，而其軍部的意識形態將隨其軍人內閣化的外貌而愈益增強。所以此後近衛內閣施政的內外方針將有一種新的發展。對於近衛內閣此後內外政策的動向，我們可以從其國內政權的方面、中日戰爭的方面及日本外交方面來概括地加以分析。

(一) 軍閥政權的強化

這次近衛政府以宇垣一成長外相，以荒木貞夫長文相，以池田成彬長財相。今日的消息又傳：確定以板垣征四郎易杉山陸相。新內閣第一次閣議聞將合併大藏省及高二省為經濟省而以池田成彬任經濟相，是又一身而兼兩相。日本內閣最主要的位置可說全部易人，而這次更易的方向卻是和軍部的要求一致的，是和留職的諸相配合的。近衛內閣是在向加強的途程努力，它又是在竭力謀以適應軍部的政權的，換一句說話，也就是在向軍事法西斯政權的前途奔進。近衛文磨去年組閣的最大任務，是在於調和軍部、政黨及財閥的三大勢力。若在平時，近衛內閣初次的陣容或即可以發生作用，但在中日戰爭的今日，近衛內閣即令不至於總崩潰，但也難免過於孱弱不能支持這非常時的大局。所以近衛內閣成立不久即有第一次的改組，這次又來一次更積極的改組。而其改組的方針都是在適應軍部的要求強化軍事法西斯的支配的。第一次改組吸收了末次及木戶，這次改組又吸收了宇垣、荒木、池田及板垣，其動向更顯明了。近衛內閣中已有五個海陸軍人，一個財閥的代表者，宇垣一成又集政黨及財閥的屬望於一身，這是應加注意的一點。

(二) 侵華戰爭積極化

在軍事法西斯政權日益膨脹的情勢下，日本對華的方針是更加強硬的。英國各報評論日本內閣這次的改組為欲以宇垣大將的威力「阻止少壯軍人干涉日本外交事務」，似乎是在說此後日本的外交將有一程變化，乃至改變對華的態度。這是不正確的。日本政府在任何對外戰爭時期，總是各黨各派化除成見得成立所謂舉國一致內閣，以完成其侵略，何況軍部各派的對立，此時更是不成問題的。宇垣過去雖曾以一派軍人的領袖與少壯派對立，但是這次的被吸收入閣，並不是要用以抵制少壯派，而是在於接受少壯派的

主張，運用他的手腕融合各派，使對華的侵略行動更來得順利與有效。我們如果再就荒木貞夫、池田成彬及板垣征四郎的入閣考察看，其動向更為清楚。板垣是少壯派軍人的首領之一，其入閣的意義只是補強了杉山的老弱而使少壯派的軍事行動更來得有勁罷了。荒木貞夫是個大陸政策暴論的積極倡導者之一，他的狹隘國家主義思想反侵略主義軍國主義的精神，遠勝於末次大將。他之長文相的意義只在於推進日本全國精神總動員，把人民反戰的思想壓制下去，使日本沒有覺悟的人民絕對為軍閥所驅使。池田成彬之入閣也只在說明日本帝國主義此後對華侵略更要積極化。日本侵華的第一難關就是財政的危機及政黨財閥的不積極贊助政府。在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的當時，因為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向上期，所以「舉國一致」的情勢容易成立，但在今日情形就有點不同，所以在中日戰爭進行已將一年的今日，雖經近衛後方的折衷周旋，政黨和財閥仍未見積極支持政府的方針，甚至許多議員還在議會上抨擊政府的作為。雖說第七十三屆議會通過了全國動員法案、電業國營法案，及其他許多有關戰爭的法案，但是此後這些法案的實施，更要遇到更艱難的關頭，需要更大的努力。池田為實業界及財界的代表者，他是財閥巨頭三井的掌櫃，他還為一部分政客所倚重，他的入閣將於弱體的近衛內閣解決不少財政上及經濟上的問題。即如宇垣一成之入閣也有調和政府與政黨及財閥的作用，因為多年來在動蕩的日本政界，宇垣頗得大部分財閥和兩大政黨的擁護。這些條件都是愈加增強日本軍閥對華的蠻幹政策的補品。這又是我們對於日本內閣改組應該認識的另一點。

(三) 外交政策強硬化

近衛內閣改組後的日本外交方針將必竭力破除從來的苦悶，將以積極強硬為此後外交的方針了。廣田前外相原與近衛友善，並且在二·二六事變後曾經替近衛出任撐持了危局，作了近衛的先驅，但是今日竟為素來見惡於軍部的宇垣一成所代替。但這是日本

外交新動向產生了這樣必然的結果。因為廣田外交只有過渡的作用而絕對不能完全滿足軍事法西斯的外交要求。某大報的社論以為廣田之失腳原因在於「圓滑投機之性能，迎合少壯派之意旨」；並以為他的作為「胥為倭元老重臣及一般民眾所痛惡」，這不見得合乎實際。廣田的失腳由於他那過渡性已經失了作用。在數月前廣田還唱著調和日本與各國的關係的論調，甚至於主張調整日蘇的關係。但是在日本軍事法西斯積極侵華的過程中，日本和其他各國的關係是無法友善的。特別是在日本軍部認為對華軍事的失敗完全由於蘇聯、英國及其他各國的援助的今日，日蘇關係乃至日英關係只會日益惡化，日本對蘇聯只有很自然地採取積極進攻的方向。又有人以為宇垣之得長外相是因為「宇垣之對外主張向倡南進而重視經濟發展，對於北攻蘇聯以引起無勝利把握之戰爭，不欲嘗試」，也只知其片面。日本軍部的大多數有力者主張進攻蘇聯，宇垣必不會反對「北攻蘇聯」而被吸收入閣。宇垣這次入閣除了調和各派融成所謂舉國一致的局面之外，對外就是適應當前法西斯軍閥更大冒險的要求，以更有力量更強硬地推進外交政策。歐洲的法西斯侵略者，正在瘋狂地進行著他們的軍事冒險，並且步步得到英法的讓步，節節不費勁達到了目的，加入「反共協定」的東方法西斯主義者眼看著西方法西斯主義者的冒險步步成功，非常的眼熱，更加增強了它的狂暴性。此後日蘇關係及日英關係的演進是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的，然而在德意先後承認「偽滿洲國」，德國外交部更又召回駐華顧問團的今日，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的外交動向，也已確定了的，東方的法西斯侵略者或將響應西方的法西斯進行更高更擴大的國防的軍事冒險。

三、我們該如何對付？

然而我們對於近衛內閣這次的改組，不但要深刻注意，並且要採取積極的防備。中

日大戰在日本政府的軍事法西力量加強的今日，更是新法妥協了。近衛內閣的補強就是為著這個新法妥協的原因。宇垣可以阻止少壯派軍人而使戰爭即速結束的看法，未必可靠。日本帝國主義是要以加強的軍事力量使我國「屈膝」的，而我們就只有更廣大更周密地籌劃辦法，來對付此後更擴大的局面了。無論敵人只在我們身上作更大的軍事冒險或更進一步和其他的國家同時作更擴大的軍事冒險，一切的一切都要歸結到我們身上來。我們需要更徹底的覺悟，及更周密的建國大計。我們要在抗戰中建設新中國，同時也要在現代國家的建設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完成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和平等。

實則，近衛內閣這次的改組，固然一方面是補強了日本政府的力量便於更強硬地侵略中國，但是另一方面也足以證明日本侵略者的弱點已經暴露出來了。第一，近衛內閣這次的改組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力量的脆弱。日本侵略者容易「征服」中國的預期完全落空了，所以才有補強政府力量的必要。但是這一補強只能使日本軍閥在一定的限度內加速使用力量罷了，例如池田經濟相將更要加強壓榨日本大眾，其結果適足以促進日本人民反戰運動及反政府運動開展。第二，近衛內閣這次的改組證明了日本統治者內部及其與人民的矛盾的尖銳。因為財閥及實業家還不能積極支持政府的政策，所以強拉池田成彬入閣。因為政黨及財閥還有反對政府的政策的，所以軍人政治家的宇垣大將才和池田一同入閣。又因為近衛政府去年冬發動的所謂全國精神總動員未克發生效力，日本人民大多反對這侵略戰爭，所以抬出「日本精神主義」大帥的荒木貞夫來。更因為日本侵略者內部的對立阻礙少壯派軍人蠻幹政策的遂行，所以確定了板垣代替杉山陸相。但是這種調和將因對華侵略戰爭因擴大而增加的困難，及日本與各國不可調和的國際孤立關係達到更尖銳的對立。單就侵華的路線言，目前即已分成三派，互爭雄長：其一，內閣及畑俊六主張進犯武漢，其二，關東軍主張西侵陝甘；其三，海軍派則主需南犯以奪取太

平洋戰爭發生時的伏勢據點（據《掃蕩報》五月三十日香港電）。我們可信近衛內閣這次的改組，將因對華戰爭的挫折而完全崩潰。

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時事月報》第十八卷第十一期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在成千上萬的名詞當中，意義最含混，最矛盾的，莫過於現在通行於日本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所謂「革新」。什麼「革新主義」、「革新思想」、「革新運動」，乃至「革新派」等等，充滿於雜誌及報章上。但若從字面來玩味這兩個字，就無法理解它的本義。在右派勢力狂暴發展的今日，日本所謂「革新」，差不多可以和右派一切的玩藝兒聯在一起。「革新主義」就是「日本主義」；「革新思想」就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思想」、「侵略的軍國主義思想」；「革新運動」就是排斥左派及自由主義者的保守運動，「革新派」也可以和「國粹派」及「保守派」打上一個等號。在這種現實之前，即連占日本國家主義者一派指導者交椅的林癸未夫，也都不能不承認：「革新派在某種意義上，不但是國粹主義，甚至於是復古主義……」，而拒絕某雜誌問題「讚美日本主義」的徵文（據《日本評論》五月號）。

因為這個緣故，所謂「革新派」的人物，也極其龐雜，上自政界，下至實業界和民間指導者，蔚然大觀，極盡光怪陸離的情景。現在要談這一派人物（其實在右派侵略者狂吠的今日，革新派也不是獨成一派的），也只能選出幾個主要的來簡略論說。我們也只能就其行動作簡單的介紹，至於「革新主義」的深入剖析，及「革新運動」的有系統敘述，則又須另闢專題來討論。

一般的所謂「革新主義者」，是指那些既不是社會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而只浸淫於帝國主義、右翼主義，對外強硬主義的人們而言的。在這意義上，我們首先要推崇狹隘國家主義者的現任內相末次信正了。他之被指為所謂「革新派」，不是今日始，早在他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時代，即已膾炙人口了。當時，他常發出「美國不足畏」的

豪語，他對於政治改革的意見，常為主張維持現狀的重臣所不寒而慄。自中日大戰爆發後，他隨日本政治機構的增設而出任內閣參議時，更大放厥詞，說：「即與英國一戰，也在所不辭。無論香港怎樣鞏固，在我空軍所到地方，將成完全無用」。末次是這樣富於排外的誇大狂者，而右派皆支持他，所以在他大發狂言的三天後，他即被近衛請去當內相。他這排英的精神，大引起歐美各國人士的注意，他之被請為內相，完全是弱體的近衛內閣欲利用為所謂「革新政治的推進力」的用意，所以他就職後第四日，即對日本無產黨大加壓迫，實施人民戰線派的檢舉，其鋒芒且及於自由主義者，以後日本的大檢舉事件連續發生，直至於今日。當時一般稱之為「革新時代」之到來。即連民政黨及政友會外圍組織的防共護國團暴行占據兩黨本部的事件，也是這位內相暗中指使的，所以很受議會各派激烈的攻擊。然而那樣抱著徹底「革新性」的末次，也終於扳不過現實。決心振奮「日本精神」的末次，卻不能斷然取締被認為頹喪大本營的跳舞場，倒反為舞女辯護，在野時代的強力政治，即其傾向也都無從認出。第一個強力的革新人物，也不過如此。不過，長州軍人的強蠻及海軍觀念急進派的特色，依舊在作祟著。最近共產黨檢舉之厲行，無非是他那強暴性的表露。

現在掉轉頭來，在純粹的政客當中找所謂革新派，那末中野正剛，可算第一個。他是一個徹底的革新主張者，自從去年赴歐洲會晤希特勒及墨索里尼以後，他的法西斯思想，更加尖銳化。在中日大戰前，政府及政黨，由他看來，甚至於連軍部也都還在固守著依賴歐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卻在四五年前即已一貫地反對追隨歐美的外交方針，提倡抗英的外交。中野可說是一個激烈排外的革新者。中野不但理論是飛躍的革新，行動也是飛躍的革新。大家都預料著：若有「革新黨」出現，那末先登台的一定是中野正剛。

另一方面，松岡洋右卻是右翼分子的景仰者，他在出席國聯以前，集軍部各派的支持於一身的時候，即已被數為右派的巨頭之一。他在辦理脫離聯盟手續上，色彩更加鮮

明，歸國後奔走於政黨解散運動，立場遂大確定。當時的政黨嘲笑松岡的消滅政黨思想，但是現在的政治現實，卻照他的預想進展著，他的預言竟不幸而中。松岡洋右是現在南滿鐵路公司的總裁，他計劃將日本的重工業移植於滿洲，他還在陰謀開展華北，可以說是一個對華經濟侵略的急先鋒。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軍部和財閥都相當器重他，他的革新思想將在日本上層起相當的作用。

二年以前曾經轟轟烈烈地發表過革新理論，而現在不得不沉默的久原房之助，也值得略為一說。久原是日本二·二六事件的關係者，以前極力主張過「皇道經濟論」，及「一國一黨論」，但自得參與二·二六事件的嫌疑以來，即持謹慎的態度。他今年已經七十歲，當此右翼勢力膨脹的今日，也未必有東山再起的可能。

日本議會方面的革新者也有幾個，眾議院的江藤源九郎和貴族院的三室戶敬光及菊池武夫，就是代表者。江藤是個陸軍少將，是軍人出身的代議士，他現在是以某個國粹政治團體的理事長，發揮著右派主義及行動。三室戶敬光及菊池武夫的革新性（實際上也就是保守性或復古性），特別可笑。他們是主張熟讀古書的人，不管什麼書，只要是古的，就必須讀，他們甚至於連文字的使用和書法當中，也要貫徹他們的「國體明征主義」。

日本外交界也有一二個可稱為革新派的人物，前駐瑞典公使白鳥敏夫就是。白鳥自己已宣言他是革新派，所以老早即以強力的右派外交家著名於世。他曾經在英文《現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三月號上發表一篇論文《法西斯主義與人民陣線》，極力讚稱法西斯主義，攻擊民主主義。他甚至斷言：「民主主義，究其本質，即是共產主義」，似乎有點近於開玩笑，但他現在卻已是日本霞關（外務省所在地）的強硬柱石了。他排斥依賴英美的所謂弱體外交，他有手腕，有機略，同時脾氣非常奇特。有一次在外交官的宴會上，竟因小故飛啤酒瓶打自由主義者的前駐土耳其公使的小幡。中日大戰爆發後，他的「革新」外交更加交了好運。他現在積極活動於我國的南北各地，是值得注

意的。革新派的外交官，還有一個值得一述的，就是偽滿洲國外交官的大橋忠一。現在偽滿洲國對外的方針和措施，幾乎完全握在他手裡，就說是偽滿洲的太上皇也無不可。

現在考察一下實業界的情形。要在實業界尋覓主張修正資本主義，排斥財閥的「革新派」，似乎有點滑稽，但是實際上卻也有幾個站在對外企業的立場上表示強硬的夥伴。第一個我們應舉津田信吾。津田原是自由主義資本家曼乞斯特派武藤山治的「乾兒」。他之變成「革新派」，固由於武藤之死，但也未免有點奇突。他是在由英日棉業戰產生的日印會商的當時，突然變成了強烈的國家主義者。一九三二年日印會商的時候，他一變其拜英主義的面孔，而痛擊日本外交界之軟弱，主張對英強硬，直至今日依然堅持著他的主張。因為「革新派」就是侵華主義者，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發生，當時政府，財界，乃至軍部的一部分主張「現地解決」、「不擴大主義」的時候，這個傢伙的態度卻完全兩樣，他在事變的第三日即向全國的工場宣傳事變的擴大必然性，並促他們覺悟。以後又繼續執筆寫《華北經濟的展望》、《列國干涉與中日事變》、《需要中日全面的決戰》及《國民殉國是奉公，是我國民的覺悟》等煽動的論文，他特別狂喊：「百億軍費不足畏」，儼然是一個軍部的代言人！他還把年來的抗英言論再三應用於這次的事變中。他還提倡在華北確立日本的棉花國策及羊毛國策；主張於纖維工業以外，還進行多角的經營，大倡其「為國策不計損益」的假慷慨論調，大拍軍部的馬屁。

其次，還可以舉興中公司社長的十河信二來說。十河的活動方式，和津田信吾有點兒不同。他的「革新」行動的據點，安置在日本政府上，是其以實業家活動方式的特點。提起興中公司不過是滿鐵公司的子公司；以前說到十河信二，即連新聞記者也都少有知道的。他之成了記者的常識，是林銑十郎組閣的時候起，當時十河是林首相組閣本部的參謀。普通組閣的參謀都是由政客或官僚充當的，而十河卻以實業家而當了林大將的組閣參謀，一般人皆吃了一驚。但是當時十河是以關東軍及軍部一部分強硬派軍人為背景，

企圖強行所謂革新政策。他曾經企圖以陸相交椅授板垣，海相交椅授末次，欲林銑十郎迫當時的軍部承認。但是軟弱的林銑十郎的提議，完全為寺內駁回；在林銑十郎倒無所謂，氣憤的是十河，認為「這樣的弱體內閣不足與謀」，憤然離開組閣本部，據說從沒有再見過林銑十郎。這個傢伙態度的強硬和侵華的急進，竟然實現在今日，板垣當了陸相，末次更是當了內相。他現在專以華北為活動舞台，興中公司將成了積極經濟侵略的大本營，是無可疑義的，這個傢伙的「革新」動向，更是值得注意。

日本政界及實業界都有元老，「革新派」也難免俗，頭山滿就是大家周知的革新派大元老，而山本英輔及一條實孝，也幾乎和頭山滿齊名。頭山滿這個老頭雖不很說話，也不常演講，但凡有右翼的愛國主義的集合，總是少不了他，他總是以他那緘默沉著的姿勢出席，所有右派的活動，也莫不抬他出來。山本英輔及一條實孝也和頭山滿一樣，凡有國家主義的集會，也總必有他們的份，他們也樂於和右派團體發生關係。頭山早在明治初年，即已組織過玄洋社，鼓吹日本的國粹，後又設立國權黨，刊行《福陵新報》，提倡帝國主義，各方稱之為「浪人元老」。山本英輔是山本權兵衛大將的後裔，是海軍大將，時常發表強烈的革新政治論。一條實孝是一個公爵，以公爵之身而倡革新，近衛文麿可說「德不孤」了。

日本少壯派軍人，可以說全部是「革新派」的人物，不過因為「軍與政分離」的關係，他們很少說話和行動的機會，只有退伍軍人是例外。退伍軍人以右派運動指導者著名的，就是建川中將。九·一八事變後右轉的赤松克麿，聽說即常奔走於建川門下，其次，以軍人資格而作右派政治活動的，還有橋本欣五郎大佐。記得前年我們還可以在東京各車站站的賣店櫃上，到處發見大紅封面的《大日本青年黨》的宣言。署名領導者就是這位大佐建川。在中日大戰爆發前每有演講會及座談會，總必發揮他那右派的怪調，現在不知何故，據說已少聽到他的消息了。橋本大佐曾被召參加炮兵隊，來中國作戰，

去年在蕪湖轟炸美艦巴納號，就是他幹下的事，因此他又被召回國了。

談日本革新派的人物，原應再加詳細介紹革新派理論家，如北一輝、權藤成卿、安岡正篤、桔孝三郎、大川周明以至大學老教授的蓑田胸喜、小說家的倉田百三等人，但是為篇幅所限，只好留在另篇來詳述了。

原載一九三八年七月《世界知識》第八卷第二期

戰時日本社會危機的發展

一、黑暗的日本社會生活

有一個法國作家（Laudelarrere）遊歷日本回國後著寫論文指稱日本為「永久封建」的社會。這個形容詞以科學的觀點說，固然不正確，但自其形容日本人民的貧苦之點說，卻有他的準確性，其意義就是說：中世紀黑暗的社會狀態，還很濃厚殘留在日本社會生活上，並且不是最近的將來可以消滅的。日本社會研究專家山田盛太郎也指日本的勞動狀況為人間地獄的工人生活及印度殖民地以下的勞動條件。（據《日本資本主義的分解》）蘇聯的日本問題專家薩伐洛夫對於占日本勞工大多數的農村女工，指稱為妓院式的賣身式的勞動者，更可以印證上述法國作家所言非無根據。

日本人民的貧苦到了對外作戰的時候更要深刻化。九千多萬的日本民眾（包括一千七百多萬的朝鮮及台灣民眾）在戰爭繼續一年後的今日，已被重重的重擔壓得喘不出來，氣息，被種種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了。戰費的巨款遠非日本統治者在戰前所夢到的，更非日本人民所能擔負，物價的高漲和收入的減少，正是夾攻一般日本人民的兩把刺刀，租稅的加重更使他們一陣陣地叫苦。日本軍閥政府屢次全國性的逮捕和所謂全國精神總動員的實施，也要使日本民眾精神苦悶、頹喪以至於窒息。現在日本文化界已經奄奄一息，毫無生氣了。

但是日本民眾在事實的教訓之前是要覺醒的，他們有一部分不明瞭戰爭之意義，不能積極支持侵略戰爭，有一部分已經覺悟侵略戰爭之非理且於他們無益而積極起來反對

侵略戰爭了；覺醒的日本人民大多數已經奮起企圖以實力來掙斷侵略戰爭所加於他們身上的鐵鏈了，前進的知識分子起來領導並鼓吹反戰運動；工農階級及士兵則已開始反戰的實際行動了。朝鮮及台灣的反戰運動更帶上民族革命的深意。日本侵略者，開始挖掘著他自己的墳墓，而其人民的反戰運動就是準備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了。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說得好：「法西斯主義者繼續打仗吧！……他們粉碎成為微塵，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吧了。」

二、侵略戰爭的重負

侵略戰爭所加於日本人民最大的重擔就是巨額軍事費的負擔。在平時日本軍費即在國家歲出總額當中占很大的比重，近年來占了將近一半的比率。對我全面的侵略戰爭發動後因為所謂「對支事件費」的激增及新設，而軍事費一次增至六十一億餘元，而間接軍事費還不計算在內（一九三八年度包括特別軍事費和普通軍事費）。單就侵略戰爭的特別軍事費言，即已達七十四億元（包括去年度半年份的二五五，〇〇〇萬元，及本年度的四八一，〇〇〇萬元）。到明年三月底止，日本人民所負擔侵華戰爭的特別軍事費，每人平均要負擔到一〇六元之多，單就一年份的全部軍事費言，每人平均一年要負擔八十七元多。日本人民的負擔還不獨限於軍事費，行政費也是可觀的，一九三八年度日本的普通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軍事預算共計八三六，〇〇〇餘萬元，這樣一來，平均每人一年的負擔額達一二〇元有餘。反過來看日本人民負擔的能力如何，實在非常薄弱。日寇的國富只有三千億元，僅及美國國富八分之一，即以日本內地人口七千萬人計算，每人只分得一千四百餘元。每年國民所得的總額也只得一百億元，每人只分得一四〇元，僅及英美人十分之一。日本人民以這樣貧窮的財力負擔上述過重的負擔；每一個人每年

只剩下二十元可用以維持生活。日本人民的生活怎能不低下，怎能不痛苦呢！

日本政府加負擔於人民的方式有兩種：其一是增加租稅，其二是濫發公債。自從全面的侵略戰爭發動以來，日本政府對於人民的課稅即漸增加，單就一九三八年度言，在普通預算及特別預算中，租稅收入之項則是二十二億元。每人平均負擔三十一元，連地方稅加算上去，則每人至少要負擔四十元，關於公債之項，日本人們的負擔更為奇重，其影響且不只限於現代的日本人，即其子孫的膏血也都準備著吸吮了。日本公債截至本年六月十五日止總額已達一三七億元，每人平均負擔一九六元許；到明年二月底截止，預算日本公債鬚髮至二百億元，每人負擔二八六元多的巨額。日本人民的子子孫孫將永為債奴，已故日本財相高橋是清的《百萬公債亡國論》或將證驗於未來罷！（以上數字均據國新社特稿）

然而日本政府濫發公債在目前即已加重大的負擔於一般人民的生活費上，那就是物價的高漲。日本政府無窮盡地濫發公債，但另一方面消納公債的能力卻非常薄弱。去年一年國家收支短缺很多，原擬發行三三九，四〇〇萬元公債來彌補，後以擴充生產力需要資金及金融市場硬塞的結果受了極大的限制，結果只發行了十五億元。而這十五億元的公債也只有日本銀行銷售了二八，七〇〇萬元，由銀行團攤派一億元，郵局又零星推銷了六千八百萬元的愛國公債，共計四五，五〇〇萬元，所餘的十億多元則皆存於日本銀行的金庫裡（據對敵宣傳委員會資料第一輯）。侵略戰爭逼著日本政府增發公債，上面說過，到明年二月底止日本公債將發行至二百億元，這個巨額的公債的絕大部分，當然還是要日本銀行來消納。日本銀行就利用這些公債作準備金不斷地發行紙幣，於是紙幣的流通額超過市面的需要，再加以紙幣準備金基礎的動搖，而幣價大跌，物價高漲。

日本侵略戰爭所以加於日本人民的物價負擔不自今日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

變年)至一九三五年一般人民的生活費增加了三四% (據《時事類編》特刊創刊號拙作)，全面侵略戰爭發動後其物價上的負擔更加逐步增高。據日本銀行的調查，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物價的高漲情形如下：去年八月九八·三，九月九九·九，十月九九·〇，十一月九九·五，十二月一〇一·〇，本年一月一〇二·七，二月一〇四·四，三月一〇五·三，四月一〇三·三 (去年七月為一〇〇)。三月以後似稍跌落，但這是受人民購買力減低的一時的影響，事實上日本十三都市四月份躉售物價，卻比二月份再高了〇·七% (據日本商工省發表)，五月份的出售物價更上漲了一·八 (據東京商工會調查，一九三〇年平均為一〇〇)。但是日本物價截至今日的漲價還不算厲害，準備增發的公債發行後其漲風當更可觀。侵略戰爭給與日本人民的影響將如何慘苦，是任何人現在所形容不出的。

三、日本人民的反抗運動

在侵略戰爭加重的種種剝削與壓迫之下的日本人民，厭惡戰爭，咒罵戰爭，甚至於奮起反對戰爭，反抗窮兵黷武的軍閥，自然是事理中的事，日本人民上自知識分子下至工農士兵及殖民地民眾，大多浸潤於厭戰與反戰的思想中。他們的一部分勇士已經起來實行苦鬥了。日本有覺悟的人民寫過不少反對侵略戰爭的論文，而包含日本所有的職業會社、勞工組合、農民組合、宗教團體及其他一切的反戰組織的日本反戰人民陣線所提出的要求最為乾脆扼要，現在介紹於下：

(一) 保衛和平，立刻停止對華戰爭，撤退在華的日本軍隊，尊重大中國的獨立，與中國人民樹立真正的友誼；

(二) 反對擴大軍備和增加軍費，擁護裁軍，減少並移用軍費及其預算於救濟事業上；

(三) 粉碎「戰爭是創造之父」及「戰爭是文化之母」的理論，要求保障個人權利、出版、集會、演說等自由。

日本人民的反對侵略戰爭不但提出要求，並且為爭取所要求的事項的實現而實行鬥爭了，日本的左派分子及自由主義者因為反對侵略戰爭而被逮捕了多少次了，日本工人因為反對侵略戰爭而屢次發動罷工和怠工運動，農民也和工人配合暴動了幾次。去年普遍於東京、大阪、京都、愛知、靜岡、兵庫、岡山、新瀉、福島、和歌山、秋田、岐阜、大分、富山、群馬、長崎及北海道等一道三府十六縣的大逮捕，今年二月十八日死傷數百人逮捕一千多人的士兵和家屬的大騷動，中日大戰爆發不久神戶海員工會罷工的醞釀及新瀉近郊丸新製油所的焚毀，二月中旬東京重工業中心即川崎和□住士兵的嘩變，等等事實，都是日本人民實際反戰的證據。反戰運動更是風行於台灣及朝鮮兩地，台灣民眾懷念祖國心切，朝鮮民眾要求獨立的情緒更高，這兩地的民眾都和我國取得密切的聯絡，以實行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鬥。今年三月三日台灣工人領袖高斐在宜蘭襲擊日本司令部，約略同時台灣共產黨暴動炸毀久留米儲油池，及樺社（編按，應為「花崗」）一郎兄弟領導霧社番人的暴動，都是我國關係方面聯絡台灣革命黨人發動的，即如我國英勇空軍之轟炸台北的日本空軍根據地，也是得自這樣的聯絡，台灣民眾的反戰運動，對於全面抗戰有莫大的作用。朝鮮民眾的反戰鬥爭遠在九·一八事變當時即已開始，當日本侵略者運兵由朝鮮赴東三省的路上即被朝鮮革命黨人所領導的農民炸翻了一列兵車。現在朝鮮人民反戰運動更為具體化，擴大化了，看他們民族革命戰線的統一化和與中國反帝國主義革命切實聯結的覺悟，已可窺見一斑。最近還有朝鮮人參加我們的軍隊共同抗戰，這些事實和經過都在拙作《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一書中敘述得非常詳細，為節省篇幅起見擬不詳述。日本政府對於反戰運動是採高壓手段的，雖說日本人民的反戰隨

著日本社會危機的深化而日益進展著。日本一九三七年全年份勞資糾紛的件數達二，一〇六件，參加人員達二一一，六一一人之多；和一九三六年份的件數一，九七五，參加人員九二，七二四人比較，增加了很多。（據六月二十九日《新華日報》所載）分析勞資案件的時間分布，戰爭前占去絕大部分，自戰爭爆發的七月以後即漸減少。七月一二九件，八月一百件，九月六十五件，十月五十九件，十一月四十六件，十二月四十四件（據上引《新華日報》），這些事實，一方面是在證明日本社會危機不因九·一八以來的侵略而減輕，一方面又在說明日本侵略者假借戰爭之名高壓勞工的事實。

然而日本軍閥政府的這種高壓，並不能削弱日本人民反戰運動的高漲，它適足以增進日本社會革命的發展。潛行數年的日本共產黨，最近更趁日本政府對外作戰的機會活躍起來了。根據日本官方宣布的側面的資料，前年十二月五日全國大檢舉的第四次共產黨事件，在中日大戰中更發展成為日本全國的嚴重的問題，日本共產黨自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在東京解體以後即未再建成功。至昭和十一年始建立「泛日本反法西斯人民戰線」，但不幸該年十二月五日即為日本政府所大批檢舉。被檢舉的地方是北海道、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福島、茨城、千葉、埼玉、群馬、東京、神奈川、新潟、富山、石川、靜岡、愛知、三重、岐阜、京都、大阪、兵庫、岡山、廣島、鳥取、佐賀、和歌山、高知、德島、香川、愛媛、福岡、大分、熊本、沖繩，共一道□府三十四縣，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無不波及，被檢舉人數達一千三百餘人，造成昭和八年以來的新的記錄。

日本共產黨的反法西斯運動自中日大戰爆發後即又加上侵略戰爭運動一併進行，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大檢舉正可以和上述檢舉聯結起來考察。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晨，東京警視廳及全日本各府縣警察部密令所屬警察人員總動員大舉搜捕，僅東京一地即已逮捕一〇八名，日本全國被捕者共達三七〇名，其中以左翼運動指導者及工人領袖占大多數，特

別是從來和共產黨正統派相對立地位的勞農派幾乎一網打盡。日本政府當局公開承認勞農派的積極活動及其正統派的合流。東京警視廳，警保局長富田提出日本議會的報告書中也可找出日本共產黨最近發展的線索：「最近日本共產黨與從前的共產黨不同，他們目下已混入大眾團體中，做非法的活動，此種轉向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受第三國際第七回大會所變更的方針指導的，日本共產主義者照樣地採用，這種方針在於把反獨裁政體、反帝國主義及反戰運動等主張傳播於工農大眾，以為根據而組織大眾。其實證就是標榜擁護勞動生活、樹立和平政策等等口號，使大眾向著反戰運動進行」（據拙作《日本人民反戰運動》二十頁）。

富田更謂自從這次中日事變以來，日本共產主義者熱烈支持第三國際的反戰方針，陰謀百出，的確的，日本共產黨是在策動日本的大眾起來作反戰的工作，他們利用的口號是：「援助出征士兵的家族」、「照付出征士兵的工資」、「免除出征士兵的稅金」、「援付出征士兵的債務」、「樹立和平政策」等，表面上是溫和的，而其實效卻很大。這次的大檢舉和前年的共產黨大檢舉案的聯絡關係，富田也指明過：政府在昭和十一年曾經檢舉過一次，那時被捕者雖達一千名之多，但仍不能一網打盡。這些漏網者就是所謂：「勞農派」。又據國新社六月七日東京通訊，上述全國共產黨檢舉事件直延至去年年底始將最後一批的新興佛教聯盟友及文化運動者柴田等十九人全部檢舉，始告一段落。

日本政府屢次逮捕的政治犯不見得盡是共產黨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新興佛教青年同盟和沖繩縣（以前的琉球）小學訓育員大批被捕的兩宗事件。新興佛教青年同盟自昭六年以來即已開始積極參加反法西斯活動，即在其委員長尾妹義郎被捕後，其他盟員仍努力活動。直至去年十月，該同盟書記長林靈法研究部長小本昭順及其他幹部二十六名一同被捕。沖繩縣因此事件被捕十二名，其中由小學校的訓育員占大部分。他們

公然自己編印教科書，在課堂裡灌輸反法西斯的思想。日本反法西斯的思想如何深入民間可以想見。

日本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思想，不但深入民間並且達到隊伍了。自從中日大戰爆發以來，南北各戰場軍俘獲不少的反戰宣傳品。目前我軍又於克服汾城之役，在俘虜身上檢出日本無產黨等七政黨共同印發的告同志書及反戰傳單多種，內容充溢著反對侵略戰爭，促日本士兵覺悟，起來打倒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及乘戰爭加強直接榨取的財閥，在所獲反戰作品中最簡潔而又具體（參閱本期抗日文獻）。日本反戰宣傳在軍隊中業已發生效力，各戰場上日本軍隊的嘩變和士兵的厭戰自殺，一方面是由於現實的驅使，另一方面也是反戰運動促成的。

四、日本法西斯政府防範的加嚴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是在日益發展中，從日本政府當局繼續講求防止的方法即可證明。最近日本政府又要發動所謂「優良警士懇談」，由內務省警保局就全國各縣府警察中每個府縣挑選一名至三名共六十九名，定於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三天集合內務省開懇談會。將由各地警士報告各當地民眾的厭戰情形，尤其重視農村方面的實況。聽說警察局就要斟酌各地現狀指示應採取的方針和手段，例如欺騙、誘脅、鎮壓等等。對於反戰運動的有力分子，決定隨時加以逮捕和監禁。同時內務和文部兩省並已擬定警務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與教育機關合作的辦法，將更厲行愚民政策。等待上述懇談會開過後，所謂「優秀警士」回歸原駐地，將經由當地的町村長及學校校長等，以對一般人民和學生灌注荒木所狂吹的所謂「日本主義精神」，日本法西斯侵略政府對付反戰運動的手段，到此時又高一層了。

但是日本人民反戰的激潮，決不會因為日本侵略政府一時的欺騙或壓迫而減退；這個激潮將隨日本人民生活窮苦深化及我們抵抗的進展而發展。這裡蘊藏著一個社會革命的火藥庫，它將以日本軍閥瘋狂的侵略戰爭為導火線而爆發，它將在我們堅持抵抗消耗敵人至相當程度時而爆發。



原載一九三八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一期

日本工潮新階段的開始

日本政府非常時的法令及右翼勞工團體妥協的政策，依然阻止不了日本的罷工運動的發展。據最近東京四月九日塔斯社電，日本工潮的澎湃，就是日本資本階級代言機關的《日日新聞》，也不得不予以揭載。據云：一九三八年二月間，東京的罷工工人數是七、九九六人，但今年二月間的參加工人數，激增至一〇，二一三人，該報並且承認受戰時剝削最厲害的的兵工廠工人的罷工次數尤為激增。

依照戰時日本的統制推論，日本的罷工次數是應該減少的。其原因約有數端：其一，日本政府自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來，即頒布種種非常時的法令，嚴厲取締工農及一般大眾的騷動；其二，反抗日本政府的高壓或被認為有反抗可能的左翼勞動組合（即工會）及無產政黨，全部遭遇解散的命運；其三，右翼的勞動組合及幹部右傾化的社會大眾黨，皆在「舉國一致」的口號下採取不罷工的政策。因有這些原因，所以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的罷工次數曾經一度減少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逐月的罷工件數如下：七月，一九；八月，一百；九月，八十一；十月，五十九；十一月，四十六；十二月，四十四。

但這只不過是一時的變態的現象，日本工潮的潛流，是隨戰爭的擴大及一般大眾生活的低下而繼續增長著，它終於衝破了日本政府及反動化無產黨的堤岸，工運由衰退而日益增長了。詳細的情形雖然還沒有得到報告，但只就上列電訊，即已可明瞭這一大勢的趨向了。日本工潮之急速增長，在戰時日本已達到十分疲敝的階段上，毋寧說是必然的歸宿。在日本侵略者總動員各種力量以進行「孤注一擲」的侵略戰爭下，日本勞工所受的痛苦絕對不是日本好戰軍閥所能領會萬一的。日本軍閥賜與日本人民的重要恩惠，首推物價之高漲。與工人階級關係最深刻的零賣物價，竟從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一一六·

二，增漲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四五·八（據商工省的調查）。在這一年半的期間，約略增漲三〇％。其負擔之加重可知。對於日本物價高漲，所加於日本工人的負擔，日本政府或許以欺騙的語調，說「工資並不低薄」（最近日本陸軍省代表之言）以為搪塞罷。但是事實上，日本軍需工業儘管急激需要著熟練工人，並且相當提高工資以為釣餌，而工人的實質工資依然是低下的。日本零賣物價雖如上述激漲，但是工資的增加非常遲緩：其指數只由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〇七·六，漲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二〇·七，尚不到二·〇％（據同上調查）。此外還因為戰費負擔、國民獻金，乃至家族從軍引起的種種負擔，等等，逼得日本工人不能不延長工作時間，以增加收入，實收工資比定額工資多的原故即在於此。惟其如此，所以日本工人的死傷率增高了一五％（一九二七年比一九二二年）。

在這種情勢之下，日本工潮自然要增漲，日本政府高壓下的日本工運的反漲，可以認為是戰時日本工運新階段的起點罷！

原載一九三九年四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二期

二年來沒落過程上的日本內政

在我們全面抗戰的兩個整年的期間，日本內政因為我們英勇堅持抗戰的促動，發生過急激而又複雜的許多變化。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到敵人在主觀上雖然急於加強其政治力量，但在客觀上則愈改革政治機構，調整行政人物，其政治的危機倒反日益深刻化。日本內政這二年來的演變，就其大概的節目來分割階段，則大體上可得三個時期：（一）行政機構的調整時期。這個時期適當於中日大戰爆發後至近衛內閣大改組的期間。在這個時期，日本為著適應大規模戰爭的需要，連三接四地增設戰時行政機關，故可以稱為「行政機構的調整時期」。（二）行政人物的積極調整時期。這個時期適當於近衛內閣的幾次大改造至近衛內閣總辭職的期間。這個期間的改革皆偏於行政人物的更動，並且相當具有積極性，故稱為「行政人物的積極調整時期」。（三）行政人物的消極調整時期。這個時期適當於近衛內閣總辭職而平沼上台以至現在。在這個期間，人物的更迭，沒有多大的積極意義，在人物本身一代不如一代，在動機上也不過調和各派的衝突，或拉甲派抵制乙派而已。所以稱這時期為「行政人物的消極調整時期」。

自消極的人物調整時期開始以來，日本內政所蘊蓄的各種矛盾和危機，就顯明暴露出來，並且日益深刻化，各派的對立和鬥爭，演至最近大有劍拔弩張短兵相接的情勢，已經不是什麼「總親和」，或「舉國一致」的空頭口號所能掩飾的了。以下分述其各期的特徵，並推斷此後的動向。

一、行政機構的調整時期

七·七盧溝橋事變原是日本侵略者想以恫嚇逼中國屈服的把戲，但是事實出了他們

意料之外，吉星文將軍先給與瘋狂軍人以迎頭痛擊，繼之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國民的同仇敵愾，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發動了全面的抗戰，終於粉碎了日本的侵略者的整個迷夢。自八·一三以後，日本侵略者始認識清楚：遠東情勢已起了九十度的變化。於是日本政府急忙謀適應日益擴大化的情勢，忙煞於戰時行政機構的增設了。

首當其衝的近衛內閣，成立於準戰時體制的末期，由準戰時到戰時，自然是一層由量變到質的變化，日本政府為適用這個變化的需求而手忙腳亂地增設了不少的內閣補助機關。其中最主要的有內閣參議制之創設，企劃院、厚生省、企劃審議會，乃至戰時太內閣的大本營的設置。這些設置一方面，是戰時的需要，他方面也就是軍閥的要求。在這個時期，日本政府是一意追隨軍閥忠實服務的。近衛在七·七事變後不久的七月二三日開幕的日本第七十一屆特別議會上，坦然宣告「以事變為中心」的新方針。九月四日開幕的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上，又有更熱烈的討論，近衛則強調「對外強硬對內協調」的主張，並在這種主張下謀加強他的政治機構。

首先出現的補強機關，就是內閣參議制，其創設法案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照原案通過樞府本會議十五日經內閣議發布的，任命陸海軍界、政界、財界，及外交界的十大巨頭為參議；其目的在補強現內閣，其任務是參預內閣關於「中日事變」的重要閣議的籌劃，參議受著國務大臣的禮遇。參議的人物分布如下：宇垣一成、荒木貞夫（陸軍）、安保清種、夫次信正（海軍）、町田忠治、前田米藏、秋田清（政界）、鄉誠之助、池田成彬（財界）、松岡洋右（外交界）。內閣視參議為「頭腦托拉斯」，但事實上，適足增加了「一國二公」的難局罷了。

內閣參議制事實上的作用只是聯絡與疏通，對於設計方面當然不能有什麼貢獻，所以近衛內閣又於十月間合併企劃廳及內閣資源局為企劃院，並擴大其職務如下：（一）起草擴大並運用平時及戰時綜合國力的法案，附加理由上陳於首相；（二）審查各省大

臣提出閣議的案件中關於擴充並運用平時及戰時的綜合國力的重要大綱，附加意見經由首相以上陳於內閣；（三）審議關於擴充並運用平時及戰時綜合國力的重要事項的預算，附加意見經由首相以上陳於內閣；（四）就國家總動員計劃的設計及執行，圖謀各廳務的調整和統一。於此可知道這個企劃院，比較是有實際的「頭腦托拉斯」的本質，並且是為處理一切戰時計劃統制而設的，在它直屬於首相之點，更是有集權的作用。正和內閣參議制事權分散之點不同。企劃院因有其具體的性質和內容的要求，所以至今今年平沼上台後一月十二日又有七局大擴充案之實施；在其事務方面統合了現在的大藏省主計局、內閣法制局及內閣情報部；在其職權方面強化了總動員業務的一元的統制，企劃院總裁並得以不管部大臣而列席閣議。

在日本戰時政治機構的增設上特具意義的機關，要推大本營。它不但統合海陸軍兩省及參謀部的人員，充當一切軍令、軍事動員，及軍事編制的最高統帥部，並且是強化陸海軍兩大臣的權限，使得實際上指令戰時內閣的一種大改革。依據大本營條令，新大本營是天皇之下的最高統帥部（第一條），這個條令不但適用於戰時，並且適用於「事變之際」（第三條），可見其權限之龐大，在軍權指令政權的日本，正是強逼政府聽命於軍人的一大改革。所以自大本營成立以來，內閣許多施政方針，特別是外交方針，取決於軍人，或由在外軍人肆行不羈。此外，如以所謂「保健衛生」及處理社會事業的任務而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增設的厚生省，也是加強戰時內閣的一個機關。

在日本戰時政治機構的增設上，有一點不能忽略的地方，就是加強內閣的力量反面，寓有削弱議會監督力量及既成政黨活動力的作用，使立憲政治實質上完全變成軍事法西斯獨裁。

二、行政人物的積極調整時期

以貴族養尊處優的身分而擔當「前所未有的難局」的近衛，最初也抱著決心謀由加強內閣以適應戰時狀態，但是我國全面抗戰的擴大與增強，卻更急速地增加日本政府的艱難。自我棄守南京以後，中日大戰變成持久戰，日本速戰速決的幻夢完全為所粉碎，另一方面，日本國內經濟財政的困難益發倍蓰於以前，引起了許多國內的政治糾紛（例如總動員法案及電力國營法案遇到第七十三屆議會、政黨乃至財界各方面的抨擊）及社會的騷動（例如去年二月十七日防共護國團占領政友會及民政黨的本部，三月三日社會大眾黨黨首安部磯雄為暴徒所毆傷）。公子哥兒的近衛對於這種內外交迫的危局感覺十二分棘手，他原不在乎這個首相的位置，所以去年四月初旬即稱病表示消極。當時，政黨、財界，對於近衛之去留不加可否，近衛的親友且有勸其早退的人，但是利用近衛為理想傀儡的軍部及右翼勢力，卻強要近衛勉為其難，不但未次內相懇切挽留，《中外新聞》揭載「軍部通知政府，反對首相辭職」的消息（四月十二日），當時的陸相杉山更承軍部之意進一步要求近衛改造內閣，以謀加強。

近衛在這欲罷不能的情勢下，決定了腹案：（一）大改造現內閣，補充有力人物；（二）改革議會制度，以削弱議會的牽制。近衛內閣的大改組至五月二十六日始完全表面化。經這次大改組後的近衛內閣增加了四種力量：（一）任命日本朝野年來所注意，擁有軍人系財政界相當力量而被稱為惑星的宇垣一成為外相；（二）任命日本銀行總裁並在日本財界負代表聲望的池田成彬為藏相，後又兼商工相；（三）任命曾經一度負少壯派軍人領袖並與真崎共握日本軍界一系牛耳的陸相荒木貞夫為文相；（四）接著又以當時少壯派軍人所推戴的領袖，板垣征四郎，代替了比較老成穩健的杉山為陸相。近衛內閣到這時候面目完全一新，並且由陸海軍人占了五把交椅，儼然軍人內閣，特別是擁

有三個首相級的閣員及一個財界代表，弱體內閣驟然增強了許多，近衛以下日本政界要人，或者大都慶幸近衛苦心孤詣溶化各黨各派的勢力於一爐，及「舉國內閣」的成功罷，他們滿以為各派彼此的衝突可以避免，戰時政策的施行可以順利無礙。但是崎嶇路上的荊棘，依然滿布著，絕對不容日本政界主觀上的幻想。

近衛內閣大改造後，又組織了什麼五相會議，及內政四相會議。前者的份子是指首相、陸相、外相，及財相；後者的份子包括首相、內相、文相及財相。組織這兩個會議的動機，一方面在政務的分工，一方面又是在內閣集權化。五相會議的討論對象偏重於軍部與外務省及財界的協議；四相會議則集中於內政的調整。然而日本當時內外的危機與矛盾，並不能允許日本政界如是樂觀，橫陳在眼前的國內政治與社會的動蕩、財政的枯竭、工商業及對外貿易的衰退、國際關係的日益孤立化、侵華軍事及政策的碰壁，等等問題，又把近衛內閣一團的和氣吹得四散，把日本政界及社會的波濤重新掀起。

近衛內閣主觀上誇耀的堅固城壁的坍塌，開始於宇垣外相之辭職。近衛內閣五相會議之設，固在收集權化的效力，但少壯派軍人的狂妄卻亦隨此集權化而益加增進，無論在內政抑在外交，自不容少壯派以外的人插嘴了。於是宇垣外相儘管主張調整日本與各國的關係，和蘇聯進行懸案的談判，而關東軍卻偏偏挑發張鼓峰事件，造成了日本傳統的二重外交最暴露的局面，丟盡了日本外交當局的臉。宇垣與少壯派軍人的衝突，到對華中央機關設置問題時完全爆發。興亞院的設立，依軍人的要求剝奪了外務省的權限不少。陸軍當局的意見是將處理中日問題的權柄，全部交給興亞院，由興亞院會議來處理，甚至於主張：五相會議只處理國內問題。事實上，興亞院的行政人員幾乎全部是軍人。宇垣對於這種措置非常憤慨，終不得不繼續侵華戰爭停止線的根本衝突而藉口於興亞院的權限歸屬問題，率然掛冠而去。

宇垣之爭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代表著元老重臣及一部分財界的要求。故宇垣去後，

池田頗為快快不快；池田與末次的衝突日漸成長。少壯派軍人與元老重臣的水火，因粵漢占領後軍事的停頓與軍部擴大戰爭的衝突而日益深刻化。軍部欲借擴大戰費的問題及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實施問題，以壓迫元老重臣派及財閥，但是他們的答覆卻是：（一）「戰爭究竟到什麼時候始能結束？到什麼地方始能停止？」（樞密院對近衛嚴厲質問）；（二）當情報部發表實施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消息時，財界大起恐慌，各種股票皆大跌價；（陸軍）次官東條發表同時對中蘇作戰的主張時，財界更為之嘩然。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東京即傳近衛內閣不再加以大改組，就必須總辭職的消息。近衛也在其宣言中聲稱：「加緊政府統制」的必要。又日本政界也盛傳：「日本改造東亞的重大工作，需要日本政府獲得人物上的絕對不可缺少的妥協，就是軍部等財政當局能與負外交責任者和衷共濟，始可。」這些都在證明近衛內閣內部的衝突已相當激烈及日本各方面政見的不統一。近衛內閣終於因為末次內相與池田財相的主張無法調和而全班捲鋪蓋，滾蛋大吉。

三、行政人物消極調整的時期

近衛斷然辭職後，在匆促間繼之登台的是「最不受眾望的」平沼內閣。平沼內閣雖說是近衛內閣的延長，平沼內閣的閣員雖說有六個是近衛內閣的閣員留任的，但是實質上總令人興「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和近衛內閣大改造後的陣容比較，實難免相形見劣之譏了。平沼首相的人望與魄力不如近衛，姑不說它，即閣員方面，現外相有田不如宇垣，內相木戶也無末次的魄力，藏相石渡只是一個庸碌的財界技術家，較之財界代表人物的池田，更是一個小巫見大巫的對照了。此外，櫻內農相及前田鐵相代替了永井柳太郎及中島知久平，只是政黨閣員的更迭，沒有多大的意義。於是可知平沼內閣的弱體遠甚於近衛的弱體時代，所以這次的變動，只可以說為行政人物消極的調整罷了。

近衛內閣既為軍部與財界的衝突，右翼法西斯與元老重臣派的對立而總辭職，平沼內閣自然是為調和軍部及右翼法西斯與元老重臣派及財界的對立而登台。平沼在未登台以前是一個著名的「革新政治思想家」，所以元老重臣派及財閥對之非常猜忌，他之所以能夠上台，原因在於他秉承元老重臣派的密旨，答應履行元老重臣派所給予的條件。因此，他上台後什麼政策綱領都沒有具體發表過，而只發表一些空洞的「對內總親和」、「對外親和萬邦」的口號，隨後而來的是「日本既不是民主集團的國家，也不是極權國家集團的一員」，並且在興亞院聯絡部官長會議上發表「不要胡亂排斥中國淪陷區第三國的權益」的訓詞。他對於內政，不但沒有比近衛內閣更積極的「革新」，即連近衛內閣當時提倡的議會制度的改革，乃至新黨運動，也都推開不敢再說一句。在財政與外交的方針上，平沼之得財閥方面的暗示，只就正月初近衛內閣總辭職之後，池田即赴湘南金澤訪問平沼兩次，及平沼受命組閣回國東京後，首先訪問平沼的又是池田。據傳，池田對於財政方針及藏商相人物問題，皆有相當的進言，即關於歐洲的外交方針，也有相當意見提出。我們相信：平沼之接受池田的進言，後來作為池田接受就任物價委員會委員長交換條件。池田左右財界的魄力，表現在他泰然發表「強制儲蓄」的意見——這種意見，在石渡財相口中還覺得十分羞澀。平沼因他全盤接受元老重臣派及財閥的意見，所以軍部相當的憤慨，甚至罵他為「奸通首相」。

另一方面，在軍權指導一切的戰時日本，平沼又自不能不接受軍部方面的更嚴格的條件。陸軍最初希望近衛就任外相，未得近衛的同意。關於政治方針，則提出三大原則：

- (一) 強化防共協定——決定並遂行強化日德意三國軸心的外交方策；
- (二) 踏襲近衛內閣所決定處理事變的方針尊重設置五相會議的趣旨；
- (三) 為擴充生產力，振興貿易，及使物動計劃完全而擴充強化企劃院。

平沼處於兩大之間實在左右為難，其中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外交方針的決定，自德意締結軍事同盟的前夜起，日本政界即為是否立刻加入軍事同盟問題引起了大波瀾，平沼弄到頭痛額爛，幾至辭職。當時，平沼秉承元重臣及財閥的意志不願立刻加入這個同盟，但是少壯派軍人卻極力主張加入。代表少壯派軍人在外意志的駐德大使大島中將，貿然答應希特勒加入同盟，而「平沼內閣經三月考慮對付歐洲情勢的方針」（馬場恒吾之言），終不得不暫時觀望，因為元老重臣之觀察，疲於侵華戰爭的日本，已不堪再開罪英法，所以絕對阻止政府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即強悍如板垣，也無可奈何，遂致受了少壯派軍人加以「叛徒板垣」的唾罵。右翼法西斯及少壯派勾結，大大進行其「反板垣，倒平沼」的運動，甚至恫嚇平沼說：平沼若不答應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則將以對付犬養及岡田的手段（暗殺）對付他。

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屢次著論對平沼內閣大加抨擊，最近更將日本「喪失政治」的責任加在平沼內閣身上，言裡言外皆含有平沼辭職之意：

「事變由武力第一的階段到促動綜合政治強力的階段已有半載之久。遂行戰爭的外交斷非一外交當局的官僚事務，政治的最高責任者的總理大臣應在軍事、經濟等一切的要素上，自己決定根本原則。但自組閣以來，召開所謂五相會議前後凡六十餘回，國民所聽到的結論，卻只不過『關於歐洲情勢對策已得意見一致』的區區十數字罷了。我們固然不是像低能的自由主義者，要求把政治的全部發表給國民。若是有責任心的為政者真正持有指導國家與國民的方針，那末有時掩國民之眼，塞國民之耳，或許是不得已之事。但若此種做法是為著掩飾為政者自己的無能及優柔，那末事情就不能寬恕了」（五月二十七日社評）。

真正的，氣死了平沼老頭子，幹不上去，又不能下台，沒辦法，只好學近衛去年五月的故智，來一番什麼補強改組，強拉小磯國昭和田邊治通再上台。但是小磯上台後，倒反增加小機、板垣之間的新對立，平沼內閣的前途更加難關重重，岌岌不可終日了（參閱本期《東京政權問答》）。平沼現在雖是一個日本政治的最高責任者，但是行政方針即不能決定於自己，在元老重臣財閥與少壯派軍人的夾持之下，左右袒皆不可能，元老重臣財閥儘管阻止平沼政策的急進於國內，而少壯派軍人卻發動在外的力量，尋事生非，欲以在外行動的勝利壓制元老重臣財閥在國內的優越地位。

兩個月前，西園寺元老雖有捨身救國「即倒於少壯派槍下也在所不惜」的決心，但是少壯派卻要以蠻幹的辦法強奸平沼內閣的外交方針，追隨他們。事亦湊巧，英國近來對日態度的劇變，供給了少壯派軍人壓制元老重臣及財閥的良好條件，日本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已在進行中，英日談判萬一於日本有利，少壯派軍閥的氣焰將更高漲。然而日本政治機構的複雜性，國內外客觀情勢的艱難，及日本軍人政治家的低能，絕對不能造成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獨裁，事務的演變只增加日本內部派閥的對立和糾紛，「難為馮婦」的平沼，勉強支持的日子，大概也是不會長久的。

處於戰時軍權高於一切的時代，軍人的猖獗是要日益增大的。平沼上台當時聲言放棄的議會制度改革案，及全國一黨連動，最近似又不能不再度抬頭，所謂「國民再組織」的問題，現已成了元老重臣派與少壯派軍人明爭暗鬥的標題；元老重臣挾天皇以令軍部，而軍人則專以暗殺相恫嚇，昨日的消息告訴我們：右翼法西斯與軍人的勾結，又在企圖暗算內大臣湯淺、宮大臣松平，及牧野伯爵等重臣了。西園寺也在他們窺視之中，平沼老頭更是戰戰兢兢不可終日，日本政治上層機構此後的多事，正可以逆料。此外還有兩種的壓力，促進這種糾紛的進展：（一）日本下層民眾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及（二）中國英勇持久的抗戰。政友會內部的分裂，民政黨對法西斯的應聲，反映既成政黨的瓦解，

民主政治的衰落，但是獨裁政治在日本，也不是立刻可以生長的，舊的政制已沒落，新的又未建立，此後日本政治將如侵華軍事，一直徘徊、動蕩到總崩潰為止。

原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六期

日本外務省派閥鬥爭及其背景

戰時鬥爭激烈化的秘密

日本最近外務省的紛爭問題，引起了日本國內外人士的注意，的確是日本外務省有史以來未曾有的軒然大波。但是日本國內外一般人士的推斷與分析，都不正確。我國論客大多視為單純的貿易設置問題，日本論客則又視單純的外務省內部派閥鬥爭問題，這兩種觀察者的腦筋，都太過於簡單，前者所犯的毛病是近視眼，後者所犯的毛病是「見樹不見山林」。吾人不否認日本外務省內部歷來派閥的存在及其不斷的鬥爭，但其派閥的鬥爭演至最近，其所受外務省外「特種勢力」的促動，卻已不是那麼單純了。

然則所謂特種勢力，究竟所指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指導日本全政局轉動的幾種上層力量。因為日本政治機構內的複雜性與矛盾性的存在，所以指導日本全政局的轉動，也就產生了複數的力量，又因為是複數的力量，所以自其動的形態看來，也就形成了複雜錯綜光怪陸離的鬥爭。這種鬥爭並且浸透於日本政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次外務省的「騷動」，自然也不能是例外。具體地說來，日本論客所論列的什麼歐美派對亞洲派，什麼傳統派對革新派等等的說明（如平河道雄及岩淵辰雄等人的論文——皆載《改造》十一月號），若不能道出各派在每一個時期轉動的動機及其背景，則徒然使讀者讀後莫名其妙。再如馬場恒吾等人，只管責備阿部內閣，也未把握住問題的核心；《國民新聞》（軍部機關報）借題對阿部內閣大肆攻擊，倒是巧妙地並又老實地供出軍部狡猾陰謀的一面來。

簡單一句話說，在二元性的日本外交局勢下，每一種日本外交問題的背後，總有兩種力量交手的「黑影」在擺動著。因有這種力量交手，所以外務省派閥的鬥爭就變得非常怪異微妙，有時竟有不合常識的事實發生。例如這次志在調整日本與英美關係的阿部首相及大家指為傳統派而非軍部的理想人物的谷次官（他替野村外相握外交實權，承元老重臣派的意志佐阿部進行英美關係的調整），竟答應軍部要求，決意設置貿易省，而結果倒反為現由傳統派占壓倒勢力的外務省全體官僚所反對，這種事實只從表面上是不能瞭解的。

二

日本外務省派閥的存在，我們不否認，但更重要而必須認識的，是派閥鬥爭背後元老等穩健派與少壯派軍人的交手。這兩派的交手所反映外務省的明爭暗鬥，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外交陷於「無路可通」以來，尤其呈現錯綜複雜的現象。

日本外務省的主要部分是政務局。所以外務省官僚的鬥爭就集中於這部分肥田上。自政務局分歐美局與亞洲局以後，日本外務官僚，也就因此分成歐美派與亞洲派：前者的主幹是幣原、出淵、佐藤，及廣田等人，一般稱之為外交陣營的元老；後者的主幹是有田、重光葵、谷正之，及白鳥敏夫等人。這兩派擁有悠久的鬥爭史，亞洲派的少壯分子，對於歐美派升官發財的迅速，常存不滿，圖謀挫其優勢。在田中內閣當時，谷與白鳥即勾結政務次官森恪，以東方會議為中心舞台，大事活動，並打擊歐美派。在以前日本外交上，歐美重於亞洲，外交界也自以所謂歐美派占優勢。九·一八事變以來，亞洲重於歐美，亞洲派遂一躍而成為新興的勢力。但是外務官僚的鬥爭也隨之集中到亞洲派的陣營中來，重又分成傳統派與革新派。前者的意識偏於維持現狀，而後者偏於革新；

前者的派系較靠近元老重臣系，而後者較接近少壯派軍人。

九·一八事變和五·一五事件，造成有利於亞洲派的情勢，幣原外交退陣的結果，歐美派降於次等地位；在齋藤內閣，廣田雖以玄洋社出身關係及中立態度被任為大臣，但當時的次官則為有田，並由谷正之任亞洲局長，白鳥敏夫任情報部長，革新派占實際的支配地位，所以終於不能不實行脫退國聯會。

但自那個時候起，白鳥的作風太過於驕傲，視廣田、有田及重光等前輩為無物，引起他們的惡感，導致演成亞洲派的分裂。這次外務省騷動中心人物的谷正之次官，當時加入了有田的陣營中，今日已和白鳥成了敵對。於是，有田、重光及谷等人形成一派，一般稱之為傳統派；白鳥雖覺孤立但也不示弱，遂努力組織革新派與之對抗。這兩派遂成了今日支配「霞關」的兩大派閥。

三

九·一八事變提供了孤弱的革新派發展的機會，白鳥乘戰時各方都要求革新的時會，培植自己的勢力，遂得栗原正和松宮順兩支生力軍。白鳥先放逐當時東亞局長的石射而提供位置與栗原，栗原就任東亞局長後，即便大刀闊斧，驅逐傳統派而布成清一色的革新陣營。松宮是當時的會計課長，當然也是革新派的柱石。當時，外務省內高等官的半數（在四十六名以上）聽從革新派的號令，可說是白鳥派的全盛時期。當時甚至於期待著白鳥外相、栗原次官出現，其威勢之浩大可知。

革新派勢力之膨脹已足與傳統派分庭抗禮，外務省外的某種力量，就擺弄起魔手來了。關係日本外交的鬥爭問題，早在近衛內閣時代，即以興亞院問題出現過，問題在於割裂外務省關係對華外交的幾乎全部權限，移歸興亞院。這是軍部用以對抗穩健派軍人

外交家宇垣外相的一種作法。當時反對的意見充溢於外務省，反對運動的中心在於直接受害的亞洲局長栗原，所以他的態度也特別強硬。少壯派軍人更乘此機會，唆使革新派鼓動風潮，推波助浪，以期趕走宇垣外相。栗原等人的強硬反對，雖未阻止成功興亞院的設置，但卻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趕跑了「惑星」的宇垣，得以進行擁護白鳥為外相的運動，白鳥原被宇垣放逐，將赴意大利，也以此故退回船票，奔走於外相爭取運動。但是近衛對於革新派頭目的白鳥敏夫不甚愜意，反把外相椅子交給傳統派的有田八郎。白鳥終不得不怏怏然赴任羅馬，收漁人之利的是少壯派軍人。

四

宇垣掛冠去後，繼任外相的傳統派頭目有田，開始培植傳統派勢力，以向革新派進攻。當時受革新派壓迫的外務官僚，大都集中到有田方面來，重光及谷等人的直系，不消說，即來栖、堀內、天羽，及吉澤等歐美派的殘餘，也都加入，形成一個擴大傳統派，有田大可以闊步於外交舞台上。

中日戰爭爆發後，軍部要求日本外交一面加入防共協定，一面對中蘇實行兩面作戰。有田曾經運用巧妙的手腕，以牽制蘇聯的理由加入了德意日防共協定而避免了對中蘇同時作戰，很得到國內一般的歡迎。但是侵華戰爭的發展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難。第一，日本加入防共軸心，正與英法法正面衝突；第二，為要圓滿推進對華的外交，非與英法法周旋不可。日本主張打開現狀，在理論上須與德意協力，但在東亞的實際情形下，又須與英法法調和。有田雖然巧妙地以蘇聯為日本外交的假想敵，但不敢強化防共協定至締結軍事同盟的程度，一方面又與英法法進行國交的調整。可是這種微溫的作法，始終為軍部所不滿，有田外交的致命傷也就存在這裡。革新派遂乘機進行猛烈的活動，駐意

大使白鳥和駐德大使大島，在外策應，甚至武斷地答應德意加入國事同盟的提議，曾經引起日本政界的巨波大浪，在吾人腦中，自然還是新鮮的事實。

當時，軍部正極力主張加入德意軍事同盟，所以暗助革新派向傳統派進攻。革新派雖是勢孤力弱，出席外務省幹部會的人數不滿十人，但卻態度非常強硬，栗原及松宮對有田、澤田、□西、吉澤、松島及三谷等傳統派，無時不在伺機進攻。當時日本國民的視聽固然為英日東京談判所吸引，但是加強防共軸心的運動，也未停止過。

五

日本軍部始終利用外務省派閥的鬥爭，削弱與之對峙的官僚的力量，日本官僚據以對抗三宅阪的霞關也常因為內部的爭執而提供軍部得漁人之利的機會。在蘇德不侵犯協定成立後，傳統派與革新派遂至兩敗俱傷。軍部借政府不及早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致使德國奔向假想敵國的蘇聯為口實，推倒了平沼內閣，有田也自遭遇「樹倒猴孫散」的命運。傳統派陣營雖起了動搖，但是革新派的加強軸心的主張，更以德國聯結蘇聯為日本人民所憤恨，一時斷絕了活動的機會。

平沼內閣垮台後，在兩大力量挾持下成立的阿部內閣，幸因歐戰的爆發而得以一面宣告中立，對蘇聯成立諾門罕停戰協定，一面進行親英美的外交，以滿足財界及穩健派的要求。但是軍部始終認此種調整為「媚態外交」。在阿部組閣當時，軍部即畏忌穩健派力量的膨脹，曾經要求任用白島為外相，阿部不得已暫停外務專相的任命而由自己兼攝，過後始任命野村大將為外相而以谷正之為次官。這或者可說是穩健派對軍部鬥爭的勝利。

由革新派轉變為傳統派的谷正之，過了多年埋沒的生活，有田任外相時候曾經一度

任為駐法大使，又為法國所拒絕。這個時候幸得因原田熊男（西園寺元老秘書）的斡旋。被任為次官，自然喜出望外，恨不得粉身碎骨以報答傳統派。所以上台後即便派天羽為駐意大使，放逐栗原以承天羽後任，命令大島歸國，並派來栖駐德，升栗山為駐比大使，而放逐松宮於比利時。即連素來持中立態度的河相達夫（情報部部长），也都被貶走。然而日本外交最高當局的這樣辦法，是要惹出亂子的，因軍事失敗壓抑的軍部正找著了出氣管了。野村外相自命為「知美家」，有許多知交的美國人士，谷次官又是這樣大刀闊斧地幹，親英美的積極做法固已準備發動，但是軍部眼看很多穩健派勢力如此膨脹，當然大起妒忌，恰好湖北軍事的慘敗，正需要移轉國民的注意，以圖藏拙掩醜。於是，軍部發動貿易設置問題，以離間外務官僚，削弱穩健派主要營壘的震盪。

六

軍部一面要求阿部內閣設置貿易省，以威脅外務省官僚，一面則又暗中唆使心懷憤恨的革新派，破壞穩健意識的傳統派的全面統制，貿易省問題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外務省對此問題認為「省外勢力」分割外務省權限的一種陰謀，所以率直表示反對。十月三日阿部內閣的閣議，雖然絕對拒絕了外務省的希望，通過了貿易省設置要綱，但是軍部卻更加油鼓動這個風潮。先由山松島通商局長，山本及水野面敕任事務官以次五課課長提出辭呈，而全部課長及事務官繼之急起，大喊「拯救外交的危機，外政一元化」的口號，主張：「通商外交與政治外交的分離，是外交的死滅，非國家之福」。問題不但震撼了全國，甚至於鬧到樞密院裡去。無論阿部內閣的議決案怎樣堅決，谷正之的推斷怎樣有自信，議決案終不得不猶豫執行，甚至於鬧到谷正之的飯碗，幾乎打破。「廢物收回內閣」（日本論客對阿部內閣之評語）更加飄搖動蕩起來，軍部行動派（一名：少壯

派軍人）機關報的《國民新聞》，遂乘此機會向阿部內閣集注紙彈的炮火，攻擊阿部內閣威信的失墜，至體無完膚，其結論竟謂：「官界即起未曾有的紛爭，責任的歸屬仍未能了然。主義和政策，極輕易變更，官場內的派閥肆意跋扈，處此情勢下的政府，果能圓滑處理未曾有的大事變嗎？國民非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不可。惟其是在處理『事變』之前，一內閣一大臣的運命，總是不成問題的」（十月二十日該報社評）。軍部行動派對企圖執行穩健派政治意識的阿部內閣，襲擊的毒辣與推翻的陰謀，已活躍於紙面了。

在貿易省設置問題上，軍部行動派對重臣穩健派的進攻，收到了雙料的勝利。貿易省設置綱領雖然修正過，現在尚無立刻設置的象徵，但是貿易省不但仍在必設，而阿部內閣又起了動搖。軍部行動派的陰謀，不但達到分割外務省權限的目的，並且因為外務省風潮掩飾過湘北軍事的慘敗，尤其重要的，是阻止著他們指為「媚態外交」的進行——可以說「一石三鳥」的收穫了。

戰時日本行動派軍人，實在是天之驕兒。去年興亞院的紛爭上，即令日本軍政界的「惑星」宇垣仍終於不得不吞「萬斛之淚」（平河道雄之語），憤憤然掛冠以去，軍部的力量可謂大矣！在軍部得天獨厚的戰時，尤其是在軍部行動派力量已經形成的今日，外務官僚派閥的格鬥，將時常被利用做進攻穩健派的工具，但其紛爭也將永無已時！

泥塘中的日本內政

漫談日本政治非我所能，只是戰爭中的日本政治，宛如一潭泥塘的景色，是人人所共見，我也看清這一點罷了。

自從侵華戰爭發動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即便意氣萬丈地大改革其內政，大增設其政治機構。自近衛內閣大改組以來，更覺得日本政府已包括了日本各派的力量，政府基礎十二萬分的鞏固，頗有揚揚自得的氣概。其後更加繼續增設機關，增加人員，什麼「庶政革新」啦，什麼「協力政治」啦，鬧得三島烏烟瘴氣，「新官僚」乘勢進出，推波逐浪，甚至於日本論客也承認近年日本官僚的進步，很有自尊心了。

然而混雜在泥塘中的日本魚群，都不過是「自我盲目」，自己看不見自己，至於泥塘外的人，總是旁觀者明，只看見泥塘中的魚蝦愈吵鬧，泥塘的水愈混濁，紊亂無條理罷了。瞧罷，近衛內閣大改造曾經有了什麼樣的成績呢？豈不是徒然加深了宇垣外交與軍部行動派外交的矛盾了嗎？元老重臣倚為「最後一張牌」的近衛，豈不是已於最大努力之後驟然決定去職了嗎？其後的內閣，由近衛到平沼，由平沼到阿部，豈不是一蟹不如一蟹了嗎？即在首相的主觀與抱負上，也是愈來愈失了自信。在平沼本人，所謂「革新」的內心火，似乎還是相當的熱烈，但輪到阿部，即感覺空虛沒有生氣，在組閣途上幾至流產。阿部內閣性質的雜什，幾乎可說是日本內閣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於是日本好事的評論家，給他起個綽號「廢物收容內閣」，也算得可憐極了。

阿部內閣自其呱呱落地以來，所遇到日本內外難關，確實在以前內閣的惡劣環境以上。戰爭中的日本任何內閣，都要遇到的慘淡命運，在阿部內閣更為加深了。第一，外交方面即須打通對美英法外交調整最難的對美外交調整一關，還須維持德意軸心的舊關

係，親蘇的課題逼得阿部和野村更加頭痛。第二，在對華侵略上，雖然需要趕快結束戰爭，但又遇到不中用的日軍到處「敗戰」，英法維護在華權益的決心更為堅決。軍部雖有形成所謂「獨裁國集團」的幻夢，但是蘇芬戰爭又給了一盆冷水；政府雖欲與英美妥協，以收拯拔泥足的代價，但又不能投下過大的本錢。於是美日關係未調整好，蘇日關係又急轉直下。第三，雖然一面不能不接受軍部的強蠻要求，但是「革新」內政又似無從著手，少數閣僚制的流產，挨了軍部機關報多少的臭罵。第四，阿部內閣恰又遇到日本政治的「例礁」，第七十五屆日本議會的開會，除了照常的幾多難題之外，還加上一個戰爭以來未有的政黨政治運動的抬頭。民間右派法西斯的加油活動，又多添阿部一層夾板，戰爭以來幾次「無風」的日本議會，這次似乎不能太平靜吧！在蘇芬戰爭發生後軍部外交主張的根據被削弱後的今日，阿部內閣所挨的臭罵，已由「媚態外交」、「八方美人主義」，發展到「請早辭職罷」了。軍部會不會再像棄去平沼內閣那樣，借「調整外交無力」的口實來趕走阿部，是誰都不敢保險的了。

戰爭第四年日本政治總檢討

一、日本戰時的官僚政治

日本現在的政治是有史以來未曾有的紊亂，現在的政府，是有史以來未曾有的無力——這是二年餘來日本政局的動蕩所告訴我們的實情，同時又是日本國民所共認的事實。現在到了日本「官僚政治」的一個分水嶺。

日本官僚政治的存在不自今日始，但自侵華戰爭發動以來，日本政治的官僚性質益加濃厚，並且隨著戰爭的進展而日益加強。這裡有兩種條件：其一，是日本政治的基本特質；其二，是戰時統制的強化。日本政治原即帶著極濃厚的官僚性質，立憲、議會，及至政黨政治，等等，只是民治政治的招牌而已，事實上日本政治沒有一個時代不在官僚的直接間接統制之下。但是日本的官僚政治又是一種複合物，包括著貴族主義的官僚成分與軍國主義的官僚成分。二者相成而又相剋，只在其帝國主義性之點，是一致的，無論自其對國內民眾的統治言，抑自其對外的侵略言，貴族主義官僚與軍國主義官僚的目的是一樣的。不過因為統治階層的矛盾，再加上日本政制的複雜性，如軍部之獨立於政府之外及非法律所規定的內閣總理大臣的推薦特權等，貴族主義官僚與軍國主義官僚二者，遂至相剋、對立。日本這兩種官僚勢力的相剋，自入戰爭時期更加尖銳化；同時相剋而又相成的日本官僚力量，也隨著戰爭的發展而發展。

日本政治無論怎樣帶著極濃厚的官僚特質，但在平時尚有議會與政黨的節制，到了戰爭的時候，日本的議會與政黨完全變成有名無實的「贅物」。日本政府既不受議會的

有力的牽制，自然也就完全脫離了政黨。政黨內閣在戰時日本，早已被埋葬了。日本自入戰爭以來已經召開過三屆的議會，但是每一屆議會上，任何艱難的複雜的問題，也都「一帆風順」地通過了議會的難關，以前日本政府認為風浪險惡的議會，居然變成了所謂「無風帶」了。戰前某屆議會上濱田國松與寺內陸相賭「切腹」的「奇蹟」，在戰時的日本議會上是沒有的。日本朝野皆以「戰時」兩個字堵塞日本議員的嘴，像《物資總動員法案》和《電業國營法案》那樣嚴重而又受到議會最大非難的提案，也都終於不多少修改，全盤通過議會。日本議會牽制政府力量的減低與政黨政治的退場，意味著日本官僚政治性質的加厚，日本官僚政治的發展，幾乎達到絕對支配的程度。

二、日本戰時政治的無力化

日本戰時政治幾乎完全離開了議會監督的結果，一方面固然減輕了政府顧忌國民直接指責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卻推進官僚內部的鬥爭，貴族主義官僚與軍國主義官僚的鬥爭，再加以內外情勢的困難，於是逼出了「官僚獨善主義」的顯著發展了。

日本在侵華戰爭發動的初期，日本軍閥也曾企圖造成軍人法西斯獨裁的局面，例如戰爭爆發後，日本軍人之努力謀政府政權集權化，設置太上內閣的大本營，以至前年五月間近衛內閣的大改造，皆或多或少具有這種傾向。然而日本元老重臣集團特權的存在，阻斷了軍部陰謀的進展，大改造後的近衛內閣，更加採取偏向元老重臣等穩健派的政策（參閱拙作《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載《世界知識》第八卷第七號）。後來，雖說宇垣大將的「協和外交」未得完成就被軍部所滾蛋，西園寺元老「最後一張牌」的近衛公爵也終於離開了首相的交椅，但是，繼近衛之後出頭組閣的「革新」政治家平沼，也未脫離元老重臣派的政治意識；其次的阿部內閣更是元老重臣派所選擇出來的穩

健意識執行者。軍部儘管要求阿部內閣實施「少數閣員制」，要求這個一元化那個一元化，但是直至今日，阿部內閣的行政依然是多元的，其兼攝的閣員也要補充足數了。軍部的喉舌，固然無日不在責罵「阿部內閣喪失威信」，事實仍於日本政治的改革無補。要而言之，近衛內閣以後日本政府的貴族主義官僚的色彩，不但沒有稍減，倒反加深。

然而戰時日本的貴族主義官僚政府，卻受到軍國主義官僚的壓迫最厲害。日本軍部平時即擁有獨特的地位與實權，到了戰爭時期，其獨特的權限更加膨脹，所以加於政府的壓力，也特別強烈。日本貴族主義的官僚政府，為著逃避責任而極力採取「官僚獨善主義」，於是戰時日本政府，日益無力，由行政機構的改造到行政人員的調整，再由行政人員的積極調整到消極的調整，而其政府遂每況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了（參閱拙作《二年來沒落過程上的日本內政》——載本刊第二卷第六期）。

日本戰時最強的內閣，蓋棺論定算是近衛內閣，它成立於中日戰爭前，持續了一年又半之久。其後為時剛及一年，內閣已兩度更迭。去年一月四日是近衛內閣總辭職的日子，今年一月四日又是阿部內閣最後考慮去留的日子，現在一月四日雖已過去，阿部依然在戀棧，奔走疏通各方的有力者，但是今日日本政府的危局十倍甚於去年。去年今日的近衛只要決心繼續幹下去，沒有一個人敢請他滾蛋，但是今年有力量的方面幾乎全部反對阿部內閣。軍部對於阿部內閣，初因力薦白鳥敏夫為外相未蒙接受，已不快意，後又看出阿部內閣不但未履行組閣當時軍部所提的條件，實質上倒反日益走向相反的方向，如外交之親英美，如內政之放棄「少數閣員制」的集權準備等等，更加厭惡。另一方面，二年來官僚獨善政治的無力，喚醒了一部分日本人民的自覺，不少政客及論者又拾起政黨來作活動的招牌和作文的題目。日本既成政黨在議會開會皆著力於恢復應有的權力，對於阿部內閣一邊加以攻擊，一邊不接受參加的要求。阿部內閣處在這樣夾攻之下，一方面多少追隨起軍部的指令，如加強對蘇德外交的工作；一方面再三懇求五個既

成政黨黨首予以支持。但是日本政局的動蕩，不只是阿部內閣幾個人的問題，而是日本戰時內政外交一切艱難的集中表現。「官僚獨善主義」，是不能打通這個難關的。

日本政局動蕩的基本原因有兩方面：其一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困難，不但是孤立，並且孤立不住；其二是內政上的困難與複雜已經超過日本國民所預期戰時艱巨的程度多多。日本的侵華戰爭造成了自己的國際孤立，歐戰爆發後雖宣言「不介入」的方針，但以遠東問題的複雜性又無法完全中立。同時，單獨拉攏蘇德既不可，調整其對英法關係又不能有誠意，徒然苦壞了日本政府。日本國民在內政上所花的代價，據日本論客的估計也已超過了戰時應花的程度。日本軍部對於本年的財政預算，也破例地以「警戒預算的膨脹」的標題攻擊政府（見《國民新聞》社評）。此後財政物資的困難將更上百倍於今日。這是日本官僚政府的力量所不能挽救的，阿部內閣既無三頭六臂，只好滾蛋了。

三、日本官僚政治的分歧點

日本自從齋藤內閣（一九三二年）以來的歷任內閣，雖皆標榜「舉國內閣」，事實上只是一部分官僚與貴族為中堅的政府。這是日本國民所承認的。但是中日戰爭以來的官僚性更加濃厚，而這樣官僚性質加厚的日本戰時內閣的無力，也為日本國民所共認：「『中國事變』以來，日本迎送了三任的內閣，他們沒有例外地，沒有做了值得稱為政治的任何事件」（見津久井龍的論文——載《改造》新年號增刊）。日本國民更加看見了阿部內閣就任以來，為著貿易省問題或專任閣員補充問題而流著脂汗而苦悶著（同上），日本戰時官僚政治完全碰了壁。

然而日本政治的退化絕不是日本政府單獨的無能。一部分日本人自己也承認它是「日本國民全體的無政治自覺與無政治能力的綜合的縮圖」（津久井龍雄的意見）。這是正

確的，但是更須注意的問題是：日本官僚政治無能的深化確是日本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的結果。日本侵華戰爭增強了日本官僚政治的性質，同時又促日本官僚政治到沒落的途程了。最近日本各方面對政府不滿的強烈，是戰爭以來未有的情形，同時既成政黨政治復活運動與右派法西斯運動的積極化，也是戰爭以來未有的情形。

政友會總裁町田等政黨黨首雖然備受阿部首相的央托，但是他們的態度皆是觀望，據傳，「在現內閣沒有好轉的事實依然顯明以前，是無意參加內閣的（據上引《改造》雜誌）」。政黨議員毋寧是準備在議會上攻擊阿部內閣；馬場恒吾及山浦貫一等自由主義論客，更加鼓吹政黨政治的復活。今中次磨更自「政治的國民基礎」之點，強調議會政治的必要性（見《中央公論》及《改造》新年號）。政黨政治居然成了日本文人論客及一部分民眾所憧憬的對象，這不是日本國民對於不完全的日本議會政治的留戀，而實在是日本戰時官僚政治太無能力了。另一方面，日本右派法西斯也以「革新政治」的標題，企圖日本政治的新開展。戰時日本右派法西斯的組黨運動與團體活動，以末次信任內相的時候為最高漲，其後步著下坡的趨向。迨至最近右派結黨的運動，又隨既成政黨的政治復活運動的開展而再開展了。前年年底，曾被囑望為右派法西斯首領的末次大將，已再出頭，召集日本右派政黨的黨首；如「國民同盟」總裁的安達謙藏、「大日本青年黨」黨魁的橋本欣二郎，及松井石根大將、建川、中野、德富、三宅等人，積極籌備新右派政黨之締結。他們所標榜的共同目標，是「建設新東亞」的外交刷新與庶政革新；企圖締結「東亞建設國民聯盟」。

然而右派法西斯政黨運動的發展，卻與政黨政治復活運動，走著相反的方向，它毋寧是反貴族主義官僚的政治力量的發展。這種力量是與軍國主義官僚配合著，同時又是戰時官僚政治沒落的必然產物。在戰爭中急速膨脹起來的軍部力量，一方面極力排斥既成政黨政治，他們視議會為贅物，他們欲使內閣集權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厭惡貴族官

僚的迂腐無力。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最希望軍事獨裁政府的實現。貴族主義官僚自戰爭以來，既利用軍部的這種心理，儘量採用大中將級的軍人。但是日本不是德意，日本又沒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人物，軍人獨裁政治一時不能實現。

然則日本政治往何處去呢？日本國民儘管因為官僚政治的無力而憧憬著政黨政治的復活，但是戰時特殊情形卻遮斷了這種希望。日本政治的將來，毋寧是走向軍事法西斯獨裁的方向，不過日本未來的獨裁人物，決不是希特勒及墨索里尼那樣普通的平民。日本將來的獨裁者，必須具備兩種條件：一方面是皇族階級，另一方面又須是軍事的領袖。近衛只有貴族的條件，故不能繼續強化他的內閣，戰時內閣的歷任陸相，只有軍部代表的資格，也不能絕對支配內閣，將來或者須有軍事領袖的親王級人物出來收拾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的殘局。

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日本的政治還不能夠發展到上述的地步，恐怕還有一個時期繼續「官僚獨善主義」，同時又是徘徊在政黨政治與軍事獨裁的歧路口。

四、日本新內閣的展望

意圖戀棧的阿部內閣，終於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總辭職，繼任的米內內閣也已於一月十六日組織成功，表面上是一新日本的政局了，但這是不是日本官僚政治分岔的決定點呢？不是的。日本官僚政治還須一個時期徘徊於貴族主義官僚與軍國主義官僚之間。只要考察這次阿部內閣總辭職的情景，幾乎和去年八月間平沼內閣總辭職當時的情景完全一樣，就不難解答我們的斷言。

阿部內閣總辭職的第一個原因，應首推他們辦理外交毫無成就。阿部上台的最主要使命，雖然表面上標榜為處理「中國事變」，事實上就是打破國際孤立的僵局以拯救深

陷的泥足。所謂「中國事變」既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可以根本解決的問題（如津久井龍雄所言），又不只是中日兩國的問題，所以日本侵略者自己也承認日本欲結束中日戰爭，必須依賴日本國際關係的調整。阿部和野村終其任期，可以說集注全力於這個國際關係的調整工作。但因日本政治組織的複雜與外交的二元性，致使外交大權行使者的外交方針，與「政治推進力」（軍部自稱）的外交方針，不能一致。再加以日本因侵華戰爭引起的國際困難，日本外交的能否發展，完全操於中國抗戰的手中，遂致多邊外交既無開展可能，單方面的偏向又受阻礙。日本政府的穩健意識，固欲積極調整對英美外交關係，甚至不惜投下相當代價，如現金賠償美國種種損失及允許開放長江及珠江，但是事實上外格於中日問題的複雜與中國抗戰的持續，內又阻於軍部幻想外交的「推動」，結果終如軍部喉舌的指責：「八方美人外交」陷於四面楚歌的情勢下。阿部內閣的外交到了末期完全紊亂起來，彷徨無措，實質上已又回到「白紙外交」、「無主外交」的原點上，這正和蘇德協定後平沼內閣辭職前的情形一樣。

阿部內閣辭職與平沼內閣辭職情形相同的第二點，在於兩任內閣同為日本政治實際「推動力」的軍部所推倒。阿部這次逼不得已而出於總辭職的一途，表面上似乎是政黨議員不信任內閣運動所促成的，事實上卻是軍部逼宮造成的局面。自遠因看，軍部自始即不喜歡阿部內閣的外交與內政方針，因為阿部內閣既未任命「革新」外交家白鳥敏夫為外相，野村又未執行軍部所要求的幻想外交（親蘇聯），在內政方面，阿部後來更不遵從軍部所提條件，實施少數閣僚的集權制。自近因看，軍部一月八日指令陸相畑俊六逼迫阿部總辭職，其咄咄之言有曰：「你不應該利用軍部決定處理『中國事件』之原則，來做延長內閣壽命的工具，全國民情均反對現在內閣，故應立刻辭職」。（畑俊六與寺內杉山兩大將會商後）。畑俊六且以辭職相挾逼。自此以後，阿部始決定不再戀棧。這又與平沼內閣總辭職當時的情形，沒有兩樣。阿部內閣總辭職而只陸相得以留任，更值

得玩味。

兩任內閣第三點類似的情形，是元老重臣對於內閣的去留，沒有多大成見，不加可否。日本元老重臣去年對平沼內閣，初雖懷憎惡與疑慮，但因後來「革新」政治家的平沼並不實行「革新」也就放心了，後見有田外交不「邁進」至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德蘇協定成立後更欲放棄軸心外交採取所謂「自主獨往」外交，更無逼迫平沼滾蛋的必要。元老重臣對於阿部內閣的支持更為積極，所以到狂妄的軍部必欲阿部總辭職而無知的議員為所利用的時候，他們的態度遂變成無所謂的灰色。只就近衛文麿堅拒軍部再三力逼出馬的經過考察，也可知其大半。近衛對人稱：「『中國事件』與國內事件，同樣重要，但就日前政治經濟的情狀而論，對於國內事件尤應加以更大的注意。今日國內之情狀確比我任首相時，困難得多……我希望將來的首相，能夠組成『內閣，既完整，又有能力』」（東京一月十二日電）。所謂國內困難的事情，當不僅指著財政經濟，毋寧是說政治的紊亂不統一，暗射著軍部干涉政治致使政府難於施政。這正與阿部內閣總辭職的宣言「……但時至今日，欲求意見之一致，顯不可得」，正相吻合。近衛堅拒阿部及畑俊六之請，稱：「鑒於此次政變的程度，經濟問題極關重要，余對於經濟問題的知識沒有自信，當收拾時局的大任，實為良心所不許」（一月十三晚在華族會館）。這又暗示著：軍部必須尊重財界意見。組閣大命不落於宇垣、寺內、荒木、池田，而落於米內海軍大將，元老重臣不甚支持軍部這次的發動，可知。

再就米內內閣與阿部內閣的陣容對照，則其相傲之點更濃厚。阿部內閣坍塌後，組閣大命既未落到陸軍代表者手裡，也未為政黨所拾得，就其閣員個別考察，也可看出日本新內閣絲毫沒有政黨政治的氣味，但軍部也不能收完全統制的效力，其間依舊供給貴族主義官僚施政而軍部從中搗亂（軍部雖美其名曰「推動」）的地盤。質言之，日本新內閣依舊是日本兩派系官僚的鬥爭場，米內內閣位置的分配，有代表穩健外交意識的有

田外相，有幾個次等的政黨閣員但不能代表政黨的意志，有幾個接近財界及實業界的閣僚但又不是代表人物，加之，軍部依然在背後擺弄，很顯明的，米內內閣依然沒有脫離「官僚獨善主義」的舊套，此後行政仍舊不能夠「自主獨往」。今日完全體現後的米內內閣，完全和我們所設想日本獨善主義官僚政治分岔後任何方面的政治性質，都不相同。具體言之，說是政黨政治的復活，實質上不符合。雖說米內內閣也擁有幾個政黨閣僚，如藏相櫻內幸雄、遞相勝正憲民（民政黨）、農相島田俊雄，及鐵相松野鶴平（政友會），但是民政與政友會兩黨首皆拒絕入閣，其力量亦可想見。至於軍事獨裁的傾向，卻更比前閣阿部內閣更為稀薄。

只是米內內閣的構成力量，在元老重臣財閥穩健派與軍部行動派的鬥爭上，無疑地略為偏向於元老重臣等穩健方面，比之平沼與阿部兩閣的穩健意識或更為強烈。第一，米內為首相，有田八郎任外相，指示著日本此後的外交方針，一方面將放鬆「德意軸心」的傾向，一方面加強對英美的工作。有田在平沼內閣時極力阻止日本的軸心外交發展至參加德意軍事同盟，而積極謀與英美接近並解決中日戰爭引起的諸問題。但是此後日本對英美的的工作將不只限於「一味諂媚」（軍部對阿部、野村外交的攻擊），而出以積極的態度，此次以海軍大將的米內任首相，既帶有此種意味。第二，日本新閣此後的對內政策，將較看重財政界及實業界的意見，以富於自由主義思想的實業界的櫻內為藏相，以三井財閥的掌櫃藤原銀次為商工相，以信托事業及電力事業老闆的島田為農相，等等，即其具體指示。此外，如以歷任貴族議員的兒玉秀雄為內相，更是指示著米內內閣對元老重臣穩健意識的偏向。至於日本新閣之解決「中日戰爭」將努力於英美兩國身上找出路，或將更加積極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局面。

但因遠東國際關係的複雜與我國抗戰的堅決，「東方慕尼黑」的局面也不易形成。即自日本本身言，最初呼聲最高的宇垣一成既未上台，軍部又不能贊成政府對英美的更

大讓步，則「東方慕尼黑」的發展未必就達到形成的地步。日本新閣仍不能置軍部意見於不顧，其以小磯國昭為拓相即其一證，那麼米內內閣「處理中國事件」，自不容易順手。即在內政方面，由於軍部擴大作戰的固執而統制經濟的加緊實施自難避免，雖有幾個財界及實業界的閣員，結果也只徒然增加軍部與財界實業界的糾紛，因而加深日本政界的鬥爭罷了。在更艱難的局面下存在於兩大勢力傾軋之間的米內內閣的危機性，實較以前的內閣更為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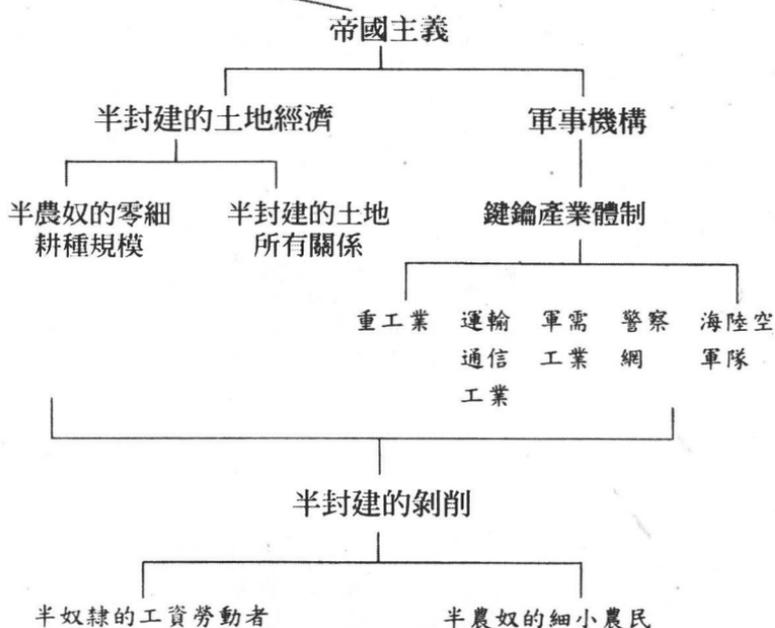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

原載一九四〇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一期

日寇特殊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和社會

從拙作《日本帝國本質論》（見本書第二卷以後連載）分析日本帝國的經濟基礎可知：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由（一）軍事機構——基礎產業體制，及（二）半封建的土地經濟兩面構成的。軍事機構和基礎產業聯著密切的關係，結成一個體制，其具體的內容就是海陸空軍隊、警察網、軍需工業及重工業。半封建的土地經濟，也囊括著兩面，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及半農奴的零細耕種。而構成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軍事機構——基礎產業體制及半封建的土地經濟又都是在半封建的剝削關係上樹立著，其頂上一層就是地主資本，商業高利貸資本、產業資本、獨占資本、金融資本、財閥，及國家資本托拉斯的一串。半封建剝削的對象有兩種，半農奴的細小農民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歸結起來說，日本地主資本。商業高利貸資本、產業資本、獨占資本、金融資本、財閥、國家資本托拉斯，完全依存於半農奴的細小農民及半奴隸的工資勞動者身上。這層關係如果更顯明地表示出來，就可以畫出下列的圖表：（見下頁）

日本資本主義→土地資本→商業高利貸資本→產業資本→財閥→國家資本托拉斯



日本資本主義↓土地資本↓商業高利貸資本↓產業資本↓財閥↓國家資本托拉斯
 具備上列構造和特質的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其形成及發展上必然地帶上不徹底的，不調和的特徵。這種特徵反映在政治上及社會上，並且貫通於各方面。

一、政治上的反映

日本帝國的特質在政治上的反映，還可以縷列下列事實：

(一) 明治革命的不徹底。日本德川末期雖有農奴抗爭的革命條件，但是由下士發動的布爾喬亞革命卻不能徹底利用這有利的情勢，明治政府倒反因為外逼於先進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懼於勞農大眾的騷動，而中途停止了「民主革命」的進行。舊時的封建諸侯終以明治六年「地稅改正」為轉軸而解消，但這只是布爾喬亞氾與大土地領有者的妥協，大土地領有者在瞬息間轉變為地主階級，寄生於土地上，後來又寄生於債票上——當然沒有脫掉對於土地的寄生性。地主階級的權限依然站在很重要的地位。布爾喬亞氾與大土地領有者的妥協，布爾喬亞氾與地主階級的融化，必然地產生民主革命不徹底的結果。明治年代的民主主義運動，結果只制定了一道不三不四的《憲法》，大正年間較切實的自由民權運動，也不過得到一個不徹底的普選制度。在這普選制度下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是以財產所有額為標準，這是第一種特色。第二種特色就是婦女沒有參與的權限，既無被選舉權，也無選舉權。第三種特色是選舉時候的壓迫和收買，受賄和棄權等等醜態百出無窮。有這三大特色的日本普選制度所包含的民權氣質實在太少，實質上，我們可以說日本的民主革命到今日還沒有完成。

(二) 布爾喬亞氾與官僚的妥協。二者妥協融化的結果，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及實權的比重上。封建勢力不但殘存著極強大的力量，同時也得到法律的保障。以下列三點可

以看出：

1. 不純潔的政治機構。反映布爾喬亞汜與地主階級妥協的憲法（表面上是民主政治的憲法），第一，保存天皇地位及其大權。其次，還有樞密院和貴族院落之設置。元老和重臣的實權之遺存，也是封建特色的一種。更其可笑可驚的，內閣不對政黨負責而對天皇負責；同樣閣僚的海陸軍大臣不隸屬於內閣總理之下而直轄於天皇，天皇充任海陸空軍大元帥。

2. 絕對勢力的膨脹。日本封建的絕對勢力因為受到基本法律——憲法的保障，同時又有堅固的經濟基礎（廣大的官有地及巨大的官營產業），所以樹立了鞏固的基礎。軍閥的氣焰，近年來更加增高。日本軍部的跋扈並不是偶然的，天皇政權之神權說，近來更加具體化。通行三、四十年之《天皇機關說》居然在前幾年發生了空前的大問題。這種學說的創設者，前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博士，居然被判「不敬罪」（在日本是一種嚴重的罪名）。另一方面，民間右翼法西斯團體的勢力，日益洶湧膨脹起來。

3. 布爾喬亞汜與絕對勢力的結托緊密。當此工農大眾的勢力日益增長的時候，原可站在支配地位的布爾喬亞汜，不但要利用絕對勢力，利用官僚和軍閥，並且要密切與之聯結。絕對勢力和布爾喬亞汜，表面上有時雖表現對立的情勢，但這是內部的對立，其在對外的關係上卻是一致的，而形成一種對立物的統一。在階級的關係上，絕對勢力與布爾喬亞汜是有愈發緊密化的傾向。九·一八事變以來劃一新時期的日本法西斯的發展，只有在此二者緊密聯結的基礎上始能步上德意的後塵，而現在正在開始這個新階段。

二、社會上的反映

日本帝國特質在社會上的反映，也可以從幾方面來分析：

(一) 社會制度上的反映。明治維新後，日本封建的身分制度表面上雖似廢除，而實質上則尚遺存，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身分制度的調整而已。把舊時的公卿諸侯列為華族，諸侯的家臣闔列為士族，農工商及「穢多非人」(未列入士農工商的賤民)列為平民。現存的身分制度就是皇族、華族、士族、平民。這不只是形式上的遺存，皇族、華族、士族且有他們適應的實權，寧可說是特權。其次，男女之間是極度的不平等。男尊女卑雖說是男性中心社會的一般現象，但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未有如日本懸殊之甚者。

(二) 生產技術上的反映。生產技術發展的不調和不平衡，第一表現於現代高級工業與零細農業耕種的並存。大阪東京一帶的大工場生產與一般農業經營上的畜耕及人耕，相差有幾百年之感。即在大都市工業之中，亦有高級現代工業生產與低級家庭手工業(例如一般婦女在家庭兼作的所謂「內職」之中，有抒解舊絲襪及所謂「馱果子」(手製的糖果點心之類)的手工業的對照。東京丸之內一帶的宏大建築物與郊外的小板屋，也是對照之一。總之，都市有急速的進步而鄉村則很落後。這裡存在著都市剝削鄉村的事實，形成了農民境遇劣於都市工人，農村與都市對立的情勢。

(三) 文化教育上的反映。在上述不調和不均衡的發展情勢之下，一般的教育只能以接受官方的指導及命令為最高限度，可說是一種變態的奴隸教育。此種奴隸教育尤其是表現在婦女教育上。婦女教育普通以所謂「高等女學校」(不及男子中學的程度)為最高度，男子專門學校或大學完全不收女生，女子大學及專門學校全國只有幾個，並且只限於醫科及師範科而已。因此，文化仍未脫離素來「盆栽文化」的氣質，一般人民雖有「親切」之美風，但是器量還是小。日人信教非常虔誠，到處可以見到大小廟寺及神社，時時可以見到許多男女恭敬地參拜。宗教的信仰並且由神而及於人，時常發見許多鄉下人乃至紳士在皇宮前的二重橋邊跪拜祈禱。一般皆崇拜英雄。

(四) 革命鬥爭上的反映。在經濟的政治的特殊情形下，日本的革命勢力也很不健全。受到高度半封建剝削的工農在革命上皆有他們的弱點。農民素來保守，很少革命性。吸收了新空氣而最有革命性的現代工業，尤其重工業的工人，卻又處於嚴密監視及高度壓迫之下。日本產業之最大特質就是官營工業之龐大，一百多萬的工人皆在刺刀之前勞動著。其餘大小財閥經營的工場中，同樣地布滿著軍警網。日本農民因為農業生產的單純化而有其「同一性」卻無「共同性」，在革命上不能密切聯絡。現代工人也因嚴密的監視和高度的壓迫而不易堅固團結。站在革命前線的，仍然由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占多數。這些革命者主觀上雖然很清楚，但卻容易動搖。所以在表現上看得到的只是理論鬥爭多於實際行動，而理論陣營又極分歧。又如經濟鬥爭多於政治鬥爭，又在表現一個缺點：個別勢力雖已充分存在，但是組織化的整個力量還是不夠。

然在日本的政治客觀上，最近有一種極顯明的傾向，就是階級勢力之集中化。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法西斯的膨脹逼得自由主義者銷聲匿跡，中間革命份子不能再徘徊於歧路上，不左傾就須右傾。而左傾勢力在這高壓之下，幾乎可說完全潛伏化了。不潛伏化的份子就須「轉向」，投降軍部政府。結果，日本的政治秩序及社會秩序，更加完全完全依賴嚴密的警察網及龐大的軍隊始得維持。社會的危機愈發潛伏化和擴大化。

三、國家對外行動上的反映

日本國家機構的特質不但表現於國內各方面並且表現於對外的各種關係上。日本資本主義特質在對外關係上的反映，可以由顛倒的經濟程序及滑稽的二元外交來說明。日本資本主義在它未及健全生長的時候即已跨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卻是軍事的帝國主義，是軍隊領導著商品和資本前進的，資本和商品跟在軍閥的屁股後面。

先進帝國主義之國際的進出，是商品和資本先到，在某一地方樹立了商機，然後軍隊和政權才跟著到來。英國之於印度即是一個顯例。若日本帝國主義之於台灣、朝鮮、關東州、東三省等地方，都是先用軍力及政權掩護商品及資本前進的。即在金融資本的勢力相當強大的今日，資本家穩定市場的要求仍為軍閥侵佔領土強化軍力的行動所壓服。結果，資本家和政府仍不得不跟著軍部亦步亦趨，採取一致的步伐。

日本軍事帝國主義的本質不僅表現於經濟關係上，並且表現於外交上，日本民主革命的不徹底和民治政治的不純潔，保存著封建官僚的統治權及軍閥的優越地位。日本帝國的外交方針不能完全決定於內閣，有時政府的外交行動竟為軍部所不齒。於是演出二元外交的滑稽把戲，日本政府倒反要屈服、遵從軍部的路線。但到戰爭失勢圖謀收場時則又以軍人的責任來作結束。我們單就最近的事實考察，即可了然。九·一八事變當時表演過，這次大戰爆發前後皆表演過。日本軍閥在九·一八事變當時，代表日本產業資本及金融資本的民政黨政府是反對事態之擴大的。幣原外相強調其「吞炸彈」的主張就是實證。但是軍閥蠻幹下去的時候，政府也就不支持軍部的路線，甚至於利用政府與軍部外交方針衝突的理由欺騙國際減輕政府的責任。及至日本軍閥及金融資本家一致於結束戰爭的時候，日本政府就把侵略戰爭的責任推在一部分少壯軍人身上。在這次全面抗戰的過程中，我們也常見到日本政府內部意見對立，唯一的元老西園寺被毒害，帶政治家意味的前陸相宇垣大將被暗殺的消息。但是近衛政府仍為軍部幫忙。迨至日本軍隊的作戰相當疲憊而希望著收場了。所以軍部與政府又唱起雙簧來。一方面軍部的代言人大肆其強硬主張，煽動反英反美的空氣；另一方面駐英美的大使卻又頻繁奔走於各國外交官之間。日本政府一向放任軍人蠻幹，而外交官周旋於國際政治舞台上，他們善於運用兩面外交。但是我們不能忘卻：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促使日本政府 and 軍部的外交步驟有急緩之差，而其對立的統一，卻是一樣的侵略，始終是不利於我國的。即遠東政策

徘徊不定的英美各國，也容易上日本這種兩面外交二元外交的當。

此外，日本帝國的國家行動還常表露殘暴、陰險、卑鄙等等中世紀的色彩。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來說，因要占國際的便宜而竟慣用不宣而戰的侵略戰爭。在兩國戰爭上居然假冒敵人的國徽，真是雞鳴狗偷的技藝。英人拉敦最近著評日寇為侵略罪惡的發明家，稱：「事前未經宣戰而突然進兵，而猶名之曰和平，明為友善而暗作敵對之準備，煽動鄰邦之紛擾以造成武裝干涉之藉口，而猶曰恢復秩序，占領他國之領土而自稱無領土野心」（上海《字林西報》）。日本人個人是謙恭誠懇的，但是封建的軍事性的日本帝國卻極其殘暴而卑劣。自我們全面抗戰發動以來，這種卑劣和殘暴的事例，真是舉不勝舉，日本帝國主義已為人類所共棄了。

原載一九四一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五期

日本的欽定憲法與陰性議會

一、日本憲法反映日本國體

日本的所謂《帝國憲法》，正和各國的憲法一樣，在其國家的政治上占著重要的地位。日本政界的各黨各派即令互相傾軋，互相對立，但是他們之提出政見和主張，都是在所謂《帝國憲法》的名目下提出的，這是各黨各派絕對一致的地方。尤其可笑的，即連所謂「無產政黨」也在這一點上和其他的資產階級政黨完全一致。無產政黨所標榜的所謂「合法性」，或「合法主義」，就是宣告不違反《帝國憲法》的意思。日本憲法還制定《治安維持法》及其他種種法律及命令，防衛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固然，日本也有企圖反對《帝國憲法》的事件或人物，但是這種企圖和人物立刻被判定為反對日本國家乃至反對天皇的叛逆，而被處極刑。除了根本反對日本國家機構的所謂「叛逆」之外，上自自由主義者的尾崎□堂下至法西斯的強硬派，乃至合法的無產政黨，都是標榜「憲法主義」，一切行動上表明皆要遵循《帝國憲法》的規定。然則日本憲法的本質究竟如何？它的基本主義是什麼？值得我們研究。日本憲法之為十足的欽定憲法，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就是說：要理解日本憲法的基本問題，須先究明君主主義在日本憲法上所占地位的重要。關於此點，美濃部學說的解釋是：

「就大體言之，第一是君主主義，第二是立憲主義，這是日本憲法的二大根本主義，日本憲法可說是結合調和這兩種主義的東西」（據社會科學辭典）。

美濃部博士的這樣見解，在日本民主主義運動的全盛時期雖曾被尊重為解釋《帝國憲法》的標準，但至近年因為日本主義之猖獗，而被日本主義者及國體明征派，誣為有

傷君主主義乃至「天皇大權」的尊嚴，終至釀成所謂「天皇機關說問題」。實則，美濃部是把日本憲法上近代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成分，故意評得超過實際多多，他的用意是在於美化日本憲法醜惡的本相，想不到學說風行數十年後竟終於因此而獲罪。

關於日本憲法的本質問題，日本憲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曾經赤裸裸地表示過，其言有曰：

「君主親握立法行政之大權，不得君主之認可，不得製成一法，不得君主的欽諾，不得有任何施設的主腦，可以說：『國家即君主，君主即國家』。但與擅政（專政）者不同。在立憲君主國，立法組織，行政組織，以至百般政治，皆有一定的組織，依紀律以運用」（《伊藤博文秘錄》二九二頁所載）。

伊藤博文之起草日本憲法，完全取法於普魯士憲法，從他上面簡單的敘述，已可見到他完全應用君主主義貫徹於日本憲法上，日本憲法的根本特色，也即在此，我們可以稱之曰「十足的欽定憲法」。

我們從日本憲法的本質尚可瞭解日本的國體，因為一般的憲法同時也就是「國體」的簡解，日本國體的解釋問題，在五六年前掀起了一大風浪，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變成國體明征派眾矢之的，竟然被提起公訴，即在此時。

當時的岡田內閣專為這個問題，特請樞密院顧問官金子堅太郎伯爵，到文部省撰成憲法講義（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以為代替美濃部解釋的標榜，而滿足日本主義者及國體明征派的要求。金子把日本憲法與日本國體弄得更密切，他說：「憲法之制定根據我國體的本義」；即是所謂「國體本義的明征」。岡田內閣就根據金子的國體明征主義發表《明征國體的聲明》（昭和十年七月十八日），更具體強調君主主義，申論日本憲法第一條的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

於此更可瞭解日本憲法如何反映日本國體。究竟日本國體怎樣？我們先從日本憲法的制定形式，求得一般的論據，詳細的剖述則留在以後各章。

日本憲法所反映日本國體的第一種特徵，是《帝國憲法》的修改，是非常嚴重而困難的問題，事實上日本憲法可說是不許修改的。日本憲法的修改，不但需要帝國議會的協贊（只是協贊而不是主動的修改），尤其重要的，須有兩種條件：其一，僅依敕令始得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換言之，只有天皇的動議始可以討論修改憲法的問題，人民代表的議會並沒有提案權；其二，在議會方面的決議，也與通常的立法手續不同，必須兩院議員都有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始可以構成議案。日本憲法的這種固定性，決定了憲法在日本政治上的重大作用，使日本的政治制度長久固定，沒有改進的機會。

日本憲法形式上的第二種特徵，就是上面提過的，屬於欽定憲法。在民主政治的各國中，憲法的制定是依國民一般的投票，或由國民代表會議舉行的。反之，在君主政治的國家，則由君主大權制定憲法，這種憲法稱為「欽定憲法」。而日本憲法是純粹的欽定憲法，在其制定上專由天皇大權制定而頒布的。在這兩種制定的不同手續上，就確定憲法本身的性質。若是人民代表會議制定的憲法，自可隨時代的變化而為人民會議所修改；但是日本憲法因為是欽定憲法，又其固定性極強，所以一般認日本憲法為日本國體的成文化，或謂日本憲法的規定指示了日本國體的本質。在此點視日本憲法同於日本國體，在我研究日本政治構造者，首先應該深刻予以注意。

二、天皇的大權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瞭日本憲法是純粹的欽定憲法，其固定性甚強，全部貫徹著

君主主義。現在再就其條文的規定研究其君主主義的具體內容。

日本憲法是由七章合計七十六條組成的：第一章天皇，第二章臣民的權利義務，第三章帝國議會，第四章國務大臣及樞密顧問，第五章司法，第六章會計，第七章補則。天皇大權占著第一章，天皇諮詢機關的樞密顧問也占了專章，可知日本憲法內容的一斑，但其特殊而值得首先深刻注意的，就是「天皇大權」的廣大。

日本憲法上的「天皇大權」的第一種特質，是不需要人民代表議會協贊，並且包括極其廣大的範圍，這裡舉其犖犖大者則有如下三種類：

(一) 在實際政治上演最大作用而關係軍事的重要事項，全部屬於天皇大權的範圍內，絕對不需要議會的協贊，更不許議會過問。日本憲法規定「陸海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的大權」(第十二條)，「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的大權」(第十三條)，專屬之於天皇。日本資本主義正如以前拙作所剖述的，具有極濃厚的軍事性，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與對外的侵略戰爭具有特殊的關係，更增強了日本天皇的軍事大權的作用。

同時，超然獨立於日本內閣之外的陸海軍部，因其帷幄上奏直隸於天皇，也正可以利用天皇的軍事大權，肆行無忌，甚至壓倒政府及其他的政治力量。日本現代民主主義的成份更為削減，增加天皇大權之實際的擴大。

(二) 日本憲法規定：關係皇室的一切事宜均依「皇室自律主義」。換言之，皇位的繼承、攝政的設置，及其他關係皇室的事項，完全歸皇室自己決定，政府及人民皆無過問之權。這些事項，即令同時又是關係國家大事及人民生活計者，如皇位的繼承、攝政的設置、皇室財產的處分等等，也是一樣無須經過議會的協贊，一概由皇室自己決定。

(三) 日本憲法特別規定戒嚴令的大權屬之於天皇(第十四條)，在這一道命令之下，全國人民的權利，即令是憲法所賦與的權利也立刻全被停止，或受到限制。這種命令既不是代表民主的議會所可頒布，更不是對議會負責的政府(固然日本政府不對議會負責，而是直接對天皇負責)所可頒布的。天皇的這樣大權，即令施行時違反日本憲法其他的規定，也以天皇的命令為依歸。所以日本憲法後又規定：「戰時或在國家事變的場合之下，不妨礙天皇大權的施行。」這裡可以看出日本天皇大權的絕對性，日本政治的絕對主義，也充分流露於基本法律上，誰能肯定日本政治的現代性或民主性？

三、女性議會的權限

凡立憲國家的議會，都是代表民意的機關，不但可以頒布基本法律及代替法律的法令，並且指令政府，監督政府。但是日本議會則無此大權，許多應具大權皆受到限制，日本政府又不對議會負責，幾乎可說是虛設，或是日本統治階級欺騙人民的工具。我們無以名之，稱之曰「陰性議會」，諒不為過。

日本憲法是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制定的。關於議會的規定自然也以普魯士國會為藍本。明治初年日本政府為著準備制憲而派伊藤博文赴歐調查各國的憲法。當時，伊藤博文所師事的，是德國守舊派憲法學者格耐斯特及斯泰恩。格耐斯特關於議會的設置，曾經指示伊藤博文如下：

「聞日本有開設國會的計劃，關於外交、經濟及兵制三項，絕對不可容許議會置喙」。

「若賦與議會以過多的權限，則政府將被議會所使役。如關於財政事項，若歸議會專權，則政府必成議會所豢養者而受其使役。……規定歲入之權，若全部賦與議會，則自己不能行使政治，終必釀成負責大臣辭職，再依議會之多數，以任命大臣。」（《西哲夢物語》——明治文化全集憲法篇）

格耐斯特的意見，完全站在官僚的立場，自然大使明治官僚的巨頭伊藤博文等極度喜悅而欽佩。又以當時日本封建性的濃厚，日本根據格耐斯特的精神，規定日本議會的地位，自非偶然的。於是日本憲法適應當時的環境而充分發揮絕對主義，嚴格限制議會的權限。日本議會與各國國會不同，所受到的嚴格限制約有下列重要事項：

- （一）沒有修改憲法的發言權；
- （二）沒有討論關係皇室事項的權限；
- （三）眾議院（人民代表機關）沒有修改貴族院會的權限；
- （四）沒有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的權限；
- （五）不得干預陸海軍的編制、常備兵額的決定，及軍隊的統帥派出。
- （六）預算審議權極受限制，幾乎變成有名無實的虛設。

再自日本議會的組成上考察，更可看出日本民意在議會上表現的薄弱，也就是日本議會無力的所在。日本議會是由特殊的二院制組成的，即眾議院與貴族院。貴族院議員完全不適用選舉制度，完全是貴族主義與官僚主義。因此，日本的二院制又與美國的二院制（元老院與代議院）之全部依公選制度選出者，不可同日而語；即連保守意味相當深湛的英國二院制，也且不如。英國的貴族院（上院），議員雖然不由於選舉，大多是世襲貴族議員，終身議員，形成英國的保守勢力；但在英國的二院制下，凡經過下院（眾

議院)三回以上可決的議案，上院(貴族院)即喪失其否決權，這樣明文規定著眾議院的優越性。但是日本的二院制則完全與此異趣，甚至於顛倒過來，貴族院對於眾議院的決議案，無論多少回，無論何時都可以予以否決。甚至在兩院發生衝突時，通常是眾議院被解散重新改選。反之，貴族院則無所謂解散。日本的二院制這樣規定著貴族院的優越性，所以在日本的議會史上充滿著眾議院對貴族院妥協屈服的史實，絕無眾議院對貴族院鬥爭的事件。在日本民主主義全盛的大正時代，一部分布爾喬亞自由主義者，雖也曾一時提過改革貴族院制的主張，但不幾何時復又銷聲匿跡，無聲無嗅了。近年來雖以「革新」聲浪的高漲而又有入主張改革議會制度，但即如貴族代表者的近衛文麿假借「國民再組織」的大題目，也沒有成功議會制度的改革。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者固然無法促成，法西斯派也覺十分困難，這是由於日本憲法規定：貴族院制的改革必須經過貴族院自身的贊成。

因為貴族院如此穩固，所以眾議院永久處於貴族絕對主義的控制之下，而現代議會中心的眾議院的權限，非常薄弱，日本眾議院等於虛設。雖然每屆議會也曾有幾許勇敢的議員發揮過指責政府政策的言論，但結果皆成空喊，特別對於重大事件如預算案，皆是忍氣吞聲地服從軍部的意志。

日本眾議院只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就是「預算案先向眾議院提出」(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但是憲法又例外的規定：「在緊急必要的場合，政府得依敕令為財政上必要的處分」(第七十條)；又「帝國會議不能成立預算案的場合，政府可以施行前年度的預算」(七十一條)。這些都是便利政府而削弱會議的規定。

日本議會完全是普魯士型的議會，當時的普魯士議會完全是官僚政治的附屬物，會議作用只是在官僚政治上施以代議制的粉飾，同時結合官僚政治與布爾喬亞社會，使官僚政治不至孤立而已。日本原是半封建性的資本主義，布爾喬亞汜的生長不健全，官僚

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日本資本主義雖已發展到金融資本的階段，但是日本的官僚主義勢力（包括貴族官僚與軍事官僚）卻也隨著增加，所以日本議會之附屬於官僚政治依然如故，特別是在戰時軍閥大勢力膨脹的今日。預料此後即令法西斯的「革新」勢力發展後，日本議會的權限將更低降。日本政黨的作用原即不大，在議會占多數的政黨，未必能取得政權，事實上日本就不是政黨政治的國家，近年來日本政黨的勢力尤為沒落，既成政黨即不解散，也都四分五裂了。這和英美典型的政黨本位議會政治比較起來，真有隔世之感。

原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六期、第六卷第一期合刊

日本特殊選舉制與官僚政黨

一、日本式的「普選制」

不論中外古今，一個國家有何種憲法，即有何種議會制度；有何種議會制度，即有何種選舉制，日本不能例外。因有純粹的欽定憲法，才有女性的議會制，也才有不健全的選舉制度。

在典型的議會政治的英國，是依無差別的平等選舉法選舉代表人民的議員的，他們以國民的代表資格支配立法機關，監督政府。但日本的選舉制度，卻又與日本獨特的議會制度相適應，又是一種特殊的制度。日本議會開設於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選舉法也同時頒布，規定擁有選舉權者只限於繳納直接國稅十五元以上的人民。這種限制，至明治三十年改為十元以上，大正八年（一九二九年）改為三元以上。但即使為三元以上，繳納這麼多直接國稅的人，仍是日本國民中的極少部分。大正八年當時有選舉權者不過三百萬人左右，不及日本人民總數二十分之一。對於這樣過度限制的選舉制，終於掀起了大正七八年以來猛烈的「普選運動」。普選運動又與當時漸漸抬頭的勞工農民運動結合起來，轟動過一時。日本政府則加以嚴厲的取締，大正七年因為普選運動而被投獄或被檢舉的，竟達一千八百人之多。但在這種猛烈澎湃的情勢之前，即連頑固的官僚勢力也終於感到有對於普選運動做若干讓步的必要，其限度止於容納布爾喬亞的選舉擴充權，其目的在於分離布爾喬亞政黨的普選運動與農工的徹底普選要求。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始於清浦官僚內閣瓦解之後，實現了主張「普選」的政黨聯合內閣，加藤高明內閣。所謂普選法也始得於大正十四年五月與樞密院制及貴族院制的修正同時

得到可決，而於同年十二月頒布實施。

但是日本的普選，始終是名目上的普選，實際內容是等於限制選舉制，其限制條件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完全限制婦女的參政權。在實施普選的文明國家中，把婦女除外的國家非常之少。

第二，設年齡的限制。歐美的普選法大多對二十歲以上的國民賦與選舉權，而日本的選舉年齡則定為男子二十五歲以上。日本男子到二十一歲即有當兵的義務，選舉又是每四年始實施一次，所以實際上須到三十歲左右，始得行使選舉權。

第三，現役的陸海軍人除外，也有重要意義。這不是削弱軍人政權的意義，而是軍部集中統制的用意。

第四，限定在同一市鎮村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始有選舉權，這是把因為生活而須時常移動的大多數勞工除外的用意。

第五，候補者須繳納保證金千元。這種規定對於貧窮者、勞工，及農民代表的候補者，加以極度的限制。

在這種限制選舉規定之下，實際有權者中有一千三百萬人，比之大正八年時代的三百萬人，不過增加了一千萬人，在日本總人口九千多萬人之中，不過占一四％強。再就普選制實施以後舉行的總選的總投票數加以考察，昭和元年約九五〇萬，昭和三年約一千萬，昭和七年約九七〇萬票，這種普選實施的作用並不很大。

二、買收與干涉

自選舉開始以來，日本的議會選舉即有一個原則，政府黨必勝。固然嚴密地說來，政府方面並沒有完全勝過，但是幾乎全部是政府方面的政黨占到勝利。只在當時的政府與有力政黨的關係不和協的時候，政府方面始歸於敗北。為什麼說政府黨必勝呢？政府干涉選舉的效果是第一原由，第二是政府黨有豐富的選舉資金，便於收買投票，是一般承認的公開秘密。即自普選實施以來，這種情形仍毫無改變。第一次普選的昭和三年的選舉中，政府黨政友會，由田中義一經手使用了一千萬圓。這種例子相當的多。政友會及民政黨等政黨每次選舉至少也要使用五百萬元以上。若就候補人平均分配，則普通每一個使用三萬元至五萬元，多的使用十萬元。

這種收買的選舉須政黨與巨大財閥勾結始有可能。此外尚且用盡種種不正的手段。現舉一例，則有尾崎行雄所提起的「機密費」與政友會選舉的關係：

第一，沒有比事實更正確的東西。我國使用機密費，使用過軍事關係的機密費的事例，是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及西比利亞出兵即大正三年事件以來的事。……中日戰爭當時陸軍使用的機密費只有三六九，〇〇〇元。日俄戰爭是三二〇萬元。今日的西比利亞是無人之地，沒有敵人。在沒有敵人的西比利亞，無人之地，倒使用了二千四百萬元，對於此點有不懷疑的人嗎？……若就這二千四百萬元的用途分析看，則大隈內閣十五萬元，寺內內閣三四〇萬元，原內閣二千萬元，都是在無人之地使用的，所以發生使用於何處及如何使用的疑問也是當然的。……在寺內內閣的時候，發生過眾議院的解散。議會解散則如前述，選舉費是要特別用得多的，也是事實。這樣看來，這十五萬元突然增加到三百萬元，和此次的解散有某種聯繫，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樣，在原內閣的時代，也發生過為阻止普通選舉法而解散議會的事件，此時解散後的選舉上，軍用金極其富裕。

……既有二千萬元的機密費用於西比利亞無人之地的事實，則這裡也必有某種的聯繫……
(大正十五年眾議院議事速記錄——尾崎行雄)。

當時原內閣的陸相是田中義一，原氏與田中有特別關係，後來田中當了政友會的總裁。機密費有種種的種類，在其支出上，有大臣可以自由支配的，有須得軍事課長同意的。田中陸相時代的軍事課長是以後的教育總監，某軍派巨頭，當時的大佐真崎。他認為所要求機密費的一部分為不合性質而拒絕之。所以惹得田中大怒說：「真崎這個傢伙實在不懂理，免掉他。」終於，不久謫為聯隊長。

收買既是選舉的常識，為著費用的籌劃，通常不但要與財閥勾結，即連上述不正手段也都採用。日本選舉毫無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成分，於此已可明白瞭解。

日本政府干涉選舉也是公然的事實。其適當的事例，我們想起依普選法最初的選舉而實行的昭和二年府縣會選的實例。

政友會內閣在成立後不久即於昭和二年五月十七日經內務大臣鈴木喜三郎之手，免掉民政黨系的知事二十多人，而代以政友系的浪人。其後又大更動內務部長，及警察部長級，並在府縣會選舉時要求依照命令行動。這樣，在選舉的時候出於無限數的干涉，終至宮崎縣古宇田知事引起了司法問題。關於這位知事的干涉態度，可充一個典型：「知事室恰如參謀本部」，「選舉當時的古宇田氏完全超越政友會支部顧問的地位而有支部長之觀。知事家裡架設專用電話，召喚茂山高課長，授與高等政策，努力引導友方於有利地位」(昭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京日日新聞》)。

對於政友會及政府的這種干涉態度，民政黨也會發揮其對策。他們派遣前警保局長，前警視總監，被田中內閣免職的民政黨系的知事，前警察部長，前高等課長，充當所謂選舉干涉監視委員，使他們挨戶訪問他們前部下的現任警察部長，而加以威脅說：「你

們若干涉民政黨候補者的選舉運動，到民政黨內閣的時代就罷免你們」。對於政府黨之發動官僚行政機構而出於干涉，反對黨也發動官僚的要素與之對抗，真是分庭抗禮，無獨有偶了。無論如何，日本的選舉權，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要素的民眾選舉絕無關係，是可斷言的。

這些事實是同樣布爾喬亞地方黨，同樣官僚勢力相互幹出的把戲，但若與真正反對勢力的勞工農民的選舉運動接觸時，則其干涉又採取特別的方法。單單剝奪言論的自由，壓迫集合，還是不夠的。

三、政黨與財閥

從來政友會及民政黨是以所謂二大政黨而壓倒其他的中間黨的。單看這兩個政黨的情形，即可明瞭今日布爾喬亞政黨的性質。這些政黨如上所述，是立於這個國家獨特的官僚機構的下位，是在政黨的首腦部擁戴著許多官僚主義的政治家的布爾喬亞地主的政黨。雖然帶著極濃厚的官僚色彩，但是政黨自身卻不是官僚機構。又在伊藤博文創立政友會，桂太郎創立憲政會前身的立憲同志會的當時，這些政黨不過是官僚的一種工具，只是官僚機構的附屬物；但隨上次世界大戰前後布爾喬亞勢力的強化，而服務於其要求的政黨勢力也隨之而強化，終至擁有較獨立的活動力。此項，若就政友會檢點看，則在伊藤博文及西園寺公望的總裁時代告終以後，三井的原敬時代的大正初葉以前，經過中日及日俄兩戰役而膨脹起來的布爾喬亞氾的支配權已經確立，三井財閥對於政友會的支配尤其明確。別方面，幾乎同時期的憲政會總裁，也已經不是肥後藩閥的參議大隈，而是三菱系的加藤高明了。這些金融資本已不復如前，專靠官僚巨頭的庇護以獲得利權，已經積蓄了可以派政黨為代理人而活躍於政治舞台上的實力，因為他們覺得如此辦法更

為有利。固然，布爾喬亞並沒有放棄其與官僚勢力的勾結。這樣，隨伴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確立了兩大財閥資本的支配權。於是二大政黨的對立，遂至占政治的重要地位。但是一個政黨不能單為一個巨大財閥的利益而行動。政友會不獨服務於三井財閥的利益，不與對立的許多中間財閥的利益，也同時服務，即對於三菱財閥的利益，也不能絕對忽視。若離開布爾喬亞政黨應盡的全般行務，則不能維持政黨的生命。雖有激烈競爭和對立，但這始終是同一階級內的競爭和對立。不過，政友會是較為關心三井的利益，而民政黨是較為關心三菱的利益罷了。

政友會與民政黨之間政綱上或政策上的對立，只反映當時各自背後的勢力關係，並不是一貫的原則上的對立。

有些論者或謂：「兩黨政治任務之相異，在於兩黨各自勞動者農民政策的相異形態之點。民政黨比之政友會是較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之遂行者，而政友會則比之民政黨反動色彩較強的政策之遂行者，云云。」但這是非常的錯誤。只就兩黨之間些少的一貫政策遂行上的差異，不能作如此主張。治安維持法是在民政黨內閣制定的，而濱口閣的強行合理化；強行勞動化，不能說是對於勞動者農民的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固然政友會的田中義一總裁及鈴木喜三郎總裁等人的反動色彩較為露骨，官僚的傾向較為明顯，但是民政黨之與反動官僚勾結，也是傳統的強固，竟至承認自己為齋藤及岡田兩次官僚內閣的「準與黨」。

這種混亂，不獨限於政黨，即支配者政策的本質，也不能由他們的口頭禪來下判斷。在民政黨內閣有幣原主張平和外交；同樣，在官僚內閣有廣田主張協和外交，但是對華的侵略工作則沒有一個放鬆過。民政黨常使用似乎自由主義的言辭，特別是在對外政策上，但是民政黨前身的憲政會的總裁，又是幣原的盟友加藤高明，卻就是以有名的二十一條壓迫中國的責任者；同樣的政策無論在民政黨或政友會，乃至官僚的諸內閣，也都

採用過。必須充分理解這種地方，始可以明瞭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

四、政黨與官僚

表面上雖說是布爾喬亞的政黨，但是日本的這種政黨都和官僚主義有非常緊密的結社。

繼伊藤博文之後任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公爵不消說，即田中義一大將等等也都是極典型的官僚巨頭。即如原敬及高橋是清等人，雖不若他們之為純粹官僚，但也都是官僚色彩濃厚的政治家。

只有繼田中義一之後的犬養，是政黨的政治家，但他也不過是一個最新實權的總裁，至於後來的鈴木喜三郎，又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再就他方面的民政黨考察，若槻和濱口不消說，即上自構成民政黨首腦部的山本達雄、幣原喜重男以至背後的指導者伊澤多喜雄等人，也都是官僚的政治家。他們的大多數都是占住貴族院的議席而沒有眾議院議席的傢伙。日本的布爾喬亞政黨擁戴官僚為其頭目，換言之，上半身為官僚的要素所占，又是日本政黨的重要特色。又在既成政黨內部的統制及指導，也完全看不到黨內的民主主義，而總裁及其周圍的總裁式及官僚式的支配，卻籠罩著全黨。無論是政友會或民政黨，當初伊藤或桂氏這兩官僚巨頭發起結黨的傳統精神，即至現在仍然強烈支配著。政友會之服於田中義一之下，民政黨之欲擁戴軍部官僚的宇垣一成為總裁，都是這些政黨內部沒有黨內民主主義的證明。即如政友會及民政黨的黨則，也都規定：幹事及委員等皆由「總裁指令」。固然不是總裁個人決定的，但是既有如此規定，也足以反映總裁及其周圍主腦部的專制，且又保持其專制的法律地位。日本政黨經由這種官僚主義的構成而一任首腦部的命令，以奉承官僚機構上層的意思。

這種情形再從另一方面看，也就是日本政黨帶濃厚的私黨色彩的意思。即如尾崎行

雄等也說：「日本政黨事實上不是公黨，而與私黨無異」。這可以視為支配政黨的官僚傾向產生的一種趨勢。

無論在任何國家，布爾喬亞政黨經由首腦部以服務於金融資本，雖是事實，但在日本政黨上層部分則由官僚或政治家占支配的地位，再以其黨內官僚主義的統制，而全體經首腦部以與全官僚作深固的結托。因此，政黨立於官僚機構的下位。

原載一九四二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六卷第二期

日寇國民政治的沒落

——國民政治組織的糾紛

一、一體化問題的提出

在第八十一屆日本議會中（本年三月），最生動而引起國民關心的議案，就是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的一體化問題。這個問題無論在國民，抑在政府，都是日本現階段政治的某種必然趨勢，構成最重大的課題。

日本政治的動向，正要求著一種完全的全體性與強力性。企圖於此基礎上，開展其所謂決戰的政治。但直至最近，現實的政治並未表現出一種十分完全的形態，這當然基因於日本政府之遂行國策尚難獲得國民的協力，而日本國民還在到處表示願意和政府做更高一層的政治協力，以發揮其所謂「舉國的政治力」。這些事件皆在證明日本年來集政治強力的企圖，並沒有成功；而其失敗至最近反映成為所謂大政翼贊會和翼贊政治會一體化的問題。在上屆日本議會上，日本政府及議會對於此兩團體一體化問題的意見，固然互有徑庭，但惟其如此，更足以看出日本政府集結運動的前途，暗礁尚多，其不可樂觀可知。

在上屆日本議會上，金光庸夫首先提出這個課題，質問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的異同，日首相東條曾作簡單的答覆，但其內容依舊是政事結社與公事結社的舊話重提，而肯定翼政與翼贊兩團體並存的現狀。問題依舊沒有解決，殘留為未來的宿題。日本朝野一般的印象殆皆如此。

隨著東條所代表日本軍事法西斯政權的強化，日本國民愈益喪失了參予政治的機會。所以日本一般國民，皆認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一體化的問題，為日本國民要求強化「政治協力」的反映，對於兩個團體內部的問題，反視為次要。因此日本政治評論家，對此問題提出如下的意見：

「如果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的一體化，不能達成國民更高政治協力的要求，甚或招來更惡劣的效果，則此問題完全變成愚劣的結果，徒然終結於為論議而論議，甚或更壞，墮入一部分議員的惡作劇。其時，推進日本政治全體性與強力性的熾烈衝動，失掉了意義，而對於適切解決的途徑，應另做周到的考慮」（據津久井龍雄《政治力強化的本義》——《改造》本年三月號）。

日本政治上議會比重的減退，已是近來不可掩飾的事實，過去的日本政治，即未以議會為政治的中心，現在議會的政治地位更加低落，這是日本政治基本制度的問題，據日本憲法的規定，議會並未單獨成為政治的中樞，實際上也從未有過這麼一回事。樞密院、軍部，及財閥的勢力，時常構成日本政治的指導力量，起極大的作用。形式上即為議會中心，事實上並不是政黨政治，此種傾向至最近更加顯著。其原因有二：一為自由主義沒落的世界現象的反映，一為日本畸形國體的加深反映。空前深度及廣度的大規模戰爭，就是這種傾向的動力。

二、翼贊會與政治會的歷程

大政翼贊會原設立於第二近衛內閣時代，曾經經過許久的醞釀與演變，當時原以國民再組織的意義，欲與會議並行以補其缺陷。但至其擁有廣義的，或高度的政治性時，自難免有與議會對立之感。但是實際上，翼贊會的性格確與議會不同，其用意原在於直

接指揮民眾，例如最近將產業報國會、商業報國會、農業報國會，及其他職業或地域團體，收歸管轄，而進行其所謂「奉公運動」的指導，並及於經濟再編成的領導，是為大政翼贊會特別顯著的特色。日本統治者原欲借此地域及職業代表團體，補強單純的地域代表團體的議會，以發揮議會所不能完成的機能和作用。

日本政府之組織大政翼贊會，既出於此種用意，所以後來又新設調查局，調整調查委員會，用以充實協力會議。其用意據說是在於加強「下情上通」的意圖，也即上述原意。即其設地方事務局，由民間選出局長，也說是出於同樣意向。後來更與所屬部下組織，如部落會及町內會，加強有機的結合，其用意所在，尤為顯明。大政翼贊會的這種新姿態，據日本政府代言人的解釋，是欲立於國民運動的立場，圖謀精神與物質兩種生活的全面再建，稱讚其新作風愈與本來的意圖接近云。

大政翼贊會這樣新的發展，尚未至侵及議會的獨立的立場。議會形式上依然是憲法所保障的國民參政立場，據日本論客所誇耀，議會開院式上，日本天皇必定蒞臨，賜予聖旨，未改舊觀。尤其是預算案及法律案，仍經議會審議；總理大臣及各省大臣，對於地方選出的代議士，仍有懇切答覆質疑的義務。

迨至東條組織臨戰內閣集中職權，及軍部南侵冒險的一時勝利，日本政治就漸起質量的變化。數十年來貴族官僚與軍事官僚的對壘，漸有歸趨於軍部獨裁的傾向，貴族官僚及其他穩健派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其代表格的近衛派人物，幾乎完全退至後台。上屆總選舉的結果，民政黨與政友會的議席大為減少，而親軍派政黨的議員，占了壓倒的多數。軍部及親軍派的野心，在於組織軍閥支配的第一政黨，至去年五月二十日，正式成立「翼贊政治會」，其動機即在於此。

翼贊政治會之成立，在軍部及其革新派，確有兩種用意：消極方面，用以抵制先行

成立的大政翼贊會，積極方面，則在於增強所謂「政治力的結集」。而在日本兩大派勢力的對抗上，前者尤重於後者。「翼贊政治會」的宣言，強調「政治力結集」。這個口號自近衛第二次內閣末期革新派即已提出，他們原想以「政治新體制」為號召，以大政翼贊會為陣營，組織單一政黨。當時大政翼贊會已為革新派所操縱，現狀維持派乃起而攻擊，指為「違憲」、「赤化」，結果革新派的計劃失敗而退出了大政翼贊會。革新派被驅出了翼贊會之後，一面攻擊「大政翼贊會革新性的褪色」，一面則進行新組織，欲用以代替大政翼贊會。

革新派早即企圖組織革新的政黨，乃推當時的首相近衛為總裁，但近衛對於組織新黨，並不積極，只稱：「翼贊會是公事結社，是推進翼贊政治的議員的機關，無團體意志」。後來革新派的設施又為穩健派所攻擊，權終於落入穩健派手裡，革新派覺悟出：欲由大政翼贊會完成「政治力的結集」，已不可能，於是重新發動「第三政治力結集」的組織。

大政翼贊會是擁戴近衛文麿的團體。翼贊政治會卻是東條政府及戰時內閣時代的產物，時代性不同，意義也就不同。翼贊政治會推阿部信行大將為總裁，石渡花太郎及舊政友會及民政黨的重要份子，任該會常任總務，會內設事務局，遇必要時尚可設立其他機關。除陸海空軍大臣外各省大臣皆參加，貴族院及眾議院兩院議員，除參加其他政治結社者外，也可參加。此外尚有大政翼贊會重要分子，皆在羅網之列。據同盟社去年五月二十日電，被邀參加翼贊政治會的人數，達一，〇四四名，迄舉行成立大會之日止，確實參加者共三十二人。翼贊政治會全是東條政府支持下的一個政治團體，這正與近衛政府支持大政翼贊會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東條沒有任總裁，而以阿部信行代肩其名，而自任實際的總裁。這固然由於東條名望不如近衛，但作風卻比近衛之為半傀儡者又勝過一籌。東條較重實際，翼贊政治會規定由首相擔任監督，由各省大臣擔任會內各種運

動團體的指導。

「戰爭」的一時勝利，不但決定了國民政治方式的動向，並且決定了內閣職權的一元行使。的確是日本近代史上一個劃時期的發展。

軍部夢想多年的「公武合一體制」，實際上得了第一步的成就。最近東條內閣且更以《行政職權特例案》，在內閣攬得總理大臣的專權處置的地位，在地方也已實施行政一元化制度，即在瘋狂的「超重點產業生產」上，也得以一元地處置了。

在軍權統治一元化得全面推進中，只國民政治運動一項，未獲圓滿的成就。於是大政翼贊會和翼贊政治會一體化的問題，終於上了日本政治日程。

三、國民政治力集結的沒落

自從翼贊政治會成立以來，日本國內即不許再有第二個政治結社存在，換言之，日本軍閥確認翼贊政治會為唯一的政治團體，而其構成議員當中，大多為大政翼贊會的幹部，或內閣各省部的委員，或為其□國策機關的構成員，皆於議會之外占重要地位。要而言之，到此時候，日本議會算是以翼贊政治會為中心，此種性質的議會的存在，已無可否認，日本政府即欲以此政治會，為結集國民政治力的機關。

翼贊政治會只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它本身沒有直接的黨員，沒有鞏固的組織。於是第一需要地方支部的組織，以為彌縫；第二，需要與大政翼贊會合流。上述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一體論的根據，也即在此，這也是日本強化國民政治力的當然歸趨。但是這種合一論的主張，與國民自身所希望的政治團體，未必完全一致。日本政府想以現在的議會為中心作成一元的組織，究竟能夠吸引日本國民多大的關心，尚有疑問。在議會政治全盛時代，政黨勢力的增大，可以左右政府的運命及國策的方針，另當別論。

若現在基本國策業已確定，任何政治黨派，皆不能左右國策動向的今日，以議會為中心作成政黨組織，對於日本國民，能有多大魅力，實屬疑問。

政治的活動，原須以客觀條件為前提，絕不能蔑視此客觀的條件，而提出抽象的主張。若陷於這種抽象論，則大政翼贊會，乃至議會的廢止論，或將實現。日本現在的論客等業已退讓至此地步，而主張以現在的政治環境為前提條件，以尋求解決或整理國民政治結社的途徑。

從此主觀的要求出發，日本政論家逐漸承認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漸次加強其密切關係，為當然的趨向，並謂兩團體的最高幹部共通者居多數。但是實際的情形，並未允許二者立即合併為一體，故又有人主張二者固可協力，但彼此之間尚存有不同的區別。若就日本今日的政治情勢分析，大政翼贊會支配於元老重臣穩健派，而翼贊政治會則操縱於親軍的革新派，則欲此兩團體馬上混合成為一體，會徒然先掀起日本政局的波瀾，而促其動向愈益混亂，日本明眼之士亦皆注意及此。

日本現在一般國民所希望的，似在於更加努力於調和軍部、官僚（狹義的官僚），以及其他一切領域的政治協力，這種努力又不必拘泥於大政翼贊會，或翼贊政治會。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軍部與官僚云云，其間的政治氣流，究竟不是單純的東西，所以想以囫圇吞棗的辦法，依抽象的概念論，予以處理，結果必定失敗。故今日日本盛唱大政翼贊會與翼贊政治會的合流，或者可能使日本政界起一番的興奮，但欲期其效果甚大，則似尚困難。

日本政府雖以設立翼贊政治會，慶賀所謂舉國主義的政治體制一度完成，但是問題依然存在。除機構性質區分不明之外，尚有更嚴重的人事問題存在，要日本國民在此不義的作戰過程中及軍權愈益獨裁化的情勢下，全體拿出勇氣和努力，尚不可期。於是日

本一般政論家，將此勇氣和努力的原動力，寄托於少數的所謂有志者身上，而不敢期待於全體國民。他們稱讚德國納粹或意大利法西斯並不是開始即有今日的態勢，最初是靠少數先驅者，拓開道路的。他們只希望翼贊政治會會員，奮起登高呼喊，使日本國民予以響應，至於形式上的組織尚屬次要，並稱國民政治力不是先有形式或組織而後形成內容，反之必須先有先覺者出為領導，集結而成整個力量。甚而至於有些人，竟將此先覺者，囑望於軍事獨裁者的東條英機。日本國民政治力的集結，已可見其暗淡的前途了。

津久井龍雄對於東條英機的禮讚如下：

「議會席上的東條首相，雖以病後衰弱而其元氣則甚潑辣，其行動言論大有壓倒議場之風。首相在其病中或者有所深思遠慮，或者已得新決意及構想。故其對議員的答辯，處處表現著確定的信念。並且其信念的根底，完全根據日本國體的本義，以貫徹臣民之道，若反映於政治面，則上承陛下的信任，下想國民的愛國心，欲超機構與制度而著重於人類的工夫和努力。若東條首相深切貫徹此信念，則日本的政治氣氛，將急速振作、淨化、高揚罷！想像不到的政治力，也將浸透、普遍於日本全國吧！」（據上引《政治力強化的本義》）

津久井所代表的日本政客，顯欲奉東條英機為獨裁領袖，但是日本的政治制度，卻與德國納粹及意大利法西斯黨不同。津久井自己也承認：「日本的總理大臣，與外國的獨裁者大異其趣，且非民眾投票所可左右的；總理大臣既無黨的背景，其命運自然不受黨的支配云云」。但也惟其如此，日本總理大臣的地位，究竟是架空的，他沒有民眾作他的後盾，欲以無黨組織基礎的首相，領導舉國一致的國民組織，集結全體國民的力量，自無多大希望。

日本的國民政治力集結運動，已經退步至期待於「賢人領導」，議會政治及政黨政

治，固已失掉意義，即連年來近衛文磨等人所主倡的「國民再組織」，也漸失其根據。日本的軍權政治愈趨集中強化，而自由民權主義萎縮至無以自存的地步，日本軍事獨裁尚有它一時期繼續進展的可能。日本自由民權首倡者的福澤諭吉有知，不知將如何捶胸懊恨其子孫後輩的不肖哩！

原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半月文萃》第二卷第五期

日本戰時議會本質的檢討

日本稱去年為「決戰年」，而在這一年中，前此業已匆匆召開過三次議會，最後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開第八十四屆議會，是為第四次議會了。第八十四屆議會，經過休會期間後，業於本月二十一日重開。日本的戰時議會，多少總反映著日本作戰的姿態，因此對於議會的召開，也值得我們注意。而對於日本議會的本質，我們更擬乘此機會進而略加研究。

東京十二月二十日廣播告訴我們：「日本議會已定於二十四日舉行第八十四屆常會。現已有種種跡象，證明此次會議會期將大為縮短，議案之討論並將以迅速方式進行。政府已決定將二十七種方案及十項議案提出大會，儘先討論，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財政年度之概算，亦在儘先討論之列。……政府之準備既順利進行，貴族院及眾議院方面，亦希望實現政府縮短會期之政策，俾使政府集中力量，從事作戰」。

從上項消息的報告，我們已可以瞭解日本戰時議會的本質及本屆議會的使命。

第一，日本議會的根本性質，原即不能代表日本七千萬人民的意志，原即為貴族官僚及軍事官僚所把持的所謂人民代表機關，從來只是聽取政府報告、追隨政府的施政方針罷了，故常稱為「無風帶」的議會。

第二，日本無風帶的議會，到戰時，特別是到東條軍閥政府出現以後，更是風平浪靜，所以屢次會期皆甚縮短，甚至有僅討論兩日的，這次更加以短縮宣告國民，其為形式機構，尤可窺見。

第三，有些議會為憲法所規定，所以不得不按期召開，所通過的議案也是形式議案，

如每年的財政預算，也有些議會是臨時議會，因政府業已實施或將實施的「措施」，在憲法規定上須經過議會通過，其為形式仍無二致。

一、日本議會的本質

凡是一個立憲議會制度的國家，一切政治設施的總原則，皆須通過議會，重要的政治外交問題，皆在議會上公開討論。日本的議會制度，雖不完全。帶著極濃厚的封建的絕對性，但只要形式上議會其物存在則其政治外交的總動向，必緣由此議會的決議表映出來。更嚴格地講，惟其日本議會，是個傀儡機關，是個形式組織，是個追隨政府、追認政府設施的機構，其討論及決議，更可老老實實地反映日本政府的特質及其施政方針。日本議會，本質上就不是完全的民治議會，不能代表民意，而只追隨政府的屁股走，自東條政府出現，全副武裝的軍閥政權登台以來，戰時日本議會的「無風帶」，更是惟妙惟肖地反映東條政權的本質與施設。

日本議會之反映政府的施設，在其為傀儡機構及形式組織，故先就其議會的本質，加以分析，當更有助於吾人瞭解日本議會與日本政治的關係。

日本議會之為傀儡機構，應涉及其憲法規定的特質。日本憲法是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而判定的，其關於議會制度的規定，自以普魯士國會的規定也為依歸。日本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曾為準備立憲而赴歐洲研究各國憲法，在德國拜兩位保守派學者，格耐斯特及史太恩為老師，得他們的指示，而將普魯士的憲法精神，編織於日本憲法。

格耐斯特關於議會的規定，指示伊藤博文，幾種重要的原則如下：

「關於外交、兵制及經濟三項，政府絕對不可容許議會置喙」。

「若賦予議會以過多的職權，則政府將為議會所使役。比如關於財政事項，若歸議會專權，則政府變成議會所豢養而受其使役——規定歲入之權，若全部賦予議會，則政府便無法施政」（《西哲夢物語——明治文化全集》憲法篇）。

日本憲法關於議會的規定，在這指示之下，使它喪失歐美先進立憲國家議會享受的權利，其主要的有下列幾點：（一）沒有改正憲法的發言權，（二）沒有討論關係皇室的權限，（三）沒有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的權限，（四）不得干預陸海軍的編制，常備兵額的決定，及軍隊的統率事宜，（五）預算審議權，極受限制，幾乎變成有名無實。議會最大權限的預算審議權，在日本特別賦予日本政府，以便宜的處置，規定：「至緊急必要的場合，政府得依敕令為財政上必要的處分」（七十條）。最近東條要求議會預算審議手續簡單化，自非無根據。日本議會制度的殘缺，尤在於貴族院權限超越於眾議院的二院制，這正與英美的實情完全相反。日本眾議院與貴族院發生衝突的時候，只有眾議院解散，而貴族院根本就無所謂解散。眾議院沒有議決改革貴族院條例的權限，日本議會之為非民意機關，於此可以了然（以上均據拙著《日本帝國本質論》）。

日本傀儡議會到了戰時，尤其到東條軍閥政府時代，更充分表露其弱點與缺陷，而更老老實實地反映政府的意志和施設。東條政府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也即他上台的前期，乘其戰爭初期勝利的餘威，對於議會滿不在乎，簡直不放在眼下。但自太平洋戰爭第一周年以後，因為東條革新派政權與現狀維持派調和的必要，而其施政必需假手於議會，所以在今年中頻繁召集議會，其開會期間雖此日甚短促，討論經過也仍為風平浪靜，但其所反映政府施設及政權性質，更為充分而具體。但是我們若欲從根本瞭解日本議會之為政府的傀儡機構及其為軍閥政府的分罪組織，則我們更應從日本的選舉制度及軍閥政府之成立過程，予以適當的分析，然後始可得一基本的瞭解。

二、日本的特殊選舉制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制，各有其特殊的性質，表面上雖同為立憲國家，而其憲法所規定表達民意的內容與方式，皆有各自不同的規定，因而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東西皆有懸絕之例。

英國可以說是典型的議會政治的國家，採用無差別的平等選舉法公選國會議員，議員則以國民的代表資格支配立法機關因而支配內閣。所謂無差別的平等，固然不是絕對的，但各階層的人民，至少可以公開而廣泛地，自由而又自主地主張自己的利益，並且督責自己的代表，向政府主張自己的利益。各階層人民的志意能否表達，關鍵完全在於選舉制度的合理與否。

日本的普通選舉制度，正與其國體相適應，有其特殊的形式。日本選舉法頒布於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規定有選舉權者只限於繳納直接國稅十五元以上的人，至明治三十三年放鬆限制，改為十元以上，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又改為三元以上。這種限制表面上雖似甚輕，但在日本能繳納三元直接國稅的人，究竟仍為少數，大正八年當時的有權選舉者，不過三百萬人。為著消除這種限制，而在日本民權運動最高潮的大正七、八年間，曾經發動過猛烈的「普選運動」，其影響且已浸淫於農民間，與農民運動結成一體。日本政府為著壓迫這個普選運動而逮捕人民，達一千八百人之多。日本頑固的官僚勢力（當然包括貴族官僚與軍事官僚），對於一般人民仍不稍放任，他們認為：日本即令必須實施普選制度，其資產階級與工農群眾，也須設法分開。其結果，大正十三年底繼清浦官僚內閣之後成立的四黨聯合內閣（加藤高明內閣），雖然主張「普選」，其普選法且也通過於大正十四年五月（經貴族院與樞密院的修正），但是這個高潮仍阻止不了「農民勞動黨」的解散（尤其不可思議的，這種解散是在該黨成立的刹那執行

的)。其普選制度，始終只是名目上的普選，其實際內容仍等於限制選舉制。

要而言之，日本現在的普通選舉制，有如下的特質：

第一，完全否認婦女的參政權。在實行普選制度的文明國家中，除掉婦女選舉權的國家，非常之少。

第二，設下年齡的限制。歐美各國的普選法，大多數對於二十歲以上的國民，賦予選舉權。反之，日本則規定為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始有選舉權。但是日本男子到二十一歲即有服務兵役的義務，選舉又是每隔四年始實施一次，所以實際就等於日本男子須三十歲，始有機會行使選舉權。

第三，規定現役軍人的沒有選舉權。此點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日本大多數的士兵，來自工農群眾，此項規定，就等於限制工農的選舉權，故有上項結果。

第四，限定在同一市町村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始有選舉權。這種限制很顯明的，是加於工農及一般小市民的，因為這些人須為生活問題而時常遷移。

第五，被選舉人候補者，須繳納保證金一千元。此種規定對於貧窮者、勞動者及一般農民的候補者，發生很大的限制作用。

由於上列各種的限制，而日本普通選舉法所規定選舉權者，只有一千三百萬人，在日本總人口九千多萬人之中，不過占一四%。因為日本普選的畸形，致使一般日民對於選舉不甚瞭解，也不感興趣，其總選舉的總投票數，離選舉權者總數也很遠，昭和三年約九五〇萬票，昭和七年約九七〇萬票。簡單一句話，日本的普選制度，可以說只適用於資產階級及大地主。對於一般人民，無論在制度上，抑在實際施行上，皆無多大關係。

三、雙重壓迫下的普選

日本的普選制度，除開不完全的規定以外，還在實際的選舉投票上，加以收買與干涉的兩重不正當的阻礙，於是日本普選制，更成了四不像了。

因為日本普選制上表現出半公開的收買與干涉辦法，所以一向的普選結果，皆歸政府黨勝利。此項已經成了日本普選的一個定則，其例外非常之少，過去如此，戰爭過程中的今日，尤其是如此。前年的總選舉歸東條法西斯政黨獲得壓倒的全勝，自非偶然的。政府黨之所以能夠獲勝的原因有二：其一，為政府擁有實權，干涉選民的投票，此項干涉在前年東條政府，最為顯明；其二，為政府擁有豐富的秘密費可用作選舉資金，便於收買選民投票政府黨議員。這種現象在日本的國會議員選舉上，已成公開的秘密，即自普選制度實施以來，情形也未稍變。就收買一項言罷，在第一次普選中（昭和三年），政府黨的政友會，由田中義一（即上奏日皇，條陳大陸政策陰謀者，我國人當牢記）經手使用了一千萬元的選舉費。同時，反對黨也使用金錢收買，惟其數目不能如政府黨之多。據調查，政友會和民政黨以次日本各既成政黨，在每次的選舉上，至少要使用選舉費在五百萬元以上，各就候選人平均分配，即每一個人要使用三至五萬元之譜，多的則使用至十萬元。如此情形，日本的一般人民，如何能得有力量被選為議員呢？

日本選舉費的來源有二：其一為政府方面的所謂「機密費」，其二為大財閥付出的支持費。前者曾經幾次暴露了日本政府的秘密，後者造成既成政黨必須與財閥勾結的主要原因。關於日本選舉上使用機密費的事例，日本議員尾崎行雄，曾無情地暴露於下，處處與普選聯著關係：

「事實勝過雄辯，我國使用機密費，使用過軍事機密費的事例，有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及西伯利亞出兵（即大正三年的遠征）以來即繼續發生。……中

日戰爭時，陸軍使用的機密費，只有三六九，〇〇〇元，日俄戰爭是三二〇萬元。今日的西伯利亞是無人之地，也沒有敵人，在沒有敵人的西伯利亞，倒使用了二千四百萬元。對於此點，能有人不懷疑嗎？若就此二千四百萬元的用途分析看，則大隈內閣十五萬元，寺內內閣三四〇萬元，原內閣二千萬元，都是使用於沒有敵人的地方的。若此，人民對於此種款項之使用於何處？如何使用？發生疑問，自是當然之理。在寺內內閣的時候，發生過眾議院的解散事件，在議會解散後的選舉，照例需要特別多的選舉費。『機密費』突然由十五萬元激增至三百萬元，自與議會的解散，聯著某種的關係，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樣，在原內閣時代，也發生過為阻止普通選舉法而解散議會的事件。此時，在解散後的選舉上，軍用基金正極豐富，二千萬元的機密費，就用於沒有敵人的西伯利亞沙漠上了。這裡也當然有某種的聯繫」（大正十五年眾議院議事速記者——尾崎行雄）。

事實也如尾崎翁所暴露，從側面也可以證明。原內閣當時的陸相，是田中義一，原與田中之間有著特別的關係，田中既為原系政友會盡了力，後來政友會的總裁交椅，就給田中坐上了。又，田中當時的軍事課長奇崎（後來的陸軍總監），因為反田中的機密費的用途而被辭為聯隊長，也是一種佐證。

另一日本選舉的弊病是政府的干涉亦為日本政界的公開事實。政府黨所以獲勝的原因，其適當的事例，我們可以想起昭和二年為實施普選法而舉行的府縣的選舉事例。政友會內閣在成立的不久即於昭和二年五月十七日經內務大臣鈴木喜三郎之手，免掉民政黨系的知事二十多人，而代以政友系的浪人。其後又連續更動內務部長，及警察部長，是為準備府縣會的選舉的措施，故至實行選舉時，要求依照命令行事。在這種命令之下，

各地對於選舉出以無限次數的干涉，終致宮崎縣古宇田知事觸犯了司法問題。日本報紙也有披露：「知事恰如參謀本部」，「選舉當時的古宇田氏，完全超越政友會支部顧問的地位，而有支部長之感。知事家裡架設專用電話，曾召喚茂山高等課長，授予高等政策，努力引導，友方政黨候選人於有利地位」（《東京日日新聞》昭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選舉干涉的鬥爭，發生於反對黨（在野黨）的抗爭的同樣干涉行動上。民政黨也發揮對策，他們派遣前任的警保局長，前任警視總監，被田中內閣卸職的民政黨系的知事，前任警察部長，前任高等課長充當「選舉干涉監視委員」，挨戶訪問他們以前的部下，現任的警官，予以疏通，甚至於加以威脅說：「你們若干涉民政黨候選人的選舉運動，到民政黨內閣的時代，就要免掉你們。」於此便知對於政府黨之發動官僚行政機構進行的干涉，反對黨也如何發動官僚的要素，與之對抗，彼此分庭抗禮，真是無獨有偶，日本的普選制完全喪失了真正的意義。

四、日本議會的推移

從上面的剖述，可知日本議會完全沒有民意的表現，也不可能有意義表現的機會，它只是日本政治特質的官僚意識，乃至各派官僚鬥爭的演武廳而已。

日本議會是被日本憲法的特殊規定及官僚勢力所閹割的機構，在平時完全歸貴族官僚把持，在戰時則為軍事官僚所支配，而決定其推移的力量，則在於國際情勢的變化與兩派官僚因緣時會的轉變。

日本資本主義素患外強中乾的枯血症，其政制又是立憲其名而封建其實，所以在任何時代都需要向外侵略。那一個當權的人，能夠順利遂行其對外侵略，則可以掌握政權，

控制議會。但是同時，任何一個或一派當權的人，到不能支持或開發侵略戰爭時，他或他們都要受到議會的問題，或更確切些說，遭遇反對黨的反對，甚而至於興問罪之師。

過久的不講，只就東條軍閥及親軍派政權說罷，東條政府在太平洋戰爭初勝的時期，很少遇到議會的問題。一九四二年一年的經過如此，即一九四三年一年還是風平浪靜。但在一九四三年，東條因鑒於時局日趨困難，對於反對派採取了緩和的態度，在過去一年中一連召開過三次會議，報告案皆盡歪曲陳詞之能事，議會幾乎完全為親軍的空氣所籠罩，仍然是一片「無風帶」。

在過去一年中，日本在野的反對派，還能忍耐聽取東條政府積極準備決戰的呼籲，但經過一年，今日，日本不但沒有決戰，並且沒有決戰的能力的準備決戰的前程，甚且非常渺茫。而中美英盟軍總反攻的舉動，日益浩大，蘇聯也有參加圍剿的可能。「一億人民」皆戰慄了，現握攻權而負其責的東條政府，也已起了畏懼，其在野的反對派乘勢起來活動，也是當然的趨勢。今日各報揭載日本「第八十四屆議會，定於一日起召開」的消息，又據接近議會的人士指陳：「該次議會開會的特點，乃因局勢的發展，將決定議會本身在戰爭狀態中的何種地位。」日本政界人士也宣稱：「此次議會所討論者，並非政府的議案及預算，而是造成此項議案及預算背景的較重要問題。」這些消息提供我們對於日本議會及政局推移，許多可以深切吟味的資料。

議會尚未披露所討論的內容，其實際情形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預料的，日本戰時議會的本質，已在變化，隨著太平洋戰局的演變及可能更大的演變而在變質。日本戰時政府已面對著多事多難的時期，議會將如何對於戰爭的責任，興問罪之師，是可以預想到的。此後的日本議會開會情形，或將較有聲色，或將不復為「無風帶」。議會「所討論者，並非政府的議案及預算，而是造成此項議案及預算背景的較重要問題」，已經告訴我們：此後日本議會所討論的對象，將不是單純的內政的技術問題，而是與戰

局有關的全面的問題。據筆者的觀察，日本議會討論的著重點，將有兩方面：

第一，偏重於外交。在現勢下如何重新估計軸心外交的比重及其推行技術，如何重新確定蘇日關係可能的演變及其應付的手段，對於日益加緊攻勢的美英，應如何設法應付，乃至如何個別對付，對於獨霸亞洲最主要對象的中國，應該如何加緊其侵略陰謀，或有無更新對華外交的必要，……這些將成為討論的題材。

第二，偏重於如何決戰，而不是如何執行決戰的單純的內部問題。不錯，一九四四年將是日本更重要的決戰年，但是決戰不能只在準備，決戰也不只限於使用武力。日本究竟能否決戰？是否應當決戰？可否採用武力以外的決戰，結束戰爭？這些已為日本一般人士所留心，相信關心「大東亞戰局」的政府反對派，必不能放鬆這些問題。

總而言之，日本在「大東亞戰局」中的地位，已開始走下坡的路程，執政權的東條軍閥政府，已走完紅運，不但對外處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的境地，即其對內也以荊棘滿路，不能如意算盤上下其手了。反對派將運用議會的場面，向政府下攻擊令，至少也將醞釀進攻。日本議會此後將更熱鬧無疑。

(元月二十三日)

原載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二十五日《廣西日報》

如何鏟除日本軍權政治

參予此次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都成了戰爭罪犯。這不但是表面上的法律問題，而實際上毋寧是日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問題、本質上的問題。換言之，想根絕日本軍人的侵略性，必須從根本鏟除日本的軍權政治。

日本軍權政治在日本憲法上及實際政治上占著重要的位置，可以說是日本的政治制度問題之一。所以想根絕日本軍人的侵略性，必須先瞭解日本軍權政治的實質。

今日，日本軍人，尤其是上級軍人雖然成了戰爭罪犯。但是根本鏟除日本軍權政治，還有待於此後日本政治制度的改革。所以今日尚有徹底認識日本軍權政治的必要。這不獨為聯合國國家所關心，並且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深願關心改造日本的台灣日本人士，特加注意。

日本社會科學界早已經公認日本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的軍事性。九·一八事變以來，特別是「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許多事實更加證明這種軍事性之存在。這是理解日本的一個關鍵。

像日本軍閥那樣政治地位的優越，和政治行動的跋扈，在普通的民治國家裡，實在找不出第二個。日本的法典及習慣皆保障軍部的優越地位，日本軍部的幾個重要中央機構，如軍事參議院、元帥府、參謀部、軍令部及侍從武官長等，都是直接輔佐天皇而握有帷幄上奏權的機關。日本陸海軍部大臣不隸屬於內閣政府，而是代表軍部意志的資格或權威，這一點是日本和歐美民主主義國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日本憲法上，規定許多種各國憲法所沒有的天皇大權，其中，關於軍事的重要事項，例如規定海陸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的大權（憲法十二條），宣戰、講和及條約締結的大權（憲法第三條），皆可

以不得國會通過而直接由天皇行使。特別是頒布戒嚴令的大權（憲法第十四條）甚至可以剝奪憲法所給與人民的一切權利。但是關於軍事方面的天皇大權的行使，事實上都是由軍部的幾個中央機關去決定的。陸海軍部大臣不隸屬於內閣，而直屬於天皇，事實上與總理大臣並列，他們對軍部負責，不對內閣負責，也是最大的特點。再如陸海軍部大臣不能由總理大臣選任，而必須由軍部選任，也是一個當然的特色。假如政黨政治色彩最濃厚的大隈內閣（明治三十一年）尚且不能由總理大臣選任海陸軍大臣，而向薩派的前任海軍大臣西鄉請求海相，向長閥的前任陸軍大臣桂氏懇求陸相，結果只有懇切請求他們留任，桂陸相答應留任時，且聲明自己是以「異分子」入閣的。一九三一年以後，隨著日本對外侵略的發展，軍部的優越地位更加增強，甚至於軍部應負責的大事變，如五·一五事件發生時，內閣全體總辭職而陸海軍部大臣倒反泰然留任。二·一六事件後，內閣總理竟須在軍部的要求條件下成立，廣田與寺內磋商條件，幾至流產。這些都是鮮明的事實。

日本軍部的地位雖是如此優越，但它並不是一個空架子的集團，而是有它政治經濟的基礎的，它是背後有所依屬的一種力量。日本軍部無論在過去或是現在，都是為著某一種政治經濟的權利服務或與之結托的，它聽令於一種首腦，而自己只充當四肢。在明治中葉以前，日本資本主義還帶著濃厚的封建色彩的時代，日本軍部是為官僚、地主服務的。到了後來，獨占資本（包括國家托拉斯資本及財閥獨占資本）充分發展，官僚和財閥合抱，日本軍部就自然地轉而為獨占資本服務。這裡或許有兩種事實值得考慮，其一是軍閥支配財閥的一般看法。日本軍部勢力的猖獗，表面上好像軍部支配著一切，軍權支配著財權；但是軍部的任何主張並沒有根本否認財產私有制；反之，他們提倡軍備的大擴充，倒反增強了官僚支配下國家資本托拉斯的力量，培植了個人財閥資本的膨脹。其二是個人財閥支配軍閥的另一種看法。過於機械地評量日本金融資本勢力的人，

常把三井、三菱等財閥的力量估得過高，說事實上軍閥不過聽命於幾個大財閥。但這種看法忽略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忽略了日本產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特性，乃至無視了日本財閥成立過程中的特殊事實。

從表面上看來，日本軍部常直接間接與財閥衝突，政黨與軍部之間也發生不調和的事象，但是軍部始終是為某一種經濟力服務的，近年幾乎可以說完全是在為獨占資本服務的。從本質看來，我們說日本軍部服務於日本獨占資本可以，說日本軍部完全服務於財閥則不可以。日本的獨占資本和其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官僚操縱下的國家資本托拉斯的比重，大於個人財閥的獨占資本。而個人財閥獨占資本又是國家資本的附庸，那麼現在充當獨占資本的手足的軍部就表現為主動力量。

日本資本主義是在封建的土地經濟基礎上，在家長式政府的溫床裡發展的。由封建經濟的遞變，在極短期中確立了產業資本，緊跟著就是金融資本的成立。歷史要求著日本更高一層的發展。在日本現存經濟組織下，日本資本主義不能向社會主義轉變而很自然地要求著法西斯的實現。獨占資本和封建勢力的融化，個人財閥獨占資本和國家資本托拉斯的結托，皆要求著法西斯的實現。日本幾年來的政治過程，都是在這種要求下摩擦過來的。有一部分急進法西斯分子不滿意財閥，也不滿意官僚和政客，於是發生過多次次過激的暴動，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等。但是日本的政治機構不容許急激的改革，只能容許一個合法的法西斯。於是需要著政黨與軍閥的融合，還需要著政黨、財閥和軍閥的合抱。二·二六事件以後，每一任的內閣皆努力於這種工作。寺內、廣田內閣的努力，失敗於政黨與軍部的尖銳對立。繼起的林內閣也不過成功了政黨與軍部調和，而未及完成三者的抱合。到近衛內閣，才算成功了這種偉大功勳（？），而日本政治就更急速地向法西斯的方向發展了。

然而日本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在其開始第一步即已帶上軍事性，軍隊培植政治經

濟向前發展，其政治經濟也靠軍隊及軍備來維持，軍部的勢力依然占著優越的地位。日本法西斯，不但需要著軍隊的膨脹及軍需工業的發展，並且要由軍部的力量來維持這個秩序，來推進這個發展。又在對外的關係上，日本經濟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必須侵略外國，獨占外國的資源、市場，以及勞力，以補強它先天及後天的缺陷。於是日本法西斯更需要著強大的軍權來維持，來開拓道路。根據日本國內外客觀的條件，日本法西斯承受日本資本主義的衣鉢，帶上更濃厚的軍事性。從本質上考察，日本資本主義是軍事性的資本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軍事性的帝國主義，日本法西斯更是軍事性的法西斯。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軍閥與獨占資本主義的共同要求，把日本經濟漸向戰時經濟體制方面推進。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軍部又把日本政治、經濟，及軍事的一切推上戰爭的軌道上。日本法西斯發展過程上的種種摩擦，居然依賴這個發展而消滅下去。日本政黨，財閥和軍閥的緊密的抱合，居然在對外侵略戰爭的軌道上完全實現，軍部充當四肢的作用更要發揮，軍事法西斯的色彩也更為加濃，其前途是只有毀滅的一途。這次日本的戰敗，自是注定的命運，深望日本人民自己反省，力謀根本改革政治制度。

原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八、九日《人民導報》

日本軍權政治終結與日本人民應有之努力

我們分析過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本質，我們須更進一步研究日本資本主義軍事特質的歷史條件及其經濟基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非常遲後的，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各國大多完成了產業資本的發展而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了。這個時代的落伍性就逼著日本政府採用人工來培植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主觀上固然是為了國內外軍事的必要而建設了軍警網，創設了軍需工業及重工業交通工業，而在客觀上卻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日本因為這個帝國主義時代性的決定及其先天的缺陷（資源缺乏、市場狹小）而急激走上對外侵略的途程，日本軍隊領導商品及資本向外進出其特色，恰與英美等國相反。此外，產業、特別是基礎產業（Key-industries）的創造和發展，皆產生於軍事的目的，並且是由軍需工業領導著普通產業，又與通常的產業發展形成顛倒的關係，也是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歷史條件。又比如，日本近代三次對外戰爭的結果，取得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條件等等，也都是軍部的優越政治地位及今日軍事法西斯的歷史條件。

其次，為軍事法西斯的經濟基礎，在日本經濟體制中也有許多特殊的事實可提。日本軍部所以能與財閥結托的原因，即在於這個日本經濟的特殊性。貫通日本近代經濟的發展過程，軍需工業占著最重要的地位。日本軍部要求軍備的大擴充。日本官僚和財閥要求軍需工業的大膨脹。所以不相稱的龐大財政，皆能很容易地年年增加下來。軍需工業經營於國家托辣斯資本，及財閥獨占資本而受軍部的統制，也是軍部勢力繼續膨脹的原因之一。但是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經濟原因，還是在於日本軍事資本主義的特性，不但在其初期需要對外侵略以建造它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即在帝國主義階段，也需要

更大的市場和更豐富的資源，否則日本帝國主義經濟早已無法維持。日本經濟要求日本軍部執行這種任務、日本軍部也很強硬地執行這種任務。幾年來因軍需急增引起的通貨膨脹的景氣，及因軍備大擴充引起的軍需景氣，阻止了日本經濟的衰退，還進一步增大了一般事業的生產指數。這種動向，雖是軍需工業資本的要求，但其發動則須歸功於日本軍部忠實地強硬執行它的任務。日本軍部把日本經常的經濟推進準戰時的經濟體制中，在中日戰前既已有六年的期間，近衛內閣以來又把準戰時經濟體制帶上戰時經濟體制的途程。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作全面的侵略，就是日本軍事法西斯經濟發展的結果。日本法西斯是否能受到挫折，原要由中國全面抗戰的努力如何來決定。所以說，中國的對日抗戰不獨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並且帶有解放日本大眾的意義。中國抗日戰爭是反帝國主義的，同時又是反法西斯的，特別是反日本軍事法西斯的，所以中國民族和日本大眾正站在同一厲害關係的基點上。這是分析日本軍事法西斯的結論。

現在，由於日本軍閥的敗戰，日本軍權政治倒台，而日本歷史開始另一個階段的新頁。日本人民能運用此歷史的轉變，製造一個合理的和平的政治制度來，日本軍權政治就可以斷定，確已壽終正寢。

不過，中國軍民及聯合國國家軍隊，對於日本人民的貢獻，只是提供一個歷史轉變的機會，日本此後歷史的趨向，固也已奠定基礎，但其轉向的角度及其遲速問題，就有待於日本人民自己的選擇和努力了。

相信、日本人民不願意戰爭，他們與中國人民一樣，酷愛和平，他們就必須選擇人民自己決定政治措施的政制。民主政治運動已在邁進中，但願百尺竿頭進一步，貫徹到底罷！